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 读书之旅 2



## 读书之旅

## 地平线

### 尊重谁的文化差异？

龙应台 卢伯华 译

这篇文章在 1998 年 4 月 2 日由德文的法兰克福汇报（FAZ）副刊作特稿发表。刊出后引起欧洲读者注意，从巴黎到布拉格都有回响。多数欧洲人以为人权争议是东西文化之争，符合亨廷顿的冲突理论。这篇文章至少透露了一点：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支持威权主义，不是所有的西方人都信仰自由主义。所谓文化差异已经不能够沿着传统的文化区域分隔去切割。看起来是甲文化与乙文化的差异，往往同时是甲文化或乙文化内部也有的重大分歧，做文化对比时不能不慎重。文章虽是与欧洲人的辩诘对话，或许对中文读者也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野。

### 中国人不一样

中国人究竟有多么不一样？加州学者张隆溪曾经用了一个例子：小说家波赫士为了彰显中国人的“不一样”，说他在一部中国百科全书里读到中国人对“动物”是这样进行分类的：

一、属于天子的动物，二、经过防腐处理的动物，三、已经驯服的，四、乳猪，五、会尖叫的，六、寓言动物，七、无主的狗，八、属于此类的……十一、用骆驼细毛可画出的，十二、以此类推，十三、打翻了水瓶的，十四、远观貌似苍蝇的。

波赫士当然是天花乱坠，旨在嘲弄，但傅拜却正经八百地去解读波赫士的玩笑。他说，中国人这样“不一样”的思维方式显示出“在地球的另一端有一个文化，这个文化专注于空间秩序；对于事物的复杂性的理解，以我们的归类思维方式，与他们是完全无法进行命名、讨论、思考的”。

中国人的“非逻辑”思维在中国哲学家圈内也是一个争论已久的题目；梁漱溟就曾经强调过中国人重玄学的直观思维。但是波赫士的“百科全书”如此荒诞而竟有人上当，表示“中国人不一样”这个认定在欧洲是如何的根深蒂固。这种认定在欧洲的通俗文化里也非常普遍。

德国南部有个旅游景点。叫“欧洲乐园”，有“小意大利”、“小瑞士”、“小法国”等等。每个小国里都有鲜花怒放的庭园、雅致的小桥流水。带着民族风味的房子漆着明亮的色彩，童话中的公主和小矮人随着甜美的音乐向游客微笑、点头。

乐园中惟一不属于欧洲的国度叫做“巴塔维亚之屋”（巴塔维亚是雅加达旧称）。这个亚洲小国嘛，就在一个乌七八黑的水流甬道里，阴森森的。游客坐在小船上，看见的是头戴斗笠、蓄山羊胡的蜡制中国人，怪模怪样的亭台楼阁；鳄鱼埋伏水中，长蛇盘身树干对游人丝丝吐信。失火的房子里，一个黄种人强盗高举着尖刀正追杀一个嘶喊的妇女。

“欧洲乐园”所推出的亚洲图像使我想起英国作家德昆西的名著《一个鸦片鬼的忏悔》。《忏悔》中当年最脍炙人口的段落是他对自己梦魇的描述。德昆西的梦魇有一个不断重复浮现的主题：“属于亚洲的种种最恐怖的酷刑和意象。”譬如：“在中国或印度最常见的热带动物——飞禽猛兽、爬虫、

奇花异木”，都以最可怕的形象出现。鳄鱼追咬不放，他逃进“一间中国房子里，里头藤制桌椅的脚突然活起来；鳄鱼那令人恶心的头和邪恶的眼盯着我看”。当他的孩子将他吵醒，他看见孩子“天真”的、“属于人类”的脸庞时，不禁泪下。

“欧洲乐园”所反映的不过是德昆西对欧亚文化差异成见的翻版——欧洲是光明的、理性的、愉悦无邪而安全的，亚洲却是阴森的、非理性的、神秘诡异而危险的。可叹的是，从德昆西到“欧洲乐园”，人类已经走了 150 年的时光！

欧洲人固执地继续相信“中国人不一样”当然有许多复杂的原因，其中之一可能是人们对异国风情有一种自然的向往；神秘而又危险的异国风情较之一般的异国风情又更有刺激性。没有了阴森恐怖的“巴塔维亚之屋”，“欧洲乐园”岂不太无聊了？

## 两极化的东西文化

中国人对西方人自然也有难以打破的成见。在义和团的年代，许许多多的中国农民深信传教士会拐骗小孩，然后在教堂地窝里挖出小孩的眼珠。到 100 年后的今天，仍旧有不少人相信中国人和西方人从人性基本上就完全不同。1997 年 11 月的上海一家报纸刊出了这么一篇文章：

中国人深谙兵法，但崇尚和平；我们参战是出于自卫，洋人则爱挑衅、好杀戮及侵略。

中国人出口他们认为最好的东西；洋人出口最能获利的东西。

中国人的疆界由民族融合而定；洋人疆界依靠刺刀和马靴。

中国人讲义，洋人讲利。

中国人教导子女知足，洋人教导子女要求更多。

黑白二分、简化到这个程度的思考在这里是无需评论的，但是同样简约制式的思考方式却也同时是部分亚洲人津津乐道的所谓“亚洲价值”的基础。在“亚洲价值”的架构里，中国文化，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个群体文化，而西方文化，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个个人文化。人权观念与个人主义是分不开的，因此它是西方所特有的财产，不属中国传统。结论就是：不能将现代西方的人权标准求诸中国。对中国要求人权的，若是中国人，就是卖国叛徒，若是西方人，就是殖民主义者。这种推论法不仅只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爱用，西方许多自诩进步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所谓“文化相对论者”，也坚持这样的观点。

这样的观点有两个基本问题。首先，个人主义或者人权观念不属于中国传统，和应不应该在中国推行人权丝毫没有逻辑上的必然关系。马克思主义显然不属于中国传统，却在中国运行了半个世纪之久。女人缠足显然属于中国传统，却被中国人摈弃了半个世纪以上。所谓传统，不是固定的既成事实，而是不断的突破发生。

第二个问题是，对文化的简化就是对文化的扭曲。中国文化在时间上绵延 3000 多年，在空间上横越高山大海，在组织上蕴涵数不清的民族，在思想上包容百家学说，还不去提种种巨大的外来影响，譬如佛教。“一言以蔽之”地断言中国传统中没有个人主义，就是完全无视于与儒家并列的种种思想流派，譬如极重个人自由解放的道家。即便是儒家思想本身，又何尝不是一个

充满辩证质疑、不断推翻重建的过程？

西方文化发展形成的复杂，同样抗拒着任何“一言以蔽之”的简化。你说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是西方文化的胎记？哪一个时期的西方文化？文艺复兴前或文艺复兴后？启蒙运动前或启蒙运动后？你说人权观念属于西方传统？法国大革命前或法国大革命后？个人、自由、人权，在西方文化里也是经过长期的辩证和实验才发展出来的东西，不是他们“固有”的财产。

文化，根本没有“固有”这回事。它绝不是一幅死的挂在墙上已完成的画——油墨已干，不容任何增添涂改。文化是一条活生生的、浩浩荡荡的大江大河，里头主流、支流、逆流、漩涡，甚至于决堤的暴涨，彼此不断地激荡冲撞、不断地形成新的河道景观。文化一“固有”，就死了。

当然，把文化简化、两极化，是挺有用的。它能够清楚地分出“非我族类”，而异我之分又满足了人类天性需要的自我定位与安全感。对于统治者而言，它又是一个可以巩固政权的便利工具。步骤一，他按照自己统治所需来定义什么是“民族传统”、“固有文化”。步骤二，将敌对的文化定义为相反的另一极。步骤三，将他所定义的“民族传统”、“固有文化”与“爱国”划上等号。这么一来，任何对他的统治有所质疑的人都成了“叛国者”，他可以轻易地镇压消灭，往往还得到人民的支持，以“爱国”之名。

### 代表谁的中国人？

文化多元主义的原则是很吸引人的：不同文化之间确实存在差异，而且我们必须尊重别人保持文化的差异的意愿。但是在我看来，问题症结不在“尊重”文化差异，而在“认识”真实的文化差异。好吧，“中国人说，人权观念属西方文化，不是中国传统，所以不适用于中国。”在辩论适用不适用之前，有些根本的问题得先搞清楚。

是谁提出这种说辞？是中国人的少数还是多数？如果是少数，他们有什么代表性？如果是多数，他们持这样的主张是基于什么样的历史事实、什么样的哲学思考、什么样的动机、什么样的权利？

这些问题不先追究，我们何从知道他们所宣称的“文化差异”是真是伪？如果所谓文化差异根本不能成立，就不必再讨论下去了；文化相对论者也无法置喙其中。假使文化差异是真实的，这个时候，作为一个西方人，他可以考虑究竟该如何看待这个差异，而谨记伏尔泰的名言：“尊重不一定是接受。”作为一个中国人，尤其是一个认识到凡是传统就得面临变迁和挑战的中国人，他很可能决定：这个文化传统压根儿不值得尊重，只值得推翻。谁也不会否认，一整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个中国传统全盘重估的过程。

但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某些人，从来不曾允许过别人对历史有不同的解释；他们企图在世界上代表所有中国人说话，企图向世界解释什么是中国文化传统，并且要求国际尊重它的文化“差异”，一种由强力定义的文化“差异”。奇不奇怪？

托马斯·曼流亡美国时，记者问他是否怀念德国文化，他答道：“我在哪里，德国文化就在哪里。”他的意思够清楚了：假使硬要一个人来代表德国文化的话，那么那一个人就是他托马斯·曼而不是希特勒。告诉我，哪一个文化相对论者要“尊重”希特勒所宣称的德国文化“差异”？当然，同一个德国文化培育了托马斯·曼也培育了希特勒，但是全盘接受一个由统治者

片面定义的文化差异而毫不批判置疑，在我看来不是盲目无知，就是对受压迫者冷酷漠视。

人权观念属不属于中国传统？这个问题和中国人该不该享有现代人权毫不相干。但是在深入探究这个问题时，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就会较清晰地浮现出来，两者都不能以简化或两极化来理解和对比。尊重文化差异，是的，然而必得是真正的文化差异，而不是由统治者为了权力需要所设计出来的伪差异，或者是为了满足观光客而想像出来的“巴塔维亚之屋”一类的变形差异。

我个人并不担忧异国风情和神秘感的消失，真正的文化差异可以提供足够的空间让想像奔驰、好奇心探掘，而不冒扭曲的危险。扭曲一个文化固然可能点燃有趣的“创造性的误解”，却更可能导致毁灭性的仇恨。

（《文汇报》1998年8月1日）

## 域外书讯

### 《所有这一切的意义》

R·费曼著海利克斯出版社

美国杰出的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费曼逝世已有十年了。但是时光的流逝并没有使人淡忘他。相反，最近出版界和读书界对他的兴趣越来越浓，不断有他的遗著被整理出版。

这本新出版的费曼著作实际上是他多年前在华盛顿大学所作的一个系列演讲。演讲的内容不是他所从事的物理学专业，而是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他以一个职业科学家的视角，来看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科学才能健康发展。

费曼指出，科学的根本动力在于怀疑，在于对已有的确定性的挑战。一个科学家如果想要真正解决一个什么问题，他必须为未知因素和疑问留下位置，他必须时时质问自己，是不是已有的回答还不够好。只有这样，科学才能持续向前发展。然而在专制集权制度下，科学并不能享有这种与疑问和不肯定性的特定关系。因为专制制度是容不得疑问的，特别是在排除了血缘神话的现代，独裁者总是以自己的全知全能洞察一切作为专制权力的根据的，在这种自上而下的一统专制里，科学家是无法自由地疑问自由地思考的。他们的思想必须符合官方已定的教条。

相反，民主政体是一种能容忍疑问和不肯定性的制度。事实上民主制度就是来自于对政府功能及其合法性的怀疑。费曼认为，美国宪法的制定者之所以将宪法规划成现在这个样子，就是因为他们认为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该如何组建一个政府，以及该如何治国。美国民主政制的可贵之处就是允许尝试新的政治思想，由此，费曼指出在科学和民主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刻的亲缘性，两者是互依互存的。

## 新闻与宣传

展江

在一般公众眼中，新闻与宣传是同义语。这一情形的产生自有其原因。首先，中国的新闻媒介受党的各级宣传部门直接领导；其次，我们过去不大分得清新闻与宣传的不同之处，在封闭的环境下沿用苏联的新闻与宣传模式，新闻界很少受众本位和新闻市场的概念。

美国政治学者、传播学奠基人之一哈罗德·拉斯韦尔在其成名专著《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1927年）中对宣传下的定义是：“它仅指以有含义的符号，或者稍具体一点而不那么准确地说，就是以描述、谣言、报道、图片和其他种种社会传播形式来控制意见。”10年后他将宣传的定义修正为：“宣传，从最广泛的涵义来说，就是操纵表述来影响人们行为的技巧。”拉斯韦尔认为，广告和公共关系都属于宣传活动。

在西方公众眼中，宣传常常与党派和团体私利、偏见等含义相联系。当一个传播者被称为宣传家（propagandist）时，他是很难获得公众信任的，因此，宣传一词被弃之不用，而代之以“公共关系”、“广告”等字眼。在美国，新闻界推崇的客观性（objectivity）要求新闻媒介：（1）将事实与观点分开；（2）报道新闻不带感情色彩；（3）公正平衡，使双方均有机会使用向受众提供充分信息的方式进行答复。美国新闻界认为，客观性与宣传是格格不入的。

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宣传家列宁从办报入手创建了布尔什维克党，他组织的卓越的宣传活动，为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立下了殊功。在前苏联，宣传被细分为宣传和鼓动。

从前苏联的实践看，宣传鼓动工作在苏共中央宣传部的直接领导下，为维护国家政权的稳定和抵御外敌入侵作出了突出贡献。同时我们应当看到，前苏联的宣传体制是一种高度集中统一而缺乏活力的体制，宣传工作在和平建设时期暴露出种种弊端，主要表现为：宣传鼓动强调意识形态至上，对马克思主义实行僵化和教条式的理解；宣传鼓动没有将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结合起来，甚至成为鼓吹个人崇拜、推行霸权主义的工具；宣传鼓动全面取代新闻媒介的新闻信息传播功能，终至于出现“《真理报》无真理，《消息报》无消息”的政治笑话。

长期以来，我国的宣传体制和新闻体制，是沿袭战争时期和前苏联50年代宣传与新闻传播模式的产物。这种体制下新闻传播模式的共同点是：单一党报体系，高度集权调控，突出宣传功能，经费和发行国家包干。这种体制在战争年代尚可，到了和平建设时期则弊端四起。有鉴于此，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宣传和新闻工作者，都提出了改进宣传与新闻工作的要求。

宣传与新闻被一部分人视作同义语，至少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着某些联系。这种联系表现在：第一，宣传与新闻都属于传播的范畴。在前面引述的拉斯韦尔对宣传的两个定义中，第一个定义将宣传归结为一种以符号控制意见的特殊传播活动；第二个定义则将宣传归结为一种影响人们行动的技巧。拉斯韦尔的影响是深远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对宣传下的定义是：“宣传是一种借助于符号（文字、手势、旗帜、纪念碑、音乐、服装、徽章、发型、硬币、图案、邮票等等）以求操纵他人的信仰、态度或行为的或多或少系统的活动。”在传播学东渐的今天，我国学者对宣传的理解与国外同行趋于—



致，《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的定义是：“运用各种符号传播一定的观念以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的社会行为。”

第二，现代宣传主要通过新闻媒介来进行，报刊、广播、电视成为宣传者使用的基本工具（当然，现代宣传并不排斥古已有之的各种简单媒介）。

第三，新闻事业脱胎于宣传活动。新闻事业充其量只有二三百年的历史，而早期的报刊均是特定的政治或宗教集团的宣传工具。从世界范围看，报纸从“观点纸”向“新闻纸”的转变仍然是一个尚未完全终结的过程。

然而，这种共性只是一种表象，宣传与新闻无论是在内容上、方法上，还是在目标上，都有若干相异之处。第一，宣传重符号，新闻重信息。符号是对特定反应者而言又有特殊意义的信号（刺激物）。符号被认为具有“神秘、不可思议的魔力，这种魔力的最大秘诀，在于唤起人们的刻板印象”。恰似动物对铃声作出条件反射一样，在刻板印象面前，人们会不由自主地作出一致的反应。两个以上的反应者对相同的符号可能附加不同的意义。“卐”对于纳粹来说，是种族优越和德国强大的象征。镰刀铁锤对共产党人、十字对基督徒、新月对穆斯林，都是具有特殊意义的符号。而新闻传播追求的是信息量的最大化。

第二，宣传要反复，新闻重新意。宣传受预设、恒定目标的导引，需要以相同的内容对宣传客体进行反复的灌输。而新闻传播期待的是“朝朝新世界”，最忌老生常谈。

第三，宣传重观点，新闻重事实。政治宣传所传播的总是某种观念，通常表现为一定的理论、纲领、方针、道德主张等；即使传播某些事实，这些事实也是为上述观念服务的。而新闻传播须臾离不开具体的、不大受传播者好恶影响的事实。

第四，宣传重时宜，新闻重时效。为了获得更好的宣传效益，宣传者总是选择适当的时机发布某些信息，宣传过程常伴随着“旧闻”和“不闻”。而时效是新闻的生命。

第五，宣传重操控，新闻重沟通。宣传的本质在于其功利性，旨在对宣传客体进行操纵和控制。新闻传播则以变化的最新信息沟通整个社会。

第六，宣传有重点，新闻讲平衡。无论是政治宣传者，还是广告商，其宣传活动总是具有强烈的倾向性。而新闻传播则注重以全面、详实的最新事实勾勒世界的完整画面。

笔者无意否定宣传的作用和推销西方的新闻价值观。我的意见是：一些新闻传播大国对新闻的认识是领先于我们的，这种规律是无所谓国别和阶级性的。如果无视它，受惩罚的不仅仅是传播者本身，更有千千万万的传播对象。

（《方法》1998年第6期）

## 思想书廊

### 《往事与随想》（三卷）

[俄] 赫尔岑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年3月版 定价：65.40元

赫尔岑是俄国伟大的文学家和革命家，他的作品影响了整整几代人的思想和生活。三卷本《往事与随想》是作者用血和泪写成的回忆录，它不仅忠实而真诚地记载了他的一生，而且正如他所说，这是“历史在一个偶然走上它的道路的人身上的反映”，是19世纪社会良心的实录。

## “焚书”与“反文化”

雷颐

从一战结束到 1933 年希特勒攫取政权这十余年间，也是茨威格创作激情喷泻、最终功成名就的十余年。

这期间，他的书出了一本又一本，而且发行量越来越高，影响越来越大。如薄薄一册《人类群星闪耀时》就遍及所有学校，印数很快就高达 25 万册；还有一些小说被改编成戏剧或电影。他的作品被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多种文字，据设在日内瓦的“国联”办的《智力合作》杂志统计，他是当时世界上作品被翻译得最多的作家。甚至在外国旅行时他也偶会被海关人员认出而享受“免检”的优待，在火车上也曾受到列车员的礼遇……作品的畅销当然还给他带来可观的收入，不仅不必为生计发愁，还可以使他纵情于青年时代的嗜好，大量搜集价格不菲的名人手迹等等。

但当 1933 年希特勒夺取政权后，这一切突然结束。为了“统一思想”、保持“德意志的精神纯洁性”，希特勒纳粹德国实行严酷的文化专制主义，实施了一系列具体的文化清洗政策以防止“异端邪说”的“污染”。由于他的犹太血统和作品中的反战主义与和平精神，他与其他一些犹太作家的书都被纳粹宣布为禁书。这种禁书措施，纳粹十分狡猾地分步实施，首先是煽动起民众的情绪，以“群众”的名义进行：“对我们著作的第一次攻击，是推给一群不负正式责任的人，即身为纳粹党徒的大学生们去干的。在此之前，他们为了贯彻蓄谋已久的抵制犹太人的决定，导演过一出‘民众的愤怒’的丑剧，他们也以同样的方法，暗示那些大学生们，要他们对我们的著作公开表示‘愤慨’。”这些情绪被挑动起来的大学生们成群结伙冲向书店和图书馆，把他们的书搜走，或按中世纪的习惯把这些书钉在耻辱柱上示众，或“把书籍放在大堆的柴薪上，口中念着爱国主义的词句，把它们烧成灰烬，可惜当时已不允许焚烧活人”。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 1933 年 5 月 10 日夜晚，一群群兴奋激动的德国青年学生在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的煽动指挥下，在柏林市中心的歌剧院广场点燃熊熊烈火，焚烧了包括海涅、马克思、弗洛伊德、茨威格等人作品在内的 2 万册图书，作为“反对非德意志精神行动”的主要部分。随后，开始了一系列更大规模的禁书、焚书活动和对进步思想家的残酷迫害。许多犹太作家、科学家不堪其辱，被迫逃往国外。茨威格写道，他的书曾经以百万计，但此时“谁要是手中还有我的一本书，他就得小心谨慎地把它藏起来，而且我的书在公共图书馆里是始终塞在所谓‘毒品柜’里的，只有得到官方的特别许可——大多是为了辱骂的目的——才有人为了‘学术上’的需要去看那些书籍”。

大规模的集体性焚书当然是与人类文明为敌的“壮举”。但在今日一些学富五车的新锐学者文人的笔下，这种焚书却成为与 60 年代美国“嬉皮”们提出的“反文化”相同的浪漫之举，成为“消解文化”的后现代的先驱。不知无意还是有意，他们无视“焚书”是为了更加专制、压迫反叛，而“嬉皮”“后现代”却是强调“多元”提倡“反叛”这种本质的区别。由此，似乎就可以涂抹、减轻焚书的罪恶。对于受害者类似茨威格这样的控诉，反有人指责这是由于他们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被打破”，尽管这种指责者本人以在美国大学任教有洋房洋车过着典型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而自我炫耀。甚至某些焚书的参加者现在仍津津乐道自己当年“相当庄重”的“充满着的神

圣感”，心中充满了“圣徒纯洁的献身感”，以此作为拒不反思、忏悔的理由……

真正的历史总是被轻易忘却，一场巨大的劫难，要不了多久就被涂抹成淡淡的粉红色痕迹。或许，正是由于对人类的极度失望，茨威格才在已经逃过法西斯的劫难，在远离战火的南美仍可过着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时候，毅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 思想书廊

### 《知识考古学》

[法] 米歇尔·福柯著 谢强 马月译

三联书店 1996年6月出版 定价：12.80元

近些年，福柯越来越受到中国学界和读者的瞩目，但其本人的著作在国内却很少翻译出版。有鉴于此，三联书店邀请专家学者主持译事，率先在《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中推出《知识考古学》一书；按三联书店的出书计划，明年初则将在《学术前沿丛书》第二辑中刊行《疯癫与文明》和《规训与惩罚》二书，并正筹划两卷本《福柯文选》的出版。

《知识考古学》是福柯惟一的带有强烈方法论色彩的专著，行文相当抽象艰涩；但其别致的思路及对权力与知识之间关系的剖析在此书中显露无遗。

## 一个童话：天人合一

何家栋

这几年，意识形态领域兴起一股反西方人文主义的思潮，认为它是社会动乱的根源。宣传家们一方面反对“用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方面又鼓吹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性，说是中国生产力虽落后，文化却先进，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否定中国文化传统，“在西方国家面前自惭形秽”，“数典忘祖”。于是，食文化、酒文化、床上文化……都“发扬光大”，酒色之徒成了“文化人”。

这种宣传不自今日始，只是越来越语无伦次了。有些自封的马克思主义者似乎忘了自己的祖师爷不是孔夫子而是马克思，马克思主义恰恰是从西方传来的。如果孔夫子那么高明，何必请教马克思？在西方国家面前自惭形秽固然不好，在传统文化面前自惭形秽就好么？马克思的前辈黑格尔就不大看得起孔夫子，对中国哲学持蔑视的态度，认为孔夫子的教训不过是一种“常识道德”，还没有西塞罗的道德教训高明。他说中国哲学停留在感性的象征的阶段，即使达到了纯粹思想意识，也并不深入。

黑格尔或许有点孤陋寡闻。欧洲学者为中国古代治国术倾倒的不乏其人，或许也可以说是自惭形秽吧。在这方面，孔子所做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如同苏格拉底之在西方，孔子是中国把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的第一人。如同柏拉图把斯巴达理想化，创造了他的“理想国”，孔子把周礼理想化，确立了封建等级和伦理规范，从而发展和巩固了封建制度。特别是他适应社会需要，培养出那么多治国安邦的干才，即使在今天也不多见。

中国人不讲究严密的思维形式，不在乎概念的确切内容，可以无限大，也可以无限小，凡事以意志为之，没有一定规则，因此权变之术盛行。中国人经常处于精神紧张和道德恐怖状态，缺少自由思考的空间，不知在什么地方触礁，在什么角落踏雷。人性也向两极发展，不是谨小慎微，就是桀骜不驯。自我贬抑和自我放纵都是人性压抑的结果。

中国人不好思辨之学，自古已然。冯友兰先生认为这是中国哲学讲天人合一，一直没有显著地将人和宇宙分而为二的缘故。西方哲学最大的成就，就是“我”的自觉，有了自觉，我与非我就一分为二，主观和客观之间便成此岸彼岸，随之产生我如何能知非我的问题。中国人思想中一直无“我”的自觉，我与非我一直没有显著地分开。对于我以外的宇宙不大了然，只好随遇而安。

但也有人认为，“天人合一”是比把人与自然分开的观点更高一级的观点。他们的根据是儒家和道家都肯定了人的价值。中国虽没有西方的“天赋人权”观念，但有“天赋价值”的思想。孟子所谓“良贵”就是一种“天赋价值”，就是主张把人当作人来看待，这表达了人道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也就是人本主义精神。

“天人合一”还有另一个说法：天人感应。天上掉下一颗星，地上死了一个人，若有什么联系，也是“天本主义”，听天由命。国学界好做“现代诠释”，喜欢旧瓶装新酒，外界出现什么新思想、新创造，都能从故纸堆里找到出生证，原来古已有之。既可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又可以作为拒绝它的根据。既然天赋人权是天赋价值的翻版，现代文化启蒙运动不是多此一举吗？

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什么人本主义，说得确切点，只有民本主义。民当然也是人，当然也有价值，但这价值是在载舟覆舟之时才显出来。“天赋人权”、“生而自由”，关键在于人的独立性、平等性，而民在封建等级制度中，只能从属于一种依附关系，没有独立人格可言。

直到中世纪，西方还存在着不能自觉到个人的现象。布克哈特这样描述：中世纪“人把自己只看作是一个种族、民族、党派、家庭或社团的一分子，而且，他只是从种族、民族这些一般群体出发来观察自己”。中国人的内在意识和外在意识，好像都还停留在前现代，所要求于人者，也是共性多于个性，特异独行者便被看作异类。

我们把个人的依附性称作集体主义。所谓集体，就是个人等于零。以反对他人个人主义的罪恶掩饰自己的个人主义罪恶，不仅不受制裁反而得到鼓励，因为他并不觉得自己是在犯罪，而是觉得是在维护集体利益。费正清说得很直率：中国人是从团体和当局的表彰中获得满足而不是从个人抱负的实现或个人任何形式的自我发展中得到满足，所以一见到能主宰他人升沉荣辱的大人物就直不起腰杆了。西方以思想自由和个人独立为出发点，因而看重人权，给人以自我发展的自由。每当美国人以人权保护者的姿态开导中国人，中国人就举起正义的旗子来教化美国人。这类似下棋，美国人下跳棋，中国人下象棋，各有各的路数。跳棋每个棋子都是活跃的，全部棋子到达位置“自我实现”之后，就是成功。而象棋每个棋子都以将帅为中心定进退，作牺牲，如果将帅困死，即使不失一兵一卒也输了。这倒像黑格尔说的，眼睛只有附于身体时才有价值，如果脱离身体就没有价值了。

马克思将集体作为实现个人自由的手段，“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集体获得自由”；集体保障个人自主活动的实现。不能促进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集体，就是冒牌货，“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集体，而且是新的桎梏”。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集体主义都不是剥夺个人权利的理由。个人权利是普遍权利，不是特殊权利；它同国家权利、阶级权利有一致性，也有不一致性。一切专制制度都有以集体名义吞噬个人权利、把自己的特殊权利冒充普遍权利的特征。

个人价值的被确立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也是现代社会的发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就是要求个人地位在更大程度上得到确认。几个世纪以后发生的被胡适称为“中国文艺复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呼唤个性解放，引导人们寻求新的生活方式。虽然同时发生的爱国运动很快转入政治斗争，“救亡压倒了启蒙”，但如果我们不过分拘泥于教科书上历史阶段的划分，而着眼于中国进入世界历史的过程、着眼于思想启蒙的主题——人的解放，救亡正是它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的人文运动在东西方两大文明巨流汇合的过程中，经过许多回合的反复冲撞，波澜壮阔，高潮迭起。40年代以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列入被改造对象，知识分子群体的人文精神遭摧残，以致丧失了自我。我们总是看到，政治危机触发思想解放，歌舞升平就忙着修庙造神，善男信女顶礼膜拜，直到政治再交厄运。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经历了两三个世纪，时起时伏，甚而天下大乱。中国的人文运动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现在就做结论未免太匆忙了。

每次新生产力的出现，总要引起价值的重新评价。自从蒸汽、电气和自动纺机像妖魔一样闯入人类社会，便引起无穷无尽的纷扰。

历史学家汤因比从东方农业社会看到了希望。他认为科学技术的盲目发

展，不但无助于人类精神境界的提高，而且将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汤因比认为需要一种新的政治哲学把世界统一成为一个整体，能担当这个重任的，不是欧美，也不是欧化国家。他认为中国儒释道三家学说包含着力求与自然和谐的神秘的合理主义精神，这种文化心理素质使一个民族在 2000 多年中一直保持政治和文化的统一，并且能够融合周围许多落后部族到本族里面来。现代西方文明所缺乏的正是这种凝聚力。

这个神秘的合理主义很费解，合理性属于科学，可以理解为不狂妄地支配自然；而超乎确切知识之上的神秘性属于神学。他是主张科学和神学结合吗？

用我们的说法就叫“天人合一”。汤因比追求物质和精神的和谐，或者为精神而牺牲物质。他给我们指点出路，最能说明这一点：“中国过去虽然工业落后，但对将来反而是值得庆幸的事。因为落后，中国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国运衰微，受尽屈辱，但也因此避免了极端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所以或许可以说，这是一个廉价的代价。”这好像是一个童话，人们到处寻找幸福，最后发现幸福就在自己家中。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这份“天人合一”精神遗产，至今仍“使人屈服于环境，而不是把人提升为环境的主宰”。正如马克思所说，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

但是汤因比的话还是值得玩味的。商品经济的确是邪恶的，问题在于我们的市场经济，既有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贪婪，也有资本主义垄断时期的腐朽，却缺少资本主义赖以发展起来的理性精神和法制精神，甚至也缺少创业激情。我们不能不考虑究竟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文明模式，既保证物质丰富，又保证精神自由。否则，我们即使不做权力的奴隶，也要做金钱的奴隶。

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都认为有了纯洁无私、诚实正直的理想的人，才能建立理想的国家。其实柏拉图以前的斯巴达城邦业已证明此路不通。斯巴达人人都是钢铁勇士，形同机器，战必胜，攻必克。然而最后还是难逃灭亡之祸。因为它除了粮食，除了铁剑，别无所需。斯巴达王就曾大言不惭地说：“斯巴达人无意向任何国家学习任何东西。”没有文学、艺术，没有哲学、逻辑，没有思想也没有人性。整个城邦是一座大兵营，以征服杀伐为能事，人民生活乏味、社会停滞、国运日衰。军事机器一朝失灵，寡头统治随即垮台，它甚至连一件像样的文物古迹也没有留给后代。再看我们，战争年代，从马背上的摇篮、子弟学校，到苏联留学，也培养出一批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和平时期，毛泽东更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进行人性改造工程，按照完全彻底的模式塑造理想的人民。他的确把人民鼓舞起来了。古往今来，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执著地去改造一个民族，一个数亿人口的大国的国民。他培养出视死如归的战士，却没有培养出独立思考的人。当动乱的烟尘落定之后，他的国民却发现他们是在天堂里过着远不如人间的生活。

历史上一切改造人性、国民性的理想都失败了。因为理想的人不是历史发展的起点，而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中国思想家梦想的“天人合一”，从来没有进入现实生活。

我们有 5000 年历史，但是说来惭愧，我们几乎不知道我们的先人为什么要走到一起来，为什么要创立这样一个国家。我们像一群蜂，嘤嘤嗡嗡地辛苦；我们像一群蚁，忙忙碌碌地操劳。我们总是播下龙种，收获跳蚤。治乱



兴衰，循环往复。现在是该反思我们立国精神的时候了。我们没有“天赋人权”，即使最英明的人物，一旦尝到权力的乐趣，很难分清领导和统治的区别。国家应该保护个人的自由，个人当然拥有争取自由的权利。这就是进入现代文明的出发点。

（《方法》1998年第6期，本书有删节）

## 我们距布拉格有多远

汪政 晓华

《重返布拉格》是捷克作家克里玛与著名美国作家罗斯的一篇长篇对话，对话录译在《漓江》上。克里玛与罗斯的谈话是在1990年，那时还叫捷克斯洛伐克，还有杜布切克，戈尔巴乔夫也尚未退出政治舞台，现在的捷克与那时也已有重大的变化吧？这样说起来，我就有一种捷克始终处在动荡中的感觉和印象，这可能还与二次大战和著名的布拉格之春不无关系。克里玛与罗斯也确实花了大量的时间去讨论二次大战及苏军入侵之后的捷克文学，克里玛提到了当时很特殊的一种文学传播方式，以这种方式传播的文学称为“桑末滋德文学”。桑末滋德出版物是一些不为当局所容的作家、诗人、人文科学家们以油印、复印的方式流传的“地下出版物”，克里玛提到了许多著名的作家以及后来带来国际声誉的作品，在当时，都是桑末滋德文学。发展到后来，桑末滋德文学已不再是偶然的，它已成为与当局的“谎言”文学足以抗衡并在其后被人们视为那个时代捷克真正的文学。笔者曾在一篇研究“文革”文学的文章中感慨过在中国政治专制的时代就未曾有过大气的东西，最近，笔者又在谈论苏联文学时表明了同样的判断，现在克里玛又带来了捷克的参照。中国当时相对强大的地下文学是诗歌，作为朦胧诗的前站，今天看来对它的评价实在言过其实，“文革”后整理公开出版的《第二次握手》、《晚霞消失的时候》等小说艺术水平就更一般，尤其是它们的传奇特色和浪漫主义臆想仿佛与那个时代是隔绝的，我们从中看不见人们的反思和批判。所以，我说中国作家有种自古而来的软弱，缺乏强大的理性力量的支配，没有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足以与任何专政抵抗的人格力量、思想勇气和人文主义传统。

由于缺乏这些，我们很容易被击垮。罗斯用复杂的语气谈到了专制制度下的捷克作家，他说民主社会的作家可能缺少捷克作家的苦难而难有创造与创造之后的效应。克里玛一方面通过大量的叙述介绍了当时的作家、知识分子是如何在监狱、工场和平凡乃至卑微的场所从事着最繁重的劳动，并认为这是对作家们创造力和生存的严重摧残，但另一方面也不无同感地承认，苦难之于捷克作家，确实提供了可资思考的沃土。看来，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善于利用苦难，从苦难中发掘思想，一个民族对苦难的有意义的超越方式显然不应该是遗忘或避而不谈。我常常这样善意地想，对“文革”，我们之所以一直未能拿出真正有力度的作品，不是由于作家们的“遗忘”或搁置，而是思想的火候未到，虽然对后者，我们已表示了遗憾，但毕竟还在时间上心存希望。其实，中国的苦难又何止“文革”，中国的罪恶又何止那几个政客与弄臣，按克里玛和罗斯的意思，人人都应对世间的罪恶负责，只要这个世界还存在罪恶，那么，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都不是纯粹的审判者。对罪恶的审判按克里玛的意思可否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对罪恶的自觉的体认，这一点我们做到了吗？第二，是欧美大部分作家已经做和仍在做的，那就是将罪恶作为对象来进行审判，当然，即或这一点，也有高下深浅之分。第三步就是“自省”，在我们这个国度，曾经最为风行“灵魂深处闹革命”，但真正有勇气正视自己内心的罪恶的，尤其是通过文学方式予以审美表现的至今尚未读到。欧洲人倒是经常这样，是不是与他们的文化承传比如“原罪”有关？不过，我确实很看重这一方式在道德、理性和审美方式上的重大意义。罗斯

举了波兰作家塔德兹·鲍罗夫斯基作为例子，鲍罗夫斯基说关于大屠杀的写作惟一的途径是作为有罪者，作为同谋和参与者，在自传体小说《通向毒气之路，女士们和先生们》中，鲍罗夫斯基鲜明地把自己放在奥斯威辛的比一个囚犯所处的更加麻木冷漠的道德水准之下，准确地揭示了集中营的恐怖。我未读到这部作品，我想一位作家能对象化到这种地步，那他对人生的拷问与揭露肯定是深刻的和令人警怵的。现在我们不是在提倡重建人文精神，在倡导道德批判吗？不知倡导者想过没有，批判者首先应该是一个自我批判者，如果总是以道德偶像自居，那批判到最后总是不得位。罗斯提示了这种方式的存在依据：他在总结了一批东欧作家的实践后说道：“他们都曾经从卡夫卡的甲虫中爬出来，告诉我们，当检视这个制度如何毒害我们的时候，尽管存在着讽刺性的细微差别，但这儿没有不受污染的天使，内在的邪恶如同外在的邪恶一样。”罗斯还指出了这种方式在道德与审美上的艰难：“这种自我鞭打，仍然不能从良心谴责成分中摆脱出来。你总是站在真实一边，承担着所有变成正当的、虔诚的、说教的反宣传等风险。”

克里玛与罗斯的对话有相当的篇幅提到了昆德拉与卡夫卡。对中国读者来说，昆德拉并不陌生，我曾反复以昆德拉为例说过一个作家对自己民族的反省与批判的重要与成功，不过后来也曾看到报道说昆德拉在本土倒不见得怎么红，但并未细想，也无法细想。读了这篇对话，才明白了捷克本土对昆德拉的态度，克里玛指出了昆德拉的意义及世界性的影响，但他同时描述并解释了捷克人对这位作家的“反感”。捷克人对昆德拉的生活方式有一种道德上的鄙视，当昆德拉以他的捷克批判系列赢得世界声誉时，捷克本土的人们，包括大批作家正承受着专制文化的摧残并坚决地为真正的捷克文学而工作。克里玛宽容地说，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成为战士，但这话可能隐藏着另一层无法阻止的抱怨，即也不能要求每个人放弃对脱离战场者的责难。昆德拉的遭遇可能是普遍的，它反映了包括民主等在内处于低水平中的本土民众对境外作家和“流亡者”的普遍心态，是水中人与岸上人的不平衡。前几年索尔尼仁琴重返俄罗斯的遭遇也说明了这一点。不过，克里玛认为这些也许是不重要的，尤其是对有理性的人来说，因此，克里玛认为捷克人对昆德拉的反感中最为严重的应该是昆德拉也曾经是一个体制的赞美者，但当他离开本土后，却开始了对本土的批判。问题还远不止如此，值得仔细考察的是远离了本土的批判性写作是否构成了真正的对本土的深刻的有意义的批判？他的写作趋向是否真正是面对本土的，抑或是面对西方非本土读者、政治话语和根植于他们立场的想像？克里玛对此的分析才是我最感兴趣的：“像昆德拉承认的那样，极权主义制度对人们是可怕的难以对付的，但是生活的艰难有着比我们在他的表达中找到的更为复杂得多的形式。昆德拉的描绘，他的批评能告诉你的，是你可以从我们那儿得到的。这么一种图景容易为西方读者所接受，因为这证实了他的期待，它强化了童话中关于善与恶的观念，那是一个好男孩一遍又一遍听到的。但是对捷克读者来说，我们的现实不是童话，他们期待一种更有穿透力的更复杂的图景，一种从昆德拉那种地位的作家对我们现实更深刻的洞察。”显然，克里玛在昆德拉与捷克本土读者的读写对立中更同情后者，他说：“当然是昆德拉对他的写作有另外的抱负，而不仅仅是提供一种捷克现实的图景，但是他的作品这些品质对一个捷克读者来说是那么的不中肯。”看来，批判与提示的方式不应脱离“主战场”，对西方话语的厉害我们是越来越有体会了，我们的一些海外华文写作情况可能更

糟，至少不如昆德拉。这几年我们不断读到从海外进口的那几年“出去”的作家和理论家的著述，我的直感是显然不如他们国内的好，有的已经纯粹在为西方的话语编着中国注解，有的则已开始以浪漫的传奇故事来替西方读者做着非现实的古老的东方之梦。理论的阐释更为陌生，从概念到体系，俨然“汉学家”。更为严峻的是，并不需要走出本土，在开放的今天，本土的写作也完全可以按西方的趣味进行。昆德拉曾经批判过媚俗，这种媚俗现在正以东方的方式如行云流水般地进行着，从理论到创作，绘画、音乐、文学，无不如此。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走向世界，向西方批发。作家圈子中，以外文译介的多少、以在国外出版（哪怕只能卖上百来本）的多少来攀比早已是时尚，这样的写作或“制作”趋向所带来的后果当是不言而喻的。

批判的真正的有意义的场所看来是本土性的，起码的一点是使批判者对苦难与罪恶始终具有切肤之痛。但需要进一步申明的是，知识分子的尤其是作家的批判并不一定是直接的方式，而且，更深刻的批判可能是超越了罪恶与苦难之后。也就是说，罗斯所谈的自我审判并不是审判的最后和最高境界，最高的境界应是自由的境界，即一个作家也许并未直接面临苦难与罪恶，但他却先验地与人类的苦难与罪恶有着天生的体认，他的生活可能是极端个人化的，但他却能在这纯粹的日常的私人经验中发现它与人类苦难与罪恶的隐秘的联系，或者，苦难与罪恶尚未以它感性的极端的“事件”的方式发生，但作家却可以从人性的深层次出发，以想像、象征和寓言的方式去描绘那可能存在的一切。

克里玛与罗斯的对话还涉及许多更有兴味的话题，他们也在思考“改革开放”后捷克的文学命运问题，也在讨论大众文化对纯文学的冲击问题，真让人感到亲切。我不知道对这篇对话的理解深不深，有无误读的地方？因为我对捷克是那样的陌生，布拉格距我们太远了。那样一个小国，居然有由斯美塔纳、德沃夏克、哈谢克、卡夫卡……构成的传统，据说伟大的爱因斯坦也与布拉格有不解之缘！让人景仰。我们或缺的就是这些更具现当代意义的可资开掘的人文主义和理性的传统。

（《作家》1998年第8期，本书有删节）

## 域外书讯

### 《A·索尔仁尼琴》

D·汤姆斯著 马丁出版社

苏联曾拥有成千上万的飞机坦克，但这个曾是世界上最庞大的武库似乎还抵挡不了文人的一支笔。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一书问世之后，使苏联体制在世人心目中永久地失去了光彩。

这个被认为凭一支笔改变了历史方向的作家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呢？从这部传记中我们看到索尔仁尼琴是个非常执著于信念的人，而他的信念却来自于他直面现实的勇气。

索尔仁尼琴年轻时也坚信斯大林主义，作为一个才华出众的炮兵军官，他曾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在随着乘胜进军的红军向柏林开发时，他为亲眼目睹的红军士兵施于无辜的德国平民的暴虐所震惊。他在给后方的妻子的家信中叙述了他看到的苏军士兵的烧杀奸抢的劣迹。信未寄到他自己已先被克格勃逮捕了。

在服刑的漫长岁月里，索尔仁尼琴出入于前苏联的各个劳改营中。在劳改营的所见所闻所历激起了他要向世人揭露这一黑暗王国的决心。被释放后他乘着解冻之机发表的《伊凡·德尼索维奇的一天》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文学声誉。随后他秘密撰写的《古拉格群岛》在国外发表，他又得到了世界声望。这些作品都是以劳改营的生活为主题的。

被驱逐出苏联之后，他并不为新闻媒介的喝彩所动，转而在美国的僻乡找个小农庄隐居了下来，专心从事他下一部巨著的写作。与同代的其他持不同政见者不同，他不怕开罪于那些热情欢迎他的西方主流派人士，反而严厉批判起当代的西方社会，在西方他仍是个持不同政见者。赞同索尔仁尼琴所主张的俄罗斯传统主义的人或许不多，但你不能不为他坚持信念的道德勇气所折服。

## 泡沫时代的“思想家”

零丁

真正的思想都是卓然不群的，平均状态和日常状态的思想只不过是一些世俗的智慧而已。赞美现状的人可能成为出色的修辞家或秘书、幕僚，决不会成为思想家。每一个时代都会有每个时代的文学家，至于他们的作品是否能够成为名著，那倒是另当别论的事情，文学家是时代心灵最敏锐的感受者，他们的博大或者肤浅都深深地打着时代的烙印。而有的时代却出现了思想家的空白，有的民族甚至也出现了思想家的空缺。摩罗的《巨人何以成为巨人》一文对“缺乏精神资源和力量源泉的绝境”恨之入骨，实质上绝境从来没有真正遏制思想的生长，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地火在运行”，苦难时代的思想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包括精神上的、肉体上的、情感上的，而思想却在炼狱般的痛苦中得以提炼和充实。误解和非议使真正的思想家更加顽强乃至固执。对思想家肉体之类的折磨从某种意义上说，恰恰是对思想家价值的一种认同，尽管这种认同是以反问的方式来体现，但是，毕竟显示了相当的重视程度。没有人响应，也没有人叫骂，这才是一件悲哀的事情。泡沫时代的“思想家”倒是没有陷入如此难熬的孤独和寂寞，他们在沸沸扬扬的商业语境中发言。

思想家对时代的关注不是一件坏事情，玩弄玄思的人永远都不会成为思想家。海德格尔说：“日常此在最接近的世界就是周围世界。我们从平均状态的在世的存在的生存特征出发来探讨一般的世界性的观念。”（《存在与时间》）平均状态是思想家的出发点，不是归宿。平均状态是孕育思想家的肥沃土壤，反过来又局限了思想家的伸展。泡沫时代的“思想家”在时代表层自得其乐，参与笔墨官司，偶尔也制造水波微澜的精神事件，如同《约翰·克利思朵夫》中的那群巴黎人：“他们有本领把最高贵的思想变成舞文弄墨的玩意儿，把人类最壮烈的热情缩减到跟时兴的领带的作用一样。”在泡沫时代，“思想”更多的是一门语言艺术、社交艺术、表演艺术。泡沫时代，是复制和模仿的时代，泡沫时代的“思想家”是一种形象，一种策划，“思想家”本人也没有把这样的名号当真。泡沫时代的“思想家”是平均状态的代言人，他们指指点点，品头论足，他们最关心的并不是思想，而是以思想家自居所带来的种种好处。

思想是一种冲动，一种欲望，一种激情。传统的中国人一般不这样认为，他们只是把思想当作一种工具而已，在政治社会中，思想就是统治人和被人统治（奴才也有他的理论体系）的工具，当前一个目的达不到时，就会出现文字狱和焚书坑儒之类的历史性悲剧，当后一个目的达不到时，人们就会用膝盖来表白自己的妥善和奴性。“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陈寅恪语），中国文人的最大困境是既没有统治人的资格，又不想被人统治，于是，制造了入世和出世的二元选择，入世寻求的是霸权话语的实现，出世获得的又是一种美学意境。思想，往往是传统文人所回避的，思想家这样的称呼远不如“才子”动听。

泡沫时代的“思想家”同样是对思想抱以冷淡的表情。真正的思想家常常是一副受难者的形象，他们的浪漫是在应对苦难的潇洒自如中体现出来的。他们的郁闷，他们的踌躇，他们的歇斯底里，无不显示着思想的分量。泡沫时代的“思想家”心情要好得多，他们连最起码的沉默都不愿意承受，

他们滔滔不绝，大放厥词。泡沫时代的“思想家”沉溺于他们的幻觉中，周旋于思维游戏中。

泡沫时代就是这样一个一些人大言不惭地以思想家、评论家自居的时代。既然终归成为泡沫，何不耀眼一时？

（《文论报》1998年8月6日）

## 域外书讯

### 《制高点》

O·尤金和J·斯坦尼斯罗著西蒙和舒斯特出版社

对于即将逝去的这个世纪，我们可以作出各种各样的历史性概括，撰写本书的两位经济评论家采用一个新的视角来纵论本世纪的世界大潮。

在他们看来，整个这个世纪的历史就是政府与市场两股力量互相消长的历史。在本世纪的前半部，政府的力量显然是占了上风，成了影响和控制经济的主要因素，无论是在西方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如此。以国家干预为特点的罗斯福新政挽救美国于经济崩溃的边缘，在英法等旧大陆国家则逐步建立起了国营企业以及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计划体制。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则更完全控制在政府手中。

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政府干预以至经营的经济结果到处遇到了困难，美国出现了滞胀，西欧出现了大规模的失业，社会主义经济陷入了匮乏的绝境。人们开始怀疑政府的能力，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各国都开始了减低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的改革。在美国有里根时代的大刀阔斧砍预算削税收，在英国有令人生畏的撒切尔主义，从波匈开始，社会主义国家也一个接着一个地走上了改革之路。这近二十年来东西方的变化虽然看起来各不相同，但实质上都是越来越倚重市场的作用而摒弃万能的政府。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派取代伦敦经济学院成了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学派；华尔街上的交易所取代了财政部而成了主宰经济活动的中心；中国改革的本质也就是让一个接一个的经济部门加入市场的竞争之中。

当政府接过经济时常常是采用引人瞩目的革命的形式，而当市场接过经济时则常常采用逐渐过渡的低调形式，然而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它的深远影响现在还难以确切地估定。



## 五月风暴 30 周年

1968 年 5 月，或，为我叹息

王昶

对于 1968 年 5 月在巴黎和其他法国城市中发生的事件有许许多多不同的称谓和表述：危机、革命、内战、（学生）公社、大罢工、动乱等等；或者径直称为“五月”或“岁月”；或者在转喻的意义上代之以“街垒”；当然还有那个著名的蔑称“狗的早餐”（“一团糟”）。而我们似乎一直以“五月风暴”来强调我们的价值取向，虽然在所有的相关法文和英文表述中并没有与“风暴”相对应的词语。史学界更习惯使用“事件”这个平淡而暧昧的称呼，如果依罗兰·巴特之说：“描述一次‘事件’即暗示着‘事件’已经被书写。”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再书写一次“事件”？

所有相近或相异的称谓引发不同的联想：公社——巴黎公社；革命——十月革命；内战——慕尼黑起义（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但是，被联想或被暗指的那些历史事件一般只有一个名称，为什么有关“五月”的称谓却如此复杂歧异？“五月”作为一个巨大的历史和文化事实，其语义的丰富和内涵的芜杂令任何观察者都不得不充当一种解谜人的角色。这里我们就陷入了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的著名悖论：“我们必须去理解五月的意义，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又必须首先使那些事件的谜一样的特质重新显形。”而与其说“五月”是莫测高深的斯芬克司，不如将它视为一面多棱镜，可以全方位、多角度地折射战后法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变迁，当然这种折射同时也必然是扭曲和畸变。

所谓“危机”是在强调建制方面：“五月”的高潮阶段政府濒于解体，第五共和国岌岌可危；而“起义”、“造反”和“革命”则强调反抗的本性和反抗的欣悦。青年人似乎依据加缪的教诲明确区分了反抗和革命：“五月”不是政治革命，“因为没有人杀人，也没有人想杀人”，所以“五月”是作为生命的运动和作为人固有特性的“存在的反抗”。事实上，整个 60 年代在西方世界普遍爆发了青年人的反抗运动。美国正统史学家倾向于把 60 年代总结为青年人与成年人的斗争，以“两代人之战”和“俄狄浦斯情结”来解释美国青年的反战运动和嬉皮文化自有道理，但“五月”的斗争中似乎其他方面的因素比年龄差更重要。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了：戴高乐比萨特大 15 岁——整整一代。

“革命”一词曾轰传于“五月”，但现在它是最失宠的称谓。莫兰说：“‘革命’是一个被玷污的词。”可能部分是由于雷蒙·阿隆（Raymond Aron）那本臭名昭著的《难觅的革命》。而“五月”的青年偶像丹尼·科恩-邦迪（Daniel Cohn-Bendit）20 年后的回忆录的书名则富有挽歌式的反讽意味——《我们曾如此热爱革命》。

“狗的早餐”和“大罢工”是两个最明显的突出政治内涵的词：前者为新法西斯主义者所钟爱，是典型的戴高乐分子的用语，将军本人也因在“五月”期间的讲话中大声疾呼“变革吗？是的！一团糟？不！”而为自己赢得了“一团糟”的绰号；后者是法共的措辞和定性，暗示了“五月”的意义存在于工厂和车间，而不是大学和剧院。“大罢工”强烈地唤起对 1936 年和“人民阵线政府”的记忆，当时法国工人占领工厂以支持当选的左翼政府和 40

小时工作制。最重要的是，法共将“五月”定义为“大罢工”，便是对将其称为“革命”的直接否定。

虽然“五月”处于整个60年代的文化语境之中，任何理解的尝试都拥有这一基本的前提，但是“五月”又无论如何是无法预见和无法预后的。因为最根本的问题是表述的危机，各种叙事在话语的层面上遭遇纠缠。这一场历时月余，造成法国事实上瘫痪的“事件”与60年代其他国家发生的类似事件不同之处在于：法国学生和工人联手了，并引发欧洲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总罢工，900万工人参加，1500万个工作日失去。从整个社会结构陷于危机的角度说，只有随后的捷克“布拉格之春”及苏军侵入事件在规模上与之相当。突然爆发的大地震并不见得是所谓“60年代主导文化情绪”和政治激进主义的必然结果，或许我们仍然需要从大革命和巴黎公社的法兰西传统中寻求解释。戴高乐也曾以一种混合了沙文主义和反讽的语调称：“像以往一样，法国引导着路向。”

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加缪的《反抗者》、布迪厄和帕斯隆(Jean-Claude Passeron)的《继承人》、勒菲弗尔(Henri Lefebvre)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和马尔库塞、阿尔都塞的著作都曾是“五月”学生们的枕边宝书，但传单、标语飞舞的校园中又贴满了切·格瓦拉、卡斯特罗、胡志明等“第三世界英雄”的肖像。但是，青年们并未陷在意识形态的狂乱之中，正相反，意识形态为青年们的反抗开拓了宽广的视域。萨特认为：表面上的失控并不意味着失去方向，“五月”表达的绝不是“无序的意志”，而是“对另一种秩序的向往”。在索邦大学，巴勒斯坦人竟与犹太复国主义者比邻而居，散发各自的传单，这样的景观可以被视为精神的症候，但它无疑更接近于一场公共的狂欢。

青年们清醒地意识到与既存建制的格格不入，他们对贫富差异忍无可忍，对刚刚结束的阿尔及利亚战争记忆犹新。像任何时候一样，青年们被迫在延宕青春期、拒绝成人式和进入大学世界、从而受到社会权力机制的更直接控制两者之间无望地选择。空间的压迫和禁闭使得独立生活的理想永远无法企及。所以萨特宣布：“他们(青年人)与学校的惟一可能的关系，就是砸碎它。”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夸塔里(Felix Guattari)剖析了资本主义和精神分裂的症候(《反俄狄浦斯》，1969)，指出：“资本主义依据一项世界性的通则而运作，即不断地用新的限制来阻挠流变不羁的革命性力量。”那么，一种革命暴力美学和欲望的政治学的建构就变得空前重要，萨特从科恩-邦迪等青年人那里发现了这种建构的可能性——“想像力执政”。在这个意义上，“五月”可以被称为一场“心理剧”，但它正是不折不扣的精神和身体政治的解放，所以，雷蒙·阿隆故作深沉地评论：“人们创造历史，但不了解他们创造的历史”根本毫无意义。

1966年接管了斯特拉斯堡学生会的境况主义者称青年学生“如同戈达尔(Jean-Luc Godard)和可口可乐一样，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学生们在经济、政治、心理和性方面与青年工人一样境况悲惨。境况主义者对民主和狂欢节革命的鼓吹深深影响了楠泰尔和索邦的同学们。这时间，学生人数暴增，但教育经费和质量均在下降。学生生存空间——教室和校舍日益局促，无关痛痒、僵化陈腐的课程和普遍的社会经济萎缩、权力者对公民生活不屑一顾等种种现象同为青年们展现了一幅绝望的图景。于是，大学危机成为了“五月”的导火索。

1968年1月，青年和体育部长弗朗索瓦·米索福在楠泰尔学院（巴黎大学）为一个新建成的游泳池剪彩，社会学系的德裔学生丹尼·科恩-邦迪向部长提问，为什么在他的讲话和文章中只字不提学生们在性方面的问题？部长自作聪明地建议科恩-邦迪“可以跳到水中来败败火”，科恩-邦迪针锋相对地回答：“这是法西斯官员能对学生们作的惟一答复。”学生群中突然爆发怒吼：“打倒性别隔离区！”部长不知所措。这一小小的不敬事件似乎是“五月”的预演。青年们的反抗开始了。3月21日，一个左翼突击队袭击了在巴黎的美国捷运公司大楼，以抗议越战。六名被捕青年中有一人是楠泰尔的学生。22日，科恩-邦迪遂率众占领了学院行政大楼以示抗议，这是法国历史上青年们首次占领教育机关——这一象征性权力的主要据点。“3月22日运动”于是成立，同时各团体在楠泰尔会聚，渐成规模。

“五月”的另一场序曲是“朗格鲁瓦事件”。亨利·朗格鲁瓦（Henri Langlois）是巴黎电影资料馆的创建人和馆长，深孚众望。但政府，准确地说是文化部长马尔罗试图干涉资料馆事务，并宣布解除朗格鲁瓦的馆长职务。电影界迅速集合，起而捍卫他们的“教父”。2月14日，数千名电影人、知识界人士示威要求马尔罗辞职。16日，保卫电影资料馆委员会成立，让·雷诺阿（Jean Renoir）任名誉主席，成员包括阿伦·雷乃（Alain Resnais）、戈达尔、特吕弗（François Truffaut）、罗兰·巴特等人，斗争持续近两个月。4月初，法国电影俱乐部同盟投票表决意见，绝对多数支持保卫电影资料馆委员会，保卫朗格鲁瓦运动达到了高潮。4月21日，马尔罗让步，朗格鲁瓦仍任馆长，但马尔罗以撤销对资料馆的政府资助来报复。整个保卫朗格鲁瓦运动不是一场激进的斗争，其意义在于在法国电影文化体系内部建立了一个组织基础和交流网络，这一网络在随后的“五月”中作用非凡。60年代末是被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称为“媒介即信息”的时代，电影电视机器一方面可以被用来为劳工阶级服务，最典型的的就是戈达尔的“电影传单”；一方面它们也在“五月”的神话制造层面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5月2日，校方关闭楠泰尔学院。科恩-邦迪等八名“3月22日运动”成员被要求到巴黎大学总部纪律委员会接受训斥。3日，索邦（巴黎大学）集会抗议。政府教育部长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和索邦校长让·罗什（Jean Roche）担心“楠泰尔事件”引发连锁效应，使得索邦这所法国最古老的大学因骚乱而被迫关闭。于是他们招来了警方，而法国的一贯传统是警方不得进入大学的领地，部长的这一决定使所谓的担心变成了事实。下午，警方冲入校园，逮捕500多名学生。警方花了三个小时将被捕者押上警车，同时不停地驱散围观者。学生们高喊：“释放我们的同志！”“停止抓人！”得到的回答是催泪瓦斯和警棍。学生和过往青年们一起用石块在卢森堡广场建起了第一处街垒，战斗开始了。接下来的几天，烟雾、瓦斯、爆炸、叫喊、掷石战充斥了拉丁区。6日，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UNEF）和全国中等和高等学校教师工会（SNESUP）号召总罢课和罢教。8日，萨特、波伏娃等发表声明，号召“所有劳动者和知识分子在物质和道义上支持学生和教师们发起的斗争”。数万名示威者挥舞黑旗（无政府主义）和红旗，高唱《国际歌》游行。9日，萨特、波伏娃、雅克·拉康、勒菲弗尔、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等联署一份宣言，“向用一切手段摆脱异化秩序的学生们致敬”。阿拉贡奔赴奥居斯特·孔特广场，在科恩-邦迪陪同下发表演讲。但政府拒绝释放被捕者，所有和谈和调解均告无效。塞纳河所有桥梁被警方封锁，左岸

爆发更大规模示威。两方发生严重肢体冲突，伤者无数。电影电视工作者介入，媒介使斗争立刻传遍全法国，南特、斯特拉斯堡群起响应巴黎。10日是整个“五月”的中心点，“占领拉丁区！”的口号叫响，晚9时，拉丁区到处用树枝、铁篱笆、汽车、铺路石建起了街垒。从准军事的角度说，这些障碍物毫无用处，但正是在这无实用意义的层面上存在着一种象征性价值。街垒在“五月”是一个符号：它把人们带回到了历史中，把历史带到了青年一边，把戴高乐分子变成了凡尔赛分子。

5月11日晚，总理蓬皮杜结束在阿富汗的国事访问回到巴黎，即发表电视讲话，同意青年们的要求，下令警方撤出索邦，但一切似乎已经太晚了。13日，法国总工会（CGF）、法国民主劳工同盟（CFDT）和巴黎学生组织80万人横穿巴黎的游行，科恩-邦迪、雅克·索瓦热奥（Jacques Sauvageot）和教师工会秘书长阿兰·盖斯马尔（Alain Geismar）三大青年领袖走在最前面，队伍中还有几位职业左派政治家：社会党人密特朗、孟戴斯-法朗士、法共领导人瓦尔德克·罗歇（Waldeck Rochet）等。索邦迅速被学生收复，接下一周内，“占领运动”成为主调：各大中学校、工厂、商店、建筑均被青年控制，追求政治权力和个人自治的斗争直接体现为占有物质性或象征性空间的斗争。

14日，戴高乐赴罗马尼亚进行五天国事访问，他可能也已经意识到了：他的权威无论在道德意义上还是在宪法意义上都受到了质疑，但是他不愿直接面对这一困境。15日，国家剧院奥德翁被青年们占领，院长因向青年们表示了同情在事后受到处分。米歇尔·比托尔（Michel Butor）带领一群作家占领了作家协会办公室。几乎同时，戛纳电影节在戈达尔、特吕弗等导演的强烈抗议下草草闭幕（“当我们的同志在巴黎的街垒前倒下时，我们不能再继续节日了！”）。戈达尔旋奔回巴黎，同阿伦·雷乃等开始摄制一系列反映当下运动的时事短片“电影传单”，在学校和工厂巡映。16日起，巴黎附近的雷诺汽车厂开始罢工（“工人阶级从瘦弱的学生手中接过红旗！”）。18日，公交系统罢工，巴黎完全瘫痪。这时的巴黎，“十年够长的了！”“严禁使用严禁！”“实现梦想！”等标语、口号、传单满天，红旗招展、歌声嘹亮。巴黎似乎变成了爱丽丝的“奇境”，“五月”成为真正的狂欢，人们亲身经历了幻想的乌托邦。20日，萨特、波伏娃、玛格丽特·杜拉斯等受邀到索邦参加文化讨论，萨特乐观地预言：“社会主义和自由结合了！”但是次日，政府发出了对“德国无政府主义者”科恩-邦迪的驱逐令（他在月底又秘密返回巴黎）。22日，爆发空前规模的反对驱逐的抗议示威，两方发生激烈冲突。24日，戴高乐终于发表讲话，同意改革，建议公民投票。将军以一种似是而非的哲学派头试图再次鼓舞起法国人民，但他的个人权威未能得到重新确立。抗议者指出：“他等待了三个星期，讲了五分钟；他又准备在一个月內完成他十年都没完成的事情。”当晚的情况更加混乱，自称为“恢复秩序的力量”的右翼分子向高喊“再见，戴高乐！”的人们进攻，两名学生死亡。25日，由于意识到危机可能会彻底颠覆法国，工会和政府开始谈判，在政府代表中还有一位年轻的官员——雅克·希拉克。27日，双方达成一系列协议，但各大工厂工人拒绝这个方案，人们高呼：“人民政府！”同日，在夏特莱体育场的盛大集会上，密特朗呼吁戴高乐辞职，科恩-邦迪提出“选择孟戴斯-法朗士”，左翼力量团结在一起，试图以反资本主义的共同纲领建立过渡政府。

29日，戴高乐失踪。整个巴黎传言将军准备辞职，甚至准备自杀。但实际上，他在酝酿反击。戴高乐乘机到达德国巴登—巴登，会见了驻德国法军总司令马索，军方表示完全效忠总统。于是，当戴高乐在30日下午4点30分发表对全法人民讲话时，他完全恢复了自信。将军宣布：解散国民议会，下月进行大选。知识分子们借用布莱希特讽刺苏军镇压1953年东柏林起义的名言评论道：“如果政府不喜欢人民，为什么不解散人民，再选一群人民呢？”但是该讲话无疑令“恢复秩序的力量”欢欣鼓舞，雷蒙·阿隆在收音机前不时高呼：“戴高乐万岁！”

当晚，戴高乐分子组织了支持将军的游行，队伍中有马尔罗、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等人。6月1日，工会试图组织“选举=背叛”的示威，但大潮已经渐落。警方采取严密措施禁止示威和集会，大批罢工工人被解雇，两名工人被杀。6月10日，选举开始。拉丁区布满了警察，14日，青年们撤离奥德翁剧院；16日，撤离索邦。30日，议会第二轮投票，戴高乐分子大获全胜，“五月”彻底结束了。左派撤退前留下的最后一句口号是：“这只是一个开始，让我们继续去战斗！”

重访历史并不能让我们获得解释，甚至叙述也可能是最危险的。阿兰·图海纳认为“五月”揭示了太多的矛盾，而没有解决其中任何一个。莫兰则看到了一场试图超越资产阶级文明的“面目不清的革命”。但在雷蒙·阿隆笔下，“五月”这一出巨型“心理剧”不过是戴高乐主义的消亡和复活。而如萨特所言：“我敢打赌阿隆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在如此的山崩海啸面前，会有阿隆这样的“自由思想家”面不改色，冷静客观地独立思考，这本身就是一件让人起疑的事情。青年们说：“宁与萨特共享谬误，不和阿隆走向真理。”问题在于，阿隆握有什么样的真理？萨特和阿隆之争曾被认为是“介入”与否的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冷静最终演化成为了犬儒主义，风行于革命之后，然后就不再有人怀疑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冷静地思考。

无论如何“五月”又是被不断地重读和感悟着的，从《辩证理性批判》的再发现到戈达尔的回顾和反思；一本《学生公社日记》甚至也被推荐为“理想藏书”。或者我们可以采用所谓的“历史逆推法”来观察：无论是1969年4月戴高乐的下台、1981年密特朗的当选，还是精神分析学说、女性主义运动、现代电影理论和意识形态批评的发展都被视为“五月”的延后效应。虽然“五月”中的青年被称为以萨特主义来反对列维—施特劳斯主义，但“五月”落幕之后，“结构不上街”成为知识界的座右铭。“五月”试图回到现实中去，但最终却使知识分子同社会经验彻底分离。

詹明信尝试用“历史阶段论”的模式来思考60年代和“五月”，他认为那些曾经拥有的自由感和可能性就60年代的过程来看是瞬息间的客观事实，但是现在重看它们就不过是历史的幻觉。那么，与其对辉煌的年代依依不舍，或为曾经的失误求全责备，不如像布努艾尔（Luis Bunuel）一样，叹息一声并且承认：“五月”像超现实主义运动一样，在所有次要方面获得了胜利，但在所有主要的方面都失败了。

（《读书》1998年第5期）

## 他们曾经如此热爱革命

刘芳

### “五月”情结

1968年之后，每逢5月，法国媒体都会温习“May '68”。一个大写的5月加上年份——他们如此称呼那30天里发生在巴黎和其他许多城市的罢课罢工事件。

今年，这30周年纪念日不大不小，可法国的报刊似乎要把它过得分外认真。

3月底的《星期四事件》周刊曝光一批“五月”的警局纪录，4月份第一期又用12个页码专访5位“五月”的关键人物，披露当年秘闻。

《世界报》4月份的资料库8版逐日叙述了“五月”的来龙去脉，并附30年间经典评论文章。

4月16日，《快报》周刊封面故事《'98人看'68人》调查的是青年一代如何评说父母昔日的梦想。

4月28日，同一题材又上了《新观察家》的封面，这本一贯强调理性的刊物为“五月”做了一集“有关警察、戴高乐派、共产党、中央情报局和苏联人的秘密档案”。

素以追踪时尚名流为己任的《巴黎竞赛画报》也赶在4月底开始了“五月”人物专访及图片回顾的连载。

赶在5月之前出版为“五月”献礼的还有一本近300页的精装《照片1968》和一本近500页的学术专著《May 1968，不可能的遗产》。

“五月”就像一个情结，年复一年诱惑着人们将它解开、阅读和感悟。情结的表述过程中，“革命”、“反叛”、“暴动”等词汇被频繁使用，同时又被默契地避免用成定性之语。关于“五月”，法国人习惯的说法是“事件（événement）”。他们的语言里，这个词可大可小，亦不必与政治有关。

### 做爱的青年？作战的青年？

翻开黑白老照片，“五月”热闹而隆重：汽车像玩具一样躺得满街都是；铺路的石块被青年们撬起投向警察；阶梯教室里学生挤在一起聆听萨特演讲；塞纳河桥上80万人游行，看久了，他们的踏步似有声响。

巴黎大学楠泰尔学院社会学系22岁的学生丹尼·柯恩-邦迪一头红发，一脸反叛，这是“五月”最著名的特写之一。

1968年1月，这个人称“红毛丹尼”的德裔犹太学生就质问过法国政府青年和体育部长：“为什么您从不谈论学生们在性方面的问题？”

政府部长没有答题，他建议桀骜的青年“去水里败败火”。柯恩-邦迪立即指出：“这是法西斯官员能对学生作出的惟一答复？”在场的学生发出怒吼：“打倒性别隔离区！”

那时在性方面占主导地位的基督教信条刚刚遭遇避孕药，“学生们在性方面的问题”被火辣辣射出来，挑战的靶心是大学对男生进入女生宿舍的严格限制，靶面上陈腐的教育制度、保守的社会观念和独断的政治运作都将在

重击之下摇动震颤。

实际上，万箭齐发在真正的“五月”之前就已开始，“红毛丹尼”是抢先发言第一支。他和“战友们”强烈感觉社会不合自己的尺寸，自己似乎也永远不会有上台发言的机会。连萨特都说了，他们和学校惟一可能的关系，就是砸碎它。

正好当时中国的同龄人都成了红卫兵，正在“造反有理”，“毛主义”虽然颇有些神秘，却也不妨借来与格瓦拉和卡斯特罗摆在一起，用作革命的旗。

所以3月22日学生占领了学院行政大楼。5月2日校方关闭学院，3日学生集会抗议，当警察冲入校园抓人，学生筑起街垒打巷战，用石块回敬催泪瓦斯。10日，学生又去占领工厂、商店和其他建筑，青年们让拉丁区回到大革命时期，让法兰西民族内战式的政治文化在百年沉寂之后，于1968年的“五月”再度激活。

13日，当“工人阶级从瘦弱的学生手中接过红旗”，工会和左派政治家组织80万人横穿巴黎大游行，三大青年领袖走在了队伍的最前排。

6月30日右派大选获胜之前，青年们像是经历了一场盛大的狂欢。丧气的生存条件和压抑的社会环境都被抛得远远的，巴黎成了标语、口号、传单、红旗的海洋，青年们“严禁使用严禁”，“要做爱，不作战”，他们“无限享乐”，“实现梦想”。

### 回首时候的尴尬

30年过去，昔日青年领袖如今年过半百。52岁的丹尼·柯恩-邦迪发表纪念文字时附一帧胖胖、微笑的小照，作者身份一栏里写着：欧洲议员、绿党党员。

与其他几位“五月”青年偶像不同，他这30年间还一直在搞政治。10年前，他撰写了一本回忆录《我们曾经如此热爱革命》，书中已用“傻事”来话当年。

“1968年的法国社会及其统治者缺乏变革的能力，如果他们自上而下顺利变革了，历史就不会写下‘五月’……话说回来，叛逆者当年高举的旗帜是否都是真理？当然不是！我们干过的蠢事、傻事数也数不完。”柯恩-邦迪如是说。

今年的纪念，《巴黎竞赛画报》请他与前总理米歇尔·罗卡尔来了一场对话。言谈之中，昔日英雄对“五月”横扫了一切假道学仍然颇为骄傲，因为“如果没有1968年，再婚过两次的罗卡尔怎么也不可能当选总理”。

其实，“五月”的威力不止于此，历史学家们认为，1969年4月戴高乐下台，1981年密特朗当选都是“五月”的延后效应；还有精神分析学说、女性主义运动、现代电影理论和意识形态批评都从“五月”借力得到发展。

《快报》周刊为纪念“五月”走访了14位学者，发现今日的知识分子对“五月”本身有种说不出的柔情，对“五月”期间提出的种种口号却是毫不留情。也许这些与柯恩-邦迪同龄的知识分子在反思过去时也想到了同样的“傻事”和“骄傲”？

《快报》周刊又调查了一批18~30岁的青年。“你们向往亲身经历‘五月’吗？”“不，谢谢。”55%的调查对象回答说。当然，不到20岁的孩子

中还是有 55%认为，在“五月”身临其境“过过节”也挺好。

柯恩-邦迪们的子女对“五月”本身似乎没有多少柔情，但是“五月”曾经张扬的种种口号却令他们心旌摇荡。

### 评说父辈的梦想

《快报》“’98人看’68人”调查结果：

——提起 1968 年“五月”，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            |     |
|------------|-----|
| 对新的自由权利的要求 | 50% |
| 反抗现有制度     | 25% |
| 大学生的发泄     | 17% |
| 左派势力革命     | 5%  |
| 无政府主义风波    | 3%  |

——当年提出的新价值观念，你认为哪些依旧现代，哪些已经过时？

|          | 现代  | 过时  | 没看法 |
|----------|-----|-----|-----|
| 保护少数派的利益 | 77% | 22% | 1%  |
| 性自由      | 76% | 23% | 1%  |
| 男女平等     | 75% | 25% |     |
| 对家庭的质疑   | 60% | 40% |     |
| 挑战权威     | 57% | 43% |     |
| 拒绝消费社会   | 50% | 49% | 1%  |
| 阶级斗争     | 46% | 53% | 1%  |
| 革命       | 37% | 63% |     |

### “五月”里的旗和它们现在的颜色

法国作家艾尔维·阿蒙曾写过一部“五月”专著《那一代人》。他将“五月”比作一场小型歌剧，种种主义者挥舞着他们的旗，上台就是为了谢幕。但是那些旗帜在街道上挥舞，在街墙上停留，也在人们的记忆里留下了颜色。

30 年过去，人们仍在翻检和评价“五月”里的旗和它们现在的颜色。

“要做爱，不作战。”

精神分析学家早就说过，爱神不是个幼嫩润滑的美人儿，而是只脏兮兮、多毛的兽。“五月”为什么会用一块红布把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绑在一起？享乐是权利，但是当快感变成义务，你是否觉出同样专制的气息？所以啊，我们的生事革命跟爱情、战争都无关，它的缘起和流向均是权力与金钱。

——精神分析学家米歇尔·施奈德

“严禁使用严禁！”

这话曾令我热血沸腾去游行。后来当了老师，我才见识它如何横扫一切：人可以不守法，但你不能惩罚他；没有一条规定被绝对遵守，教育沦为不可能。

——哲学家伊莉莎白·巴丹泰尔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救世主，就是我。”

这句口号有两种阅读方式。第一种，上帝和主人被消灭了，人类被迫自由。这个“我”必须有理性、有诚意，个人必须是具备公民性、严肃认真的



个人。第二种，个人冲动、热情和兴趣继承了上帝和主人的位置。“我”不仅全能，而且自恋。哪种阅读方式会取得最终胜利？也许要再等30年才能看出来。

——社会学家弗朗斯瓦·杜贝

“经济已经不行了，让它垮掉吧！”

’68人在法国经济起步回升时说出这种话着实奇怪。当时还有一句口号说：“谁会对经济增长率产生爱情呢？”“经济”一词好像盛着无穷的罪恶招来人们痛恨。可历史却证明了“五月”英雄们的无知，人们就是爱上了经济增长率。只是我们面对的世界比过去粗鲁，标志着财富增长的经济增长率却不能解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经济学家丹尼尔·科恩

“所谓选举，全是骗局！”

这样过激的话在当时本意是想给选举注入新的活力吧。可是如果以为取消了选举，民主就会诞生，那就不是犯错，而是犯罪了。

——巴黎大学教授艾弗林·皮兹叶

“做现实主义者，求不可能之事。”

这是“五月”最深刻、最美丽的口号。有位作家写过一本书，名为《不可能》。他说：“让我们把‘可能’留给那些喜欢它的人吧。”显然，他想说的是，真正的现实和爱情一样属于不可能的范畴，我们的想像力都无法企及。但很多人和我一样从不停止朝那边张望。

——作家菲利普·索勒斯

## 世纪末集体寻梦

——法国 1968 年“五月风暴”30 年

陈彦

今年 5 月是法国 1968 年五月风暴 30 周年纪念，法国出版界为此推出了大量总结与反思的著作，自 4 月底以来，1968 年 5 月也是传媒的热门话题，广播、电视、报刊杂志连篇累牍，不厌其烦。当年的运动领袖和主要当事人都成为新闻人物，《世界报》、《解放报》等从 5 月开始每天都刊载 30 年前 5 月的记实追忆文章。民间各种讨论会、当事人的聚会也时兴起来，一时，五月风暴也成为普通人茶余饭后的家常话题。

### 五月风暴社会影响深远

1968 年五月风暴是怎么一回事，现在 40 岁以上的中年人仍然记忆犹新，而事实上传媒与出版界对五月风暴 30 年的纪念似乎也多在追忆与怀旧的范围。

五月风暴是一场由学生运动引发的群众自发社会抗议运动，运动的根源可以追溯至 1967 年大学生中的各种左翼团体的出现，但最直接的导火线则是 1968 年 5 月 3 日巴黎警察拘捕 500 多名参加“反帝”游行的学生并查封了巴黎索邦大学。自此学生自发抗议活动成为同警方的公开冲突，1 万至 3 万激愤的大学生在拉丁区筑起街垒，走下工厂动员工人使运动迅速蔓延至社会其他阶层。法国爆发战后最严峻的社会冲突。然而这一运动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自发的社会运动，既无政治目的，又无统一组织，当然也没有战略选择。此次运动是以当时总统戴高乐解散议会（5 月 27 日）并于 6 月 30 日戴高乐领导的执政党第五共和民主同盟取得大选压倒性胜利而结束的。

从直接政治结局看，五月风暴是以失败而告终的，但五月风暴从学生到工人，全法国曾有 600 万工人参加社会总罢工，不仅工人的利益经过此次罢工后有了重大的改观，学生运动所体现出的社会发展方向也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 世界战后秩序的转折

1968 年发生于法国的五月风暴并非孤立现象。我们知道 1968 年正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日子，中国红卫兵的造反活动，毛泽东的群众动员所引发的集体乌托邦狂热，都对法国的青年学生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果说中国“文革”曾从意识形态层面启发过法国五月风暴的话，但这一影响却完全不足以说明五月风暴的内层动因。

首先，1968 年这一年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类似的知识反叛或社会反叛运动发生。1968 年是墨西哥大学生大示威的一年，这一学生运动成为拉丁美洲各国对美国关系重新定位的一个深刻运动的先兆；同时在华沙、布拉格等共产主义阵营内部也出现了变革之风，甚至苏联内部异见分子也初露头角；也是 1968 年，美国承认越南战争失败，同意在巴黎同越南谈判。因而 1968 年实际上意味着世界战后秩序走向崩溃的转折，而这一转折不仅仅是政治意义上的，也是社会与道德意义上的。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杜兰曾将五月风暴称为“文化解放”，即是说它将由社会、经济问题引起的政治革命转移至文化问题、种族问题、性、妇女问题等，同西方家庭有过接触的人都知道，今天西方社会家庭成员间的关系是较平等的，父母和孩子，即使是十分年幼的孩子都可以平等地交换自己对某政治、社会问题的看法，从法国角度看，这一家庭民主，便是1968年五月风暴所赐。有人称五月风暴是一次不流血革命，而正是这一场特殊的革命使得学校、家庭、夫妻关系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5月的冲突使法国的左派放弃了乌托邦狂热，在催泪弹的烟雾中新一代的以社会治理为己任的左派脱颖而出。

### 宣告集体乌托邦的破灭

对五月风暴的意识，法国思想界有人指出，在本世纪末的今天看来，五月风暴既是最后一次19世纪式的社会革命，也是后工业社会的第一次文化革命。它继承了19世纪那种以意识形态为指导的革命模式，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旗帜同时飘扬，人们要求改变生活，摧毁现存制度，颠覆资本主义甚至议会民主。同19世纪的那种形成庞大体系的哲学和政治乌托邦截然不同，1968年五月风暴是一次没有政纲的革命，它的特点是抗议一切，却又不提出任何明确的建议，即是说呼吁人们起来造反却没有将来的指向，一切现存秩序从政权到团体都是它攻击的对象，它的目的就是反对秩序。

五月风暴作为社会革命是失败的，但作为文化革命则是成功的。5月的梦想是最后一个集体之梦，它宣告了集体乌托邦的幻灭，留下了市场拜物教与缺乏伦理的自由民主伴随着孤独的现代人。

正是这个孤独的现代人，面对当今的意义失落而彷徨若失，法兰西热衷于纪念1968年5月，是否借助历史的余光去搜寻那已逝去的年华呢？

（《书城》1998年第7期）

## 思想书廊

### 《储安平文集》

张新颖编 东方出版中心 定价：54.00 元

本书是现当代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储安平的第一部文集。全书分四个部分，基本按写作时间顺序编排，收入作者早期的文学创作和当年享誉甚高的《客观》、《观察》杂志上的政论文章等在内的各个时期的主要著述。文集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作者一生的生活、思想历程，将对中国现代和当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提供许多重要史料和信息。

本书为《20 世纪文学备忘录》丛书之一。同时出版的还有《李金发回忆录》等。

## 德国文化史话

### 文人与国家

——联邦德国五六十年代文学片断

李昌珂

说起文人与国家，也许我们不禁会想起德国文学史上几位声名赫赫、影响深远的文人。这几位文人，对于威严得令人不敢冒犯的国家敢于睥睨，其间传递出的抵牾、冲突意识，给人的震撼又是那么深刻强烈：歌德尽管担任了几乎40年之久的国家官员，却告诫世人：“一个诗人如果想要搞政治活动，他就必须加入一个政党；一旦加入政党，他就失其为诗人了，就必须同他的自由精神和公正见解告别，把偏狭和盲目仇恨这顶帽子拉下来蒙住耳朵。”而亨利希·曼说得更为干脆：“一个向统治阶层靠拢的知识分子是在背叛精神。”尼采对于国家政治体制、机构设置问题的认识上也不无“狂气”张扬：“搞政治的，哪是些什么治国之材，遭此情形的国家，势必糟糕，不过也活该败落衰亡在这一大群政治家手上。”同样，在托马斯·曼眼中，政治家都是些市侩庸人，他的看法定会让生活在今天的人更加感到惊世骇俗：“让那个从外边来的令人生厌的流行词藻‘民主’去它的罢！西方机械的民主国家（体制）绝对不可能在我们这里获得安家落户的权利。”上述几位德国文人对于国家的态度代表着德国文人的一种文化精神传统。这个深厚的传统，始终上承下衍，尤其在战后德国五六十年代文学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二战结束后，德国被反法西斯同盟国分割占领，生活在“无国家”状态中的德国文人时刻憧憬建立一个崭新的德国。有的流亡作家早在流亡期间就设计了一个“希特勒后的德国”计划；“年轻一代”作家，也遐想着要把德国建设成为一个起着连接西欧与东欧桥梁作用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国家”。可是，占领国当局推行其一元政治所造就的现实却无情地嘲弄了文人们的想像力。

尽管建立新国家的政治热情遭到了无情的打击，但当国家分裂的迹象愈加明显时，忧国的德国文化人又一次鼓起政治热忱，成立了“德国笔会中心”等协会、团体，对于分裂国家的每一次政治行为都密切注视，严正抗议。然而，反对民族分裂的种种努力均被一一碾得粉碎。战后德国文人与国家之间出现一种不和谐乃至紧张的关系，突出表现为文学对新生国家的普遍冷漠态度。

战后德国文学的这个发展，应当说既自然又合理。文学主潮反思法西斯“第三帝国”和它发动的战争，是因为人们对于过去不久的那场灾难记忆犹新，急于控诉、倾吐、呐喊；文学支脉描绘、礼赞山水草木亘古如斯的大自然原始状态或原生美感，也是因为有人面对满目疮痍的战后悲惨状况，急于求得心理上的慰藉、补偿或者排遣。表现在这两极景观之间的文学对新生国家的冷漠，又是属于一种什么性质呢？可以说，这也是一种源于文人敢于抗拒的文化精神，产生于这个国家还处在被占领国当局策划时便注定要与德国文人失去血脉相通联系的这个“先天不足”，产生于极力维护国家统一的文人对这个标志着民族分裂的国家必然会产生心理“逆反”，即情感上对它的抵触。

这种心理“逆反”，在50年代似乎发展成了贯穿这个文学历史阶段的一

种文学自觉。进入 50 年代的德国文学，继续对国家缄默不语，仿佛文人心中竖立着一道高墙，阻挡着国家题材进入创作主体意识。

60 年代初崛起的“新文学”，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新现实主义尝试，尽管其结构和手法趋于多样化，但是新一代作家仍然在沿着反观“第三帝国”那段历史和描写人与自然这两个主、次层面移动，在主题旨归上也依旧是注重个体化感受和个人生命、思维、情感、意识的自由舒张，虽然它开始变得絮絮叨叨，随意散漫。

事实上，在这时间段里终究也有两部小说表现了对国家方面的关注，并且甚至还是将其作为直接描写对象关注：沃尔夫冈·克彭的《温室》（1953）和君特·维森伯恩的《建筑在沙滩上》（1956）。然而关注固然不假，问题却在于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关注！透过作家们精心编织的故事，我们看到的对国家方面的关注实质上是对国家方面的反感、鄙视、不屑乃至叹息，是对国家行政机构内幕丑行的谴责和鞭笞，是对国家政治发展前景的悲观忧虑（《温室》），是对国家的民主政治体制是否具有真实性提出的严正质疑（《建筑在沙滩上》）。

要么根本不把国家方面纳入文学视野，要么便是从批判性审视角度切入，将其置于被告席上，非此即彼，无可商榷。文学的这种与国家方面对立冲突，除了前头说的文人对国家的心理“逆反”产生历史惯性作用之外，还折射出传统积淀的文人对于国家方面的理性批评意识；同时，也与国家建立后文人忧心忡忡地体验到的国家政治生活形态和形势发展密切相关。

我们在伯尔 50 年代的作品（《一声不吭》，1953；《无主之家》，1954；《九点半的台球》，1959）中可以看到的那种暗含的文人对国家前景、体制的怀疑、否定和批判。

文人对于国家前景的疑虑，进入 60 年代后并没有得到冲淡，而是变得更为深重。60 年代，西德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禁止共产党合法存在，颁布《紧急状态法》，经济出现严重萧条，古巴危机、越战爆发等一系列国际、国内政治事件急风暴雨般地向德国人袭来，造成社会人心动荡不宁，文人们则更有理由对国家方面是否真的能够保障宪法规定的自由和民主，是否能够真的吸取历史教训，是否能够让社会不陷入只追求平庸的物质享受而得到一个健康向上的发展感到担忧。在这“惶惶不安的情绪遍及每个作家”的大背景下，“四七社”代表人物汉斯·维尔纳·里希特 1960 年就在一篇文章中情绪沉闷地写道：“我生活在联邦德国。或许，从大众心理感受角度看，我已经生活在一个就要来临的新的专制制度的前院里面了？一个就要来临的，以自由的名义压制自由，以法律的名义架空法律，以民主的名义打击民主的制度？我说不上来。”

1960 年沃尔夫冈·魏劳赫邀请 15 位具有代表性的知名文人撰写文章谈作家对国家的体会与感受，编辑出版名为《我生活在联邦德国》的文集，上面提及的里希特的文章也收在这本文集之中。魏劳赫与文人们这个共同举动，明显带有要修补与国家方面关系的愿望。

文人的生活是清晰的，它表白了文人不再以感性的“逆反”心理看待国家，而是开始认同它，主动想调解、改善与它的关系。而产生这个思想转折，主要是因为民族分裂显得已成定局、不可逆转，于是大家“学会了对各自的国家怀有一种特殊归属感——即便是种有保留的归属感”。不过，对国家开始怀有归属感却并不表明与国家方面的关系从此便是紧密无间。既然是“有

保留的归属感”，那么就意味着对国家方面至少心怀一种犹豫不决的复杂情绪。而事实上，文人对国家的“有保留的归属感”在《我生活在联邦德国》文集里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直观表现。

或许，是文人有用理性眼光去审视国家一切的自觉和习惯，或许，是国家政治、社会形态的发展让文人对国家前途的“担心”着实大于他们对国家方面表示的“关切”，或许是二者皆有，总之，对国家方面的矛盾心态和对国家前景的担忧进一步伸延，成为文人的一种内在压力。这个压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并未得到缓解，反而是在其他诱因进一步催化下终于反映在 60 年代德国文学之中，激起文学波澜，引发了严肃的思考。

60 年代的德国文学最引人瞩目的特征，无疑便是它的政治性走向。譬如以艾里希·弗里德、雅克·卡尔松柯、F·C·德利乌斯等人作品为代表的“政治诗”，以罗尔夫·霍赫胡特、海纳尔·基普哈特、彼得·魏斯等人戏剧为代表的“政治剧”，还有以马克斯·封·德尔格吕恩、汉斯·君特·瓦尔拉夫等人作品为代表的“工人文学”等社会性、政治性极其强烈的文学潮流先后涌现出来，与文人的忧患意识遥相呼应，将专制、剥削、压迫、非人道现象、阶级斗争、学生运动、越南战争等题材摄入文学视野。概而言之，“各种艺术在 60 年代转变了方向，它们以层出不穷的形式政治化，取得了迥然不同的效果”。

60 年代德国文学出现政治化倾向，并非是创作主体某种瞬间旋生旋灭的兴奋、激情使然，而是在深刻的政治、社会背景基础上持续地体现文学现实主义精神、历史使命感和主体社会关怀意识；此外，文人是在“受到持久不断的无情政治攻击”情况下仍然坚决追求文学的政治性、社会性价值，使之显得有思想，有探索，有向度，有超越，在这两层意义上，60 年代德国文学政治化倾向值得首肯。

既然是政治化出于对国家前景的担忧，文学对国家方面的关注姿态自然也就不会是俯就和认同，而是理性解构，深沉质疑，冷峻批判。在一次社会公众讲演中，伯尔说：“我不说社会，也许我可以说说国家，如果我们有这么一个国家的话，此刻我没有看到什么国家……在国家也许存在或者应该存在的地方，我看到的只是权力的一些腐朽残余。”这集中地为 60 年代德国文人对国家方面的那种抗议性关注姿态作了一个绝好的注脚。

文人既看到了国家的现实，又提出质疑，还有浓郁的责任意识。仍以《我生活在联邦德国》文集为例。前面说过，文人撰写出版文集，有与国家方面修好之意。但是，要修好这个关系，并不等于就是要放弃自己的见解和文学的个性，并不等于就是要无原则地随波逐流、歌功颂德、是非不分。相反，正是因为要热爱国家，所以文学更应该坚持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恪守自己的鞭挞、批判功能，更应该敢于触犯貌似威严神圣的东西。了解这些，就不难理解魏劳赫在文集序言中不要求作家对国家方面宽容，反而鼓励对它高高举起批判的大旗：“提出批评，提出激烈的、显现自己内心真切的批评，就好比要驾驭文字那样属于作家的根本。必要时，还必须将批评上升为反抗……作家的言论假如趋向顺同于国家的言论……对于二者皆无裨益。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会僵化、没落、低迷、沉沦。不敢触犯的作家，是在放弃自我，背叛真理，败坏自己荣誉。”

魏劳赫的话，可谓掷地有声，值得击节赞叹，然而，在文学政治化势头全面推进，社会上要求对西德体制革故鼎新的呼声浪潮迭起的 60 年代，像魏

劳赫的这种文学观念竟然已经显得有些陈旧落伍，跟不上形势发展。60年代的德国文人，在社会上“议院外反对派”斗争形势鼓舞下，普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者瓦尔特·本雅明和恩斯特·布洛赫的关于艺术政治化和政治美学的哲学观的影响，相信“艺术可以具有政治性，能够起到政治作用”，要把文学作为从事改革社会的政治活动的一种重要工具。在他们看来，文学的真正价值应该“就是行动”，应该就是直接使国家、社会得到改良、变革的“公开行动的多种形式之一”。

的确，德国文人参与国家政治的渴望是极其强烈的，他们不仅以文学为手段追求政治目标，而且还采取文学创作之外的行动来谋求现实政治理想。这就导致出现60年代德国文人与国家方面关系上的另一特别现象：一方面，文人与执政党之间相互攻击，壁垒分明；另一方面，文人又主动与在野党携手结盟，缔结政治“联姻”。而当在野党大选败北，原来的执政党继续掌权后，文人要“干预”国家政治的激情不减，他们一方面加强对国家方面的抨击（伯尔《随笔、评论、讲演集》，1967），一方面频频写下针砭国家方面缺陷的作品（君特·格拉斯《狗的岁月》，1963；《局部麻醉》，1969；鲍尔·沙吕克《堂·吉珂德在科隆》，1967）。岂料文人支持的在野党1966年与执政党组成了联合政府。文人原来希望通过协助一个党派步入政权，从而自上而下使得国家得到变革、社会得到改良的愿望，由此破灭。接下来，一方面文人们义无反顾地“退守”到对国家方面的批评、拒绝立场上。另一方面，不再寄希望于某个党派的文人，其主动参与政治、实现国家变革的意识和姿态并没有萎缩，更无意改弦更张。相反地，社会上翻江倒海的“议院外反对派”的斗争态势，竟使他们萌发了不可遏止的革命冲动：革命是艺术的本体，文学政治化的代言人赫伯特·马库斯如是说。革命既然可能，那么文学该怎么办？恩岑斯贝格宣告道：文学已经面临“尽头”。

事实上，确有不少作家转向了他们认为比写文学作品更为直接的参与革命的形式。进入70年代后，有作家在杂志上回忆当年文学创作为何“搁笔”时，就这样解释说：“写传单、小册子更为重要。”

作为60年代社会生活和文学活动政治化的后果，70年代德国文人展开了关于文学的政治倾向性、现实主义态度等问题的争论，同时开始使文学作品出现一定程度的社会主义思潮化，其中积极描写共产党人的作品被首次推出。在80年代，伯尔的最后部小说《流水景色前的女人》（1985）在他去世后不久出版，这部直接借用波恩政治舞台作为故事发生地点的作品，是“伯尔最终失望的表达——表达了他对西德的政府、社会和国家感到失望”。

在90年代，德国统一了。对此世界瞩目的大事，德国文人却大多沉默不语，少数的如格拉斯则公开表示拒绝这个“统一”。格拉斯对统一问题的立场，后来表现在他于1994年推出的长篇《说来话长》之中。而这部小说在德国评论界舆论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90年代出现的情景，真可谓时过境迁。世纪末情绪似乎早早到来，除了在报上有时可以读到瓦尔泽、恩岑斯贝格或者格拉斯几位知名作家对国家方面的一些政策或行为发表一些看法、评论外，大多数德国文人都显得没有了政治热情而躲进个人“象牙塔”中，使得有人宣布文人已经是一个“褪了色的神话”，使得德国“笔会”总书记约翰诺·施特拉瑟尔直接呼唤文人要焕发“知识分子意识”，甚至要求他们拿出“建设性建议”，参与和干预国家政治生活。但是，在文人与国家方面关系问题上，更多的人则是希望文学能够继续五六十年代的文化精神立场，而



同时却不要去直接介入党派政治。

（《外国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本书有删节）

## 德国战后的“托马斯·曼风波”

李昌珂

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上下满目疮痍，一片破败景象，令人不胜凄怆。至于还在第三帝国时期就被当时内外交困、风雨飘摇的大环境挤压得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德国精神文化领域，那更是被深深地压在断壁残垣的瓦砾下面，没有半点生气和活力。殊不知，出于对德国人实施“再教育”策略的自身需要，同盟国占领德国后便立即大力着手恢复德国的大众文化媒体及机构，竟使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开始呈现一派“火红”的发展态势。

托马斯·曼走上流亡道路后，在西方国家所得到的处境甚好，被视为德国流亡作家的代表和“德国文化崇高尊严”的卫护人。如同大多数流亡作家一样，他在流亡期间依旧笔耕不辍，一方面继续创作《浮士德博士》等作品，一方面举办系列讲座，以犀利而不留情面的手术刀向美国人剖析讲解德国及德国民族问题，此外还从1940年秋季起通过英国BBC广播电台每月向国内同胞发表一次广播演说，启迪同胞们思索文明与野蛮、正义与邪恶，引导他们去拨开层层云雾，寻找人间沧桑正路。

毫无疑问，托马斯·曼是位高度感时忧国的作家。他自我感觉到的对德国以及对德国民族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决定了他在战后很快就提出了德国民族要正视自己所犯罪行这个极端敏感的问题。那是在1945年5月18日，即德国投降后的第十天，仍然生活在美国的托马斯·曼将自己所作的55次广播演说有关内容整理汇集成一篇题为《谈德国责任问题》的文章，发表在由美国占领军当时在德国发行的《巴伐利亚州报》上，文章旨在激励德国人思索，故激浊扬清，锋芒锐利，但也不无情绪激烈。托马斯·曼在文中指出德国人对纳粹暴行负有一定的整体责任；认为完全是由于外部力量的作用，德国才得以摆脱整个一片“腐朽”；认为德国是人类的耻辱、邪恶的典范，等等。其中，他这样写道：

希特勒主义把德国变成了一个刑讯室。如今，这个刑讯室的厚墙已被打破，我们的耻辱在全世界人的面前众目昭彰……德国使整个人类感到可怖，是的，使整个人类感到可怖！

以这篇直抒己见的文章，托马斯·曼一石激起千重浪，在德国引起轩然大波，给人带来极大的情感冲击和复杂的心绪。首先作出公开反应的文人，是在纳粹统治期间未曾流亡异国的小说家、诗人瓦尔特·冯·莫洛。莫洛于1945年8月13日在《柏林汇报》上发表了一封尽管有明显的自我怜悯，但不失真诚的致托马斯·曼的《公开信》。

在呼吁托马斯·曼回国的同时，莫洛表示以“极大的克制态度”，不赞成托马斯·曼对德国人批评一大片的做法。另一个也未曾流亡他乡的作家法兰克·蒂斯，也于1945年8月18日在《慕尼黑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内心流亡》的文章，把围绕着托马斯·曼文章所产生的争论推向新一轮高潮。蒂斯的文章，列举一些不能说并不重要的理由，说明因此使得许多作家不能流亡外国，并且辩护说这些作家虽然身留德国，但保持了“尽管希特勒千方百计地想予以占领却始终未能成功”的“内心世界”，因此，这些作家实际上是在进行“内心流亡”。

蒂斯的辩护，将一小撮出名的纳粹分子除外，把当时“帝国作家协会”

的全部成员宣布为“内心流亡”者，也就是说宣布他们实际上本来就是反法西斯斗士。如此自我拔高，显然不合情理。不仅如此，蒂斯还在文中提出了“内心流亡”作家身留德国“保持人格傲骨，比在那边（国外）向德国人民发些通告更为可贵”的攻击性观点，并在字里行间表露出流亡作家在德国遭受灾难浩劫时躲在安全舒适的外国，现在无权对国民说三道四的尖刻指责。

蒂斯认为面对法西斯的暴戾而虚与委蛇，表面顺从而内心憎恶的“貌合神离”的做法值得首肯。而这种处世行为对于托马斯·曼来说，却正是他所十分鄙薄、憎恶的德国国民精神痼疾中的卑怯性、苟安性的一个具体体现。托马斯·曼认为，正是由于国人有这种苟且态度，才使得纳粹分子能够篡权夺国，为所欲为。因此，显然被蒂斯文章中的暗含攻击所激怒的托马斯·曼，于1945年9月28日在纽约《建设》杂志上发表题为《为何我不回德国》一文，作为对莫洛《公开信》的答复，在谈到未曾流亡的作家问题时，竟一反过去那种严格将纳粹分子与德国人民区别开来的立场，变得武断起来，笼统地斥责未曾流亡作家的作品全都是些魑魅魍魉，全都曾为虎作伥：

也许这是偏见，但是在我的眼里，凡从1933年至1945年能在德国出版的书籍，比毫无价值还无价值，总之不堪沾手。它们散发着血腥味，寡廉鲜耻，应当统统地销毁，捣烂，打成纸浆……我对自己说，在受到如此精神荼毒长达12年之久的人群中，你焉得安然生活。

这样，托马斯·曼拒绝返回德国。他的这封有些措辞过于尖锐、说法略欠妥当的复信，经大众文化传媒，尤其是广播媒体的传播，导致一时间满城风雨，成为一场激烈的不可调和的争论之滥觞。在随后的好几个月里，德国上上下下，还有国际上，都有人纷纷投书报刊杂志或广播电台，评论纷纭，孰是孰非的争论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总之，托马斯·曼拒绝回国的决定，得到德国某些舆论的尊重，但他对特定时间段的文学的全盘否定、概行摈斥的态度，却几乎遭到众口一词的抨击。

这场在德国重音乱耳、沸反盈天的社会大争论，很快就被舆论称之为“托马斯·曼风波”。

大家知道，同盟国占领德国后很快就依据波茨坦协定在占领区内广泛地推行“非纳粹化”运动，在这个运动的背后蜷缩着认为德国人对法西斯政权的产生和所犯罪行为负有“集体责任”的观点。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集体责任”这个观点自然难以被德国人所接受。而托马斯·曼在他的《谈德国责任问题》一文中就已经表露出他认为德国人负有“集体责任”的观点，因此与留在国内的同胞形成尖锐冲突也就可以说是在所难免。而在这层意义上讲，“托马斯·曼风波”也就是从另一个角度展示出人们当时精神上的迷惘，价值尺度的失衡，对于“责任”等问题普遍不敢正视的态度、闪回的意识、接近病态的敏感和急于自我保护的心理。事实上也果然如此，在“非纳粹化”运动过程中，就有不少人依据蒂斯等人提出的“内心流亡”言论为自己开脱，其自负情绪比以前更甚。

亨利希·曼曾于1934年说：“流亡曾经是，现在仍旧是绝大多数德国人的一个念头，这也就是说，流亡者，德国之精华也。”他的这句话，表达出许多流亡作家的自我高扬信念。尽管他们在国外历尽漂泊无着和羁旅无归的孤苦与艰难，并且有仍然坚持以笔作投枪反对法西斯的鞍马之劳，然而国人却对他们及他们的作品暗中颇有抵触情绪，并且这种情绪，经“托马斯·曼风波”后还更为高涨和愈益彰显。

因此，有许多大失所望的流亡作家，便纷纷决定继续滞留国外，或者是决定回到由苏军占领的东占区德国。这里面包括相当一大批国际知名的流亡作家。与流亡作家作品遭到贬斥的处境相反，“托马斯·曼风波”使“内心流亡”作家不期而至地获得了一份前所未有的自信，获得一块与他们的实际情况不相称的活动园地，占领了本应属于曾外出流亡的、“具有道德楷模和积极影响”的资产阶级民主作家的传统文学的领地，他们的作品得以鸠占鹊巢，堂而皇之地在战后德国文坛上雄踞一时。战后德国文学呈现出的这种畸形的尴尬局面，正如流亡出版家弗里茨·H·兰兹霍夫在给阿尔诺尔德·茨威格的一封信中愤然所说：

有谁曾经料到，希特勒被打败已经有三年了，然而整个德国和奥地利地区的大门却

依旧对流亡作家紧紧关闭着。这个现状，真令人感到是种莫大的耻辱。

大门紧关着，这就意味着即使回到了德国的流亡作家依旧是个得不到社会承认的“陌生人”，更别说那些滞留在外的作家了。事情过去了十几年，“托马斯·曼风波”仍旧是许多爱制造热点的报刊杂志文艺副刊上的一个热门话题。直到60年代，当社会上不少人开始为流亡作家鸣不平时，“托马斯·曼风波”才在这些报刊上余波渐平。不过到了80年代，仍然有个别当年的“内心流亡”作家公开对当年“托马斯·曼风波”中的托马斯·曼耿耿于怀。而一直到了90年代初两德统一之后，一位在希特勒篡权后就走上流亡他乡道路的流亡作家，才宣布他正式结束“流亡”生涯回到德国，让人在唏嘘感叹之余难免不陷入深思。

## 说来话长

余阳

1995年8月,德国当代最负盛名的作家君特·格拉斯发表了鸿篇巨著《说来话长》。该书长达781页,将1990年的德国统一置于历史的大背景中,同上世纪末的第一次统一(1871)相比较,总结出它们的相似之处,并以荒诞讽刺的笔触对1990年统一带来的尖锐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此书出版前就已广受关注,问世后更是引发了德国文学界、评论界、新闻界乃至政界的一场大论争,喧嚣之声甚至波及到法国等周边邻国。此书出后,一月再版三次,并即将译成五国文字。这般轰动效应在近年来的德国文坛极其罕见。

自他的成名作《铁皮鼓》起,格拉斯就钟情于流浪汉小说这一体裁,《说来话长》中的两位主人公也是一对类似堂·吉珂德和桑丘的怪人。忒欧·伍特克别名“冯提”,生于1919年,是19世纪德国批判现实主义代表作家台奥多尔·冯塔纳的狂热崇拜者,或者说是冯塔纳在20世纪的化身。书名“说来话长”就源于冯的名作《艾菲·布丽斯特》。冯提在二战期间服役于帝国空军部,战后住在前东德的普伦茨劳尔山麓,邻居多是受到前东德国国家安全局严密监视的反叛艺术家。作为冯塔纳专家,他在全国各地为文化联盟作了大量关于冯塔纳研究的报告。其中不乏影射当时政局之辞。1990年统一以后,他受雇于Treuhand(这是统一后德国官方设立的专门机构,负责对前东德国有企业实行全盘私有化),成了那里的信差。

书中的另一位虚构的主人公霍夫塔勒是冯提“昼夜不离的影子”,生于1819年,是超越一切社会制度、一切时代的永远的密探的象征。他先后为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纳粹德国、前东德政权效力。早在19世纪时就反对德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二战期间是盖世太保成员,后供职于前东德国安局,负责监视文化界动态,冯提就是他监视的对象之一。

就是在这两个看似水火不相容的人物之间却滋生出一种奇怪而深厚的友谊。因为他们觉得“受害者和凶手,其实是陷在同一张网中的”。两位老人还有一点共通之处:往事对于他们就像时事般触手可及。在1989年12月30日至1991年秋的短短20个月中,他们相伴漫步柏林城,以一种闲适的聊天口吻,回顾了自己以及冯塔纳的一生,追忆在前东德共度的时光,并将眼下的德国与旧普鲁士俾斯麦统治时期的德国做了对比,对德国再次统一及现状忧心忡忡。

交谈达成三方面的共识。首先,对于1990年的统一,他们持鲜明的反对态度,认为它不过是1871年统一的卷土重来。在“深渊”一章中,“11月9日”,即拆毁柏林墙的日子,被视为“悲伤、阴暗、血腥、让人恶心并该受诅咒的日子”。历史在重演,只是形式不同罢了。

其次,目睹现状,他们认为,西德人显然正在扮演殖民统治者的角色。而前东德则被描绘成统一的受害者,是供西德人肆意瓜分的一块“里脊肉”。书中还暗示,前东德亦有可取之处,它的功绩不能被西德人一概抹杀。

冯提与霍夫塔勒得出的另一个重要结论则是Treuhand这个机构的非人道性。原东德国有企业私有化,使成千上万人失业,带来的不仅是悲伤、绝望,还有仇恨。

对德国的历史与现状作了一番回顾和反思之后,冯提和霍夫塔勒都觉得在德国“已无容身之地”,分别神秘地消失在两个不知名的国度。

此书是 1990 年之后第一部详细论述统一主题的长篇小说，气势恢宏，颇具史诗性，况且又出自德国人现在寄予厚望的“民族作家”格拉斯之手，其成功似乎是不言而喻的。格拉斯本人对成稿也甚是满意，认定它将是一部“成功之作”，开始时的迹象也表明确实如此。

早在 1995 年 4 月，一向对格拉斯作品颇多微辞的德国“文评教皇”马歇尔·海希-哈尼茨基主动邀请格拉斯去法兰克福朗读《说来话长》中的一章。在朗读会上，哈尼茨基与格拉斯互予了对方高度评价，这在作者与文评家关系甚僵的德国实不多见。

但当对此书的评论纷纷见诸报端之后，却令公众哗然：正是以哈尼茨基为首的文评家开始了对此书的狂轰滥炸。

文评界先扬后抑，其转向之快之剧，已令舆论界瞠目，但更惹人注目的则是此次文评的政治色彩。对该书文学性的评价，如人物刻画呆板、语言乏味等，在这次声讨中所占篇幅甚小。大多数文评家将此书首先视为“政治手册”，并将其失败归结于它“错误的政治观点”。这样，文艺评论变成了政治论坛，整个文化界，甚至政界人物也加入了论战。

这一切的“喧嚣与愤怒”看似缘起于一部名家新作的失败，同时关涉政治话语在文评中统治“度”的问题。但细查之下不难发现，该书内容与所谓“政治化文评”的所指实则是一致的，即对 1990 年德国统一的评价。换言之，即德国当代文学应如何对待这段最年轻的德国历史，并以文学的形式将其载入史册。

东西德合并之后，德国作家在对待统一的态度上明显地分为三大阵营。以马丁·瓦尔泽和 G·库勒特为首的少数派坚决拥护统一。1988 年瓦尔泽就着手写小说《童年的辩护》，揭示当时由于两个德国处于分裂状态而导致的种种问题，呼吁它们的统一。而统一之后，他似乎对“统一后的德国”这一主题无甚兴趣，如他的近作《芬克的战争》表达的就是人在巨大的权力机制下心灵所需承受的痛苦，与统一毫不相干。这部分作家的兴趣所在，似乎只是德国在政治形式上合二为一，而对这一历史性转折及其导致的诸多社会问题，并没有予以文化上的关注。

第二大阵营中几乎是清一色的前东德作家，他们对统一的态度比较复杂，但总的来说，是持一种保守的观望态度。对他们来说，反思在前东德几十年的生活中形成的世界观、行为方式与自我意识才是当务之急，而统一主题则被暂时搁置一旁。1990 年，前东德著名作家克·沃尔夫发表了《还剩下什么？》一书，旨在谴责前国安局监视压制文学的做法，并由此引发了一场长达两年的关于政治与文学、道德与权力的文坛大论争。此后又有一系列类似的作品问世。对于他们而言，理清与前东德的各种纠葛与情结，意味着在统一的环境中责无旁贷地为自己和东德人找到一种新的自我认同与价值。正如克·沃尔夫所说：“这段 40 年的历史该往何处去呢？它并非幽灵，但它的消失却留下了幽灵般的痛苦。如果大家都忙于改善物质生活，那谁来讲述这许多人都经历过的悲伤、耻辱和悔恨呢？”许多评论家将《说来话长》一书的受挫归因于前东德优秀作家的沉默，这也不无道理。格拉斯毕竟是西德人，没有体验过前东德的生活，却试图从一个东德知识分子的角度评点统一，这种“超验”式的尝试是注定会失败的。

人数最多的第三大阵营是以格拉斯为首的反统一派。他们的基本主张是：统一的进程过于仓促，缺乏意识形态与心理上的准备，这势必导致盲目

的民族主义，让人不得不担心德国人重蹈历史的覆辙。

格拉斯一直将统一视为“玩笑的产物”，认为那个曾经统一过 75 年（1871~1945）的德国带给世界人民与本民族的只有深重的灾难。它曾是反犹主义和奥斯维辛的温床，因此悲剧决不能重演。如果说阿多诺的观点是“奥斯维辛以后，写诗就是野蛮”，那么格拉斯则是：奥斯维辛以后，谁让德国统一就是野蛮。他与大多数左翼作家认为，理想的是让东西德以联邦的形式共处，即在拥有同一种文化的前提下，作为“文化民族”而不是政治形式来统一。

如果说丹尼尔·约拿·戈特哈根在《希特勒自愿的刽子手》一书中把反犹主义归结于德国的民族性，在美国反响强烈，是因为统一后重新强大的德国令美国感到不安，那么格拉斯的《说来话长》在德国的遭遇则说明德国人本身对统一的疑虑。（《外国文学》1998 年第 3 期，本书有删节）

## 思想书廊

### 《中国思想史》

第1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

葛兆光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8年4月 定价：42.00元

本书一改过去作为教科史思想史以个人为中心的叙述模式，在一个更为广泛的思想文化视野内，对上古到七世纪以前的中国知识、思想及信仰的历史进行富有个人色彩的描述。本书不仅关心古代中国精英与经典思想的发展，而且分析这些思想得以形成与确立的知识来源；不仅描述了思想本身，而且也描述了这些思想所以如此生成的土壤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



## 汉娜·阿伦特专辑

### 汉娜·阿伦特生平及创作

汉娜·阿伦特是 20 世纪杰出的政治理论家和社会评论家，是西方知识女性的杰出代表。在西方，尤其在德国和美国的政治学和哲学领域，享有很高声誉。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哈贝马斯曾说过，在社会学领域，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个人物就是舒茨和阿伦特。

阿伦特于 1906 年 10 月出生于德国汉诺威市。她的祖辈来自俄国的犹太移民。阿伦特的父亲是一个工程师，母亲在文学和音乐方面颇有造诣；在他们周围，形成一个知识分子圈子，关心民主政治，热衷文化活动。

1924 年，阿伦特进入马堡大学哲学系，投师于海德格尔门下；1925 年转学到弗莱堡大学听胡塞尔的现象学课；1926 年经海德格尔推荐到海德堡大学，在雅斯贝斯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随后移居柏林，与报刊作家斯特恩结婚，并从事德国浪漫派研究。1933 年希特勒上台后，大规模迫害犹太人，阿伦特乃放弃书斋生活，主动为犹太人以及共产党人和民主党人的逃亡提供帮助，一度被盖世太保抓获。获释后，即逃往巴黎，随后流亡美国，在一家德裔犹太人周报工作，后来负责一个犹太组织的科学研究工作，并在一家出版社任编辑。

1949 年，她重返德国和欧洲。1951 年发表多年政治学研究的成果《极权主义的起源》，震动欧美知识界，被誉为“大师的杰作”，认为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可与马克思的社会批判著作相媲美。此后，她应邀在美国的一些著名大学讲课，晚年还曾两次应邀赴英国主持著名的吉福德讲座，跻身于世界一流学者之列。1961 年还曾应纽约一家报社之邀赴耶路撒冷报道对第一个纳粹战犯艾西曼的审判过程。1975 年 12 月 4 日，因心脏病突发逝世，终年 69 岁。

据不完全统计，阿伦特生前及身后一共出版了近 20 部著作。本专辑选编了她的代表作《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三部最重要的两章；另外，还编入她的一篇访谈录片断。

《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以历史现象学的研究和叙述方法，揭示极权主义产生的根源和赖以生存的基础。全书分反犹太主义、帝国主义、极权主义三部分，中心思想是：在现代社会中，人民群众面临空前的孤独；这种危机，最终必将导致政治空间的崩溃，和世界性灾难的发生。书中把前苏联与纳粹德国、布尔什维主义与纳粹主义并提，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为了较完整地体现作者的政治哲学思想，在此作了保留，敬希读者注意。

## 极权主义运动

[德] 汉娜·阿伦特 林骧华译

### 一、极权主义的宣传

只有暴民和精英才会被极权主义本身的锐气所吸引；而只有用宣传才能赢得群众。在立宪政府和自由言论的条件下，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极权主义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使用暴力，并与其他政党共同获得必要的坚定支持者，巧言取悦公众。公众在此时此刻尚未与其他一切资讯来源隔绝。

在极权主义国家里，宣传（propaganda）和恐怖相辅相成，这一点早已为人们所指出，而且经常被如此认定。然而这只是部分事实。凡在极权主义拥有绝对控制权的地方，它就用灌输（indoctrination）来代替宣传，使用暴力与其说是恐吓民众（只有在初期阶段，当政治反对派仍然存在时，才这样做），不如说是为了经常实现其意识形态教条和谎言。在相反的事实面前，极权主义不会满足于宣称不存在失业现象；它会废除失业者的福利，作为它的一部分宣传。同样重要的是，拒绝承认失业——尽管是以一种相当出人意料的方式——实现了古老的社会原则：不劳动者不得食。或者另举一例，当斯大林决定重写俄国革命历史时，他的新版本的宣传中包含了将旧版本的书、文件连同作者和读者一起加以毁灭：1938年出版的新版官方共产党历史是一个信号，意味着那场屠杀苏联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超级大整肃结束了。同样地，纳粹在东方占领区起初主要利用反犹主义宣传来赢得对居民的牢固控制。他们不需要也不使用恐怖来支持这种宣传。当他们清除波兰的大部分知识分子时，并非因为知识分子们的反对，而是因为根据他们的理论，波兰没有知识分子，而当他们计划绑架蓝眼睛金头发的儿童时，意图并非在于恐吓居民，而是要拯救“日耳曼血统”。

由于极权主义运动存在于一个本身是非极权主义的世界中，它们被迫使用那种普遍认为是宣传的手段。但是这种宣传总是诉求于“外部范围”——无论是国内居民中的非极权主义阶层，还是国外的非极权主义国家。极权主义宣传诉求的这个外部范围可能变化很大；即使在夺取政权以后，极权主义宣传可能会针对自己国家里的几部分人，因为在经过足够的灌输之后，他们仍未采取协调一致的态度。在这一方面，希特勒在战时对他的将军们的演讲是典型的宣传，其特点主要是撒弥天大谎，这位领袖借此来娱乐他的客人，以图博取人心。外部范围也可以指一些运动的同情者，他们还未准备接受运动的真正目的；最后，甚至纳粹党员也常常被领袖手下的内部圈子（inner circle）或精英集团成员看作属于这类外部范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需要接受宣传，因为他们还不能可靠地接受控制。为了不致于低估谎言宣传的重要性，人们应该记得更多的例子，看到希特勒在界定运动的真正目的时，他是完全真诚的，直率而不含糊，然而公众还未准备好接受这种贯彻的说法，所以未被承认。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极权主义统治之努力限制其宣传手法，仅仅在于它的外交政策方面，或者它的国外各分部，目的是向他们提供合适的材料。每当国内的极权主义思想灌输与在国外的宣传路线相冲突时（战时在俄国发生过此类情形，这不是在斯大林结束他与希特勒联盟之时，而发生在对希特勒作战使之站到民主阵营一方时），在国内就将宣传解释为一种“暂

时的策略手段”。只要有可能，对于被吸纳到运动内的人的意识形态理论（他们已不再需要宣传）与对外部世界的真正宣传之间的区别，在运动取得权力之前就已存在。宣传与灌输之间的关系通常一方面取决于运动的规模，另一方面取决于外部压力。运动规模越小，就越有能量扩展纯粹的宣传；外部世界对极权主义政权的压力越大——即使在铁幕后面，也不能完全忽视这种压力——极权主义独裁者就越会积极地从事宣传。根本的要点是，宣传的必须性总是由外部世界控制着，而运动本身实际上并不宣传，而是灌输。相反，灌输不可避免地恐怖相伴，增强了运动的力量或极权主义政府的孤立，以及不受外部干涉的安全感。

宣传确实是“心理战”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恐怖更甚。甚至当极权主义政府达到了它的心理目的以后，还会继续利用恐怖手段：它的真正恐怖在于它统治一群完全沉默的居民。凡在恐怖统治达到完美的地方，例如在集中营里，宣传就完全消失了；甚至在纳粹德国，宣传也被明白禁止。换言之，宣传也许是极权主义一种最重要的对付非极权主义世界的工具；相反，恐怖是它的统治形式的本质。它的存在很少依靠心理因素或其他主观因素，就像法律在一个立宪国家内的存在不依靠违法者的人数一样。

恐怖作为宣传的对应，在纳粹主义中比在布尔什维主义中作用更大。纳粹并不打击著名人物，像它早先在德国掀起犯罪浪潮时那样（杀害拉德诺和厄兹伯格（Matthias Erzberger））；相反，他们杀害社会主义的小活动家们，或反对党中有影响力的成员，试图向民众证明只有参加那些组织的人才危险。这种大规模的恐怖还在相对较小范围内进行时，并逐渐扩大着范围，因为警察和法庭都不会认真地对攻击所谓右翼的政治犯法者执法。一个纳粹宣传家所说的“权力宣传”（power propaganda）是很值得研究的：它至少清楚地向民众表明，纳粹的权力比当局更大，参加纳粹组织比做一个忠诚的共和主义者更安全。纳粹在制造政治罪行时具体地利用了这一点，极大地强化了上述印象。他们对此总是供认不讳，从来不为“下级的过分行为”而道歉——只有纳粹的同情者们才作这类道歉——并且使民众印象深刻，看到他们与其他政党的“高谈阔论者”大不相同。

这种恐怖和歹徒的普通犯罪（gangsterism）之间的相似性已很明显，无需指出。这并不是指纳粹主义就是歹徒帮派，像人们有时作出的结论那样，而只意味着纳粹尽管不承认，它实际上学了美国的黑社会组织，而其宣传却承认是学了美国的商业宣传。

但是，极权主义宣传比直接威胁更具体，针对个人的犯罪行为就是利用间接的、掩盖之下的、险恶的暗示来针对一切不愿跟从他们教导的人们，在此之后，大规模屠杀渗透到一切“有罪”和“无罪”之人。布尔什维主义宣传威胁民众，说他们会被历史抛弃，落后于时代就会陷入绝望，只能虚度生命；而纳粹主义威胁说，民众的生活会违背自然和生命的永恒规律，他们的血液会无可挽回地、神秘地败坏。极权主义宣传非常强调其论点的“科学”性质，这一点常被人用来比较某些在群众面前作自我表演的广告技巧。而事实上，每一份报纸的广告栏都夸示这种“科学性”（scientificity），制造商用事实和数字来证明，一个“研究”机构出马相助，例如论证他的肥皂是“世界上最好的肥皂”。同样地，宣传者充满想像的夸张中有某种暴力成分，例如小姐们如果不用这种牌子的肥皂，就会一辈子长粉刺，找不到丈夫，这种说法的背后是垄断欲望的胡思乱想，梦想有朝一日，这位“惟一预防粉

刺的肥皂”制造商会有力量剥夺所有不用这种肥皂的小姐们获得丈夫的权利。商业广告宣传和极权主义宣传这两者都明显地只是一种权力追求。一旦极权主义运动掌握了权力，这种科学证明的纠结就停止了。纳粹甚至抛弃了那些愿意为他们服务的学者，布尔什维克利用他们的科学家的名声来达到非科学的目的，强迫他们做骗子。

但是，经常被高估的群众广告和群众宣传之间的相似性，仅止于此。商人通常并不装扮成先知，他们往往不会表明自己的预言是正确的。极权主义的科学性的特点是几乎完全强调，科学的预言与老式的追溯历史完全不同。社会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起源所显示的，无非就是它们的代言人假说他们发现了隐藏的力量，可以在命运链上给他们带来好运。当然，群众极被吸引，是因为“绝对系统 (absolutist system) 陈述一切历史事件是依靠与命运链相连的第一因，这个绝对系统本身在人类历史上就是压迫人的”。(托克维尔语)但是毫无疑问，纳粹领袖实际上并不只是利用宣传，他们也相信这样的理论：“事实上，我们越是认识和观察自然和生活的规律……我们就越是服从万能之神的意志。我们越是深刻认识到万能之神的意志，我们越是能获得更大的成功。”很明显，无需改动多少字，就能表达斯大林用两句话所说的信条：“我们越是精确地认识和观察历史与阶级斗争的规律，就越会遵从辩证唯物主义。我们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越深刻，就越能取得伟大的成功。”无论如何，就斯大林关于“正确领导”的概念而言，没有比这更好的解释了。

极权主义宣传将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及其用预言形式发表声明的技巧提高到有效方法与荒谬内容的高度，因为从煽动技巧的角度来说，几乎没有更好的方法可以避免争论，只能从控制目前情形出发来发表论点，说只有未来才能显示它的优点。但是，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并未发明这种程序，也并非这种程序的惟一使用者。现代政治普遍地在群众宣传中运用科学性，这被解释为是一般迹象，这种对科学的热中是西方世界自从数学和物理学在 16 世纪兴起以来的特点；因此极权主义在“科学变成偶像，可以巫术般地医治恶的存在，改变人性”的过程中似乎是最后一个阶段了。群众的兴起和利用科学性之间实际上很早就有联系。群众的“集体主义” (collectivism) 受到一些人的欢迎，他们曾希望出现“历史发展的自然规律”，它能消除个人行动与行为的无法预示性。昂方丹 (B.P. Enfantin) 常被援引作为例子，他早就能“看到一种时代即将到来，‘使群众感动的艺术’即将完美地发展，使画家、音乐家和诗人能够拥有一种力量，取悦和感动群众，其自信程度不亚于数学家解决一个几何难题，或化学家解释任何一种物质”。其结论是：现代宣传就在此时此刻产生。

然而，无论实证主义、实用主义 (pragmatism) 和行为主义 (behaviorism) 有何种缺点，无论它们对 19 世纪常识的形成产生多大影响，极权主义宣传和科学性所诉求的群众的特点完全不是“功利主义存在部分的有害生长”。我们从孔德的学说中知道，实证主义相信，未来最终可以科学地被预测，利益评价是决定历史的主要力量，并且假设可以发现权力的客观规律。罗昂的政治学理论说：“国王指挥民众，利益指挥国王”，客观利益是“惟一不会失效”的规律，“正确理解利益，能使政府生存，错误理解利益，会使政府死亡”，这些都是现代功利主义、实证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的传统核心，但是，这些理论都不会假设有可能“改变人性”，如极权主义试图做的那样。相反，

它们都或明显、或含蓄地假设，人性总是不变的，历史就是变动的客观环境以及人类对它们作出反应的故事，正确地理解历史，就能导致改变环境，但不能导致改变人类反应。政治学中的“科学主义”（scientism）仍然假设人类福利是它的目标，这种观念是在极权主义里完全没有的。

正因为认可了功利主义的核心思想，极权主义政府的反功利主义行为、完全无视群众的利益这一点，就成了一种震荡。这在当代政治中引进了一种前所未闻的和不可预测性的因素。然而，极权主义宣传——尽管其形式上经常变换重点——指出了，即使在极权主义夺得权力之前，群众所关注的早已超越纯粹利益。因此同盟国都怀疑，希特勒在战争开始时下令屠杀精神病人，其实是想摆脱不必要的食物供应之负担，这是毫无道理的。希特勒不是因为战争而被迫抛弃道德上的考虑，而是将战争的大规模屠杀看作是一次无与伦比的机会，可以开始一项屠杀计划，就像他的计划中的其他要点一样，是根据“千年至福”（millennia）的观点来策划的。自从全部欧洲历史几百年来实际上教会人们根据“什么人得益”来判断每一次政治行动，根据背后的具体利益来判断一切政治事件，他们突然面对一种前所未有、无法预见的因素。由于极权主义宣传的煽动性质——早在夺取权力之前很久就清楚地显示出，群众很少受到的自保（self-preservation）本能的驱使——群众很少认真对待这些宣传。但是，极权主义宣传的成功并不十分依赖它的蛊惑人心，而是依赖群众的知识，使他们明白，利益是一种集体力量，只有当稳定的社会在个人和群体之间提供必要的传送带时，才能感到利益所在。群众的主要特点是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社会团体或政治团体，他们只代表个人利益混乱多变的现状，因此在群众之中，以纯粹利益为基础的宣传不会生效。极权主义运动成员的狂热和一些普通的政党之成员的最大忠诚相比，明显地具有十分不同的性质，他们是缺乏自我利益意识的群众的产物（他们随时愿意牺牲自己）。纳粹党人证明了一个人只需用一句口号——“否则我们就完了”——来引导整个民族进入战争（这种做法是1914年的战争宣传小心地避免的），而且此刻并不处于苦难、失业、或鼓噪民族野心的时代。同样的精神出现在一场明显失败的战争的最后几个月，纳粹宣传在安慰早已惊慌失措的民众，许诺说：“领袖凭他的智慧，早已为他的人民准备了一种简易死亡法，假如战败，就让他们进毒气室。”

极权主义运动利用社会主义和种族主义，并且取消它们的功利主义内容，即一个阶级或一个民族的利益。在一贯正确的预言形式中提出这些概念，使形式变得比它们的内容更重要。群众领袖的主要资格是永远无误；他绝不能承认错误。再者，一贯正确的假设之基础不是超人的智慧，而是正确解释历史或自然的根本可靠力量，失败和毁灭都不能证明这些力量是错误的，因为长远来看，它会证明自己是正确的。掌权的群众领袖在一切功利主义的考虑中只关心一件事：使他们的预言变为现实。纳粹党人在战争结束时毫不犹豫地集中他们尚能掌握的组织，尽可能彻底毁灭德国，以实现他们的预言：如果战败，德国人民就遭毁灭。

“永远无误”的宣传效果，以各种可预言的力量的惟一解释者自居而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功，这些都鼓舞了极权主义的独裁者们，习惯于以预言形式来宣布他们的政治意图。最著名的例子是希特勒于1939年1月在国会的讲话中所宣布的：“我今天再作一次预言：假如犹太金融家们……再一次成功地将民众扔进一场世界大战，结果将是……犹太种族在欧洲灭绝。”用非极权

主义的语言来解释，这意味着：我想制造战争，我想杀死欧洲的犹太人。同样地，斯大林于1930年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演讲中说，他准备清除党内右派和左派分裂主义分子，形容他们是“垂死阶级”的代表。这一定义不仅具体地加重了论调的尖锐性，而且以极权主义的风格宣布从肉体上消灭的那些人，他们的“死亡”正是预言中的事。这两个例子都达到同一个目标：清除对手都符合历史过程的规律，根据永远不变的规律，人的所作所受都是必然发生的。对牺牲者的迫害一旦执行了，“预言”就变成了一种回顾式的辩解：所发生的一切都只是早已预言的。“历史规律”是否诅咒阶级及其代表的“毁灭”，或者“自然规律是否……消灭”一切不“适宜生存”的人——民主人士、犹太人、东欧次等民族、无法医治的病人，这些都无关紧要。希特勒恰巧也说过“垂死的阶级”应该被“消灭，这不用大惊小怪”。

这种方法就像极权主义其他宣传方法一样，在运动夺取政权以后，只是极其简单明了的事情。那么，关于极权主义独裁者预言之真伪的一切争论都是很古怪的，好比争论一个潜在的杀人犯的未来受害者究竟是死是活一样——因为杀死这个人，杀人犯可以立即提出他是正确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惟一有效的争论是立即拯救这个被预言判定将死的人。在群众领袖夺取权力以实现他的谎言之前，他们的宣传就是以其极端地嘲弄事实为标志，因为根据他们的观点，事实完全取决于能够编造事实的人的力量。声称莫斯科地铁是世界上惟一的地铁，这个谎言只要布尔什维克还没有力量摧毁别国的所有地铁之前会一直存在。换言之，永远无误的预言方式和任何其他极权主义宣传手段不一样，违背了它最终统治世界的目的，因为只有在一个完全处于他的控制之下的世界里，极权主义统治者才有可能实现他的谎言，使他的一切预言变为现实。

预言之科学性语言符合群众的需要，他们在世界上失去了家园，现在准备和永恒的、统治一切的力量合为一体，这些力量本身可以将处在险恶风浪中游泳的人带到安全的岸上。“我们根据遗传学的证明来塑造民族的生活和我们的法律”，纳粹此言，正如布尔什维克向他们的追随者保证，经济力量有能力决定历史。因此他们保证会有一种胜利，不受“暂时”的失败和具体企业的失败影响。因为群众与阶级不一样，他们只要胜利和成功，哪怕是最抽象的形式，他们被约束在一起，并非因为他们特殊的集体利益，那是他们感到作为一个群体而生存不可或缺的，以及即使面对逆境也可以坚持的利益。对他们而言，比可能胜利的目标或可能成功的具体努力更重要的是：只要是胜利，无论是什么目标；只要是成功，无论是何种企图。

极权主义宣传使群众宣传的技巧更完备，然而它既不发明、也不创造宣传的主题。这些现成的主题，是由50年里帝国主义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解体替它准备的。当时欧洲暴民进入了政治舞台。极权主义运动的代言人像早先的暴民领袖一样，对一切事物具有准确无误的直觉，这是普通的政党宣传或舆论不关心或不敢触及的。隐藏的一切事物，悄悄地发生过的一切事物，都变得具有重大意义，而它们的内在重要性却被忽略。暴民实实在在地相信，真理就是体面的社会虚伪地忽略，或者腐败地掩盖的一切。

在选择论题时，神秘性(mysteriousness)本身变成了第一条标准。秘密的起源无关宏旨；它可以是在合理的、政治上可以理解的渴求秘密(desire for secrecy)中，例如英国情报部或法国第二局(French Deuxieme Bureau)；或者革命团体的密谋需要，例如无政府主义和其他恐怖主义组织；或者在社

会的结构中，它们原先的秘密内容长期以后却变得十分出名，只有礼仪形式仍然保留着先前的神秘性，例如共济会；或者在古老的迷信中，围绕着某些群体编织传说，例如耶稣会士和犹太人。在选择群众宣传的这些题目时，纳粹无疑棋高一着；但是布尔什维克逐渐学会了这些把戏，虽然他们不依靠传统的被接受的神话，宁可选择自己创造——自从 30 年代中期以来，在布尔什维克的宣传中，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了神秘的世界阴谋，从托洛茨基的阴谋开始，接着是 300 个家族的统治，再接着是英国和美国情报局凶恶的帝国主义（即全世界的）阴谋。

这类宣传的效果显示了现代群众的主要特点之一。他们不相信自己的实在经验中一切明显可见的事物；他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只相信自己的想像，这种想像可能被同时是普遍的、又是首尾连贯的任何事物捕捉住。使群众信服的不是事实，甚至也不是编造的事实，而是一种他们在其中成为组成部分的系统一致性。重复手段的重要性常被高估，因为在一般情况下都相信群众把握事物和记忆事物的能力很差，其实重复手段之重要仅在于它能及时使人相信事物是首尾一致的。

群众拒绝承认于充满现实中的偶然性（fortuitousness）。他们生来倾向于各种意识形态，因为他们将事实解释为只是一般规律的一个具体例子，否定事物的巧合，发明了一种适应一切的万能解释，假设它是一切偶然事物的根本。极权主义宣传由于这样地从现实逃避进虚构，从偶合逃避进一致性，遂显得颇有生机。

极权主义宣传的主要缺陷是它无法满足群众的渴望——完全一致的、可以理解的、可以预见的世界，而不与常识（common sense）发生严重的冲突。例如，如果苏联的政治反对派的一切“告白”（confession）用语相同，承认同样的动机，那么追求一致的群众就会将虚构接受为真理的最高证明；而常识告诉我们，这种一致性恰恰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而是编造出来的。说得形象些，似乎群众要求经常重复旧约圣经的奇迹（the miracle of Sep-tuagint），根据古代传说，有七名翻译者各自独立地翻译出希腊文《旧约全书》，而内文完全一致。常识只能将这个�故事当作一个传说或一个奇迹来接受；然而它也能说成是证明译本都绝对忠实地译出了每一个词。

换言之，如果说群众受到一种逃避现实的愿望所蛊惑，因为在他们本质上无家可归的存在中，他们不再能忍受事实的偶然性和不可理解，那么同样地，他们对虚构的渴望也与人类思维的能力有关，人类思维结构的一致性高于纯粹的思维现象。群众逃避现实，这是对世界的一种判决，他们被迫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却又不能在其中生存，因为偶然性变成了这个世界里的最高主宰，人类需要经常地将混乱的、偶然的条件转化为一种相对的比较一致的人为条件。群众反对“现实主义”、常识，以及“世界的表面真实”（plausibilities of the world）（伯克语），原因是他们的分子化，他们失去社会地位，随之失去整个社群关系，而常识本来只有在它的范围内才能产生意义。他们在精神上和社会上无家可归的情况下，就无法以一定的尺度来深刻洞悉任意性与计划性、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极权主义宣传只有在常识失效的地方才能大量地侮辱常识。或者面对混乱的发展和完全任意性的衰落，或者服从于最严格的、异想天开的意识形态虚构的一致性，群众可能永远只会选择后者，随时以牺牲个人来作为代价——这并不因为他们愚蠢或邪恶，而是因为在这总体的灾难中，这种逃避至少给予他们一种

最低限度的自尊。

纳粹宣传的特点是从群众渴望一致性中获得好处，而布尔什维克的方法显示出（如同在实验室一样）它对孤独的群众中人的冲击力。苏联秘密警察很愿意使受害者相信他们有罪，尽管他们从未犯过这种罪，而且在许多例子中，他们根本不可能犯这种罪，秘密警察完全孤立和抹煞了一切真正的事实因素，以使“故事”的逻辑一致性在预先准备好的忏悔书上显得十分明白。在有些情况下，虚构和现实之间的分界线被骇人的指控和这些指控内在一致性弄模糊了，为了抵制对罪状纯粹抽象的可能性屈服的诱惑，就不仅需要抵抗经常性威胁的性格力量，而且也要求十分相信人类同伴的存在——他们绝不会相信这些“故事”。

无疑地，只有在极权主义的世界里，虚假和伪造的蠢事才能达到极端。但是，这只是极权主义政府的宣传手段之一部分，忏悔还不是必要的惩罚。“告白”是布尔什维克宣传的特产，用追溯法来奇怪地使罪行成立则是纳粹宣传的特产。这两者的目的都是一致的。

在根据它们的理论夺取权力和建立一个世界之前，极权主义运动想像出一个一致的谎言世界，与其说是满足现实本身的需要，不如说是满足了人类思维的需要；其中通过纯粹的想像，使失根的群众能够感到自在，并且使他们的真实生活和实际经验在人类期望方面避免没完没了的震荡。极权主义宣传所拥有的力量——在运动有力量降下铁幕来防止任何人用最微小的现实来骚扰一个完全想像的世界中凝滞的平静之前——在于它有能力将群众关闭在真实世界之外。真实的世界仍然提供给分化瓦解状态的群众惟一能理解的迹象——每一次厄运的打击都使群众受骗上当——这些迹象，可以说，是真实世界中的空白，是它不想公开讨论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它不敢否认的流言，因为流言尽管夸大和扭曲，却击中了某些痛处。

极权主义宣传从这些痛处中产生了它们需要用来填平现实与虚构之间鸿沟的真理成分和实际经验。只有恐怖可以依靠纯粹的虚构，即使是极权主义政府由恐怖支撑的谎言虚构也还未完全变得随心所欲，尽管它们通常更粗鲁，更厚颜无耻，而且比运动的谎言更有创造性（俄国革命修正过的历史不是靠宣传技巧，而是靠权力来传播的，书中没有一个姓托洛茨基的人曾经当过红军总司令）。另一方面，运动的谎言更精细些。涉及群众眼睛看不到的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在官方当局周围布置了一种秘密气氛时，谎言最能成功。在群众的眼里，它们获得了最“实在”的名声，因为它们触及了隐秘存在的真实状况。上层社会中腐败政治家的丑闻被揭露，一切属于黄色小报的丑闻，在它们手里都变成了一种不止是耸人听闻的重要武器。

纳粹宣传中最有效的虚构是关于犹太人世界阴谋的故事。自从 19 世纪末以来，集中于反犹主义宣传一向是普遍的煽动手段，20 年代在德国和奥地利尤为普遍。一切政党和舆论喉舌越是一致避免讨论犹太人问题，暴民就越是相信犹太人是所谓权力的真正代表，在整个制度中，犹太人问题是虚伪和不诚实的象征。

战后反犹主义宣传的实际内容既非纳粹的独白，亦非特别新的创造。关于犹太人世界阴谋的谎言自从“德雷福斯事件”以后就一直在流传，其基础是迄今分散在全世界各地的一个犹太民族仍有相互之间的国际联系和互赖。关于犹太人的世界权力的夸张说法出现得更早，可以追溯到 18 世纪末，当时



犹太商业与民族国家的密切关系已变得很明显。将犹太人描绘成恶的化身，通常只认为这是中世纪迷信的残余记忆，但是实际上与其后来被解放以后，在欧洲社会中所扮演的暧昧角色密切相关。有一件事是无法否认的：在战后，犹太人比先前任何时候都更出名。

犹太人本身在权力方面的影响和地位却与他们日益出名和引人注目的状况成反比。民族国家之稳定和力量每降低一分，对犹太人的地位都是次直接的打击。民族部分成功地超越国家，使政府机器有可能维持它高于一切阶级和政党的地位，因此也就贬低了与居民中的犹太人结盟的价值，犹太人或许仍处于社会各阶层之外，并且对政党政治不感兴趣。资产阶级具有帝国主义头脑，它越来越关心外交政策，对国家机器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同时也就坚决地拒绝让最大部分的犹太人财富进入工业企业，不让它离开传统的资本贸易。所有这些情况加在一起，几乎终止了犹太人作为个群体对民族国家经济上有用的性质，以及社会隔离对他们本身的好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中欧犹太团体像法国犹太人在第三共和国的最初几十年中一样同化和归化了。

对于变化了的形势，相关的国家在意识上达到何种程度，到 1917 年就明朗化了，当时德国政府遵循着一种长期建立的传统，试图利用它的犹太人来一试与协约国的和平谈判。它不和德国犹太社群的领导人说话，相反却与比较不具影响力的犹太复国主义小团体对话，根据旧的方式，这些小团体仍然受到信任，正因为他们坚持犹太人独立于公民身份之外存在，因此可望他们依靠国际关系网、从国际观点出发来提供服务。然而德国政府在这点上走错了一步。犹太复国主义者做了犹太银行家们从来未做过的事；他们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并对政府说，他们只愿谈判一种不带附加条件和赔偿条件的和平。过去犹太人那种对政治问题的冷淡态度消失了；他们中的大多数由于不再游离于国家之上，所以不再有用，而犹太复国主义者这一小部分人的无用，则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政治观点。

中欧诸国的共和政体取代专制政府，瓦解了中欧犹太人群体，正如 50 年前法国第三共和国所做到的那样。当新政府在缺少权力而无兴趣保护犹太人的情况下建立时，犹太人早已失去了他们的大部分影响。在凡尔赛和约期间，犹太人主要被利用来当作专家，甚至连反犹太主义者也承认，战后时代的一帮犹太小骗子，大多数是新来者（他们与当地的一些同宗教的人明显不一样，在他们的欺骗活动背后，有一种奇特的态度，和他们早先对周围环境的标准持冷漠态度很相像），他们和假设中的犹太人国际联系网的代表没有任何联系。

在一大群相互竞争的反犹太主义团体中，在一种弥漫的反犹太主义气氛中，纳粹的宣传发明了一种对付这一题目的方法，与众不同，而且比其他一切方法都高明。话说回来，纳粹的口号没有一条是新的——甚至连希特勒精明地描绘说犹太商人剥削工人，而他的兄弟在工厂里煽动工人罢工引起的阶级斗争的说法，也不是新的。惟一的新内容是纳粹党要求它的党员拿出证据来说明自己没有犹太血统，尽管有费德尔计划，但是关于纳粹一旦掌权后针对犹太人会采取哪些实际措施方面仍然极端模糊。纳粹将犹太人问题置于宣传中心，意味着反犹太主义不再是针对少数人的观点，或只与民族政治有关，而是直接关系到每一个人的个人生存问题；谁也不可能成为一个不成序列的“家族系谱”中的成员，而在纳粹的层级制度中，层级越高，在家族系谱中就必须追溯得越远。

纳粹宣传很直率地将反犹主义转变成一种自我定义的原则，因此消除了观点动摇不定的状况。它用蛊惑来说服群众，这只是一种预备步骤，而且从不过分估计其鼓动演讲或印刷出版物的持久影响力。这提供给由分子化的、无法定义的、不稳定的、人数众多的个人组成的群众，以一种自我定义和自我鉴别身份的方法，不仅恢复了他们先前产生于社会功能的部分自尊，而且也创造了一种欺骗性的稳定，使他们成为一个组织的更好的候选成员。通过这种宣传，运动可以使自身人为地成为群众聚结的扩延，并使一个分子化的社会里孤立的个人被许诺获得自尊，将歇斯底里地追求安全感的根本感情合理化。

纳粹在对待其他相关问题上也明显地应用了别人制造的以及先前使用过的口号。当公众的关注同等地集中在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上，认为这两者不能同等地比较，而实际上在右派和左派之间构成了意识形态的分水岭时，“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Worker's Party）（纳粹）提供了一种假设，仿佛要导致民族统一，这是口头上的解决方案，它的双重商标“德国”和“工人”将右派的民族主义和左派的国家主义串连起来。纳粹运动之名偷自其他各政党的政治内容，公开地借口将这一切结合起来。先前也有将对立的政治理论成功地结合的例子，例如民族社会主义（national-socialism）、基督教社会主义（christian-socialism），等等；但是纳粹以一种方式实现了他们的结合，国会里社会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全部斗争，那些首先自认工人的人和那些首先是德国人的人之间的斗争，都显得好像是一种设计，用来掩盖背地里有害的动机的欺骗——纳粹运动的每一个成员不就是同时包括了这一切吗？

有意思的是，纳粹即使在起家时也不屑利用民主、共和、专政、专制这一类显示一种具体的政府形式的口号。这一点足以说明，他们一向懂得自己的一切将完全是创新的。每一次关于他们的未来政府形式的讨论都沦为空谈纯粹形式——根据希特勒的说法，国家只是保存种族的一种手段，根据布尔什维克宣传的说法，国家只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

但是，纳粹以另一种奇怪的和迂回的方式，在其宣传中回答了关于他们的未来作用是什么的问题，他们用“锡安长老们的草案”作为模式，为在将来组织德国群众建立“世界帝国”而作准备。他们不限于在纳粹党徒中利用这个密谋的说法做宣传：他们还印刷了几十万册在战后德国出售，甚至公开采用来作为政治手册，这已不是新闻了。然而这种造谣的目的主要是谴责犹太人，唤起暴民注意犹太人控制世界的危险。就纯粹宣传而言，纳粹发现群众并不很害怕犹太人统治世界，而是有兴趣追究这一点如何实现，关于密谋的流传实际上是歆羡和想知道内情，而不是基于仇恨，明智的做法是尽可能仔细研究他们的某些显著的公式，例如著名的口号“凡是对德国人民有好处，就是正确的”，这条口号抄袭自“草案”中的“一切有利于犹太人民的事情，在道德上都是正确的和神圣的”。

“草案”在许多方面都是很奇怪而且值得注意的。除了廉价的马基雅维里主义（Machiavellianism）方式以外，其重大政治特点是，以想入非非的方式触及时代的每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它们在原则上是反民族的，而且将民族国家描绘成泥足巨人。它们无视民族主权，并且如希特勒曾经说过的那样，相信建立在一个民族基础上的世界帝国。它们并不满足于在一个特定国家里的革命，而是将目标定在征服和统治世界。它们向民众保证说，不管在人数、

领土和国家权力方面优劣如何，它们只要通过组织手段就能达到对世界的征服。可以肯定，它们那种令人信服的力量部分是产生于非常古老的迷信成分。这种“草案”是古老的，一个国际间的团体连续不间断的存在，这种概念在自从法国革命以来的小道政治文学中就有了，即使这些 18 世纪末的写作者未曾想过，这个“革命的团体”，这个“一切文明民族中间的奇特民族”就是犹太人。

对群众最有吸引力的是“草案”中一场世界性阴谋的动机，因为它契合了新的权力形势（希特勒很早就允诺，纳粹运动将“超越现代民族主义的狭隘界限”，战争期间，党卫军试图将“民族”（nation）这个词从纳粹的字汇中抹除）。只有全球列强看来仍有机会独立生存，只有全球政治才有机会产生永久结果。这种情况会使并非世界列强的小国家恐惧，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草案”似乎可以指出一条出路，不依靠不可改变的客观条件，而只依靠组织的力量。

换言之，纳粹宣传从“由于强烈的民族性而变成超民族的犹太人”中，发现德国世界主人的前驱，并向群众保证，“首先看清犹太人、首先向他们作斗争的民族，将会取代他们统治世界的地位。”关于犹太人早已实行世界统治的幻觉，构成了德国在未来统治世界的幻想的基础。当希姆莱指出“我们的政府统治艺术应归功于犹太人”时，他心中想的就是这一点，也就是说，归功于“领袖牢记在心”的锡安长老草案。因此“草案”表现出征服世界在实践上是可能的，整个事情只剩下是否受灵感启发或技巧是否精明的问题，阻碍德国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显然只是一个小小的犹太民族，他们无需拥有暴力工具就能统治整个世界——因此，一旦他们的秘密被发现，其方法在一个更大规模中被仿效，他们就成了容易应付的对手。

纳粹宣传将这一切新的、充满希望的前景集中在一个概念上，称为“德国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这个新的社群在无产阶级的氛围下，在纳粹运动中形成，其基础是一切德国人绝对平等，这不是权力的平等，而是天性平等，以及他们与其他所有的人绝对不同。自从纳粹掌权之后，这种观念渐渐失去它的重要性。让位给一种态度：一方面蔑视德国民众（纳粹一向持此态度，但在以前不大显露），另一方面非常热心地从其他国家的“亚利安人”中扩大他们自己的队伍，这种想法在纳粹掌权之前阶段的宣传中并不很重要。“德国民族共同体”的说法只是为“亚利安人”种族社会制造舆论，它最终会毁灭各个民族，包括日耳曼民族在内。

在某种范围内，“德国”是纳粹尝试考虑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关于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的诺言。如果我们不管一切意识形态含义，那么就可以明显地看到一种宣传对另一种宣传产生的魅力。两者都许诺要平衡一切社会差异和财产差异，没有阶级的社会明显地意指每一个都被平衡到工厂工人的地位，而“德国民族共同体”的含义中有一种征服世界的阴谋，也延伸出每一个德国人最终可以变为一个工厂主的合理希望。但是“德国民族共同体”的更大利益是它不必等到未来某个时刻，也不依靠客观条件；在运动的虚构世界中它可以即刻实现。

极权主义宣传的真正目的不是说服，而是组织——“无须拥有暴力手段而能累积权力”。出于这个目的，意识形态内容的创新只能被看作是一种不必要的障碍。我们这个时代的两种极权主义运动，令人惊骇的“新”统治方法，组织方式中的独创性，都没有鼓吹一种新的理论，也都没有发明过一种

不曾流传的意识形态，这并非偶然。赢得群众的并非是成功的煽动，而是一种“有活力的组织”实实在在的力量。希特勒作为一名群众先知的辉煌天才并不在运动中使他赢得地位，而是使他的对手们误以为他是一个单纯的群众煽动者，而斯大林是能够击败俄国革命的伟大演说家。极权主义领袖和独裁者的显著特征是头脑简单和目标单一，他们以此来从现存的意识形态中选择最适合于另一个完全虚构的世界的基础因素。“锡安长老们的草案”和“托洛茨基的阴谋”都是虚构的，两者都包含了看似有理的成分——犹太人在过去的非公开影响和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的权力斗争——极权主义舍此便不能安全地建立虚构的世界。它们的技巧包含着使用并超越现实因素和各种经验因素，来选择虚构，使这些因素在某些领域里普遍化，而这些领域在当时又无疑是个人的经验不可能控制的。极权主义宣传靠这种普遍化建立的一个世界，适合于和现实世界竞争，后者主要缺陷是无逻辑、无连贯性、无组织。虚构的连贯性和组织化的严格性可以使通则化的说法在具体的谎言揭穿后，最终仍能存在——认为犹太人在孤立无援地遭屠杀之后仍有力量，而苏联的托洛茨基分子遭整肃和托洛茨基本人被谋杀之后，仍在全世界进行有害的阴谋活动，这些都是很好的例子。

极权主义独裁者们面对荒诞局面，仍然顽固地坚持原先的谎言，这种态度远不止是对诡计的迷信，至少在斯大林身上，心理学无法解释说谎的原因，他的成功也许会使他自己成为最后的牺牲品。宣传口号一旦与“有活力的组织”结合，不破坏整个结构，就无法清除它们。关于犹太人世界阴谋的假设，被极权主义宣传从一种客观的、可争议的事情转变为纳粹的主要现实成分；重点在于纳粹起而行动，假设世界已被犹太人统治，因而需要一种反阴谋来保护自己。种族主义对于他们来说已不再是一种在科学上价值可疑的、有争议的理论，而是在政治组织功能阶层中的每日现实，在这种组织的框架内，如果对现实产生疑问，那就会是非常“不现实”的。同样的，布尔什维主义不再需要争论阶级斗争、国际主义，以及无产阶级的福利无条件地依赖于苏联的福利；第三国际的功能组织比任何论争或纯粹意识形态都更能令人信服。

极权主义宣传比其他政党和运动的宣传更优越，根本原因在于它的内容，对于运动的成员们而言，不再是一种人们有可能产生意见的客观问题，而是像数学定律一样，变成了他们生活中真实的而又不可触及的成分。只有在极权主义政府统治下，才能完全实现整个生活结构的组织。在纳粹德国，当只有种族出身至关重要，而一种职业取决于人是否具有“亚利安”相貌（希姆莱一向根据相片来挑选党卫军成员），食物发放量的多寡必须追究一个人的祖辈有几个犹太人时，怀疑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有效性，就好比怀疑世界是否存在一样。

宣传常常为虚弱和不可靠的论争“加入组织的力量”，而立即实现它所说的任何话，宣传之优势，不证而明。明白之理可以驳斥以运动许诺要改变的现实为基础的论点，驳斥以纯粹事实可以揭穿的反宣传——纯粹事实属于或者维护一个任凭摆布的群众不能也不会接受的世界——宣传只有另一种更有力或更好的现实才能否定它。

极权主义宣传只有在失败的时刻才会显现出它的虚弱本质。若无运动的力量，其成员立即就会不相信他们昨天还准备为之献出生命的教条。当运动（亦即庇护他们的虚构世界）被摧毁时，群众就会转向他们原先作为孤立的

个人的地位，或者在一个已经变化的世界里愉快地接受一种新的功能，或者沉沦于他们旧日绝望的多余者地位。极权主义运动的成员们只要运动犹存，就会完全疯狂地活动，但不会模仿宗教狂的榜样作为殉道者去死（尽管他们很愿意像机器人一样去死）。相反，他们会放弃运动这种厄运，向四周寻找另一种有希望的虚构，或者等待前一种虚构重新获得足够力量来确立另一场运动。

同盟国想在德国民众中找出一个自我忏悔或被说服的纳粹分子而徒劳无功，他们中间百分之九十的人很可能在某一段时间里是纳粹的忠实同情者，这不能简单地说是人类弱点或机会主义的标志。纳粹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曾经被完全“实现”过，以至于其内容不再作为一套独立的学理而存在，失去了其所谓知识的存在地位，因此，现实被破坏无遗后没有留下任何事物，信仰者不再那么疯狂。

## 二、极权主义的组织

极权主义组织的形式与它们的意识形态内容和宣传口号不同，组织形式完全是新的。它们被设计来用于运动的谎言宣传，围绕着一个虚构的中心——犹太人阴谋、托洛茨基分子、三百个家族，等等——编造一个功能性的现实，甚至在非极权主义的环境里也建立起一个社会，使这个社会的成员根据虚构世界的规律行动作出反应。表面类同的政党和运动——法西斯主义或布尔什维主义——一旦达到某个极端阶段（这大多取决于其成员的绝望程度），就会用恐怖来支撑其宣传，相比之下，极权主义运动对于它的宣传确实是很认真的，其认真态度大多表现在组织它的追随者方面，而不在于从肉体上消灭对手。组织和宣传（并非恐怖和宣传）是相辅相成的。

极权主义运动在夺取权力之前的阶段最吸引人的新组织手段是创建了先锋组织（front organization），清楚区分党员和同情者（sympathizer）。与这一发明相比，其他典型的极权主义特征，例如自上而下指定官员，任命权是最终垄断在一个人手里，这些都是次要的。所谓“领导者原则”（leadership principle）本身不是极权主义的；它从权威主义和军事独裁借用了某些特征，极有助于隐蔽和缩小实质上的极权主义现象。如果上级指定的官员拥有真正的权威和责任，我们就必须论及层级结构（hierarchical structure），在这个结构中，权威和权力由法律来委任和运作。根据这一模式建立的军队和军事独裁的组织，其情形也大致相仿，在这里，从上到下的绝对指挥权力和从下到上的绝对服从，符合战斗中特殊情势，这正是它们为何并非极权主义的原因。按层级组织起来的指挥链意味着，指挥官的权力有赖于他在其中操作的层级体系。每一个层级，无论权威大小，每一条指挥链，无论其命令之内容如何恣意专横，都倾向于稳定和限制一个极权主义运动领袖的总体权力。根据纳粹的语言，永不休止的、有力的“领袖意志”（Will of the Führer）——这并非意指一种固定的、限定的权威，即他的命令——变成了极权主义国家里的“最高法律”。由于极权主义运动独特的组织方式，它将领袖放在一个位置上，只有从这个位置出发，领袖原则才产生了极权主义性质。希特勒和斯大林这两个例子都说明，事实上的情况使真正的领袖原则相当缓慢地集中形成，与运动的逐步“极权主义化”平行发生。

有一本匿名著作作用很大篇幅描述了这种新的组织结构在开始时令人不可

思议的现象。我们不知是谁首先决定将同路人组织进先锋组织，谁最先从同情态度不明朗的群众——一切政党在大选日都依靠他们，但是认为他们太易动摇，不宜成为党员——中看到，它不仅是一个蓄水池，可以从中吸收党员，而且本身也是一种决定性的力量。早期受布尔什维克党鼓动起来的同情者组织，例如“苏联之友”（Friends of the Soviet Union）或“红色支援者”（Red Relief）协会，发展成先锋组织，但是原先却恰恰如它们的名称所指出的：一群从经济上或其他方面（例如法律上）提供援助的同情者。希特勒最早说过，每一个运动都应该将它通过宣传争取到的群众分为两种人——同情者和正式成员。这本身就很有意思；更有意思的是，他这种划分的基础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哲学，认为任何事情一超过纯粹理论上的观察，大多数人就变得太懒惰、太怯懦，只有少数人愿意为他们的信念而战斗。相应地，希特勒第一个发明了一种有意识的策略，经常扩大同情者的队伍，同时又使党员人数严格限制在一定数目。这种观念——人数较少的党员周围环绕着人数多的同情者——非常接近于后来先锋组织的现实。先锋组织这个名称的确很符合它们的实际作用，并且也指出了运动内部成员与同情者的关系。因为同情者的先锋组织在运动中所产生的重大作用丝毫不亚于正式成员。

先锋组织环围着运动成员，像一堵保护墙，将他们和外部的正常世界隔开；同时，它们又组成一道返回正常状态的桥梁，若非如此，运动成员在掌权之前的阶段就会觉得，他们的信仰和那些普通人之间、自己的虚构谎言和正常世界之间，差异太大。在运动的夺权斗争中所使用的巧妙手段是，先锋组织不仅孤立运动成员，而且也向他们提供一种外部世界正常状态的样子，比纯粹的思想灌输更有效地防止真实现状对他们产生冲击。一个纳粹或布尔什维克成员与同路人之间在态度上的区别，证明了他的信仰在对世界作虚构的解释时是正确的，因为同路人的信念也毕竟相同，形式比较混乱，尽管也比较“正常”（即较不疯狂）；所以在党员看来，凡是运动未明确指认为敌人（犹太人、资本家，等等）者，都站在他一边，世界上到处是秘密的同盟者，他们只不过是还未被唤起必要的精神力量和性格力量，来从他们自己的信念中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

另一方面，整个世界通常通过先锋组织才最初看到极权主义运动。同情者们在非极权主义社会里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还是无关的公民，很难说是头脑简单的狂热分子；透过他们，运动制造的疯狂谎言更能被普遍接受，可以用比较温和、比较令人尊重的形式来散布他们的宣传，直到总体气氛被极权主义的成分毒化，这些成分本身很难被觉察，而是显现为正常的政治反应或政治观点。同路人组织用令人尊重的正常状态迷雾笼罩极权主义运动，在外部世界本身真实性质问题上欺骗运动成员，又用掩盖运动实质的手法来愚弄外部世界。先锋组织产生了两方面的作用：既是极权主义运动面对非极权主义世界的门面，又是这个世界面对运动内部集团的门面。

比这种关系更吸引人的事实是，在运动本身内部的不同层级上也重复出现这种关系。正如党员与同路人既联系又分隔一样，运动中的精英结构与普通成员之间也是既联系又分隔。如果说，同路人仍然像是外部世界的一个正常居民，他接受极权主义的命令就像一个人可能接受一个普通政党的纲领一样，那么，纳粹和布尔什维克的普通党员在许多方面仍然属于周围的世界：他的职业关系和社会关系还未绝对地由他的党籍决定，虽然他会明白——这与纯粹的同情者不一样——在他对党的忠诚和他的私人生活之间发生冲突

时，前者总是产生决定作用。另一方面，一个战斗集团的成员会完全同运动一致；他没有独立于运动之外的职业和私人生活。正如同情者构成了运动成员周围的保护墙，向他们呈现外部世界一样，普通党员围护着战斗集团，向他们呈现正常的外部世界一样。

这种结构无疑具有优点，它钝化了极权主义基本信条之一——世界分成两大敌对阵营，其中一方就是极权主义运动，而运动能够而且必须和全世界作战——的冲击力，因为这种主张为掌权的极权主义政府不加区别的侵略性铺平了道路。透过一个逐级变化的战斗结构（其中每一个阶层都是上级眼里非极权主义世界的形象，因为它战斗性较差，它的成员组织得不够彻底），令人恐怖的极权主义将世界一分为二的震荡效果受到削弱，未能完全实现；这类组织防止了它的成员直接面对外部世界，使外部世界的敌意在他们眼里仍然只是一种纯粹的意识形态假设。在层层包围之下，他们不知非极权主义世界的现实，也常常低估了极权主义政治的巨大危险。

极权主义运动对现状的抨击无疑比早先的一切革命政党所做的更激烈。它们能够如此激进，明显地不适合于群众组织，这是因为组织是普通非政治生活的暂时替代物——而这种生活是极权主义实际上想废除的。整个非政治的社会生活世界——“职业的革命者”或者不得不逃避这个世界，或者必须接受它——在运动中以战斗性较弱的群体的形式存在；在这个按层级结构组成的世界里，从事征服世界或从事世界革命的战斗者们从来不会被“革命”信念和“正常”世界之间矛盾不可避免地产生的震荡所触及。处于掌权之前的革命阶段的运动为何能吸引如此众多的“菲利斯丁”，原因是他们生活在一个蠢人的正常乐园里；党员被同情者的正常世界包围着，普通党员的正常世界又包围了精英结构。

极权主义形式的另一种优点是它可以无限地复制，使组织永远处于一种流动状态，使之经常可以插入新的层级，确定新的战斗性程度。纳粹党的全部历史可以根据纳粹运动内部新的组织形式来重述。冲锋队（SA；Sturmabteilung；the storm trooper；建立于1922年）是纳粹的第一个组织，它比纳粹党本身更好斗；到了1926年，党卫军（SS），作为冲锋队里的精粹而组建起来；三年之后，党卫军脱离冲锋队，受希姆莱直接指挥；只消几年，希姆莱就在党卫军里又重复同样的游戏。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比前一个更好斗，首先成立的是“突击队”（Shock Troops），然后是“敢死队”（DeadHead）（系“集中营卫队”），后来并入“武装党卫军”（Armed SS；Waffen-SS），最后又成立“保安局”（Security Service）（系“党内意识形态情报机构”，党内执行“负人口政策”的机构）和“种族与移民问题办公室”（Office for Questions of Race and Resettlement；Rasseund Siedlungswesen），它的任务是“积极的”。所有这些组织都从党卫军中发展而来，它们的成员除了“领袖卫队”（Führer Corps）以外，仍然都只属文职机构。一般党卫军成员和这一切新组织之间的关系，如同冲锋队对党卫军一样，或者像党员对冲锋队员，或者像冲锋组织成员对党员。现在一般党卫军成员不仅受命“保卫……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化身”，而且要“保护所有的党卫军特别干部不脱离运动”。

这种波动的层级制度经常加进新的层面，权威常常易手，它以秘密的控制机构而出名，即秘密警察或情报机关，为了控制控制者，就总是需要新的控制。在战前阶段的运动中，还不可能有完全的间谍活动；但是不断波动的

层级制度与秘密警察同样地使控制手段成为可能，即使没有实际上的权力，也有可能削弱任何一个动摇的或表现不像以往那样激进的阶层或群体，其手段只需插进一个新的、更激进的阶层，由此迫使旧有的团体自动地朝冲锋组织的层级下降，离开运动的中心。因此，纳粹的精英结构是党内的主要组织：冲锋队上升到党内超级地位，使党失去激进性质，然后又由于同样原因也由党卫军压倒冲锋队。

极权主义精英结构 (elite formation) (尤其是冲锋队和党卫军) 的军事价值常常被评价过高，而它们在党内的纯粹意义却有些被忽略了。法西斯的一些穿制服的组织都不是为了具体的防御或进攻目的而建立的，尽管通常的说法是以保护领导人或普通党员为借口。纳粹和法西斯精英集团的类军事形式，是它们作为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普遍蔓延的和平主义而建立的“运动的意识形态战斗工具”的结果。从极权主义的目标来看，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进攻态度的表现”建立一支假军队，尽可能像和平主义者的假军队 (bogus army; 和平主义者不能理解政治团体中的军队的宪法地位，他们谴责一切军事机构是有意识的凶手集团)，而不是建立一支训练有素的士兵组成的军队。冲锋队和党卫军当然是恣意暴力和谋杀的典型组织；它们不像穿黑军服的德国国防军那样训练有素，也并未有足够的武装可以和正规军对抗。在战后德国，军事化宣传比军事训练更普遍，而制服并未使类军队提高军事价值，尽管它们清楚地显示出在废除平民的标准和道德方面是有用的；他们的制服在杀人时多少能在相当的程度上安慰自己的良心，使他们也更容易无条件地服从权威。纳粹党内的这个部分有军事化的外貌，其主要特点是国家主义和军事化，因此不能将这些类军事部队看作纯粹的政党组织，而是当作一种对国防军的非法扩展 (根据凡尔赛和约条款，军队规模是应受限制的)，这个部分首先应当被清除。在纳粹掌权之后，冲锋队的首领罗姆的确梦想过，并且也谈判过将他的冲锋队与国防军合并。希特勒杀死了他，因为他试图将纳粹新政权改变为军事独裁政府。在此之前几年，希特勒明确表态，解除了罗姆的职务，认为纳粹运动并不期望这样一种发展。罗姆是一名真正的军人，他在战场上和在组织国防军方面富有经验，因此他认真地推行军事训练计划。他被解除冲锋队首领的职务后，希特勒选择了毫无军事经验的希姆莱担任党卫军的组织者。

精英组织除了在运动的组织结构中产生重要作用之外，它们构成了运动中变动的战斗核心，它们的类军事性质必须联系到政党中其他专门组织机构来理解，例如涉及教师、律师、学生、大学教授、技术员、工人等等的机构。所有这些机构主要仿照既有的非极权主义职业社会，它们是类职业性质的，就像冲锋队是类军事性质的。欧洲各国共产党越是明显地变成莫斯科指挥下的布尔什维克运动分支，它们也就越是利用他们的前锋组织来和现存的纯粹职业群体竞争。在这一方面，纳粹与布尔什维克之间的惟一区别是，纳粹公开倾向于认为这些类职业组织是党内精英的一部分，而布尔什维主义者选择从它们中间招募冲锋组织的成员。运动的重要因素是，即使在它们掌权之前，也使人感到社会的一切成分都在它们的队伍中有代表。(纳粹宣传的最终目的是将德国民众组织成为同情者。) 在这种游戏中，纳粹多走了一步，设立了一些假部门，模仿正规的国家机构惯例，例如外交部、教育部、文化部、体育运动部，等等。和模仿军队的冲锋队一样，上述机构都没有职业价值，但是它们在一起创造了外表完美的世界，以虚假的形式奴隶般地复制非极权



主义世界的每一种现实。

这种复制技术对于直接推翻政府而言自然无用，而在积极破坏现存机构、在“使现状解体”（极权主义组织为此必不可免地选择公开显示暴力）方面却成果斐然。如果说，运动的任务是“无孔不入地进入一切权力职位”，那么它们必须随时占据任何具体的社会职位和政治职位。根据它们对极权统治的要求，非极权主义的社会里的每一个有组织的团体，都会对运动提出一种具体的挑战，会摧毁它；可以这么说，每一个人都需要一种具体的破坏性的工具。当纳粹夺取了政权，随时准备用另一种教师的组织来立即摧毁原有的教师组织，用纳粹倡导的律师俱乐部来摧毁原有的律师俱乐部，等等，这时，假组织就显现出了它的实用价值。它们可以在一夜之间改变德国社会的整个结构——不仅仅是政治生活——这是因为它们在自己的队伍中早就确切地准备了相应的结构。在这一方面，当战争到了最后阶段，正规军序列被置于党卫军将军们指挥之下时，类军事组织的任务就结束了。这一“协调”（co-ordination）的技术巧妙而不可抗拒，正如职业标准的退化之迅速和彻底一样，这些结果在特殊的战争领域里比在其他任何领域里更能直接地显现出来。

如果极权主义运动准军事组织令人怀疑的军事价值很难说是重要的，那么它们对正规军的虚假模仿也一样。作为精英组织，它们比其他团体更严重地和外部世界隔开。纳粹分子们很早就明白完全好战和完全脱离正常状态（normality）之间的密切关系；冲锋队从不接受国内的任务，执政以前阶段的冲锋队领导人和纳粹政府中的党卫军领导人经常流动更换，因此不可能习惯于普通世界及在其中发展。它们是根据犯罪帮派的模式组织起来的，用于有组织的谋杀。这种谋杀是公开进行的，得到纳粹上层的官方承认，以致公开的共谋使其成员即使在非极权主义政府治下，即使不受到同伙的威胁（实际上是受威胁的），也不可能脱离运动。在这一方面，精英组织的作用和冲锋组织的作用正相反：后者使运动具有一种令人尊敬的气氛，并且鼓舞了信心，前者用扩大共谋的方式使每一个党员意识到，他已永远离开视谋杀为非法的正常世界，精英们所犯的一切罪行中他也有份。这一点即使在掌权前的阶段也已经做到了，当时领导者系统地宣布对一切罪行负责，并且相信他们的犯罪是为了运动的最终的善。

纳粹人为地创造了一种内战条件，以此为威胁而走上通向权力之路，其明显的利益远远超过制造麻烦的效果。对于运动来说，有组织的暴力是它的虚构世界四周的许多保护墙中最有效的一种，当一个成员害怕离开运动，远甚于他的非法活动造成的结果时，当他感到作为一个运动的成员要比做一名反对者更安全时，这个虚构世界的“现实性”就得到了证明。这种安全感的产生，在于精英组织用有组织的暴力来保护党员不接触外部世界，对于组织内部的虚构世界的完整性来说，安全感与恐惧感一样重要。

领袖处于运动中心，是使整个运动运行不息的发动机。精英组织是由合格者组成的内部圈子，在领袖周围筑起一种不透明的神秘气氛来符合他那“不可触及的优势”，并将他隔绝开来。他在这个紧密的小圈子中的地位取决于他在小圈子成员中玩弄计谋的能力和他经常更换部下的技巧。他上升至领袖地位，依靠的是一种处理党内权力斗争的极端能力，而不是煽动家或官僚组织的性质。他与先前各类独裁者之间的不同之处是他很少通过简单的暴力来取得胜利。希特勒不需要冲锋队和党卫军来保障他在纳粹运动中的领袖地

位；相反，罗姆是冲锋队首领，能够依赖冲锋队对他个人的忠诚，却成了希特勒的党内敌人之一。斯大林战胜了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在群众中更有魅力，而且作为红军总司令，手中握有当时苏俄最大的潜在权力。再者，俄国革命中最有组织天才的、最能干的官僚不是斯大林，而是托洛茨基。另一方面，希特勒和斯大林都是处理具体问题的能手，在他们的初期生涯中都致力于人事问题，所以几年后，留在重要的位置上的人几乎全倚仗他的恩赐。

然而，这种个人能力尽管在此类生涯的最初阶段，是一种绝对的先决条件甚至在以后也同样重要，但是当一种极权主义运动建立起来之后，确立了“领袖的意志就是党的法律”时，当它的全部层级制度出于一种简单目的而有效地训练成功、能迅速地将领袖的意志传达给一切阶层时，个人能力就不再具决定性作用。达到了上述目标之后，领袖就不可取代了，因为运动的整个复杂结构会由于缺少他的指挥而失去存在的理由。这样，尽管永远会有内部阴谋集团，永远会有人事变动，他们积聚了巨大的仇恨、痛苦和怨怒，领袖的地位仍能在一次次混乱的宫廷革命中保持稳定，这并非由于他的超人天赋（他周围最密切的人常常对此并不抱有幻想），而是因为这些人真诚地、有意识地相信，若没有他，一切都会在顷刻之间失去。

领袖的最高任务是使运动中每一个层次的双重功能特点得到体现——作为运动抵抗外部世界的奇妙防线，同时又是运动与外部世界之间的桥梁。领袖代表运动，其方式完全不同于一切普通的政党领袖；他宣称，他以官方的身份替任何一名成员或官员的行动或错误行为负个人责任。这种完全负责的做法，是所谓领袖原则在组织方面的最重要原则，据此，每一名官员不仅由领袖指定，而且也是他的活的化身，每一道命令似乎都发自这一永恒的来源。领袖与每一个由他指定的下级领导人之间完全一致，垄断一切责任，这也是极权主义领袖与一个普通独裁者和暴君之间最显著的关键区别。一个暴君绝不会将自己与下属等同，更不用说包揽他们的行为了；他也许会利用他们做代罪羔羊，为了使自己摆脱民众的愤怒，他会很乐于见到他们受批评，他总是与他的所有下属和臣民保持一段绝对的距离。相反，极权主义领袖不能容忍别人批评他的下属，因为他们总是以他的名义行动；如果他要纠正自己的错误，他就必须清除犯下这些错误的人；如果他要将自己的错误归咎于别人，他就必须杀死他们。因为在这种组织结构内，一个错误只能是一种骗局：骗子化身为领袖。

对运动所做的一切事情负全部责任，它与它的每一个官员之间完全一致，这导致了非常实际的结果，使谁也不曾经历过一种情况，也就是必须对自己的行动负责，或者解释这些行动的理由。由于领袖垄断了解释的权利和可能性，所以在外部世界看来，只有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是运动的惟一代表，人们仍能用非极权主义的语言和他谈话，如果他受到责备或反对，他不可说：别问我，去问领袖。领袖处于运动的中心，他可以表现得高于运动。因此，当局外人必须和极权主义运动或政府打交道时，一再将他们的希望寄托在和领袖本人的私下谈话上，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完全无用的）。真正的极权主义领袖神话是在组织之中，组织使他有可能声称对运动的精英组织所犯的一切罪行完全负责，同时也有可能获得最天真的同路人真诚而天真的尊敬。

极权主义运动曾被称为“光天化日之下建立的秘密会社”。的确，我们很少知道秘密团体的社会结构和近期历史，运动的结构在先前的党派历史上

未曾有过，只能让人联想起秘密社团的某些突出特征。秘密会社（secret society）也根据“加入”（initiation）的程度而形成层级，根据一种秘密的虚构假设来规范其成员的生活，使一切事物看上去就像别的东西一样，采取前后连贯的欺骗策略，欺骗未加入的外部群众，要求加入运动的成员盲目服从，使他们效忠于往往不认识的、一向十分神秘的领袖，领袖本人被一小群最初加入运动的人包围着，这些人周围是后加入者（half-initiated），后来者来自一个“缓冲地带”，它反对充满敌意的世俗世界。极权主义运动像秘密会社一样，也将世界分成两部分：“歃血为盟的兄弟们”和隐藏不明的大批死敌。以绝对敌视周围世界的态度为基础的划分界线，这与普通政党将人划分成“属于”和“不属于”的倾向做法大不相同。政党和一般的公开社团只认为那些公开反对它们的人是敌人，而秘密会社的原则一向是“凡是不公开表明归属的人都应排除在外”。这种秘密原则对于群众组织似乎完全不适用；但是纳粹至少使它的成员在加入时举行一种与秘密会社在心理上产生相同效果的仪式，他们不是简单地排斥犹太人，而是要求其成员证明自己的非犹太血统，建立了一种复杂的机器，透视 8000 万德国人祖系不清的状况。这当然是一出喜剧，而且代价昂贵，它让 8000 万德国人行动起来，去查找自己祖先中是否有犹太人；结果每一个人通过检查后都感到，他属于一个可靠的群体，反对想像之中各种不合格的人。布尔什维克运动也证实了同样的原则，通过党内的反复整肃，使每一个不被排除在外的人都再次肯定自己属于群体之内。

秘密会社与极权主义运动之间最吸引人的相同点是仪式的作用。在这一方面，莫斯科红场的游行在性质上与纽伦堡的庆祝政党生日的盛大礼节完全一样。在纳粹仪式的中心是一面所谓“鲜血的旗帜”，布尔什维克仪式的中心是列宁的遗体，两者都在仪式中注入崇拜偶像这一强有力的因素。这种偶像崇拜很难证明——正如有时被认为那样——是假宗教或异教倾向。“偶像”只是一种组织手段，在秘密会社中常用，也常用于以可怕的、令人恐惧的象征物来威吓其成员保守秘密。很明显，人们是通过一种秘密仪式的共同经历（而不是共享秘密本身）来更安全地团结在一起。极权主义运动的秘密即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也不一定改变那种经验的性质。

这些相同之处当然绝非偶然；它们绝不能简单地被解释为由于希特勒和斯大林在成为极权主义领袖之前都曾是现代秘密会社成员——希特勒曾是国防军秘密警察，斯大林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密谋组织成员。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极权主义阴谋虚构的自然结果，建立极权主义组织的目的可能针对秘密团体——犹太人的秘密社会或托洛茨基阴谋集团。极权主义组织中引人注目的是，它们可以不将自己的目标当作秘密来隐藏，而采取许多秘密会社的组织手段。纳粹想要征服世界，驱逐“异族”，消灭“可怕的生物遗传”；布尔什维克致力于世界革命，这从来就不是秘密；相反，这些目的一向是它们的宣传内容。换言之，极权主义运动模仿秘密会社的一切装饰，惟独放弃一条为自己的方法辩解的途径——保守秘密的需要。

纳粹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因此尽管历史起源十分不同，却在组织手段方面达到了同样的结果。纳粹在开始时虚构一个阴谋，并且多少有意识地模仿“锡安老人们”秘密团体的例子，而布尔什维克来自革命政党，它的目标是一党专政，经过了一个政党“完全游离并且在一切之上”的阶段，达到党的政治局“完全游离并且在一切之上”；最后，斯大林将密谋组织严厉的极权

统治强加给这种政党结构，直到此时，才发现需要用一种中心的虚构来维持群众组织条件下一个秘密会社的铁的纪律。纳粹的发展也许更符合本身的逻辑，但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提供了一幅更好的画面，显示极权主义的虚构本质，因为布尔什维克所反对及所根据的一种虚构的世界阴谋，在意识形态上并不固定。这种阴谋一直在改变——从托洛茨基派到 300 个家族，再到各种“帝国主义”以及“无根的世界主义”——而且根据需要而调整；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这种虚构，布尔什维主义就不能成立。

斯大林将俄国的一党专政改变为极权主义政权，将全世界革命的政党改变为极权主义运动，其手段就是清除宗派，废除党内民主，将各国共产党改造成由莫斯科指挥的共产国际各个支部。秘密会社，特别是革命政党的阴谋工具，其特点一向就是没有宗派，镇压不同政见，绝对中央化的领导。这一切措施都有明显的功利主义目的，即保护其成员不受伤害，保护会社不受背叛的危害；要求每一个成员完全服从，使绝对权力掌握在首领手中，这些都只不过是实践中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但是，麻烦在于阴谋者们有一种可以理解的倾向，认为一般政治中最有效的方法是组织密谋式会社，如果谁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应用，用全国的暴力工具来支持这些方法，就有可能无限地积聚权力。一个革命政党中的密谋策划部门可以和一个完整的政体中军队的角色相结合，只要政党本身仍是完整的：尽管它自己的行为规则与民政的规则大不相同，它为政党服务，从属于政党，并且由政党控制。当军队不再为政体服务，而是想控制政体时，就产生了军事独裁的危险。同样地，当一个革命政党中的密谋策划部门从政党的控制下解放了自身，获得领导地位时，也就产生了极权主义的危险。斯大林政权下布尔什维克党发生的就是这种情况。斯大林的方法一向是党内密谋策划部门使用的典型方法：他专注于细节，强调政治中的个人面，无情地利用及消灭同志与朋友。在列宁去世后，在一系列斗争中，他的主要支持者是秘密警察，秘密警察在当时早已成为党内最重要、最有权力的部门之一。契卡（Cheka）自然会同情密谋策划部门的代表，那个早已将之看成一个秘密团体，因此想保持并扩大其特权的人。

但是，用密谋策划部门来掌握布尔什维克党，这仅仅是向极权主义运动转化的第一步。俄国秘密警察及其在国外共产党里的代理人在运动中扮演的角色，如同希特勒在类军队中组建的精英组织一样，但是这还不够。假如秘密警察的统治保持稳定状态，那么政党本身就必须改变。结果，清除宗派和取消党内民主这件事，在俄国伴随着大批政治上未受过教育的群众加入布尔什维克党，这种统一战线政策很快被各国共产党仿效。

纳粹极权主义从群众组织开始起步，后来渐渐地被精英组织控制，而布尔什维克却从精英组织开始起步，然后组织群众。两者的结果是一样的。另外，纳粹由于他们的军事传统，从一开始起就按照军队的模式和偏见来组建精英组织，而布尔什维克从一开始起就由秘密警察来行使最高权力。然而在几年之后，这种区别就消失了：党卫军首领变成了秘密警察首脑，党卫军组织逐渐并入并且取代了盖世太保先前的人员，即使这些人员早已由可靠的纳粹分子所组成。

正是由于一个密谋者的秘密会社的功能和与之对抗而组织的秘密警察两者之间本质上的亲和性，使基于一种虚构的世界阴谋及以统治全世界为目标的极权主义政府，最终集中一切力量于警察之手。但是，在它掌权之前阶段，“光天化日之下的秘密会社”提供了其他一些组织工作方面的优点。群众组

组织和惟一可以信任其保密能力的排外性社团之间的明显矛盾，比起密谋会社可以将极权意识形态的两分法——群众对现存社会的盲目敌视，而无视社会中的歧异和差别——变成一种组织原则这一点相比，前者相形见绌。一个组织的作用依据于“凡是不归属者都应排除”、“谁不赞成我就是反对我”的原则，从这样一个组织的观点出发，世界普遍地失去了一切细微的差别、差异和多元化，对于失去地位和方向的群众来说，这个世界的一切事情都是混乱的、难以容忍的。秘密会社的成员毫不动摇的忠诚给予他们的启发，不如那种区分“我们”和一切其他人的秘密更能鼓舞他们。这一点可以用模仿秘密会社的组织结构，取消它那种理性地保密目的来达到。如果密谋意识形态是这种事情的发展源头，例如像纳粹那样，或者寄生在一个革命政党中密谋部门，例如像布尔什维克那样，其实也都无关紧要。极权主义组织的天生要求是运动之外的一切事物都“走向死亡”，这种要求在极权统治的有害条件下完全实现，但是即使在掌权以前阶段，对群众而言也似乎十分有理，他们从分崩离析和迷失方向中逃进了运动的虚构家园。

极权主义运动一再证明了它们能够同样地掌握其成员的誓死忠诚，这一向是秘密会社的秘密特征。一支像冲锋队这样彻底训练和武装的军队，面对着敬爱的首领（罗姆）和几百名亲密战友被谋杀，居然不抵抗，这真是一种奇怪的状况。在当时，国防军的力量支持的可能是罗姆，而不是希特勒。但是纳粹运动的这些事件现在不为人注目，人们过于注意了布尔什维克党内自我告白的“罪犯”不断重复出现的景象。根据荒谬的告白举行的审判，成为一种在内部成员看来非常重要、外人看来不可理喻的仪式。但是，无论今天如何制造牺牲品，这种仪式最初可能出现于1936年老布尔什维克卫士的并非捏造的告白。早在莫斯科大审判之前很久，被判处死刑的人会很平静地接受判决，这种态度“在契卡成员中间特别流行”。只要运动还存在，它的特殊组织形式就能保证至少使精英组织不再相信一群紧密团结的人之外的生活，他们即使被判罪，仍然觉得高于其余未参加他们组织的人。由于这个组织的全部目的总是欺骗、战斗和征服外部世界，它的成员们情愿付出生命，只要此举能再次有助于欺骗世界。

但是，秘密团体或密谋会社的组织结构和出于群众组织目标的道德标准的主要价值，并不在于天然保障无条件的从属和忠诚的内在保证，以及有组织地表现出对外部世界的盲目仇恨，而在于它们通过连续一贯的谎言来建立和维护虚构世界至高无上的能力。极权主义运动的整个层级结构，从无知的同路人到党员、精英组织、领袖周围亲密的小圈子、领袖本人，都可以被描述为一种由易受欺骗（gullibility）和犬儒（cynicism）等不同态度的奇特混合，其中每一个成员依据他的阶层和在运动中所处的地位，对领袖反复无常的谎言和运动的中心永远不变的意识形态虚构应该作出反应。

在暴民变成每日的群众现象之前，易受欺骗和愤世嘲弄的犬儒态度是暴民心态的显著特点。在一个变化无常和难以理解的世界里，群众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他们会同时相信一切和什么都不相信，认为一切都是可能的但任何事情都不可能真实。这种混合本身已足够显著，因为它招致幻觉的终结，易受欺骗是不善怀疑的原始人之弱点，而犬儒却是最高级的精明头脑的恶习。群众宣传发现它的听众都随时准备相信最坏的东西，无论它多么荒谬；他们并不特别地肯受欺骗，因为他们认为每一种宣言无论如何都是一种谎言。极权主义的群众领袖们从事宣传的基础是正确的心理学假设，即在此类条件

下，可以在今天使人们相信最疯狂的说法，并且相信，如果明天得到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这些说法是假的，他们就会遁入犬儒；如果领袖们对他们说谎，他们不会离开领袖，而是抗议说，他们什么都知道，这宣言是谎言，但同时又佩服领袖们高超而聪明的手法。

群众作为听众而能够显示的反应，变成了群众组织的一种重要的层级原则。易受欺骗和犬儒态度的混合流行于极权主义运动的一切阶层，层次越高，犬儒态度就越是压倒易受欺骗的情形。从同路人到领袖，一切阶层的基本信念是：政治是一场欺骗游戏，运动的“第一条诫律”是“领袖永远正确”，这对于世界政治（即世界性欺骗）的目的而言是必要的，正如军事原理的规则对于战争之目的是必要的一样。

极权主义运动产生、组织、传播巨大谎言的机器也依靠领袖的地位。宣传声称，一切发生的事物根据自然规律或经济规律是可以科学地预测的，极权主义组织又为之增加一种观点，说一个人若掌握了这种知识及其主要特性，他就是“正确的，而且永远正确”。对于极权主义运动的一个成员来说，这种知识和真理无关，这种正确和客观真实性无关，领袖之宣言正确与否，不由事实证明，而由未来之成功或失败来证实。领袖的行动总是正确，既然这些行动是为往后几百年而设计的，那么，对他所做的一切的最终检验就不受他同时代人的经验之约束了。

假定能忠实地、逐字逐句地相信领袖言论的惟一团体是“同情者”，他们的信心使运动蒙上一层忠贞和头脑简单的气氛，帮助领袖完成他的一半任务，即激发运动的信心。党员们从来不相信公众言论，不应该相信，而是对于其优越智能的极权主义宣传，将他们和非极权主义的外部世界区分开来，因而受到恭维，而所谓的外部世界，他们只能从同情者易受欺骗的反常现象中认识。当希特勒在魏玛共和的最高法庭面前作著名的法律宣誓时，只有纳粹的同情者相信他；运动的成员清楚地知道他在撒谎，但是比以往更信任他，因为他显然能够愚弄公众舆论和当局。后来希特勒又在全世界重复这一套表演，他发誓他用意良善，同时却最公开地准备犯罪，但此时此刻，纳粹却受到人们很自然的无限佩服。

运动在组织结构上若无分成精英组织、党员、同情者，领袖的谎言就不会生效。在一种轻蔑态度的层级制度中表现出各种程度的消极嘲讽，至少在面对经常的驳斥时，是像普通的易受欺骗一样必要。问题在于，先锋组织中的同情者蔑视其他公民们完全缺乏积极性，党员蔑视同路人易受欺骗和不激进，精英组织同样地蔑视党员，而在精英组织内部，随着新结构的建立和发展，同样会依层级而蔑视精英组织。这种体系的结果是，同情者们易受欺骗，使谎言在外部世界看来是可信的，而在同时，党员和精英集团不同程度的犬儒态度却解除了领袖被迫面临的危险压力，即他自己的宣传必须言辞漂亮，装出令人尊敬的模样。外部世界在对付极权主义制度时的主要缺陷之一是它忽略了这种制度，因此信以为极权主义谎言之大一方面可以使之不攻自破，另一方面可以利用领袖的话（无论他的本意如何）来迫使他做好事。不幸的是，极权主义制度的伪善不会达到上述结果；它的巧妙之处恰恰在于取消了或者可以揭露谎言、或者可迫使领袖言行一致的现实。

党员不相信为群众发表的言论，但是十分相信意识形态解释的标准陈词滥调，相信极权主义运动从19世纪意识形态中得来的对过去与未来历史的答案，并且通过组织手段将它们转化为有效的现实。群众已经相信的这些意识

形态成分，尽管相当模糊和抽象，却转变成谎言中的事实，具有完全可以理解的性质（例如不顾一般的种族理论而相信犹太人统治世界，无视一般的阶级理论而相信华尔街阴谋论），并且纳入总体行动纲领，似乎只有“垂死者”——资本主义国家的垂死阶级或没落的国家——才阻碍着运动的发展。与每日不同的运动谎言策略相比，这些意识形态谎言可以被看作是神圣的、不可触及的真理。它们的周围是仔细编织的一系列“科学的”证明，当然并不一定要说服完全“无关之人”，但是仍用“显示”犹太人的可怕之处或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生活的苦难，来迎合某些人对知识的庸俗渴求。

精英组织与普通党员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并不需要看到这些内容，甚至也不需要相信意识形态陈词滥调的字面真理。这些都是编造来回应群众对真理之探求的，它们不断解释和显示的内容，与正常世界仍有许多共同之处。精英阶层并非由意识形态专家组成；对其成员的全部教育，目的是消除他们区别真理与谬误、现实与虚构的能力。他们的优势是有能力将每一种事实的陈述直接融入目标宣言。群众成员需要事先知道犹太种族的可怕，才能保证叫他们去杀死犹太人，精英组织却理解那种说法——一切犹太人都是可怕的——意味着应该杀死一切犹太人；他们懂得，当他们听说只有莫斯科才有地下铁路，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应该摧毁其他一切地下铁路，当他们发现巴黎有地下铁路时，不一定会感到惊奇。当红军在征服欧洲的路上遭到失败，幻灭的巨大震荡只有用集中营和大部分占领军被迫撤退才能平复；但是与军队相配合的警察组织对于这种震荡是有所准备的，这并非由于得到不同的和更准确的消息——苏俄没有秘密训练学校可以接触关于国外生活的正确事实——而只是由于一种一般的训练，使他们极其蔑视一切事实和现实。

精英的这种心理状态并非单纯的群众现象，并非社会失根、经济灾难和政治无政府主义的单纯结果；它需要谨慎的准备和培养，形成极权主义干部学校、纳粹的党卫军奥登斯堡学校（Ordensburgen）、布尔什维克的共产国际代表训练中心的一种更重要的课程，尽管这种课程不很明显，但是比灌输种族思想和传授内战诀窍更重要。若无精英与由人为造成的不懂事实、不能区别真理和谬误，运动就不可能向着实现它的虚构方向发展。极权主义精英杰出的负面性格是，它从不停止思考世界的真相，从不将谎言和真理作比较。相应地，它最值得珍视的美德是忠于领袖，领袖像一个护身符，保证谎言的最后胜利，虚构终将战胜真理与现实。

极权主义运动的最上层组织是领袖周围最密切的圈子，它可以是一个正式机构，像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局，或者是一个变动的人员集团，他们不一定要占据职位，例如希特勒的随从。对于他们来说，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只是一种组织群众的手段，只要组织原则仍有活力，他们不在乎根据情况需要而使自己发生变动。在这一方面，希姆莱的党卫军组织的主要优点是他发现了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来“解决行动中的血缘问题”，即根据“优秀血统”来选择精英成员，让他们“执行一种无情的种族斗争”，以反对一切无法追溯“亚利安”祖先至1750年的人，或者身高不足5.8英尺的人（“我知道，凡是长到一定高度的人，一定拥有某种程度的理想血统”），或者并非蓝眼金发的人。这种种族主义行动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的组织活动独立于任何一种种族“学说”的全部具体教条，也独立于与犹太人的天性与角色有关的、作为一种具体教义的反犹主义，犹太人的有用之处随着他们躯体被消灭也就结束了。一旦由“种族委员会”（race commission）挑选出一名精英，将他置于

一种特殊的“婚姻法”（marriage laws）管辖之下，种族主义就处于安全之中，不受宣传必须具备的科学合理性的约束，而在相反的一头；在这种“精英种族”的法律之下，集中营的存在是为了“更好地显示遗传和种族法则”。依靠这种“有活力的组织”的力量，纳粹可以避免教条主义，向犹太人提供友谊，就像对待阿拉伯人一样，或者和“黄祸”（Yellow Peril）的代表日本人结盟。种族社会的现实，从据说根据种族观点选出的精英组织，都确实很能维护种族理论，比精确的科学证据或假科学证据更有力。

布尔什维主义政策制定者同样比他们自己的立誓教义更高明。他们很能够中断每一种既存的阶级斗争，突然和资本主义结盟，而不会破坏干部队伍的可信性或者违背他们关于阶级斗争的信念。阶级斗争的二分法原理变成了一种组织手段，本身僵化到无法妥协地和整个世界敌对，通过俄国的秘密警察干部与共产国际国外代表，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明显地变得没有“偏见”。

极权主义层级制度中的最高阶层的特点正是不受它们自己的意识形态内容的束缚。这些人根据组织来思考一切事物和一切人，其中包括领袖，在他们看来，领袖既不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护身符，也不是一个永远的人，而是这类组织的简单结果；他的确不是作为一个人，而是作为一种功能，是运动中不可或缺的。但是，和其他专制形式（常常是一个集团实施统治，而暴君只扮演一个傀儡统治者的代表角色）相比，极权主义领袖事实上可以随心所欲，可以依赖随从们的忠诚，甚至可以作出杀死他们的选择。

这种自杀性的忠诚的具体原因是，最高职位之继承并非由继承法或其他法律规定的。成功的宫廷政变会对运动整体带来灾难性的结果，就像一场军事失败一样。由于运动的性质，一旦领袖获得执政权，整个组织就绝对地和他一致，若承认一项错误，或者丧失执政权，就会打破永远无误的神话，使领袖职位周围的人一起失败，一切与运动有关的人也会遭受毁灭的噩运。这种结构的基础并非领袖的言论之真理性，而是他的行动永远无误。若无这一条，在假设永远无误的激烈辩论中，极权主义的整个虚构世界就会四分五裂，立即被真实世界的事实战胜。只有领袖才能防止分裂和失败，使运动朝着永远无误的正确方向前进。

但是，那些既不相信意识形态陈词滥调、又不相信领袖永远无误的人，他们的忠诚另有深刻的原因。坚定地、真诚地相信人类无所不能的信念使他们紧密聚集在一起。他们道德的犬儒，相信任何事物都是被允许的，这些态度的基础都在于坚定地相信“一切事物都是可能的”。的确，这批人的人数很少，很难会发现他们在具体问题上说谎，他们不一定会相信种族主义和经济学，也不一定会相信什么犹太人或华尔街的阴谋之类。然而他们也是受欺骗者，他们误以为可以做一切事情，一切障碍都是暂时的，上级组织必定能击破这些障碍。他们充满信心地认为，组织的力量可以摧毁物质的力量（好比是一群有良好组织的匪帮可以用暴力劫掠一个防卫很差的富人的财产），因此常常低估了稳定社会的巨大力量，又太高估了运动的推动力。还有，由于他们实际上不相信真的存在一种反对他们的世界性阴谋，而只是利用它作为一种组织手段，他们就不会懂得，他们自己的阴谋最终会引起全世界联合起来反对他们。

但是，无论这种人类透过组织而变得万能的幻想最终如何受挫，在运动内部，它的实际结果是使领袖周围的追随者在和他意见分歧时，必然怀疑他们自己的观点，因为他们真诚地相信，他们的意见无足轻重，只要组织得当，



即使最疯狂的手段也有很好的成功机会。他们的忠诚不在于他们相信领袖永远无误，而是相信任何人只要用高超的极权主义组织方法来指挥暴力工具，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当极权主义政府拥有权力，显示出成功与失败的相对性，并且显示物质上的失败可以变成组织上的收获时，就极大地增强了这些人的幻觉。（苏俄工业活动发疯似的错误管理导致工人阶级的分化；纳粹占领东欧各国时可怕地虐待平民囚徒，尽管造成了“劳动力的可悲损失”，“考虑到后代人，还是值得的”。）再者，在极权主义环境里，事关成败的决策大多事关有组织的、令人恐怖的公众舆论。在一个完全虚构的世界里，不必记录、承认和回忆失败。实相若要继续存在，必须取决于非极权主义世界的存在。

（本篇为《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三部第十一章）

## 意识形态与恐怖：一种新的政府形式

〔德〕汉娜·阿伦特 林骧华译

我们在前面各章里反复强调，极权统治的手段不仅比较严厉，而且其极权主义形式与我们所知的其他政治压迫形式（例如专制政府、僭主暴政、独裁）有本质区别。凡是在它崛起执政的地方，它建立全新的政治制度，摧毁一个国家所有的社会、法律和政治传统。无论它的意识形态来自何种具体的民族传统或特殊的精神根源，极权主义政府总是将阶级转变成群众，撤换了政党制度（不是用一党制，而是用群众运动来替代政党制度），将权力中心从军队转移到警察，建立一种公开走向宰制全世界的外交政策。目前的极权主义运动从一党制度中发展起来；每当这些制度变成了真正的极权主义，它们就开始按照价值观念与其他一切制度都完全不同的一种制度来运作，我们的传统法律、道德或常识中的功利主义范畴都不再能帮助我们处理其行动路线、对之作出判断或者预言。

如果说，从追溯历史和分析我们通常所谓的本世纪危机，可以发现极权主义的成分，那么结论就不可避免：这种危机并非来自外部的纯粹威胁，并非德国或俄国某种侵略性的外交政策的纯粹结果，它不会随着纳粹德国的垮台而消失，也不会随着斯大林之死而消失。甚至只有当极权主义成为陈迹时，我们这时代的真实困境才会显现其真正形式——尽管不一定是最残酷的形式。

正是根据这种思考才提出一个问题：极权主义政府诞生于这种危机，同时表现出最清晰的征兆，它究竟是否一种权宜之计的安排，从暴政、专制和独裁的著名政治弹药库中借来了威吓方法、组织手段和暴力工具，它的存在是否只归因于各种传统政治力量——自由派或保守派，民族主义或社会主义，共和制或寡头制，独裁主义或民主主义——可悲的但或许是偶然的失败。或者是否相反地有一种叫做极权主义政府本质的东西，它是否具有自己的本质，可以与其他政府形式（例如自从古代哲学以来的西方思想已熟悉和认可的政府形式）相比较，像它们一样下定义。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全新的、史无前例的极权主义组织形式和行动路线必定依赖很少的几种基本经验之一，只要人生活在一起并且关注公共事务，这些经验就会产生。如果有一种基本经验在极权主义统治中找到了它的政治表现途径，那么，考虑到极权主义政府的创新形式，不管出于什么原由，这种经验以前必定从未用作一种政体的基础，它的一般情绪——尽管在其他每一个方面也可能是人们熟悉的——从未流行过，从未有指引过公共事务的处理方向。

如果我们从思想史的角度来思考，那么它似乎绝对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们经验过的政府形式一向很少；这些形式很早就被发现，希腊人对它们作了分类，它们早已存在很长的时间。假如我们应用这些发现（它们的基本思想尽管有许多不同，但是在从柏拉图到康德的2500年以来并无变化），我们就立即会倾向于去解释极权主义是一种现代形式的暴政，是一个毫无法纪的管理形式，权力只归属于一人。一方面是滥用权力，不受法律节制，屈从于统治者的利益，敌视被统治者的利益，另一方面，恐惧作为行动原则，统治者害怕人民，人民害怕统治者——这些在我们全部的传统中都是暴政的标志。

我们不说极权主义政府是史无前例的，我们也可以说，它探索了一种可能的选择，在政治学中，关于政府本质的一切定义都以此为基础，这种选择

是在守法的和不法的政府之间，在任意独断的和合法的权力之间的选择。一边是守法政府和合法权力，另一边是不守法的政府和恣意的权力，两者互属而不可分，这从来就毫无疑问。然而极权主义统治使我们面对一种完全不同的政府。它实际上蔑视一切成文法，甚至走极端到蔑视自己制定的法律（例如，最有名的例子是1936年的苏联宪法），或者并不关心是否要废除法律（例如纳粹政府从未废除魏玛宪法）。但是它的运作既非没有法律指导，亦非恣意行事，因为它宣布严格遵从自然法则和历史法则，而一切成文法都从这两者而来。

极权统治的畸形主张似乎是没有回应余地的，它不是“毫无法纪”，而是诉诸威权之源泉（积极的法律从中获致最终的合法性）；它不是恣意妄为，而是比以前的任何政府形式更服从这种超人类的力量；它也不是使权力从属于一个人的利益，而是随时准备牺牲每一个人的重大直接利益，来执行它认定的历史法则和自然法则。它之蔑视积极的法律，宣称这是一种更高形式的合法性，因为它出自法律之源，那么就可以踢开小小的法律。极权主义的法律性（lawfulness）是假装发现了一条在地球上建立公正统治的道路——这是成文法承认永远不可能达到的法律性。法律性与正义之间的落差不可能混除，因为正确与错误的标准（成文法以此为自己的权威根据）——“自然法则”统治整个宇宙，或者在人类历史中揭示神的律法，或者以习俗和传统表达一切人共同情感的法则——必然是普遍的，必须对无数的、无法预计的案件都有效，所以每一个具体的个别案件有许多不重复的情况，因而多少会避开普遍标准的适用。

极权主义之法律性是蔑视合法性（legality），假装建立地球上的直接法治，执行历史法则或自然法则，而不落实到个人行为之正确与错误标准。它不麻烦地针对人的行为而直接将法律运用到人类。假如恰当地执行，那么自然法则或历史法则就能制造人类作为它的最终产物；而这种可能性存在于一切极权主义政府统治全世界的要求背后。极权主义政策宣称要将人类物种转变成一种积极的、永不失败的法律载体（carrier of law），否则人就只会消极地、不情愿地服从法律。如果说，极权主义国家与文明世界之间的联系由于极权主义政权的巨大罪行而中断，那么也可以说，这种罪行不应归咎于简单的侵略性、冷酷无情、战争和阴险，而应该归咎于有意识地打破组成如西塞罗所谓“民族”的“共识法规”（consensus iuris），而且只要国际法继续作为国际关系的基石，哪怕是在战争条件下，它已在现代构建了文明世界。道德审判和法律惩治预设这种基本的容认（consent）；正因为罪犯参加了“共识法规”，所以他才能被审判，甚至连上帝启示的法规也能在人际中产生作用，只要他们听从和赞同它。

在这一点上，极权主义的法律概念和其他各种法律概念之间的基本差异就显现了。极权主义政策并不用一套法律来取代另一套法律，并不建立它自己的“共识法规”，并不用一次革命来创造一种新形式的法律。它蔑视一切法律，甚至包括它自己的成文法，这意味着它相信自己能够不要任何“共识法规”而行事，并且仍然不使自己落入毫无法纪、恣意妄为和恐惧的专制暴君状态。它可以不需要“共识法则”而行事，因为它保证使执法不受行动和人的意志束缚；它也保证大地上的公正，因为它宣称要使人类自身成为法律的化身。

人与法律的一致性似乎取消了法律与公正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自古

代以来就困扰着法学思想），这种一致性也根本不同于自然法则或良知的呼声（自然或神性作为权威之源或者上帝的命令，会在人身上宣布它们的权威性）。这绝不会使人成为法律的活的化身，而相反仍然有别于作为要求赞同和服从的权威之人。自然或神性作为成文法之权威源，这一点曾被认为是永恒的；成文法根据环境变化，而且是可变的，但是与人的变化更迅速的行动相比，成文法具有相对的持久性；成文法的持久性产生于它们永远存在的权威来源。所以，成文法旨在针对人的永恒变化运动，作为一个稳定因素。

在解释极权主义时，一切法律都变成了运动的法律。当纳粹谈论自然法则，当布尔什维克谈论历史法则时，自然或历史都不再是尘世人的行动之稳定的权威来源；它们本身成了运动。纳粹相信种族法则是自然法则在人身上的表现，其背后是达尔文关于人是一种自然发展的产物的观念，认为自然发展并不一定停止于人类的目前种类；布尔什维克相信阶级斗争是历史法则的表现，其背后是马克思关于社会是巨大的历史运动的产物的观念，历史运动根据它自身的运动规律奔向历史时代的终结，到那时消除自身。

常常有人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学方法与达尔文的自然研究方法之间的区别，一般都正确地倾向于马克思的方法。这一点会使我们忘记马克思对达尔文理论积极的兴趣；恩格斯在想到马克思学术上的伟大成就时，称他为“历史学界的达尔文”。如果不是考虑这两个人的实际成就，而是考虑这两个人的基本哲学，就会发觉历史运动和自然运动最终是一回事。达尔文将发展的观念引进对自然的研究，他坚持认为，至少在生物界，自然运动不是循环的，而是始终循着一条直线前进，朝向一个无限前进的方向运动，这意味着自然本身被归入历史，自然生命被当作历史来考虑了。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正如历史法则，可以用于种族主义，也可以用于马克思的法则：最先进的阶级才能生存。另外，马克思所说的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动力，只不过是生产力发展的外化表现，而生产力却源自人的“劳动力”。根据马克思的说法，劳动不是一种历史力量，而是一种生物自然力量——通过人的“自然新陈代谢”而释放出来，人依靠“自然新陈代谢”而保存他的个人生命，复制物种。恩格斯很清楚地看到这两个人的基本信念的密切关系，因为他理解关于发展的观念在这两种理论中所产生的决定性作用。在19世纪中期，知识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包括拒绝看待或接受任何事物的“本身所是”概念，一致解释每一种事物都只是进一步发展之前的一个阶段。这种发展的动力究竟称作自然还是历史，相对地说来是次要的。在这些意识形态中，“法则”（law）一词本身含义改变了：原先将它看作一种稳定性架构的表现，人的行动和运动在其中发生，现在却看作是运动本身的表现。

极权主义政治开始遵循意识形态的秘诀，揭露了这些运动的真正性质，清楚地显示出这个过程永远不会结束。如果说，自然法则是消灭一切有害的和不宜生存的事物，那么假如不能发现有害的和不宜生存的新种类，就会意味着自然本身的终结。如果说，历史法则是阶级斗争中某些阶级会“萎缩消失”，那么如果初步的新阶级并未形成，不能反过来在极权主义统治者手中“萎缩消失”，就意味着人类历史到了末日。换言之，极权主义运动借以夺取和行使权力的屠杀法则如果能成功地使全人类服从于它的统治，那么就会继续成为运动的法则。

根据我们的理解，合法的政府是一种政体，需要成文法在其中解释和实现永远不变的自然法则（*ius naturale*），或者上帝的永恒戒律，成为正确

或错误的衡量标准。只有根据这些标准，根据每一个国家的成文法本体，才能从政治上实现自然法则或上帝的戒律。在极权主义政府的政体中，成文法的位置被极权恐怖占据，极权恐怖旨在将历史运动或自然运动的法则变为现实。正如成文法（虽然它们界定侵越范围）独立于自然和历史之外——任何社会里即使没有犯罪现象，也不意味着法律是多余的，相反，这意味着法律的最完美统治——极权主义政府的恐怖也不再是一种纯粹压迫反对派的手段，尽管它还用于这种目的。当极权独立于一切反对派之外时，恐怖（terror）变成了全面（total）；当谁也不阻挡它的道路时，它就是最高统治。如果守法是非暴政体制的本质，而不守法是暴政的本质，那么恐怖就是极权主义统治的实质。

恐怖即运动法则的现实化。它的主要目的是使自然力量或历史力量有可能自由地急行穿过人类，不落后于任何自发的人类行动。恐怖本身寻求“稳定”的人，以便解放自然力量或历史力量。正是这种运动剔选出了人类的敌人，恐怖针对他们而发作，不允许反对或同情之类的自由行动去干涉历史或自然，阶级或种族清除其“客观敌人”的工作。有罪和无罪变成了毫无意义的概念；“有罪”就是阻挡对“劣等种族”、对“不适宜生存”的个人、对“垂死阶级和没落民族”进行审判的自然进程或历史进程。恐怖执行这些审判，在其法庭前，一切有关的人主观上都是无罪的：被杀者并没有做任何反对这个制度的事情，杀人者并非真正谋杀，而是执行某种更高法庭宣判的死刑命令。统治者并不自称公正或聪明，而只是执行历史的或自然的法则；他们并不运用法则，而只是根据内在法则进行一场运动。假如法律就是某种超人类力量——自然或历史——的运动法则，那么恐怖便是守法的。

恐怖即执行运动法则，运动的最终目的不是人的福利或一个人的利益，而是建设人类，为了物种而清除个人，为了“整体”而牺牲“部分”。自然或历史的超人类力量有其自身的开端和终结，因此只有用新的开端和每一个个人实际生命的终结才能阻挠这种力量。

立宪政府的成文法是为了在人际设置界线，建立沟通渠道，因为人类社会由于新成员的出生加入而不断受到威胁。随着每一个新生儿的出生，对于世界来说是产生了一个新的开端，一个潜在的新世界开始形成。法律的稳定性对应于人类一切事务的恒常运动，人的生生死死使这种运动绝不停止。法律对每一个新的开端设置障碍，同时也保证它的运动自由，这种自由是某种全新的、无法预言的事物的潜在力量；成文法的界限说明人的政治存在，如同记忆说明他的历史存在；它们保证一个共同世界的预先存在，某种连续的实在，它超越每一代人的生命跨度，吸收一切新的起源，并由它们来滋养。

全面恐怖很容易被误解为暴政的征兆，因为极权主义政府在它的最初阶段必然表现得像暴政，消除人为的法律界线。但是极权恐怖之后并无恣意的无法律现象，没有出于某种任意的意志而发怒，或者为了一个人的专制权力而反对一切人，更不是为了一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它在个人之间替界线和沟通渠道换上了一块铁带，将他们紧紧联结在一起，似乎他们的多元现象已经消失，变成了大方向中的一个人一样。撤除人际法律的藩篱——例如专制暴政所做的那样——意味着夺走人的自由，摧毁作为一种活生生的政治现实的自由；因为由法律圈围出来的人际空间，是自由的生活空间。极权恐怖利用这种旧的暴政工具，同时也摧毁了暴政留下的恐惧和怀疑的毫无法则、毫无阻隔的荒野。这块荒野无疑不再是一种自由的生活空间，但是它仍

然为它的居民提供了由恐惧引导的运动和满心狐疑地行动的空间。

极权恐怖用迫使人们互相反对的方法来摧毁他们之间的空间；与它在铁带之中的条件相比，即使是暴政的荒野，只要它仍然是某种空间，它就会显得好像是自由的一种保证。极权主义政府并不只是剥夺自由权利或废除真正的自由；在我们的有限知识中，它也未成功地从人们心目中抹去对自由的热爱。它在一切自由中摧毁了一种重大的先决条件，即是活动的能力（capacity of motion），这种能力没有空间即不能存在。

极权恐怖这种极权主义政府的本质的存在，既不赞同人也不反对人。它假设是提供自然力量或历史力量的，以那无与伦比的工具加速运动进行。这种运动根据它自身的法则开始运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会停滞不前；它的力量最终总会比由行动和人的意志产生的最强的力量更有力。但是它可能减慢速度，而且几乎不可避免地已被人的自由减缓了，甚至连极权主义统治者也不能否定自由，因为这种自由——他们以为是不恰当的、任意妄为的——与一种事实相符，即人的出生使每一个人成为一种新的开端，在某种意义上使世界开始更新。从极权主义的观点来看，人的出生与死亡这种事实只能被看作一种令人烦恼的对更高力量的干涉。因此，恐怖作为自然运动或历史运动的顺从奴仆，必须在运动过程中清除具体意义上的自由，也清除自由的源泉，自由的源泉随着人的出生而获得，并且处在他创造一个新开端的能力之中。恐怖摧毁人的多元性，从多中选一，使他那种永不失败的意志产生作用，似乎他自己就是自然进程或自然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种被发现来解放历史力量和自然力量的手段，而且加快那由他们自己永远不可能达到的速度。从实际角度来说，这意味着恐怖当场执行自然对“不适宜生存”的种族或个人、历史对“垂死阶级”宣判的死刑，根本不等待自然或历史本身比较缓慢和较少效果的进程。

根据这种观念，凡在政府本质变成活动（motion）的地方，一种很古老的政治思想问题似乎找到了一种答案，类似于一种早已被注意到能解决合法性和正义之间的差异的答案。假如政府的本质定义为守法，假如能够明白，法律是人类公共事务中的稳定力量（自从柏拉图在他的《法律篇》里向大神宙斯祈求以来便一直如此），那么就产生了政体的运动及其公民之行动的问题。为法律性行动设定了界限，但是并不激发行动；法律在自由社会里的伟大性（同时也是错综复杂）在于它们只说人不应该做什么，从来不说人应该做什么。如果一种政体的必要运动的本质——同样自从柏拉图以来——一向根据它的永久性来定义，那么就永远不可能发现这种本质。衡量一个政府的优点的明确标准之一是它的延续性。根据孟德斯鸠的看法，暴政的坏处之最高证明是它们能从内部被摧毁，会自己衰落，而其他政府是从外部环境被摧毁的。所以，我们历来需要的关于政府的定义是孟德斯鸠所说的“行动的原则”，这在各种政府中是不同的，会同样激励政府和公民对待公共活动，它用作一种判断一切公共事务活动的标准，超越了纯粹消极的守法标准。根据孟德斯鸠的看法，这类指导原则和行动标准是君主政治的光荣、共和政体的优点、暴政的恐惧。

在完全极权主义的政府里，所有的人都变成了“一个人”，所有的行动都旨在加速自然运动或历史运动，每一项行为都是在执行自然或历史早已宣判的死刑，也就是说，在可以完全依赖恐怖来保持运动的经常性的条件下，根本不需要与其本质相分离的行动原则。然而，只要极权主义统治还没有征

服全世界，还没有用恐怖来使每一个单个的人成为统一的人类之一部分，那么，无法完全实现的不是行动，而是活动。正如立宪政府的守法不足以激励和引导人的行动一样，极权主义政府的恐怖也不足以激励和引导人类行为。

在目前条件下，极权主义统治仍然和其他形式的政府一样，在公共事务中都需要有一种对它的公民的行为指导，它不需要、甚至也不能够利用一种严格意义上的行动原则，因为它恰恰会消除人的行动能力。在极权恐怖的条件下，甚至连恐惧（fear）也不再能用作一种如何行事的忠告，因为恐怖在挑选受害者时并不涉及个人的行动或思想，完全根据自然进程或历史进程的客观需要。在极权主义条件下，恐惧或许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普遍存在；但是，当恐惧引导的行动不再有助于避免人所害怕的危险时，恐惧就失去了它的实际用处。同情政权或支持政权的情形也是如此；因为极权恐惧不仅根据客观标准来选择受害者；它在选择执行者时，也尽可能不顾其信念和同情。自从苏俄及其卫星国的大整肃以来，一直不断地在清除作为行动之动机的信念。极权主义教育的目的从来就不是培植信念，而是破坏形成信念的能力。希姆莱在组织工作方面的最大发明是在挑选党卫军成员的制度中采用纯粹客观的标准；他只看照片，根据纯粹种族的标准选人。自然本身不仅决定谁该被清除，也决定谁应该被训练成杀人者。

一个政体不再使用恐怖作为威吓手段，而它的本质就是恐怖，要使这个政体开始运动的话，没有哪一种来自人类行动范围的行为指导原则——例如美德、荣誉、恐惧——是必要的和有用的。相反，它在公共事务中采用一种全新的原则，完全不用人类的行动意志，只渴求洞悉运动的法则，根据这种法则，恐怖产生了作用，所以使一切个人命运全取决于恐怖。

极权主义国家的居民完全被扔进和受制于自然过程或历史过程，这是为了加速它的运动；于是根据它的内在法则，他们只能做杀人者或者被害者。这个过程可以决定谁可以在今天做杀人者，清除种族与个人、垂死阶级的成员和没落民族，而明天他们自己也成为牺牲品。极权统治在指导它的臣民的行为时，所需要的是只是准备将每一个人同等地归入杀人者角色和被害者角色。这种两面的准备，取代了行动原则的，是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即令信奉者满意的，可以解释一切事物和所发生的一切现象的各种主义，它们的解释方法是从一个简单的前提出发来推论——是一种非常新近的现象，许多年来，它在政治生活中只扮演了一种无足轻重的角色。我们只有凭后见之明，才能从中发现某些使它们对于极权主义统治十分有用的因素。（在希特勒和斯大林之前，意识形态的巨大政治潜力还未被发现过。）

各种意识形态都以它们的科学特性而闻名：它们将科学方法和相关的哲学结果结合起来，伪装成科学哲学。“意识形态”这个词似乎意指一种观念可以变成一门科学的题材，正如各种动物是动物学（zoology）的题材一样，意识形态（ideology）也有一个附尾字logy，所指的正是logoi，一门“逻辑知识”，关于其题材的科学陈述。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一种意识形态事实上就会变成一门伪科学和一门伪哲学，在同时跨越了科学和哲学两者的界限。例如，自然神论（deism）就此会变成意识形态，它研究关于神的观念，与此相关的是哲学，而它又以神学（theology）的科学方式出现，其中上帝是一种启示的实在。（如果神学不以启示作为既定的实在，而只是将上帝当作一种观念，那么神学就会像动物学一样疯狂，不再确定各种动物是否有肉体的、可触及的存在。）然而我们知道，这只是部分真理。自然神论虽然否

定神的启示，但是并不简单地将只是一种“观念”（idea）的上帝处理成“科学的”陈述，而是为了解释世界的进程而利用上帝这个观念。各种主义中的“观念”——种族主义中的种族，自然神论中的上帝，等等——从不构成各种意识形态中的题材，而logy这一附尾字，也从不简单地指一个“科学的”陈述。

根据“意识形态”的原词含义，它是一种观念的逻辑。它的题材是历史，从“观念”的角度运用这种主题材料的结果，不是关于某种事物“是什么”的一套陈述，而是展开一个经常变化的过程。意识形态对待事件的过程的态度，是将它们看作应该遵循它的“观念”所揭示的逻辑“法则”。各种意识形态都伪装知道整个历史过程的各种秘密——过去的秘密，现在的缠结，将来的无法预测——其原因是各自观念中内在的逻辑。

各种意识形态对存在的奇迹从来不感兴趣。它们关注的是历史，关注生成与毁灭、文化的兴衰，甚至试图用某种“自然法则”来解释历史。种族主义中的“种族”一词并不意指将人类各种族当作一个科学探索领域的任何真正兴趣，而是指将历史运动解释为一种连贯过程的“观念”。

一种意识形态的“观念”既不是柏拉图所说的靠思维的眼睛把握的永恒本质，也不是康德所说的理性规范原则（regulative principle of reason），而是一种解释工具。对于一种意识形态来说，历史并不显示为一种观念（这里指的是将历史看作某种超越历史运动的理想的永恒状态下从属的一个分类），而是某种可以用观念来估算的事物。使这种“观念”适合于这种新角色的是它自身的“逻辑”，它是“观念”本身引起的运动，无须外界因素使它启动。种族主义因此是相信种族观念有内在运动，正如自然神论是相信上帝的观念有内在运动一样。

历史运动和这种观念的逻辑过程被假设是互相对应的，所以无论发生什么，都是根据一种“观念”的逻辑发生的。但是，在逻辑领域里，惟一可能的运动是从一个前提出发的推论过程。一旦一种意识形态掌握了辩证逻辑，其原理也是相同的，辩证逻辑的过程是从命题（thesis）通过反题（antithesis）走向合（synthesis），随即又变成下一步辩证运动的命题；第一个命题变成前提，它在意识形态的解释中的有利之处是，这种辩证手法可以将实际矛盾解释为一种一致的、连贯的运动的各个阶段。

一旦逻辑作为一种思想运动（movement of thought）——而不是作为对思维的必要控制——应用于一种观念，这种观念就转变成一种前提。意识形态的世界从事这一类逻辑推理，早在它出于极权主义之因而变得富有成果之前就开始了。纯粹否定性的逻辑强制（禁止矛盾）变得“多产”，以至于能开始一整套思想路线，压制思想，用单一的辩论来得出结论。这种辩论过程既不会被新观念（它会变成另一个前提而得出完全不同的结果）打断，也不会被新经验打断。各种意识形态一向假定，用一种观念便足以解释从前提发展出来一切事物，经验不能说明任何事物，因为对一切事物的理解都在这种逻辑推论的连贯过程中。在从整体上解释一种意识形态及其世界观（Weltanschauung）时交换必要的哲学思想，其危险主要并不在于冒跌入通常庸俗的、非批判性的假设之险，而是将人能力中的内在自由换成简单的逻辑外衣，人以此可以几近粗暴地强迫自己，就像他被某种外部力量强迫一样。

19世纪的世界观与各种意识形态本身都不是极权主义的，虽然种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在20世纪变成了主要的意识形态，但是它们在原则上并不比其他



各种意识形态“更极权主义”；极权主义之发生，原因是它们原先根据的经验成分——各种族之间争夺世界统治权，各国内部的各阶级争夺政权的阶级斗争——在政治上比其他各种意识形态所根据的经验成分更重要。在这个意义上，种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对其他各种主义的胜利，在极权主义运动抓住这两种意识形态之前就已经决定了。另一方面，一切意识形态都包含了极权主义成分，但是这些成分只有在极权主义运动中才充分发展，因此这一情况造成了一种欺骗性的印象，好像只有种族主义和共产主义才是极权主义性质的。而事实是，一切意识形态的真实本性只有在它们扮演极权统治工具的角色时才暴露出来。从这一方面可以看到，对于一切意识形态思想来说，有三种具体的极权主义因素显得很奇特。

第一，各种意识形态在宣布它们的总体解释时，倾向于解释的并非“是什么”，而是“变成什么”，凡生者皆死。它们在一切情况下都只关心运动因素，即只关心历史这个词中的通常含义。各种意识形态总是倾向于历史，即使当它（例如种族主义）表面上从自然这个逻辑前提开始，情况亦如此；自然在这里只用于解释历史事件，并将它们降低到自然问题。宣称从总体上解释，许诺解释历史上发生的一切事情，对过去作总体解释，提供关于现在的总体知识，以及对未来作可靠预言。

第二，根据这种能力，意识形态思想变得独立于一切经验，它从这些经验中学不到任何新的东西，即使它刚刚发生过。于是，意识形态思想摆脱了我们凭五官感知的现实，认为有一种“更真实”的现实隐匿在一切可感知事物的背后，从这个隐匿的地方来控制事物，并且要求有一种第六感，使我们能意识到它。第六感正是意识形态提供的，教育机构提供特别的意识形态灌输，教育机构的设立也完全出于这个目的，在纳粹的奥登斯堡里或在共产国际和布尔什维克情报局里训练“政治军人”。极权主义运动的宣传也用于将思想从经验和现实中解放；它总是设法在每一桩公开、可见的事件中塞进秘密含义，怀疑每一种公开政治活动背后都有秘密意图。一旦运动取得权力，他们就着手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主张来改变现实。阴谋的概念取代了敌意，这就产生了一种心态，使现实——真实的敌视或真实的友谊——不再凭本来面目被体验和理解，而是自动地假设有别的含义。

第三，既然意识形态无力改变现实，那么它们从经验之下达到思想解放就必然通过某些方法来显示。意识形态思维将事实都组织进一种绝对逻辑过程，这种逻辑过程从公理上接受的前提开始，从中推论一切事物；也就是说，它展开的那种连续性在现实范围里根本不存在。推论可以从逻辑角度或辩证角度展开；在这两种情况中，它都涉及一种连贯一致的论证过程，因为这种论证是根据过程来思考的，假定它能够理解超人类运动、自然过程或历史过程。理解是靠心智的模仿来达到的，无论是逻辑思维还是辩证思维，模仿的是“科学地”建立的运动法则，通过模仿过程使理解整合起来。意识形态的论证一向是一种逻辑推论，对应于前面提及的两种意识形态因素——运动的因素和从现实与经验中解放出来的因素——首先因为它的思想运动并不产生于经验，而是自我产生的，其次，因为它将取自经验的现实中惟一的要点转变成一个公理的前提，从此以后就使论证过程完全脱离进一步的经验。一旦确定了它的前提和它的出发点，经验就不再干涉意识形态思维，它也不能由现实来教导。

极权主义统治者用来将他们各自的意识形态转变为武器的手法（它可以

迫使他进入恐怖运动)欺人耳目地简单而且不显眼:他们极其认真地采用这些手法,将它们奉为自己的最高天才——“冷冰冰的推理”(希特勒语)和“辩证法的无情规律”——着手驱使意识形态的含意进入逻辑上连贯一致的极端,在旁观者看来,这简直“原始”到荒谬的地步:一个“垂死的阶级”包括该死的人;“不适宜生存的种族”应该被消灭。谁若同意有“垂死的阶级”这一种东西存在,但是不得出应该杀死它们的成员的结论,或者同意生存权与种族有关,却又不得出杀光“不适宜的种族”的结论,那么很明显地不是愚蠢就是胆怯。这种严格的逻辑性作为行动的指导,渗透到极权主义运动和极权主义政府的整个结构。希特勒和斯大林虽然并没有为他们的运动的观念和宣传口号增加任何一种新思想,但是仅凭上述原因,就应该认为他们是最重要的意识形态专家。

这些新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专家与他们的先驱者之间的区别是,吸引他们的首先不是意识形态的“观念”——阶级斗争与对工人的剥削,或种族斗争与关心日耳曼民族——而是从中可以发展的逻辑过程。根据斯大林的说法,不是观念,也不是预言,而是“不可抗拒的逻辑力量完全征服了(列宁的)听众”。马克思认为,当观念抓住了群众时,就产生了力量;发现力量,不是为了用于观念,而是为了用于它的逻辑过程,“好像一种强有力的触角从四面八方抓住你,你好像被老虎钳夹紧了,你无力逃脱;你要么投降,要么下决心彻底输尽。”只有当实现极权主义的主张——实现无阶级社会,或成为主人种族——到了紧要关头时,这种力量才显示出来。在实现的过程中,意识形态为了吸引群众而赖以为基础的原初实质问题——剥削工人,或德国的民族抱负——慢慢地失去了,好像已被过程本身吞噬:正是根据“冷冰冰的推理”和“不可抗拒的逻辑力量”,工人们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下甚至失去了过去在沙皇压迫下都能准许的那些权利,德国民众蒙受战争苦难,这场战争根本不考虑日耳曼民族生存的最低需要。正是在意识形态政治的本质中——不是为了自我利益或渴望权力而产生背叛——意识形态的真正内容(工人阶级或日耳曼民族)原先引起了“观念”(阶级斗争是历史法则,或种族斗争是自然法则),现在却被用来执行观念的逻辑吞噬了。

极权主义要求取代孟德斯鸠的行动原则,但是制造受害者和杀人者的却不是意识形态本身——种族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而是它的内在逻辑性。在这一方面,希特勒像斯大林一样,非常喜欢那种最有说服力的论证:你若不说B和C等等,一直说到无数字母的末尾,你就不能说A。在这里,逻辑性的强制力量看来有其根源;它产生于我们对自相矛盾的恐惧。布尔什维克的整肃成功地使它的受害者坦白他们从未犯过的罪行,在这个程度上,它主要依靠这种基本恐惧,并且争辩如下:我们都同意一个前提,即历史就是阶级斗争,也同意党在从事阶级斗争中的角色。所以你知道,从历史角度来说,党是永远正确的。(托洛茨基说:“我们只有和党在一起,并且依靠党,才会正确,因为历史提供的惟一正确道路就是这样。”)在这个历史时刻,根据历史法则,一定会犯某些罪,而党知道历史法则,必须惩罚之。至于这些罪行,党需要罪犯;也许是党知道罪行,但是不知道谁是罪人;比清楚地知道谁是罪犯更重要的是惩治罪行,因为倘若没有这种惩罚,历史就不会进步,而只能在它的过程中倒退。所以,你要么是犯了罪,要么响应党的召唤,去扮演罪犯的角色——在这两种情况下,你都在客观上变成了党的敌人。如果你不坦白,你就不再能通过党来推动历史,就变成了真正的敌人。这种论证

的强制力量是：如果你拒绝，你就自相矛盾，由于这种自相矛盾，就使你的整个生命毫无意义；你说的 A，透过它逻辑地产生的 B 和 C，主宰了你的整个生命。

极权统治者依靠强迫力（compulsion），使我们能够强迫自己，为了有限动员那些统治者仍然需要的群众；这种内在的强迫力是逻辑性的暴政（tyranny of logicality），除了人开始创造新事物的伟大能力之外，任何东西都不能和它对抗。逻辑性的暴政开始于思维服从逻辑这一个永不终止的过程，人依靠这个过程，产生他的思想。由于这种服从，在他向外在的暴君低头，放弃他的行动自由时，也放弃了自己的内心自由。自由作为人的一种内在能力，与他开始做人的能力是一致的，正如自由作为一种政治现实，与人际活动的空间一致。逻辑和有说服力的推论无法控制事物的开始，因为逻辑之链是以前提的形式，假设了开端。就像需要恐怖，以免每一个新人的诞生会产生一个新的开端，提高他在世界上的声音，逻辑性的自我强制力量也必须动员起来，以免有人会开始思考——思考作为人类一切活动中最自由、最纯粹的行动，恰恰是推论的强迫性过程的反面。极权主义政府只有在这种程度上才能太平；它能发动人自己的意志力量，以便迫使他进入历史或自然的巨大运动，这种运动很可能利用人类作为它的材料，而根本不知生与死为何物。

极权恐怖的强制力量用它的铁掌，迫使孤立的人组成的群众集合起来，并且在一个对于他们而言已变成荒野的世界里支持他们，而另一方面，逻辑推论的自我强制力量使每一个个体在他独自的孤立状态中反对一切他人，又相互对应，相互需要，目的是启动恐怖统治的运动，并且使它不停地运动。正如恐怖（即使在极权之前还仅仅是暴政形式）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逻辑思维的自我强制破坏了和现实的一切关系。当人们与同伴们失去接触，也和周围的现实失去接触时，极权恐怖的准备工作就完成了；因为在失去这些接触的同时，人们也失去了经验和思想的能力。极权主义统治的理想主体不是忠诚的纳粹或忠诚的共产党人，而是民众，对于他们来说，事实与虚构（即经验的真实）之间的区别，真与伪（即思想的标准）之间的区别已不复存在。

我们在做这些考虑的一开始提出的问题，以及我们现在回来讨论的问题，就是在人们的共同生存中，什么样的基本经验渗透进了一种政府形式，这种政府的本质是恐怖，它的行动原则是意识形态的逻辑性。很明显，在先前各种形式的政治统治中，从未使用过这种组合。还有，它所倚仗的基本经验必定是人类经验和人们熟悉的经验，因为在一切政体中，即使这种最“有创造性的”政体也是由人发明的，多少回应了人的需要。我们经常观察到，恐怖只有对那些相互隔离孤立的人才能实施绝对统治，所以，一切专政政府主要关注的事情之一就是造成这种孤立。孤立会成为恐怖的开端；它当然是恐怖的最肥沃土壤；它总是恐怖的结果。这种孤立本身就是极权主义的前兆；它的标志是无能，在这个范围内，力量总是来自于人的共同行动，即“一致行动”（acting in concert）（伯克语）；根据定义，孤立的人是无力的。

孤立（isolation）和无能（impotence），亦即根本没有行动能力，一向是暴政的特点。人与人的政治接触在专制政府之下被切断了，人类的行动能力和力量落空了。但是，并非人际一切联系都被切断，并非一切人类能力都被摧毁。私人生活的整个领域，以及经验能力、建造能力、思想能力都还

未触动。我们知道，极权恐怖的铁掌不留这种私人生活的空间，极权主义逻辑的自我强制摧毁了人的经验能力和思想能力，正如它当然摧毁了人的行动能力一样。

在政治领域，我们所说的孤立是指社会交往方面的孤独。孤立与孤独（loneliness）不一样。我可以是孤立的——处于我无法行动的情景，因为谁也不会与我共同行动——但是不孤独；我也可以是孤独的——处于我作为一个人而感到自己被所有的人类同伴遗弃的情景——但是不孤立。孤立是一种人被驱人的绝境，他们的政治生活、他们追求一种共同目的的共同行动都被摧毁。然而孤立（尽管会摧毁力量和行动能力）不仅未影响人的所谓生产性活动（productive activities），而且也是这种活动所必需的。人只要他是一个制作工具的人（homo faber）就会倾向于使自己孤立，暂时离开政治范围。制造（fabrication；poiesis，指制作物品），一方面与行动（action；praxis）有区别，另一方面与单纯的劳动有区别，总是在某种脱离共同关注的孤立状态下进行，无论其结果是一件工艺品还是一件艺术品。人在孤立中仍然与作为人类建制的世界保持接触；只有当最基本形式的人类创造活动（人在共同世界里增加自己的某种东西的能力）被摧毁了，孤立才变得令人完全无法忍受。当一个世界的主要价值受劳动支配，一切人类活动都被转变成劳动时，才会发生这种情形。在这种条件下，只有纯粹的劳动努力（即努力保持生命）被抛弃，而人与作为人类建制的世界的关系也被打破。在政治行动方面失去地位的孤立的人也会被物的世界抛弃，其前提是他不再被看作是制作工具的人，而被看作是劳动的动物（animal laborans），他的必要的“自然新陈代谢”与任何人无关。孤立因此就变成了孤独。以孤立为基础的暴政一般不触及人的生产能力；但是，对“劳动者”的暴政（例如古代对奴隶的统治）会自动地成为对孤独（而不仅仅是对孤立）的人的统治，而且倾向于变成极权主义。

孤立只涉及生活的政治方面，而孤独涉及整体的人类生活。极权主义政府像一切暴政一样，不摧毁公共生活，亦即假如不用使人孤立的方法来摧毁人的政治能力，就无法存在。但是，极权统治作为一种政府形式是不同于以往的，因为它不满足于这种孤立，并且要摧毁私人生活。它的自身基础是孤独，是根本不属于世界的经验，这是人类经验中最彻底、最绝望的一种。

孤独是恐怖的共同基础，是极权政府的实质，而对于意识形态与逻辑性（即准备它的杀人者和受害者）来说，与无根和成为多余的情境紧密相关；自从工业革命开始以来，这已成为对现代群众的诅咒；而在19世纪末，随着帝国主义的兴起，它变得更加尖锐；在我们这个时代，却成了政治制度和社会传统的崩溃。无根意味着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立足之地，不受别人的承认和保障；成为多余者意味着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无根可以成为变成多余者的先决条件，正如孤立可以（但并不一定）成为孤独的先决条件一样。孤独自身并不考虑其最近的历史原因与它在政治中的新作用，它同时与人类的基本要求相反，也与每一个人生活的根本经验之一相反。即使是物质与感官的世界的经验，也取决于我同其他人的接触，取决于我们的共同感觉（common sense），共同感觉规范并控制其他一切感觉，若无共同感觉，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被封闭在自己特殊的感受资料中，而这种感受资料自身是不可靠的。正因为我们有共同感觉，正因为不是一个人，而是许多人生活在地球上，我们才能相信自己的直接感受经验。然而，我们必须提醒自己，终有一天，我们

将不得不离开这个共同世界，而它却一如既往地存在，为了实现孤独状态这种被一切事物和每一个人抛弃的经验，相对于共同世界的继续存在而言，我们都是多余者。

孤独不是孤寂 (solitude)。孤寂要求独处，而孤独却在和其他人在一起时最明显地显示出来。除了几句离题的话之外——通常包装着一种吊诡的气氛，例如古图 (Cato) 的话：“他从来没有比他独处时更少孤独”，或者说，“他从来没有比他在孤寂中更少孤独”——似乎希腊血统被解放的奴隶哲学家埃皮克提图 (Epictetus) 首先区别孤独和孤寂。从某种方面来看，他的发现是很偶然的，他的主要兴趣既不是孤寂，也不是孤独，而是独处，其义为绝对独立。埃皮克提图认为 (《论文集》 [Dissertations]，第 3 卷，第 13 章)，孤独的人发现他被其他人包围，他和他们无法建立联系，也不知究竟与谁敌对。孤寂的人却相反，他是孤独的，因此“可以自顾自”，因为人有能力“自言自语”。换言之，在孤寂中，我和“自我” (self) 共处，因此合二为一，而在孤独中，我实际上是被众人抛弃的一个人。严格说来，一切思维都在孤寂中进行，是我与自己的对话；但是这种合二而一的对话并不失去与我的同类伙伴世界的接触，因为他们在自我中表现出来，我和这个自我进行思想的对话。孤寂的问题是，这种合二为一需要他者，以便再度变成一个人：一个不可改变的个体，他的身份从来不会与其他任何一个人的身份搞错。为了确认我的身份，我完全依靠其他人；正是对孤寂者的同伴情谊这种伟大的救世恩惠使他们重新变成“整体”，使他们免于进行其身份暧昧不明的思想对话，恢复了使他们用一个不可改变的个人的单独声音说话的身份。

孤寂可以变为孤独；这发生于我完全靠自己来抛弃自我之时。孤寂的人永远处于变成孤独的危险之中，他们不再发现同伴情谊的拯救恩惠可以使他们免于两重性、暧昧和怀疑。从历史角度来看，似乎这种危险变得巨大到足以引起别人注意，仅在 19 世纪的历史中才有记录。它清楚地显示出，当哲学家们 (只有对他们来说，孤寂才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工作条件) 不再满足于“哲学只是为少数人的”，开始说出，没有人能“理解”他们。在这一方面，最典型的轶事发生在黑格尔临死之前，在他之前的任何一位伟大的哲学家都说不出这样的话来：“除了一个人之外，谁也不了解我：而他也误解了我。”相反，一个孤独者发现了自己并开始孤寂中思想对话的机会总是有的。这似乎发生在尼采在席斯玛莉亚 (Sils Maria) 构思查拉图斯特拉之时。在两首诗中 (《席斯·玛莉亚》 [Sils Maria] 及《来自高山》 [Aus ho-hen Bergen])，他叙说了落空的期待和孤独者在渴望中的等待，突然“到了中午，一变成二……确信一致的胜利，我们用最大的盛宴贺庆；我友查拉图斯特拉莅临，他是嘉宾之中的嘉宾”。

孤独令人无法忍受的原因是，失去了可以在孤寂中实现的自我，但是又只能靠同类的信任才能肯定自己的身份。在这种情形下，人失去了对自身的信任 (自身本应是他的思想的合伙人)，也失去了存在于一个为提供经验而必须有的世界中的基本信心。自我与世界，思维能力与经验，都同时失去了。

人类思维的惟一能力 (人类思维为了平安地发挥功能，就既不需要自我，也不需要别人，也不需要世界，当它与思维有关时，它独立于经验之外) 是前提自明的逻辑推理能力。有说服力的证据之基本规则 (二加二等于四之类的自明之理) 是即使在绝对孤独的条件下也不能颠倒的。这是人类一旦失去

相互保证时可以依靠的惟一可靠“真理”，这也是常识；人为了经验、生存，懂得他们在共同世界里的道路，就需要依靠这种“真理”。但是这种“真理”是空的，或者说根本没有真理，因为它并不揭示什么。（如果像某些现代逻辑学家那样将无矛盾定义为真理，这是否定了真理之存在。）所以在孤独的条件下，自明之理再也不只是知识的手段，而开始多产地发展它自己的各种“思想”路线。以严格的自证逻辑为特点的思维过程（这明显是毫无例外的）与孤独有某种联系，这是路德（Martin Luther）曾经注意到的问题。（他对孤寂和孤独现象的经验是独一无二的，他曾经敢于说“应该有一个上帝，因为人需要一个上帝，以便让人能够相信”。）他对于“圣经”文本有一句鲜为人知的评价。《圣经》上说：“人若孤独，是不好的。”路德说，一个孤独的人“总是从一件事来推断另一件事，并且将一切事情想到最坏处”。极权主义运动的著名的极端主义中的确包含了这种“将一切事情想到最坏处”，在这一推论过程中，总是得出最坏的可能结论。

在非极权主义世界里使人走向极权统治的是，孤独（过去只是一种边缘经验，通常是在像老年这样的边缘社会条件下经历的）变成了我们这个世纪里日益增多的群众的一种日常经验。极权主义驱使和策动群众进入的无情过程，像是对这种现实自杀式的逃避。“冷冰冰的推理”和“抓住你，好像被老虎钳夹紧”的辩证法“强有力的触角”似乎像一个无人可信赖、无物可倚靠的世界里的一种最后的支撑物。正是这种内在强制（它惟一的内容是严格避免矛盾）似乎能在与其他人的一切关系之外证明一个人的身份。即使当他处于孤独，这种内在强制也使他陷入恐怖的铁掌，而极权统治尝试绝不让他独处，除非是让他处于孤寂的幽闭之中。运用摧毁人际一切空间、迫使人们相互反对的手法，甚至消灭了孤立的生产潜力。运用教导并且美化孤独的逻辑推理的手法，使人知道，如果他放弃了整个过程由此开始的大前提，他就会完全失败，连最小的机会——孤独可以转化为孤寂，逻辑可以转化为思想——也被抹去了。如果将这种做法同专制政治的做法相比，似乎是找到了一种方法可以使荒漠运动起来，让一阵沙暴掩埋地球上各个部分的居民。

我们今天在政治领域生存的条件的确受到了这种吞噬一切的沙暴的威胁。它们的危险不在于它们可能建立一个永恒的世界。极权统治像专制政治一样，带有它自己的毁灭性细菌。正如恐惧和产生恐惧的虚弱无能是反政治的原则，将人扔进一个与政治行动相反的情景，而孤独和从孤独中产生的最坏的逻辑——意识形态推理，代表了一种反社会的情景，包藏着一种摧毁一切人类共居的原则。但是，有组织的孤独更是危险，远甚于被一个人的残暴和恣意妄为的意志统治下造成的未经组织之人的无能。它的危险在于威胁要向我们所知的世界报复——在这个世界里，到处似乎都走到终点——在那一个从终结中产生的新的开端有时间宣告自己诞生之前。

除了这一类思考——它们作为预言，无甚效用，也很少给人安慰——以外，仍然存在着一个事实：我们时代的危机及其中心经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政府形式，它作为一种潜势、一种始终存在的威胁，十分有可能从现在起就伴随着我们，正如在不同的历史时刻出现的其他形式政府，依靠不同的基本经验，总是与人类相伴随——无论有多少暂时的失败——君主政治、共和政体、专制政治、独裁政体及暴政。

但是仍然存在着一真理，历史的每一次终结必然包含着一个新的开端；这种开端就是一种希望，是终结所能够产生的惟一“神示”。开端在变

成一个历史事件之前，就是人的最高能力；从政治角度来说，它与人的自由是一致的。奥古斯丁说：“创造了人，一个开端形成。”这个开端由每一次新生来保证；这个开端确实就是每一个人。

（本篇为《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三部第十三章。

《极权主义的起源》，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出版）

## 关于政治与革命的思考

此文是德国作家阿得贝尔特·莱夫(Adelbert Reif)对汉娜·阿伦特的访谈,时间是1970年夏天。

问: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及历史学家,而不只是基于此字之严格意义所指的那些人,有一种看法,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舞台上,未来只有两种可能选项: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您认为还存在其他可能吗?

答:我看不到历史上有这些选项:我也不知道还隐藏些什么。我们别谈什么“人类历史的发展”这种冠冕堂皇的话,未来很可能会有个大转弯,是既不符合资本主义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让我们希望,未来会是一个惊喜。

但我们从历史角度来检视一下您所说的选项:它始于资本主义,一个没有人曾加以计划或曾经预见的经济体系。在一般的认知,这个系统的开始是一个巨大的征收(expropriation)过程,在历史上从未以此形式出现过——也就是,不用军事征服。征收,资本的初始累积——这就是资本主义借以崛起并一步步前进的法则。现在大家脑中所想像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我不知道。但如果看看实际发生在苏俄的情况,你会发现,在那里征收的过程走得更远;也会观察到某些极类似的情况正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进行着,一如旧有的征收过程再度恣意而行。过度征税,一种事实上的通货贬值,通货膨胀伴随着经济衰退——这些不是较为温和的征收形式又是什么?

只有在西方国家才有政治及立法的牵制,经常地防止这征收的过程会让人民的生活达到完全无法忍受的地步。苏联有的当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国家社会主义,这和国家资本主义没什么两样——亦即,是完全的征收。完全征收发生在所有政治及法律对私人拥有权的保护消失之时。例如在苏联,某些集团享有非常高的生活水准。问题只在于,这些人所能使用的东西——汽车、乡村别墅、昂贵家具、有司机的豪华轿车等等——并不属于他们;任何东西都有可能任何时刻被政府所收回。万一层峰发生领导权的争夺,再富有的人也有可能一夜之间成为乞丐——甚至连就业的权利也没有。(浏览一下当前苏俄文学——人们开始说真话了——它比所有经济或政治理论更清楚地证实了这可怕的后果。)所有的经验——不同于理论和意识形态——都告诉我们,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而开始的征收过程,并不随生产工具的征收而停止;只有独立于经济力量的法律及政治制度以及制度的自动运作,能控制及防止这一过程内在的畸形恐怖潜力。这种控制运作得最好的似乎是在所谓的“福利国家”、不管他们自称是“社会主义的”或“资本主义的”。能保护自由不受侵犯的是政府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区分,或用马克思式的语言来说,就是国家及其宪法不属于上层结构的这个事实。

在所谓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保护我们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一个法律体系,它阻止大企业管理阶层侵入其雇员私人领域的白日梦成真。但一旦政府本身成为雇主,这个做法就会成真。美国政府员工的解约制度并不尊重私人生活,已不是什么秘密;最近某些政府机关喜欢私扰民宅,这也可以看作是政府企图将所有公民当作未来的政府雇员来对待。这种私扰行为不是一种征收又会是什么?政府机构把自己当作是民宅或公寓的共有人。而在苏联,不必在墙上暗藏一些巧妙的监视器;反正每个公民的住处都会有个密探坐在那里。



如果要从马克思式的观点来评断这些发展，我会说：或许征收的确是现代生产的本质，而社会主义，（如马克思所相信的）是由资本主义开始的，也只是工业社会不可避免的结果。那么问题是，我们要怎么做才能使这个过程受到控制，而不至于以任何名义堕落到东欧国家已遭遇过的畸形恶状中。在某些所谓“共产主义”国家——例如南斯拉夫或甚至东德——他们试图对经济解除控制或去集中化，而且也做了实质的让步，以防止征收过程带来最恐怖的后果，而稍可称幸的是，一旦集中化或对工人的奴役达到某种程度的时候，征收过程在生产方面的作用就会变得非常不如人意。

基本上这是一个财产及权利的问题：在如此不人道的现代经济境况下，我们可以允许一个人拥有多少财产及权利？但没有人能告诉我们，有工人“拥有其工厂”这么一回事。稍加思索便会发现，集体所有权是一个矛盾词组。财产是属于我的东西；所有权在定义上是关联到我所拥有的事物。别人的生产工具当然不属于我，可能是由第三权威所控制，意即它不属任何人所有。最糟糕的所有者是政府，除非它在经济领域的权力是由一个真正独立的司法机构所严格控制。我们今天的问题不是如何去征收征收者，而是如何去安排，使得被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体系中的工业社会剥夺所有权的大众，能够再度获致其财产。仅就这个原因，在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之间二选一这种想法就是错误的——因为在任何地方，两者都不是以纯粹状态存在，更因为它们是一对孪生子，各戴了一顶不同的帽子罢了。

同样的事态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观看——从受压迫者的角度——却也不会使结果好转。这种情况人们一定会说，资本主义摧毁了财产、协会、公会、封建社会的整个结构。它废止了所有保护个人及其财产的集团，而这些集团原先是对个人安定生活——虽非全然安全——的保证。取而代之的是“阶级”；本质上只分为两个——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现在工人阶级——只因为这是一个阶级和集体——仍然为个人提供某种保护；但是之后，当他们学会组织时，便会为自己争取相当多的权利，并固定下来。因此今天主要的区分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尊重这些权利的国家，例如瑞典或美国，和不尊重这些权利的国家，如佛朗哥的西班牙或苏联。

那么纯粹形式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做了些什么？它也摧毁了这个阶级——其组织、联合及劳动党——和阶级的权利——集体谈判、罢工、失业保险、社会安全等的权利。取而代之的是，这体制提供了幻觉，说工厂是工人阶级的财产（而它作为一个阶级早已被废除了），也提供了残忍的谎言，说失业不再存在，而这个谎言的基础无他，正在于失业保险根本不存在。本质上，社会主义只是延续了资本主义开始做的事，甚至更推到极端。它怎么会是一种修正呢？

问：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经常强调，社会主义虽不可造成异化，却总能够通过自身的力量而再生。这种再生的理想范例有捷克斯洛伐克式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

鉴于苏联在军事武器上的增加及苏俄在其他地区的霸权，您如何评断以捷克或南斯拉夫模式为导向的东欧民主社会主义的生机？

答：您所说的第一句话的确令我感到惊讶。称斯大林的统治为“异化”好像一个委婉的说法，不仅将事实，而且连同那些最令人发指的罪行，一起扫到地毯底下。我这么说只是要唤起您的注意：事实已经遭到这个术语多大的扭曲。称某事为“异化”——这不下一种罪行。

至于经济体系或“模型”，如果强权国家不去打扰小国，某个地方总会经实验而及时出现一些什么。至于会是什么，在经济学这样一个依赖实践的领域中，我们当然不能察知。不过，首先会有对于所有权问题的实验。根据我所掌握的非常有限的资料，我会说这已经发生在东德及南斯拉夫，并产生有趣的结果。

东德在原来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建立一种合作体系，这完全不是从社会主义衍生出来的，而且已在丹麦及以色列证明了其价值——因此也使得“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能运作。在南斯拉夫，工厂中有“自营系统”，是旧有“工人议会”(workers' councils)的新翻版，而虽然有列宁要求的“所有权力归于苏维埃”，它出于意外地却从未成为正统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教条的一部分。(工人议会是惟一真正从革命本身而非革命政党或意识形态中发展出来的结果，却已经被布尔什维克无情地摧毁。)

这些试验，没有一个能令人满意地重新界定合法财产，但可能是朝这个方向的起步——东德的合作体是在生产工具及分配上结合了私人所有制和对于联合财产之需要；而工人议会则是提供工作稳定的保障而非财产安全保障。在此二例中，个别工人不再被分子化，而是属于一个新的集体，合作体或工厂的议会是对阶级中的成员地位的一种补偿。

您也问及试验和改革。这和经济体系没什么关系，除了经济体系不应该用来剥夺人民的自由以外——譬如说，让一个异议者或反对人士“失业”，或者说使民生物资不足、生活匮乏，而政府便容易去“购买”所有区域的人民。东欧的人民真正在乎的是自由、民权、法律的保证。因为这是使他们能自由地谈论、书写、出版他们想说的话的必要条件。苏联挥军入侵捷克，不是针对这个新“经济模式”，而是冲着与此相关联的政治改革。它并未侵犯东德，虽然今天东德以及其他卫星国家的人民生活得比苏联人好，甚至和西德人民一样好或终有更好的一天。于是差别“只”在于，一个国家里的人民可以说话，并在一定的范围内做他们喜欢的事，而另一个国家的人民则否。相信我，这对每个人都会造成天大的差别。

只要这些经济试验和自由的斗争相结合，就于涉到苏联的利益，必须加以打击。毫无疑问捷克的情形正是如此。东德则不然，所以它安然无事。在乌布里希(Walter Ulbricht)的统治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经济上的让步越大，在意识形态上就变得越专制。

同时，当苏联害怕哪一个卫星国会脱离华沙公约组织时，它一定会加以打击。在捷克一事上，这种恐惧的确出现，但是否构成入侵的理由我并不知道，但我想是有可能的。另一方面，我不相信苏联会以军队干涉南斯拉夫。它会遭遇到很强大的军事对抗，而今天苏联也应付不了这种对立冲突。它再也不是那么稳居强权之位了。

问：社会主义是当前对于人类社会的未来看法的主流概念，你是否认为有实现的机会？

答：这当然又带出社会主义真正为何的问题。连马克思也几乎不知道要如何具体描绘。

问：容我打岔一下，我的意思是指以捷克或南斯拉夫模式的精神为取向的社会主义。

答：那么你指的是今天称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东西。这个新术语的意思不过是试图消除由社会主义带来的不人道，而不会重新引进所谓的“资

本主义”系统，虽然南斯拉夫明确朝向开放市场经济的倾向很容易，甚至一定会，被苏联以及所有真正相信市场经济的人做如此的解释。

普遍而言，我认为所有愿意去试验的小国家都会有机会，不管他们是否自称为社会主义国家，但强权国家我就很怀疑了。这些群众社会不再能被控制，遑论加以统治。就您所举的捷克及南斯拉夫，它们的模式自然是有机会的。我也愿意纳入罗马尼亚或匈牙利等国家，在那里，革命的结果并不像可能发生在斯大林统治下的那么悲惨，造成全国百分之五十人民的迁移流放。在这些国家中，某些事物是在进行着，他们试图逃离独裁的最坏后果，并独立且切实地解决其经济问题，而想要扭转其改革的努力几乎是不可能的。

还有另一个因素我们必须考虑。苏联及其卫星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并非民族国家，而是由多民族所组成。在每一个国家内，专政权或多或少掌握在主要民族的手中，而如有对立的情形，总是会有变成民族解放运动的可能，苏联尤其如此，俄罗斯独裁者常处于苏联帝国国会瓦解——而不仅是政权转变——的恐惧中。

这种忧心与社会主义无关；它一直是纯粹权力政治的问题。苏联如果不曾担心其内部反对力量的问题——不光是知识分子的反对，也是内部民族潜在的反对——我不认为它会像捷克那样发展。我们不应该忘记在布拉格之春时期，捷克政府对斯洛伐克人做了相当大的让步，而斯洛伐克是最近才在苏联的干涉影响下被取消的。莫斯科害怕各种解除中央集权的企图。新模式对于苏联来说，不仅代表着以更人性的方式处理经济或知识问题，也是对苏联帝国解体的威胁。

问：我想，苏联领导者的恐惧，特别是对知识分子之反对的恐惧，扮演了重要角色。毕竟，今天可以在更广的范围内感受到这种反对力量。甚至在年轻知识分子那方面还有一场民权运动，运用了所有可以取得的合法工具，更别说道还有非法手段去达成，如地下刊物等等。

答：是的，我察觉到了。苏联领导对此当然非常恐惧。如果这个运动的成功扩展到与知识分子有别的人民那里，可能意味着乌克兰人会再度想要拥有自己的国家，一直遭到恶劣对待的鞑靼人等民族亦然。因此苏联的统治者基础比其卫星国的统治者更摇晃不保。但是您也看到，南斯拉夫的铁托害怕的是多民族的问题，而非所谓的“资本主义”。

问：东欧的改革运动——我说的不只是我们多次提到的捷克模式，还有提倡苏联民主化的知识分子的各种出版品，以及其他类似的抗议——它们不管如何调整，都从未提出任何资本主义形式，作为他所批判的系统的替换可能，这您会如何解释？

答：我可以告诉您，这些人和我持有同样的看法，就像社会主义不能矫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也无法补救或替代社会主义。对此我将不再重复。其间的竞争从来不单单是经济方面的。只有在专制政权阻碍经济发展，使它无法像在没有专利限制的条件下发挥生产力时，才牵涉到经济体系。其他部分都是和政治问题有关的：人们想要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立法、何种对言论及出版自由的保护；也就是我们西方国家天真的小孩们所称的“中产阶级的自由”（bourgeois freedom）。

其实并没有下述这种东西：自由就是自由，不管是由“中产阶级”政府或“布尔什维主义”国家的法律所保障的。极权主义政府不尊重公民权而且不保障言论及结社自由的这个事实，并不能导出结论说这种权利及自由是“中

产阶级的”。 “中产阶级的自由”经常错误地被等同于有自由去赚取比一个人实际所需还要多的金钱。因为，这也是东方（指苏联东欧）唯一看重的“自由”，而事实上在东方，一个人可以变得极为富有。贫富的差距——如果我们谈的是一个现实情况而非口号——就收入方面来说，东方国家比其他国家都大，如果先不论少数的超级富翁，则其贫富差距甚至比美国还大。

但这也不是重点。我重复一次，重点仅在于，我是否能谈及出版我所希望说的；我的邻居是不是会监视我。自由总是意味着异议的自由。斯大林及希特勒之前没有一个统治者对于说“是”的自由有争论；而希特勒排拒了犹太人和吉普赛人表达同意的权利，斯大林则是唯一一个剁掉他最热心的支持者脑袋的独裁者——或许他认为，凡是说“是”的人也会说“不”。他们之前没有一个暴君那么过分，而这也是无法赎偿的。

问：对于托玛斯·曼（Thomas Mann）所说的：“反布尔什维主义（antibolshevism）是我们这时代最基本的愚行。”您的看法如何？

答：这个时代有太多荒谬事，你不知道哪个要放在第一位。但严格说来，反布尔什维主义者作为一种理论，一种主义，是反共产主义者的发明。我所指的不是任何先前的布尔什维克或共产主义者，而是那些曾经相信，但某天因为斯大林先生的作为而亲身面临幻灭的人；也就是说，他们并非真的是革命者或真正参与政治的人，而是，就如他们所言，失去了一个神，于是又去寻找新的神，同时也找上其对立面，一个新的魔鬼。他们只是把模式倒转过来。

但是，如果说这些人的心态改变了，他们不再寻找信仰，而是直视现实，将现实纳入考虑，并试图改变事物，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不管是反布尔什维克者宣布东方诸国是魔鬼，或布尔什维克称美国是撒旦，就其思考习惯而言，二者是相同的。心态也仍然一样。只看到黑与白。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如果一个人不知道整个时代的政治光谱，不能明辨不同国家的基本状况、各种发展阶段、传统、生产的种类及等级、技术、心态等等，那么他就不会知道如何在这领域里行动及采取什么态度。如此一来他只能把世界粉碎，最后发现眼前只有一样东西：全黑。

（原载《共和危机》，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蔡佩君译）

## 音乐与政治

### 把音乐献给为自由而生的人们

宋轩

20世纪似乎是指挥家们彪炳乐史的时代，从尼基什、门格尔贝格到富特文格勒、E·克莱伯、克勒姆佩雷尔再到卡拉扬，这些指挥大师们在音乐事业上取得的辉煌业绩，始终是千百万乐迷们争相传颂的佳话。然而在世界更多的人民心目中，指挥大师行列里最响亮的名字无疑只有一个，那就是托斯卡尼尼。托斯卡尼尼崇高的地位，不仅是因为他在自己漫长的音乐生涯中取得了无数他人难以企及的惊人成就——诸如对乐队雷电般强劲的控制力；对节奏、速度和音准无与伦比的敏悟和把握；极富传奇色彩的记忆力；他在浪漫主义艺术思潮统治天下的时代，力劈山岳，创立了忠实于原作的指挥艺术体系；对建立现代演出制度，对振兴和推动意大利歌剧、德国歌剧和南北美洲交响乐事业做出了泽及寰宇的丰功伟绩；他录制的大量唱片对开启音乐现代传播方式的巨大影响……而且更主要的是因为，托斯卡尼尼在自己的一生中，始终无限热爱着世界人民的自由和民主事业，竭尽全力同情和帮助被压迫的人们。特别是在三四十年代，面对着当时不可一世的法西斯主义，托斯卡尼尼不仅没有被其淫威所吓倒，没有被其利诱所征服，相反，法西斯主义的每一次倒行逆施，都更强烈地激起了他为自由和正义事业而生的信念，都促使着他与法西斯主义进行更为顽强的抗争。对于托斯卡尼尼来说，音乐就是他的生命，然而这最宝贵的东西只有为自由而存在的时候，才是有价值 and 真正崇高的。正像在烽火连天的“二战”中，美国的罗斯福总统给托斯卡尼尼的信里所说：“我们本着人道主义和坚定不移地为自由献身的精神，赞赏您在音乐领域作出的极为出色的贡献。您像所有真正的艺术家一样，从自己一生经历中认识到，艺术只有在享有自由的人中间才能繁荣。正因为如此，您常常登上指挥台，为受压迫和受苦难的大众演出。”所以20世纪的文明史上，托斯卡尼尼的名字不仅象征着音乐艺术的奇迹，而且更象征着人类不屈不挠地向往自由、反抗压迫的心声。也许，对于曾经创造了无数神奇乐曲的人类来说，对于有着无限能力而把音乐事业推向空前繁荣的现代文明来说，其余一切美仑美奂的声音都已渐渐不足为奇了，而只有这亿万人共同的心声，才历久弥新，才称得上璀璨音乐殿堂中惟一永恒的圣乐吧。

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1867年生于意大利的帕尔马市，这里历来是歌剧之乡，伟大的意大利作曲家朱塞佩·威尔第就出生在离帕尔马不远的布塞托。与威尔第一样，托斯卡尼尼也出身于平民家庭，这种民族和出身上的一致，使得托斯卡尼尼一生不仅保持着对威尔第较之对于别人更深挚的热爱，而且使他不断从威尔第那热爱自由的精神中得到巨大的滋养。托斯卡尼尼的父亲是个裁缝，终年穷困潦倒，他一生中惟一能为自己骄傲的事，就是年轻时曾经为意大利的统一而参加过加里波第的义勇军。托斯卡尼尼自幼喜爱音乐，然而他的父亲在小托斯卡尼尼年仅9岁的时候就把他送到寄宿的皇家音乐学院，仅仅是因为那里可以让品学兼优的学生免交膳宿费。托斯卡尼尼被硬性分配在大提琴系，在那里度过了孤寂、冷漠、漫长的九年时光。他失去的是童年的欢乐与家庭的温暖，然而凭借自己的天赋和毅力，在大提琴、钢琴、乐理等方面取得了极为优异的成绩，并且养成了顽强坚毅的性格。从青年到

中年，托斯卡尼尼由一个普通的大提琴手一步步奋斗成为意大利最著名的指挥家，他一丝不苟的指挥风格，对威尔第和瓦格纳音乐的深刻理解，统领斯卡拉歌剧院时的辉煌业绩，都使得他声名远播，为世界乐坛所瞩目。关于他那强烈个性和惊人天赋的逸闻，甚至使他成为无数乐迷心中传奇性的人物。

然而，就在托斯卡尼尼迈向世界指挥艺术巅峰的同时，整个人类的命运开始被法西斯主义急剧膨胀着的魔影所笼罩。1919年，墨索里尼成立了“法西斯战斗团”，为了在竞选中争取人们的支持，墨索里尼一度曾标榜自己的纲领是“支持一切有助于更好地恢复个人自由的言行”，并且主张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举行全民选举等等。这些动人的言辞使托斯卡尼尼这个诚实的艺术家一时轻信了政治骗子们廉价的许诺。他甚至怀着对他们的好感而同意让自己作为其组织的候选人，并且把名字紧排在墨索里尼后面。然而，法西斯党在1919年的大选中惨败，这次失败使墨索里尼改变纲领，迅速右转，并最终攫取了国家的最高权力。由此，议会、报纸、学校都成了法西斯的工具，墨索里尼还用特别法庭、监狱和军队对付一切异己的声音。整个国家也掀起了无限崇拜的狂潮：到处回响着对法西斯主义和墨索里尼的颂扬声，到处挂满了墨索里尼的肖像。所有这些使年近六旬的托斯卡尼尼终于认清了法西斯主义的本质，他对墨索里尼也越来越感到憎恶。尽管为了保证斯卡拉歌剧院的正常演出，他暂时还不便公开抨击法西斯主义，但是他坚决反对在斯卡拉歌剧院悬挂墨索里尼像，并且对法西斯分子表示出极大的蔑视。

很快，托斯卡尼尼与法西斯主义和墨索里尼本人的冲突终于爆发：意大利歌剧大师普契尼的天鹅之歌《图兰多特》定于1926年4月25日在斯卡拉歌剧院举行首演，指挥当然是作曲家生前多年的合作者和现在歌剧院的统帅托斯卡尼尼。因为这是当时一次隆重的文化盛典，所以墨索里尼也想出席，他同时提出的要求是，在他入场时，乐队要奏歌颂法西斯的乐曲。而托斯卡尼尼的回答比这要求更干脆：奏歌可以，但首演的指挥必须另请高明。慑于法西斯的淫威，剧院经理和托斯卡尼尼的许多朋友都劝他委曲求全，然而托斯卡尼尼宁肯辞职也寸步不让。最后，墨索里尼只好放弃出席首演的计划。以后，为了捍卫自己的信念与自由，托斯卡尼尼更不惜当面与墨索里尼相抵牾：一次，墨索里尼路过米兰，指名要见托斯卡尼尼。见面后，墨索里尼大谈艺术和政治，随后，他恳切地要求托斯卡尼尼加入法西斯党。然而托斯卡尼尼仍然不为所动，坚决拒绝了强权对艺术的这种“亲切关怀”。随着国内和欧洲法西斯主义的膨胀及其排犹运动等残暴行径的日益肆无忌惮，托斯卡尼尼对之愈发深恶痛绝。他经常痛骂法西斯主义，警告人们这个魔鬼会给世界带来灭顶之灾。他决不讳言自己当初没有看清法西斯真面目这一过失，他对人们说：“我只是在开始时犯过糊涂，现在一想起来就觉得难为情。”

尽管托斯卡尼尼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声望，然而他的这种与法西斯主义决不妥协的态度却使他和家人的生命面临着威胁。1930年，由于两个法西斯首脑要参加托斯卡尼尼指挥的音乐会，剧院方面请托斯卡尼尼同意曲目中加奏两首法西斯颂歌。因为托斯卡尼尼的政治态度尽人皆知，所以他们说明并非要托斯卡尼尼自己指挥这两首曲子，而是由首席小提琴手代劳。没想到托斯卡尼尼怒不可遏地大吼：“不行！”同时愤怒地把大衣和帽子摔在地上。得知此情后，法西斯首脑当然无法出席音乐会，然而当晚，在托斯卡尼尼正要走进歌剧院时，一群法西斯分子围住了他，对他肆意谩骂殴打。随后，法西斯分子又在米兰市中心举行游行，大肆谩骂托斯卡尼尼。

从此，托斯卡尼尼和他的家人几乎完全生活在法西斯专政的威胁之下。他的名字上了警察局的黑名单，全家的护照被吊销，电话被日夜监听，法西斯的报纸假借人民的名义对他口诛笔伐，咒骂他：“认为演奏颂歌会亵渎艺术，这是对法西斯党员和意大利人们纯洁良心的污辱。”然而这一切并不能使托斯卡尼尼屈服，他说：“我宁愿抛弃一切，但我要自由地呼吸。在这里你必须与墨索里尼一致，可是我永远也不会和他想到一块儿去，永远也不会！”

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之中，音乐活动日益成为托斯卡尼尼表明自己政治态度和支持法西斯受难者的方式，例如，尽管托斯卡尼尼曾经在德国拜罗伊特音乐节的瓦格纳作品演奏中取得过巨大的成功，但在1933年纳粹在德国上台后，他就拒绝再到德国指挥，他还和其他指挥家联名致电抗议希特勒迫害犹太人。同样，他在奥地利萨尔茨堡音乐节的指挥虽然曾经轰动乐坛，但是他却拒绝音乐节在1937年对他的再度邀请，原因是在该次音乐节中，犹太裔指挥大师瓦尔特的演出遭到排挤。1938年，从德国逃到巴勒斯坦的一批犹太音乐家在著名小提琴家胡贝尔曼领导下成立了巴勒斯坦交响乐团（现在的以色列交响乐团的前身）。胡贝尔曼邀请托斯卡尼尼担任乐团历史性首演的指挥，托斯卡尼尼毫不犹豫地接受邀请，并在1938~1939年间担任该团指挥，以表示他对正在遭受法西斯迫害的犹太民族的深切同情。与此同时，他对亲法西斯和亲纳粹的音乐家们越来越表示蔑视，他与同时代另一位最著名指挥家、纳粹帝国的音乐副总监富特文格勒的决裂就是典型的例子，他甚至说：“在作为音乐家的富特文格勒面前，我愿意脱帽致敬；但是，在作为普通人的富特文格勒面前，我要戴上两顶帽子。”

1939年，面对墨索里尼追随希特勒疯狂地迫害犹太人，托斯卡尼尼也更激烈地抨击法西斯的暴行。这当然只能招致对他更严酷的迫害，意大利的各大报刊展开了对他的围攻，法西斯分子甚至公开扬言，应该将托斯卡尼尼抓起来枪毙，托斯卡尼尼的住宅也处于警察的日夜监视之中。乌云压城的形势迫使托斯卡尼尼不得不离开自己心爱的祖国，远赴美国，这时他已是72岁的老人了。不久，希特勒进攻波兰，“二战”爆发。

战争期间，托斯卡尼尼除了进行繁忙的音乐演出以外，仍然一直尽全力支持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他举行义演，购买公债，和其他政治避难者联名发表支持美国征服的声明，尽力帮助流亡的意大利反法西斯人士……所以，正像其他音乐家给他的信中所说：“您不仅是最受欢迎的、具有世界声誉的、令人望尘莫及的音乐家，而且也是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英雄。”托斯卡尼尼的名字甚至成了抗击法西斯、取得反法西斯胜利的象征：1943年7月23日，墨索里尼倒台，意大利斯卡拉歌剧院的海报栏里立即出现了大幅标语：“托斯卡尼尼万岁！”“托斯卡尼尼，您快回来！”1946年5月，米兰解放一周年之际，斯卡拉歌剧院恢复演出，也就是在这盛大的庆典上，意大利听众以暴风雨般的掌声迎接他们民族和世界正义艺术家的骄傲，年已80岁的托斯卡尼尼重新登上斯卡拉歌剧院的指挥台，这掌声饱含了人民对一位艺术家正直、顽强、热爱自由不畏强权品格的敬仰。

作为对音乐、对人类的心声有着最深刻彻悟的指挥大师，托斯卡尼尼当然把自己的人格精神和对世界命运的理解融注在音乐中。比如托斯卡尼尼在美国统领著名的NBC乐团时，正是他与世界人民一道不屈不挠地与法西斯抗争的时候，所以即使是今天的人们，仍然可以从他那时的录音中感受到他音

乐中钢铁一样坚定的毅力和贝多芬式的英雄气概。他创造出的那极为质朴又极为果断、极为雄浑的音响（在曲目上，他也始终喜爱明朗、有血有肉的作品，而较少涉及晦涩、自我感伤的作品），几乎就是他品格和信念的写照。这正好与富特文格勒在努力营造丰满的弦乐时表现出的犹豫的节拍和频繁不定的速度变化、每次指挥时的紧张和很少自信，以及他在政治、人格问题上的态度形成对比。1936年，瓦格纳的孙女菲丽德琳亲眼目睹了富特文格勒与希特勒在音乐圣地拜罗伊特的一次会晤。会晤中希特勒要富特文格勒接受纳粹的指挥，帮助做些宣传。希特勒的要求被富特文格勒拒绝，这使他勃然大怒，并威胁这位艺术大师：如果执迷不悟，下场可能是被送进集中营。这时，富特文格勒沉默了一会儿，回答道：“如果那样的话，帝国总理先生，我会好好合作的。”于是，富特文格勒与这魔鬼的合作一直持续到1945年，其中包括在纳粹党大会和希特勒生日庆典上指挥演奏。直到晚年，富特文格勒不仅依然负着纳粹分子的恶名而为世人诟病，得不到托斯卡尼尼在内的许多艺术家的原谅（战后，托斯卡尼尼仍然坚决拒绝重返萨尔斯堡音乐节与富特文格勒、卡拉扬等曾为纳粹效力的音乐家合作），而且在内心对自己的这段历史感到深深的愧疚。

作为一位出身贫寒，完全依靠自己不懈奋斗而取得辉煌成就的大师，托斯卡尼尼一生始终保持着对音乐极为质朴而深挚的情感。在他的心目中，音乐是神圣的，任何人都不能凭借地位而亵渎音乐的尊严。在他接管斯卡拉歌剧院之前，这里是贵族绅士们消闲的场所，他们在剧院与女明星调笑，在包厢里吃喝闲聊。为了取悦于他们，音乐家必须随时改变作品的面目，重复演唱某些段落以博得他们的喝彩（这似乎与京剧传统的演出方式相近）。而在他执棒以后，所有这些旧习都被严厉地禁止，为此，托斯卡尼尼被某些贵族绅士骂为疯子和乡下佬。同样，他也决不允许乐手用漫不经心的演奏敷衍听众，他要求乐手每一次演奏都要像首演一样全力以赴。托斯卡尼尼对乐队的严厉粗暴是举世闻名的，然而正是因为他的这种态度并不是为了个人的权威，而是出于对不能将音乐尽善尽美表现出来的不可容忍，所以乐队总是善意地理解了这位可怕的“雷神”，并不断在他的磨砺下取得极大的进步。出于对音乐的挚诚，托斯卡尼尼有时甚至不能容忍自己，每当他不能将意图清晰顺利地传达给乐队的时候，他同样会暴躁地砸东西，大骂“可耻”、“白痴”。与许多自觉不自觉地取悦于听众的音乐大师（从李斯特到卡拉扬，似乎都有这种心理）不同，托斯卡尼尼讨厌掌声，他认为人们对指挥家、演奏家的崇拜会使他们忽视作曲家和原作的伟大。他觉得一部作品永远属于原作者，决不会因为有人重新诠释了它就从此换了爸爸。而他对待音乐的所有这些态度，又似乎都是与他在人生和政治上的真挚坦诚、疾恶如仇一脉相通。托斯卡尼尼的生活观似乎很难融入喧嚣的商业社会，他不通人情世故，不喜欢上层社会的周旋应酬。一直到晚年，他的饮食仍然简单得一如农民。他自认为与威尔第一样，都有着农民的性格。同他在音乐上与现代派作品的格格不入相似，他在生活上的态度似乎也显得保守固执。然而这却也正是他在人格和艺术上表里相同、一以贯之的表现。瓦格纳曾认为，李斯特固然使无数听众拜倒在他神乎其神的钢琴技艺面前，但是在更深的精神层面，他却成了听众的奴隶：“如果他不是一个名人，如果人们不是让他出了名，他可能而且应该是一个自由的艺术家，而不至沦为听众中最愚蠢的人们——专捧技巧的听众的奴隶，这种听众不惜任何代价地向他索取惊人的表演和愚蠢的把



戏。他给了他们所要的。”其实，又何止音乐的风尚是如此呢？现代文明在造就了艺术空前繁荣的同时，也把许多艺术家的灵魂赶进了交易所；现代社会多元选择的自由在使人们摆脱了昔日束缚的同时，也使得艺术与人格的分离更加容易。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托斯卡尼尼的人生和艺术道路固然已经难以为今人完全效法，但是，其中蕴涵的不为时俗所动的人格精神，却始终给人以深深的启迪。

（《爱乐》总第7期）

## 城外书讯

### 《一个国家的新生：俄罗斯剖析》

〔英〕J·劳埃德 著

一个过时政权最后的日子是在世时的最好时光。如果你是戈尔巴乔夫时代驻莫斯科的一名外国记者，每一天都令你激动。劳埃德及时地从莫斯科进行报道，对苏联的崩溃作出引人注目的评论。

许多评述后苏联事件的评论家都把这些事件当作自由与盗匪之间的争斗。站在一方面的是自由市场和民主制度的年轻英雄——丘巴斯、盖达尔、亚夫林斯基。他们半秘密地阅读奥地利裔英籍经济学家哈耶克的自由市场信条，希望就像自己的父辈曾经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解决办法那样，直截了当地应用这些信条。

站在另一方面的是“恶棍”——“黑手党”、日里诺夫斯基、列别德将军、前共产党人。劳埃德知道，情况更复杂得多：他似乎有点回头看，喜欢戈尔巴乔夫的世界，那时有无法无天，但也有秩序。他甚至赞同地写到戈尔巴乔夫可悲地努力重新开始其政治生涯，结果只获得比例微不足道的选票。而且，他竟然赞同地写到谢瓦尔德纳泽，尽管在谢瓦尔德纳泽统治下的格鲁吉亚不是一个可爱的地方。

劳埃德在其著作的开头描述了新俄罗斯的政治，并用他的笔描绘了盖达尔和亚夫林斯基一派的人。他本人认识这些人，这是十分有价值的。

然而，政治不是劳埃德的强项：他看来不完全懂得，何种东西是叶利钦有而戈尔巴乔夫没有的。

然而，由于劳埃德了解马克思主义心理，在论及政治活动幕后的权力因素时，他就显得成熟多了。该书最好的章节是有关经济的章节。这是一本非常有用的书，但也是一本令人十分压抑的书，因为它使你对后苏联的经济有非常透彻的了解。

## 施特劳斯：向极权者妥协

〔英〕大卫·尼斯 刘瑞芬译

1933年7月1日，另一片黑云又笼罩施特劳斯的生命。那年年初，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被任命为德国首相，一个月之后，他所带领的国家社会党（National Socialist Party）就掌控一切。这个新的执政党向人民强调，他们将致力于稳定经济，大幅改善失业状况（这和原来的魏玛共和国大举迈向恐怖与灾难的情况正好形成强烈的对比），再加上他们还将矛头指向长久以来承受欧洲人不满情绪的代罪羔羊犹太人，令许多德国人民认为，这个新的执政党的确可以为千疮百孔的德国疗伤止痛。然而文化自由几乎立即受到干涉，首先证明了现实的残酷与可怕。布许和歌剧制作人罗伊克（Alfred Reucker）被迫离开他们在德勒斯登所担任的职位，虽然施特劳斯一再坚持：没有了他们两个，他就不做《阿拉贝拉》这出戏，可是他受合约所限，到最后也无能为力。于是《阿拉贝拉》一剧就在布许离去的情况下，由克劳斯领头完成，这是施特劳斯第一次在心不甘情不愿的情况下向新政权妥协。

以往每当施特劳斯的音乐创作受到政治情势影响时，他总是十分谨慎留神，在表面上随便敷衍一番以安然度过危机。他就像以皇帝胸口为家的毒蛇一般，以某些容易消化的军队进行曲和针对特殊场合而写的作品来满足那些政客的胃口，使他们不致受到《火荒》和《莎乐美》的惊吓；这回在希特勒的政权统治下，他一定也以为自己可以如法炮制，渡过难关。施特劳斯在1934年为恶名昭彰的1936年奥林匹克运动会谱写的奥林匹克颂歌（Olympische Hymne），虽然旨在宣扬民族主义，令人在事后看来无法苟同，但是对施特劳斯个人而言，这首乐曲就像他在1909年为圣约翰骑士庆典所写的气势磅礴、节奏僵硬的《节庆开始》（Feierlicher Einzug）进行曲一般，只是用来应景，并没有什么其他的意义，就连他在不久之前为维也纳创作的军号乐曲，也是属于此一性质的作品。至少在1933年时，施特劳斯并不是惟一不受外界影响，对前途仍然抱持乐观看法的人。奥地利小说家、传记家兼剧作家茨威格（Stefan Zweig）就曾在他自己的传记《昨日世界》（The World of Yesterday）中，说明了当时的德国虽然自许为文明进化，但是只有极少数的德国人洞见未来可能会发生些什么样的事情：

一个人无法在短短的几个星期之内，就把自己对这个世界累积了三十年甚至四十年的深切信仰轻易抹去。我们根深蒂固的正义观念告诉我们，德国、欧洲、世界必有其良心，因此我们也深信，由于人类的善性，所有的野性罪恶自有其限度，到最后一定会自取灭亡，永不复返。既然我希望在此尽力说明事情的真相，那我就必须承认，在1933年，甚至到1934年时，无论是德国或奥地利，都没有人想像得到，几个星期之后将发生在我们身上的那些事情的百分之一或是千分之一。

施特劳斯当年为纳粹“奉献心力”的经历一直令他饱受批评（以色列至今仍禁止演奏他的作品），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他和纳粹有所往来，他新找来的犹太剧作家茨威格才能享有短暂的安全，安心从事艺术创作。对纳粹而言，施特劳斯是重要的象征性人物，因此在这个阶段，他们完全不干涉施特劳斯和各种人物交往，即使这些人当中包含像茨威格这样令他们憎恶的非亚利安人。

茨威格通过出版商吉本伯格（Anton Kippenburg）的介绍认识施特劳斯。

在维也纳的时候，茨威格就和许多音乐界的人士十分熟稔，像是雷格（Max Reger）与布梭尼（Ferruccio Busoni）等人都和他有来往。他和弗洛伊德与霍夫曼斯塔耳同样受到维也纳人道主义传统的影响，因此，他的作品当中总是充满了对道德价值的关怀。当他向施特劳斯提议，想彻底改编班·强生（Ben Jonson）的喜剧 *Epicoene*，或称《沉默的女人》（*The Silent Woman*），施特劳斯明白，他的改编一定能够切合自己的需要，让自己完成一出情感丰富的讽刺剧，因此施特劳斯毫不犹豫地立刻答应了。

由于施特劳斯似乎在 1933 年时给了纳粹很多的协助，因此茨威格对于施特劳斯随和热切的态度感到很奇怪。在这段期间，施特劳斯曾两度拔刀相助，担任指挥：一次是 3 月在柏林爱乐的音乐会，当时有人建议具犹太血统的原指挥布鲁诺·华尔特暂时回避；另一次是 8 月在拜鲁特指挥演出《帕西法尔》，这次是因为原指挥托斯卡尼尼拒绝继续担任指挥。根据施特劳斯单纯的解释，他之所以会在这两次音乐会上担任指挥，都是因为在他心目中，音乐演出的考虑重于政治利益的缘故。只是他这个说法却无法用来解释，他的签名为什么会出现在歇斯底里、宣示流放艺术家的宣言上。这些人士中，像托马斯·曼和亨德密特等人在私底下和施特劳斯都很熟悉。11 月 15 日，执掌纳粹文化政策的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未事先征得施特劳斯的同意，就任命他为帝国音乐协会（Reichsmusikkammer）的主席，施特劳斯后来曾用十分明显的鄙夷语气向茨威格形容，这个职位是“惹人烦的荣誉头衔”，不过他并没有费力去拒绝这项称谓，毕竟这和他在皇帝手下工作的地位没有什么两样。事实上，施特劳斯表面上这么顺从，还有一些私人的原因，除了为保障他的新歌剧和与他共事的剧作家安全无虞之外，他的媳妇爱丽丝（Alice）——法兰兹已在 1924 年 1 月 15 日和她成婚——和茨威格一样，也是个犹太人，连带他的两个孙儿克利思钦（Christian）和理查（Richard），也都具有一半的犹太血统。1938 年纳粹大举屠杀犹太人的惨剧所造成的不明威胁，以及“最后的解决”（Final Solution），此刻已然隐隐飘荡在风中。

1930 年代初期，施特劳斯和茨威格合作的《寡言的女人》，无论是剧本或乐章都顺利出版，施特劳斯更把自己 1934 年和哥柏尔斯的会面，视为官方对这部作品正式认可与保护的承诺。尽管如此，当时许多人对于施特劳斯和茨威格的交往仍然不太谅解，认为他因此“败坏自己的名声”。《寡言的女人》这出歌剧原定 1935 年 6 月 24 日在德勒斯登进行首演，可是在演出的前两天，施特劳斯发现节目单上漏印了茨威格的名字，他暴跳如雷，坚持一定要把他的名字重新加上去；后来茨威格的名字是加回去了，不过德勒斯登的音乐总监保罗·阿道夫（Paul Adolph）也因此丢掉了他的工作。这次歌剧演出由 41 岁的奥地利指挥卡尔·贝姆负责指挥的工作，担纲演出阿敏达的，则是后来以演出施特劳斯剧中角色闻名的另一位女高音赛波妲莉（Maria Cebotari），整个演出可说是相当成功。在这次演出之后，这出歌剧又上演了第二次、第三次，甚至第四次，直到纳粹颁布禁令，整整十年都不准这出歌剧再搬上舞台。1935 年 6 月 17 日，施特劳斯写了一封信给茨威格，在信中他痛斥茨威格那种“犹太人的牛脾气”，说他自己已经牺牲许多原有的艺术信念，向纳粹政权低头妥协，同时他还过分坦白地吐露出自己对这些妥协让步的想法：

你以为我在那一次的单一行动中曾经认真地提醒过自己说“我是日耳曼人（Germanic）”吗？（也许吧，谁知道）你以为莫扎特在作曲的时候会口口声声地告诉自

己说“我是亚利安人”吗？对我而言，世界上只有两种人：有天分的人和没有天分的人；一般人只有在变成听众的时候，我才感觉得到他们的存在。

不过这封信在半途被人拦截，7月6日那天，两名纳粹官员来到嘉美别墅，拿出那封出言不逊的信件，要求施特劳斯辞去主席一职。直到此刻，施特劳斯才开始明白，政治势力对一个小小音乐家的迫害，可以严重到这种地步。施特劳斯很少感到害怕，不过这一刻，他倒是真的绝望了。这个心中充满恐惧的老人于是写了一封极尽谦卑之能事的道歉函给领导人希特勒，说明他自己一向是如何地鞠躬尽瘁，为神圣的德国艺术奉献心力。在私底下，他只能尽力设法挽救自己的作品，借以排解心中的困惑。他在六年中连续失去了两位文采诗情足以启发他创作灵感的合作对象，他甚至怀疑，自己还能不能再找到另一个合适的人选；现在想再和茨威格合作，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过去几个月以来，茨威格一直在敦促他，叫他尽快设法找一个合适的人选来接替他的工作，如今施特劳斯也只有接受这个建议，忘却外来的一切干扰，尽情投身于他所熟知的惟一世界。

（摘自《理查·施特劳斯》，台湾智库股份有限公司出版。题目系编者所加。）

## 从理查·施特劳斯说起

陆建德

米兰·昆德拉在一部近作中说，人在历史的迷雾中行走，他看得清对话者的面容，也能欣赏路边树木的婆娑之姿，甚至观察得到近旁发生的事并作出反应，稍远一点的事物他就看不真切了，四五十米以外的地方更是白茫茫一片。但是后人隔了时间的距离回顾某一时期，洞若观火，先人行进的道路以及他们的错误清晰地呈现于眼前。这时往往有人用热情简单的道德语言责难走了歪路或在一路上磕磕撞撞的前辈，他们完全忘记了当时存在的浓雾。昆德拉把那类热衷于谴责的文字称为“问罪学”。

最近读了两篇音乐笔记（《死与净化》和《触摸勋伯格》，载于1996年7月29日和30日的《文汇报》笔会专栏），想到昆德拉所说的“问罪学”。笔记作者告诫我们，千万不能宽恕德国音乐家理查·施特劳斯在历史上的过失，因为他居然于1933年接受了新上台的纳粹政府的聘请，出任国家音乐局局长之职。这罪恶的红字是永远擦拭不掉的：“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70岁的理查·施特劳斯从敞开的狗洞里爬出来。”作者的义愤以及他表达义愤的有趣方式由此可见一斑。我们还被告知施特劳斯随声附和当局的反犹排犹的政策，“阉割了艺术家的良心”。至于他的作品，“1938年创作（原文如此）的歌剧《和平日》被希特勒嘉许，1945年为管弦乐（原文如此）而作的《变形曲》，被普遍认为是为希特勒创作的挽歌。有这两部作品，足以让理查·施特劳斯终生抬不起头来。”坏人的丑恶要用好人的嘉言懿行来彰显，而好人则是非勋伯格莫属。笔记作者对这位犹太裔作曲家的作品所知甚少（“偶尔听到的几支乐曲，也并不那么喜欢”），对他在音乐上的独特贡献也缺乏兴趣（“我从不把勋伯格当成什么十二音体系写作法的奠基人，现代派无调性音乐的革新家”）。他钦佩勋伯格“有骨气有血性”，称他于二战后在美国创作的《一个华沙的幸存者》和《近代诗篇》都是揭露纳粹罪行之作，“强烈地显示出自己与法西斯不共戴天的仇恨和旗帜鲜明的立场”，这两部作者从来没有听过的作品竟使他“充满着激情的想像和崇高的敬意”。看来勋伯格的音乐因为题材正确就得到“高歌击筑、碧血溅花”的夸奖，而施特劳斯在纳粹当政时人格低下，他的作品也是“摇尾乞怜、昧心媚世”。

笔者不谙音律，自量这方面没有置喙的资格。上述两篇音乐笔记所以引起我注意一是因为有些叙述与史实大有出入，二是因为那种感情喷涌、铿锵有力的大字报声讨风格。外行不怕出丑，我倒愿意就施特劳斯的历史污点略陈管见，以就教于《爱乐》读者。

我们不妨从施特劳斯的“反犹立场”谈起。反犹主义产生于复杂的宗教、文化和经济的原因，在欧洲有悠久的历史。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里塑造了一个贪得无厌的犹太高利贷者夏洛克的形象，为此莎士比亚现在被有些人称为反犹主义者，而《威尼斯商人》在有的地方禁止上演。但是在莎士比亚的时代，对犹太人的偏见相当普遍，在欧洲多数国家，犹太人没有法律上的平等地位。这位生活于十六七世纪的伟大剧作家缺乏20世纪的政治觉悟，就好像我们无法以几世纪以后人类的眼光来看待世界，确实是令人痛心的。瓦格纳大概是艺术上反犹主义的先锋，他在1850年写了《音乐中的犹太人》一文。瓦格纳对家道殷富的门德尔松、梅耶贝尔等犹太裔音乐家可能抱有妒

忌之心，他一方面想摧毁一个金钱万能的腐败社会，一方面又梦想着德国的统一和民族文化的兴起，因而他的反犹主义背后还有纷繁的、一时难以概述的哲学、美学和社会思想的头绪。德国音乐家亚历山大·里特尔(1833~1896)是瓦格纳和叔本华的狂热追随者，这位极富感染力的人物也有仇犹的恶习，年轻的施特劳斯一度曾在他的影响下认识到李斯特和瓦格纳的“新音乐”的美学意义。本世纪初，奥地利作家奥托·魏明格的《性和性格》一书把欧洲的种族歧视和反犹主义推向高潮。魏明格本人就是犹太人，他对自己同胞的所谓特质主义和寄生虫生活作了最猛烈、最荒唐的批判。该书出版那年(1903)，年仅23岁的魏明格据说就出于无法纾解的自我憎恶而自杀。在《性和性格》的热心读者中有不少大作家，包括犹太裔的维特根斯坦和卡夫卡等人。一战以后的德国经历了颠危困厄，内忧外患，已有深厚社会基础的反犹主义如毒草般生长，很多德国人把民族痛苦的根源归结于他们错误地认为“不道德的”犹太生活方式。当时的反犹主义流布极广，在整个欧洲文化界和社会基层都有程度不同的反映。纳粹德国政府把它当作一条国策，对犹太人的迫害揭开了血腥的一幕。不过在30年代，犹太复国主义者与纳粹分子接触颇频繁，党卫军还教犹太人如何耕作。但是有反犹倾向的人对当局的种族政策的残酷性一无所知。纳粹对犹太民族犯下的罪行一直到二战结束后才充分暴露。当然在史学界有些问题至今尚不明朗，如德国有没有自始至终联贯一致的灭犹计划？何时何人下令有系统地屠杀集中营里的犹太人？下层军官因军事败局不惜手段，他们应负什么责任？（参看《通向奥斯维辛的曲折之路》）

1933年的施特劳斯像绝大多数德国人一样，没有挺身而出呵斥政府排犹反犹的措施。那年他先后顶替瓦尔特和托斯卡尼尼（顺便说一句，托斯卡尼尼未见得就是一位完美的英雄）。指挥音乐会，有人对此激烈批评，有人对他的难处和用心表示理解，但这种妥协之举毕竟不是壮夫所乐为。从施特劳斯的生平经历来看，他并没有强烈的、排他性的“亚利安”意识。他的媳妇艾丽斯（施特劳斯遗稿保管人）是犹太人，据她回忆，二战期间施特劳斯曾徒然地试图去集中营探望她外婆。施特劳斯有两位杰出的歌剧词作者：霍夫曼斯塔和茨威格，前者有一半犹太血统，后者则是百分之百的犹太人。1935年，施特劳斯为了让他和茨威格合作的歌剧《沉默的女人》得以上演，与当局最高层据理力争。首演前两天，他偶然间注意到歌剧广告上没有茨威格的名字，十分气愤，剧院方面不得不遵命将台本作者的名字补上，在纳粹德国为一位犹太作家争取到这点小小的权利需要可观的勇气。还在首演前一个多月，茨威格就出于种种考虑建议施特劳斯日后在歌剧创作上与另一位奥地利作家约瑟夫·格雷戈尔共事，施特劳斯闻讯后情绪激动，他在给他招来不少麻烦的那封著名的信（1935年6月17日）里责怪茨威格的“固执”。他再一次申明自己根本不同意“亚利安人”的宣传：难道莫扎特是作为一个“亚利安人”来从事音乐创作的吗？施特劳斯写道，他不在乎歌剧院里的听众是来自中国还是新西兰，对他来说，人只有有才与无才之分（我们不会忘记他如何提携犹太裔的勋伯格）。想不到这封信茨威格从未收到，盖世太保把它截获后将影印件交送希特勒，后果不难逆料。7月6日，当局责令施特劳斯以年老体弱为由辞去音乐局局长之职，施特劳斯立即提出辞呈。显然，他是因为自己的见解有悖于纳粹的反犹原则而被解职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人们认清了德国称霸全球的野心。但是在二三

十年代，当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德国兴起的时候，它的危害性并非人人都能预见，就连丘吉尔还长期与墨索里尼通信。（德国的高效率赢得一些英美人士的赞赏，如现在风靡一时的管理学创始者、美国人詹姆斯·伯南，对效率的崇拜依然是当今世上一个令人不解的景观。）我们或许还应意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仅是因为个别恶人的捣乱所致，它是列强争霸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延续。一战绝不是什么善恶之战，战胜的法英都企图乘机大捞一票（“掏空德国人的腰包”）。用列宁的话来说，“凡尔赛条约不过是强盗和掠夺者的条约。……是一个高利贷者的和约，刽子手的和约，屠夫的和约……这不是和约，而是拿着钢刀的强盗逼迫手无寸铁的受难者接受的条件。”法国的福熙将军有先见之明，他曾感叹：“这不是和平，这是20年的休战。”历史演进的方向，不幸被他言中。希特勒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产物，英法等国都曾以无耻的贪婪为产生希特勒的土壤添加肥料。不过在希特勒上台后，一般百姓不知道他将把德国引向何处，他们中不少人还对“元首”高呼万岁。施特劳斯出任音乐局局长之职是他的重大失误，他是不是想通过妥协来为德国音乐界在困境中维护其应有的地位和尊严？当时的欧洲音乐界似乎并没有同声责备他的糊涂或卑鄙。1934年施特劳斯被推举为设在法国的国际作曲家合作促进委员会主席；1936年11月他率德累斯顿歌剧院访问伦敦。英国的皇家音乐协会向他颁发声望卓著的金质奖章，以表彰他对音乐的贡献，难道有关组织都为纳粹分子所把持吗？

再来看一看据称给施特劳斯带来永久耻辱的《和平日》和《变形曲》的诞生过程。早在1934年的萨尔茨堡音乐节上，茨威格就向施特劳斯提议创作一部以结束30年战争（1618~1648年以德意志为主战场的战争）的威斯特发里亚和约为背景的歌剧。茨威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和罗曼·罗兰一起以和平主义立场著称，30年代的欧洲波谲云诡，和平的主题依然萦绕于他心头，他想通过这出新歌剧来歌颂各民族在战后的谅解精神。为了突出和约签订的时间，他最初为歌剧拟定的剧名是《1648年10月24日》。施特劳斯身为音乐局主管，对政治一直不甚关心。从他与茨威格的通信来看，他希望茨威格在剧情说明里添加一点爱情内容以增强“精神冲突”的气氛。由于两人在1935年中断了合作，这部易名为《和平日》的台本由格雷戈尔完成。施特劳斯屡有不满，茨威格不得已应命作了一些小小的修改。施特劳斯在1935年10月31日致茨威格的信里抱怨：“这整个主题毕竟是有点平庸的——士兵、战争、饥荒、中世纪式的英雄主义、同归于尽——这不合我的胃口。”《和平日》于1936年1月创作完毕，1938年7月在慕尼黑首演。该剧不久在维也纳演出时希特勒出席，并在演出后举办招待会（还炫耀了一点他的音乐知识）。希特勒的出现无形中使《和平日》成了他向全世界施放和平烟幕弹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该剧的酝酿过程清楚地表明，茨威格和施特劳斯当初绝对无意用它来为纳粹政治服务。受过希特勒嘉许或利用的作家（作品）为数众多，如果我们把他们一概打入另册，歌德和席勒也将遭殃，更不必说瓦格纳和尼采！我以为在文学艺术领域不必遵循这条最无原则性的原则：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同时我们也不必为了显示自己的正确政治立场而坚称，纳粹德国的音乐界百花凋零、万马齐喑，那时创作的作品都是一堆法西斯噪音。

譬如说施特劳斯的《变形曲》。1943年10月，慕尼黑国家歌剧院受到盟军飞机的轰炸，施特劳斯心情恶劣，提笔谱曲，取名“向慕尼黑致哀”。



那首曲子施特劳斯未能一气呵成，开了个头就难以为继。1945年3月13日至14日英美对德累斯顿实施炮火轰炸，一座举世闻名的文化城市顿时变为一片废墟，造成了十几万平民死伤。这次大规模空袭并无军事意义，其目的是摧毁德国人的心理防线，给德国的文化骄傲感以致命的一击，同时又不让正在急速西进的苏联红军占得太多便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德累斯顿的狂轰滥炸招致了很多批评。在当今的英美史学界，谁为德累斯顿的毁灭喝彩叫好？作为德国音乐文化的代表人物，施特劳斯的悲痛可想而知：维也纳、柏林、慕尼黑和德累斯顿的歌剧院都被炸毁，昔日德国和奥地利的音乐荣耀如今在焦黑的断垣残壁中气息奄奄。他在致格雷戈尔的信中凄然写道：

我也是处于绝望之中！歌德纪念馆，世界上最伟大的圣殿，被摧毁了！我美丽的德累斯顿——魏玛——慕尼黑，全毁了！

一个伟大的文化由于来自其自身和外部的原因竟遭到如此惨烈的结局，耄耋之年的施特劳斯要为一度辉煌灿烂的德国音乐传统送葬。于是他想起了那已被搁置一年多的乐稿。从1945年3月13日开始，他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谱写了为23把提琴而作的《变形曲》，在乐稿的结尾处他用拉丁文写了“哀悼”两字。他在谱曲的时候，引录了贝多芬《第三交响曲》（英雄）、第三乐章的葬礼进行曲主题，他说当时那些音符自然而然地从他的笔端流泻而出。施特劳斯对祖国文化的挚爱曾被误认为向纳粹首领表忠。1947年11月，一家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报纸无端指责《变形曲》是为追思希特勒而作，遗憾的是我国的《外国音乐辞典》（1989）照搬了这说法，同时又说明“《变形曲》的音乐可能只是表现为对他所热爱的德国遭到毁坏而感到的悲痛”。

据《理查·施特劳斯：生平与作品评析》一书作者英国音乐家诺曼·戴尔·马分析，这部作品的主题并未经过“变形”处理，它更像交响曲的展开，因此不必从音乐形式来理解“变形”的意义。戴尔·马指出，在战争的最后几年施特劳斯常从一套装帧精美的歌德全集里寻求精神的慰藉，他在《变形曲》的草稿边上誊录了歌德格言诗里一些富有内省性质的诗行，另外歌德曾在晚期的两首诗的题目中用过“变形”一词，有理由推断《变形曲》的名字可能是受到歌德诗歌的启发（见该书康奈尔大学1986年版，第3卷，第425～431页）。不管音乐研究者对这部作品作怎样的诠释，它的地位已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著名美国文论家、《东方主义》作者爱德华·萨伊德在他的《音乐遐想》一书（1991）给予《变形曲》极高的评价：施特劳斯的艺术不以作者权力或社会权威取胜，他邀请听众一同经历带有伦理色彩的音乐感受。

施特劳斯夫妇于1945年秋获准离开德国，开始了长达三年半的寄居瑞士旅馆的生涯。1947年10月，施特劳斯应邀前往伦敦参加施特劳斯音乐节，以83岁的高龄指挥皇家爱乐乐团和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演奏他自己的作品。当时有记者问他今后的打算，他简要地说，“哦，打算死。”这与其说是向素不相识者表明心迹，不如说是巧妙地打发好事者的盘问。1948年6月，德国加米希地方的清算纳粹法庭在施特劳斯缺席的情况下宣布他没有参与第三帝国的罪行。其实英美方面从来没有想勒令这位曾被纳粹利用的音乐家跪在地上作痛哭流涕的检讨。施特劳斯夫妇于1949年5月10日回到巴伐利亚的加米希，受到热情的欢迎。一个月后，巴伐利亚州为他举办隆重的祝寿仪式，加米希授予他名誉市民的称号，慕尼黑大学向他颁发名誉法学博士学位，慕尼黑市设立施特劳斯基基金会，准备重新振兴当地的音乐生活。1949年9月8日，施特劳斯在巴伐利亚的故土逝世，四天后慕尼黑为他出殡，乔治·索

尔蒂指挥慕尼黑国家歌剧院乐队奏起了《英雄交响曲》的第二乐章。谁说他死时落寞孤寂？这位“我们时代最伟大的音乐家”（格伦·古尔德 1962 年如是说）应该得到这哀荣。

音乐评论里可以来一点“知人论世”，但如果“知人论世”为庸俗政治学或道德学打开大门，音乐就被“愤怒与喧嚣”盖过了。两篇音乐笔记的作者扬勋（伯格）抑施（特劳斯）的手法让人感到他眼里天下一切差别就在人狗（妖）之间、黑白之间、善恶之间，这种天真烂漫的“好人坏人”的语言实在是令人惊讶的。他让自己屈服于诗人托·斯·艾略特所说的“诱人的单纯”，当他以为在伸张正义的时候，他对正义的复杂性和历史性视而不见。他相信人的心灵应该是纯洁的，要是受到污染就再也不能洗刷干净。但是谁的心灵是洁白无瑕的呢？我们不是在 19 世纪德国文化中那种对绝对纯洁性的迷恋里看到了危险的信号吗？以幼稚而煽情的道德语言贬损艺术家的人格是有乐趣的。用现在某种通行的标准来衡量，20 世纪上半叶很多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在政治上都不合格，“问罪学”是不是还不够发达，需要进一步“加强政审”、“清理阶级队伍”，然后“口诛笔伐”？我不懂德文，不过碰巧知道德文里有一个词专门形容幸灾乐祸的心态：Schaden-freude.

（《爱乐》1997 年第 2 期）

## 思想书廊

### 《民族—国家与暴力》

〔英〕安东尼·吉登斯著 胡宗泽 赵力涛译

三联书店 1998年5月出版 定价：21.80元

本书是吉登斯著作中最具历史社会学特色的一部作品。其理论思路源于《社会的构成》中有关社会转型的论点，即以全球社会变迁的历程为叙述框架，力图通过建构社会转型的一般模式，阐明塑造现代社会的力量。作者本人则宣称，本书的目的主要在于以系统的方式勾勒出世界史的粗线条。

本书为吉登斯现代社会论丛之一种，同时出版的另外两种是：

《社会的构成》定价：26.80元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定价：14.80元

## 绝望中的信靠

曹利群

就在赫伯特·齐佩尔的《达豪之歌》在各集中营不胫而走的时候，铁丝网内的囚徒们还通过另一种音乐在绝望中找到一线生机，找到一种精神的信靠。这就是法国作曲家梅西安在集中营创作的《时间终结四重奏》（一译《世界末日四重奏》）。

这个普罗旺斯的女诗人和莎士比亚戏剧的翻译家之后在遭逢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毅然应征入伍。不久他就被德军俘虏，被囚禁在西利西亚集中营。读过有关纳粹集中营回忆录的人不难设想囚徒的恶劣的生存环境，包括物质上与精神上的。

梅西安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在入狱前，他的创作冲动大都来自天主教的信仰和《圣经》故事。但他的音乐不同于教学礼拜仪式的音乐，他要表现的是现代人的精神世界。1934年他创作了《基督升天》，1935年完成了《基督降生》，1939年又写了管风琴曲《获福的人们》。那么，在集中营里怎样才能唤起绝望中的人的希望？对于拯救人的灵魂来说，信仰是否依然可靠？《圣经》中哪一段故事的喻义可以揭示人在绝望中的希望呢？梅西安提到了《新约·启示录》。

《启示录》是在基督教教会受到罗马帝国的逼迫时写成的。作者约翰被放逐到拔摩岛，有可能在岛上的采石场服苦役。当时有很多基督徒因信仰而被杀害，不少人被监禁起来。在这样危难的残酷的境地中，基督徒们朝思暮想地盼望基督再来，当时（约在公元90~95年），耶稣罹难已逾60年，这个希望仍未实现。于是在基督徒中产生了普遍的怀疑情绪。约翰写《启示录》是要告诉信徒们，无论事态怎么发展，上帝仍在掌权；掌管历史的主宰是基督，不是罗马皇帝；每个忠实的信徒都会有一个荣耀的美好的未来。不用说，在战争期间，在集中营里，《启示录》都有着支撑着人们精神的象征意义。

这部作品之所以写成四重奏的形式，是因为集中营的难友中有一个小提琴手、一个单簧管手和一个大提琴手。1941年在集中营首次演出时，梅西安本人弹奏钢琴。没有听说西方音乐史上有这种不寻常的乐器组合，是战争，是集中营，是精神上没有被摧垮的作曲家给我们留下的杰作。我们不知道当时有多少人观看了这次演出，不知道在场的人灵魂上会受到怎样的震动，更不知道除梅西安之外，有多少人活着走出了西利西亚集中营，包括那三个乐手。但可以确信的是，在将近50分钟的演奏中，每个人都经受了一次生命的洗礼，实现了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由八个乐章组成的这部作品以《新约·启示录》的第10章为序，原文是这样的：“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而降，身披着云彩，头上有彩虹；脸庞像太阳，两脚像火柱。……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向天举起右手来起誓说：‘不再有时间了。’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响号角的时候，上帝的奥秘就成全了。”

“不再有时间了。”人在无拘无束地支配自己的时间时，永远不会理解到这句话的分量。在身陷囹圄失去自由的时候，人们才真正懂得了其中的含义。也许梅西安在囚禁中创作这部作品时又想到了鸟。谁都知道，从1930年起，梅西安就开始潜心研究鸟鸣的节奏，并把这种节奏用到他的创作中。也许最初吸引他关注鸟的，不是鸟鸣的自由的、无节拍的节奏，而是鸟的自

由的、无拘无束的生命方式？而狱中的囚徒连一只鸟都不如啊！于是，我们在《时间终结四重奏》中再次听到了类似鸟的自由自在的叫声，单簧管的旋律线是那么随意，那么自然，还有大、小提琴吱喳声的轻轻唱和。声音是那么深，那么远，像是林中的空谷回声，或是“天国里和谐的寂静”（梅西安的比喻）。战后的许多年中，梅西安一直对鸟情有独钟。他写过一首《鸟群的觉醒》，但全曲没有一个音符能听出是鸟的鸣唱。三年后在《异国的群鸟》中，梅西安以他自己独特的记谱法记录的鸟鸣的节奏。而1958年创作的钢琴曲《鸟的目录》则更多地让我联想起鸟以外的世界。我听过当代钢琴家乌戈尔斯基弹奏这部曲子的录音。三张唱片听完后，我简直觉得这部作品的名字也可以叫作《人的目录》，其中所展现的完全是人的心理世界、精神世界，至少那些物理变化的巨大反差（声音的强弱、时值的长短等）让人觉得有突如其来、不知所措的效果。梅西安创作此曲的初衷我不了解，但我后来知道，钢琴家乌戈尔斯基曾一度落难难民营。

“不再有时间了。”由弱渐强的单簧管把一个单调的音无限延长，让人觉得压抑、窒息。集中营的时间就是死亡的地狱，但它的阴郁与残酷与走向光明、自由和永恒的渴望相比不也是暂时的吗？于是鸟鸣的欢快，自由的飞翔让人找到一种解脱；于是大提琴悠长而恬静地歌唱让人感觉到基督的祈祷和安详的抚摸。仿佛不再有苦难，因为苦难（再加上死亡）会使人生更加完整。令人痛苦的感情一旦为人们所认清后，便不再令人痛苦。（斯宾诺莎：《伦理学》）不再有时间了，难道不意味着地狱生活也就快要结束了吗？不再有时间了，难道天国之路不意味着永恒？象征性的第七声号在渐强声中终于吹响，世界的末日到了，上帝就要审判了。“蓝橘色的和弦”“像轻柔的瀑布”，梅西安早期的“颜色和弦”在这部作品中两次出现（第二第七乐章），让人想起披着云彩、顶着彩虹的天使。最终，在小提琴与钢琴的倾诉中，在天国微妙的和谐中，人们找到了与上帝同在的永恒，或许不妨看作是绝境中找到了对真理和希望的肯定。

不论从什么角度理解阿多诺的“奥斯维辛之后不再有诗”，但永远不能忘记的是，诞生于奥斯维辛的“诗”（一切狱中艺术品的代名称，包括音乐）却已成为生命的永恒的绝响。

（原载《爱乐》1997年第4期）

## 思想书廊

### 《论国家的作用》

[德] 威廉·冯·洪堡著 林荣远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3月 定价：16.00元

洪堡（1767～1835）是德国近代著名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家和语言哲学家。

《论国家的作用》一书较系统地表述了他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对于国家与社会、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如何确定和建立，有着更详实的阐述。由于成书时，书刊检查严厉，只发表了少数章节；直到作者逝世后16年，这部著作才得以全文出版。但从此，就被看作是德国的自由主义的《大宪章》而广为宣播，一版再版；尤其在德国的专制极权国家制度失败后，人们更是不忘重新刊印这部论著。

本书不失为18世纪末德国启蒙运动向普鲁士专制制度发动挑战的檄文，在德国的政治思想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意义。

## 漂泊的指挥棒

——为 Vagabond Baton

《流亡者的音乐史》写

[日] 永田靖 俞人豪 孙英 译

### 各式各样的情况

流亡者的音乐史，有人说就是简单地把流亡的音乐家汇聚在一起。但是为躲避俄国革命而逃亡的库谢维茨基（1874～1951）与在以色列活动的贝尔蒂尼（Gary Bertini）是完全两回事。库谢维茨基由于忍受不了革命而逃亡巴黎。当时在巴黎流亡的俄罗斯人很多，库谢维茨基是其中之一。而贝尔蒂尼生于1927年，幼时随父母逃亡到巴勒斯坦，由于在米兰、巴黎接受教育，所以几乎已经没有保留在俄国的体验。另外还有在大战前夕才来到巴勒斯坦的。因此所谓流亡是有几种不同的性质的。

另外在20年代流亡的夏里亚平（Shalyapin）与70年代不得不流亡的维希涅夫斯卡娅（Galina Vishnevskaya）也有不同的经历。革命后政府曾给夏里亚平可靠的保障和经济特权，但是他仍不能与革命政府合作而逃往巴黎。加利娜·维希涅夫斯卡娅由于70年代在自己家里窝藏索尔仁尼琴的事发，与其丈夫罗斯托波维奇道被剥夺了公民权而不得不逃亡。

例如从库谢维茨基开始的所谓第一批流亡音乐家，即使在国外也念念不忘俄罗斯音乐。指挥家库谢维茨基革命前就建立了俄罗斯音乐出版社，流亡后该出版社继续存在，继续援助流亡的俄罗斯音乐家。他格外喜爱柴可夫斯基、普罗科菲耶夫、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再加上他自己的保留曲目，他召集在巴黎的俄罗斯流亡音乐家定期举办音乐会。后来他到了美国，在波士顿交响乐团任职，不仅继续介绍俄国的，而且还介绍苏联的作品，甚至还担任美苏友好协会干事，对俄罗斯是非常想念的。

再例如格拉祖诺夫（Glazunov）。他作为俄国作曲家培育了许多后辈，他在巴黎流亡时建立了俄罗斯音乐学院，承担了把众多俄国流亡者培养成音乐家的任务。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普罗科菲耶夫。众所周知他曾一度移居国外，最后又回到了苏联，他并非同情苏联政权，他自己完全是非政治性的作曲家，他回国不是由于苏联，而是忍受不了对俄罗斯的强烈乡愁。

因此谈论流亡者的音乐时，至少在第一批离开苏联的流亡者音乐中仍散发着在俄国本土已经失去了的俄罗斯风味。

### 散居者的音乐

同样在谈论流亡者的音乐时也不能回避散居者的音乐。在犹太人的音乐中还有犹太味吗？例如，讲到犹太系音乐家时，即使仅限于指挥家，即使是奥曼第（Ormandy）、巴伦波英（Barenboim）、伯恩斯坦、萧提、华尔特、英巴尔等犹太人或者肯定为犹太血统者，他们各式各样的艺术已经没有任何犹太方面的特别价值，也令人产生不了任何评价。在姑且算作“作曲家”的伯恩斯坦的《第一号交响曲》“耶利米”和《第三号交响曲》“犹太祷文”中还能看得到的很强的犹太精神，把在勋伯格（Schoenberg）的《摩西与亚

伦》(Moses und Aron)和《华沙幸存者》(A Survivor from Warsaw)中所能感受到的、他作为一个犹太人的愿望和愤怒与散居者的音乐相联系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但是在库谢维茨基、尤利·阿罗诺维奇,如果把独奏家也包括进来则还有霍洛维兹(Horowitz)、海菲兹(Heifetz)、米尔斯坦(Milstein)、皮亚季戈夫斯基(Piatigorsky)等群星般的犹太血统俄罗斯音乐家相继逃离苏联的时代,对于那些失去了逃亡机会或者在苏联国内逗留观望的犹太人来说,所谓“祖国的音乐”到底是什么呢。

一般来说,如果将对苏联国内犹太文化的镇压过程再更明确地划分出等级的话,那就是对作曲家和音乐学家的镇压比对指挥家和演奏家更甚。例如犹太人作曲家米哈依·古涅辛,在20年代的歌剧《亚伯拉罕的青春》、《马克白》中创作了深深植根于犹太文化的音乐,可是到了30、40年代,即使引用了犹太民族音乐的语汇,但这些名称却逐渐从标题上消失了,与之并行的是只能写以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等民族音乐为主题的作品。再例如有名的犹太音乐世家克莱茵一家的亚历山大·克莱茵,他最初为苏联国内的犹太人剧场写了许多剧场音乐,并留下了以犹太为主题的歌剧(《扎克布克》)、大合唱,但是30年代以后逐渐受到政府的检查,以《为列宁而写的送葬诗》为开端,写下了一些违心之作。

在20年代犹太人剧场变成通称为“哥宰特”的国立剧场,允许用意第绪语演出,犹太文化与新兴的苏联文化互相并不排斥,而是和平共处。可是30年代以后苏维埃文化开始排除它以外的文化,在苏联国内慢慢消灭犹太文化。

对犹太人的全面攻击是从1948年批判世界主义时开始的,对犹太人进行了肉体的消灭。它最初的象征性事件是对犹太人演员索罗门·米霍埃尔斯的暗杀。当时米霍埃尔斯是国立犹太人剧场的指导,他是苏联国内犹太文化的象征性人物。萧斯塔科维奇听到他的死讯后对其友人说:“全体犹太人和知识分子的末日到了。”事实上后来消灭犹太文化的政治运动是非常猛烈可怕的。

但是另一方面这也是犹太人音乐家与苏维埃同化的时期。它不是指把犹太音乐的语汇悄悄地融入某些作品中、像古涅辛这样的“作曲”家,而是指暂时回避将犹太音乐的语汇与创作相结合的苦恼的“演奏”家。例如深爱着苏联人民的、具有“钢铁般性格”的吉列尔斯(Emil Gilels)。从大战期间起,苏联小提琴的两位代表人物是柯冈(Leonid Kogan)和欧伊斯特拉赫(David Oistrakh)。还有“欧伊斯特拉赫三重奏”中的大提琴家克努谢维茨基,他们的名字不胜枚举。他们不仅都是犹太血统,而且在苏联演奏界处于最高水准,是苏维埃的优等生。

在指挥家中有犹太血统的也很多。多布罗文(Issay Dobrowen)从钢琴家,尤利·费埃尔从小提琴家而成为指挥,还有萨莫斯德、海金、拉夫林、埃利亚斯贝尔格、帕维尔曼、金兹堡等都是犹太血统。费埃尔、多布罗文、萨莫斯德是属于老一辈的,而继他们之后在本世纪初出生的人,恰好是从斯大林主义时期起真正活跃的。这些新人们在演奏界开始活跃的时代,是古涅辛和亚历山大·克莱茵不能自由地创作犹太音乐的时代。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在30年代以后,随着犹太音乐的消失,犹太演奏家的数量却增加了。



## 自我流亡的音乐

人们仅指流亡者的音乐为流亡的音乐，但是流亡者的音乐是有了自我流亡的音乐之后才可能存在的。在这里不能忘记那些被迫定居苏联国内的，或者自我标榜为斯大林音乐的犹太音乐家的活动。他们的活动并不是指在国内流亡之外的另一种东西，而是由于他们的活动产生出音乐，因而也就形成了第二种流亡者的音乐。

70年代突然流亡的孔德拉辛(kirill Kondrashin, 1914~1981)的行动，与不得不流亡的罗斯托波维奇确实有着不同的动机。但是如果把库谢维茨基以来犹太音乐家的相继流亡，与存在因果关系的斯大林主义的音乐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那么他们两人的流亡则都是为了排除斯大林主义产生的一种污垢，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没有任何的不同。

例如谈到斯大林的音乐时，人们就会想起某些吹捧斯大林的大合唱、歌曲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另一方面则会想到某一群没有排除斯大林主义影响的作品，其中包括哈恰图良、普罗科菲耶夫、萧斯塔科维奇的一些作品。可以肯定这些作品主要是由犹太人指挥家指挥的。指挥棒是既不问国籍，也不问政治的。在从30年代开始的斯大林时代，音乐一般还没有被政治利用，也没有强迫人只写政治性的音乐。虽然只有某些种类的音乐具有特定的倾向，但是脱离政治的演奏、欣赏和赞扬是要受到粗暴指责的。作为音乐本身最基本的东西的演奏和欣赏在斯大林时代就是在这种意义上进行的。

例如《祖国之歌》是出自电影《快乐的伙伴》、《伏尔加，伏尔加》主题曲的作者、犹太作曲家杜那耶夫斯基之手，它最典型地体现了这种音乐的斯大林主义——明朗、乐观、充满希望、易懂。它完全期望着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只有唱起这首充满光明的歌时，这个社会才会引起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幻想。因此关于这首在苏联广为流行的歌曲的情况必须在流亡音乐史上重新补上一页。

(摘自《指挥家的光芒》，台湾世界文物出版社，1997年1月出版)

## 文化意识形态与作曲家

〔美〕赫洛德·勋伯格 陈琳琳 译

萧斯塔科维奇以近代俄罗斯历史创制了两首交响曲，其中一首的副标题是《十月》（1927），另一首是《五月一日》（1931）。1932年，他以震天撼地的不谐和音撰成歌剧《马克白夫人》，以俄罗斯现实主义铺陈通奸与谋杀的剧情。这出歌剧为萧斯塔科维奇招惹来无端的祸害，原因是新兴当权者并不以容忍的眼光看待《马克白夫人》里的道德或音乐语言。

早在20年代，苏俄一度鼓励试验性的艺术作品。由萨孚洛·梅尔霍德、弗拉地米尔·马雅柯夫斯基、尼可拉·奥克洛波克夫为首的创作势力，以凌厉的攻势把现存的各种传统追逼得落荒而逃。瑟基·爱森斯坦为电影树立了新的里程碑。在绘画与雕塑方面，现代主义庶几成为官方制定的风格；以南姆加伯马首是瞻的构成派成员崛起而为主流。借红色革命而滋生的艺术家们衷心相信，自己的艺术当与苏俄政治方向不谋而合。正如艺术家开斯米尔·马拉维奇所谓：“立体派与未来派是艺坛中的革命形式，它们正预言着1917年在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中的革命。”然而未及1930年，所有价值都全盘改向了。崇信赤色革命的苏联开始推动与其革命意图相去天壤的平庸而统一之艺术，这真是历史上的一大反讽。

上述转变，代表着斯大林血液中尚未泯灭的中产阶级特性。此外，这个现象也代表着所有苏维埃的官方教条，都是衍生自列宁的话语：列宁的每句话都与神谕无异。

独裁政权看待艺术的方式总是大同小异，所不同者唯有措词一事。希特勒反对前卫艺术与音乐，理由是因为此种艺术代表着颓废的文化布尔什维克主义；而斯大林所根据的理由是它代表着颓废的帝国资本主义形式，因此任何企图创新的音乐，都为苏联的律法所禁，作曲者不该作，听众们也不该听。任何十二音音乐，任何巴尔托克和亨德密特音乐，任何斯特拉文斯基继《彼德罗希卡》之后推出的音乐（也就是说所剩无几），与任何稍微显露抽象主义的音乐，均遭禁止。全苏俄无异笼罩在铁幕下，不允许外国出版品独存，所有异国的广播也自此绝迹。

在此情况下，苏俄作曲家对外界的动静懵然无知。苏俄境内，艺术、文学与音乐笼罩着可怕的统一帷幕。专门充任政府教条喉舌的评论家，也自有一套诡异的陈述，舍音乐本身的优点，而取教条的断章取义，作为评价作品的准绳；例如，雅里·克地奇在他的《俄罗斯音乐史》里指斥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像艺术中的反民谣目的一样，均是现代主义的反动要素，反映着帝国主义者布尔乔亚式颓废的意识形态”。苏俄境内的所有评论家简直是异口同声地说出以上的谬论。

对作曲家最严苛的指控，恐怕就是“形式主义”这四个字。无人知道其真正意义，但是一旦有人以“形式主义”见责，就最好赶快为自己留好后路才是。大体而言，音乐的“形式主义”就是指任何现代、不谐和、悲观、不能反映苏维埃工人之英雄式理想的音乐。普罗科菲耶夫说：“所谓形式主义，就是所有一听之下不能立即为人了解的音乐。”

说此话时的普罗科菲耶夫正在俄国境内。他先于1927年返国访问，受到民众的热情欢迎，于是在1932年决定回国永久定居。斯特拉文斯基在他的《往事忆评》中慷慨陈言普罗科菲耶夫之回归苏俄：“此举无非是对拜金主义称

臣奉献。他连续数季在美国或欧陆均一筹莫展，苏俄之行却是一次胜利的访问。1937年，当我于纽约与他见最后一面时，他正为自己在法国的艺术与经济前途不济而落寞丧志。不过他在政治上却相当天真无知——尼古拉·麦士高夫斯基的好例子也未能让他觉悟。他兴冲冲地回到苏俄，最后终于认清了自己在当地的地位，却可惜已为时晚矣。”尼古拉·麦士高夫斯基（1881～1950）是一位多产的交响曲演奏家（他先后完成了27首），也是一位到头来终于对苏联当局唯唯诺诺的名教师。

普罗科菲耶夫初抵国门时还相当兴奋。他受人尊崇拥戴，生活忙碌不堪，终于在1937年获允出国举行旅行演奏。他告诉朋友佛农公爵说自己心愿已足，后来公爵记道：

……我当时问了普罗科菲耶夫一个自己最记挂于心的难题。我想知道他在苏俄极权主义气氛下，究竟是如何讨生活、如何工作的。普罗科菲耶夫沉默了半晌才平静又严肃地说：“我毫不在意政治，这就是我的感觉。不管怎么说，我都只不过是一个单纯的作曲家而已。任何政府，只要它能让我心平气和地创作音乐，很快地为我付印；让我演出自我指尖流泻而出的每个音符，对我而言就是良政。在欧洲的时候，我们都必须刻意争取演出的机会，也必须好言说服指挥家和剧院导演；苏俄则不然，是他们有求于你——在我则是连想要满足他们的需索都已经忙得分身乏术。此外，我在莫斯科拥有一间安适的公寓，在乡下有一幢怡人的别墅，又有一部崭新的汽车。儿子们可以上莫斯科优秀的英语学校。

普罗科菲耶夫与萧斯塔科维奇二人自然熟稔——同为苏联音乐英雄，势必要在各种场合联袂演出。尽管如此，他们却彼此设防，并非真心喜欢对方。萧斯塔科维奇在他的回忆录里对这位成功的同侪颇有微词。他说普罗科菲耶夫装腔作态，对谱配管弦乐曲无能为力，常要人顶替代劳；又说他的音乐在今天听来沉闷无趣，他“生性好勇斗狠，一言不合就想开打”，说他为了某些讨好的效果，不惜牺牲基本要素。

这些回忆录在萧斯塔科维奇死后于1979年10月在美国付印，名曰《见证》；编辑是一位自称萧斯塔科维奇至友的苏俄移民所罗门·伏尔可夫。《见证》引来不少质疑，而苏俄也坚持这是一本伪书。然而如果这本回忆录真确地表白了萧斯塔科维奇思想的话，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位才思焕发的作曲奇葩，究竟是如何为苏俄制度（尤其是斯大林）所扼杀了——萧斯塔科维奇回忆录始终围绕着斯大林的话题，可见斯大林对每一位苏联公民的生死有多大的支配力。

直到30年代中期，苏俄境内的作曲家还保有相当大的自由意志。然而随着斯大林偏执病态的加剧，意识形态的种种限制也开始干预音乐，其严重程度真不下于早已遭到污染的戏剧与绘画。无人能幸免于此劫数——普罗科菲耶夫与萧斯塔科维奇双双遭殃。

萧斯塔科维奇正是感受此打击的第一人，与他作对的正是斯大林本人。1936年《马克白夫人》于莫斯科的演出，是引发斯大林怒火的主因。据言第一幕结束后，斯大林满腔怒火冲出了剧院，对其中“伤风败俗”的音乐愤慨不已。他当下对苏联歌剧提出要求：必须以社会主义为主题；音乐语言必须“写实”——易言之，就是必须尽除刺耳的调性，并以俄罗斯民歌为本；情节必须“光明正大”，也就是说必须以喜剧结尾，为国家歌功颂德。随之而起的是披露于《真理报》上对萧斯塔科维奇的攻讦。这回事态严重了。不幸遭受官方明言驳难的苏俄音乐家，很可能就此失去工作，也断绝一切出版与演出的机会。他可能丧失栖身的房子，更休提汽车、别墅这些额外的津贴了。

在斯大林当权的时代，甚至可能身陷囹圄。

萧斯塔科维奇读到《真理报》上的报导时正在阿干折斯克旅行，只见眼前的世界顿时崩溃了——直到此时为止，他一直是苏联乐坛上无往不利的“金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现在，他却成为众矢之的，“人民的公敌”，任何敌人都可以鸣鼓而攻之。“我濒临于自戕的绝境。眼前的危险令我惊慌失措，前程似乎一片黯淡，丝毫见不到出路。”

萧斯塔科维奇以 1937 年的第五交响曲重振声威。不过就意愿和目标而言，他的作曲生涯是结束了。表现在第一交响曲、《鼻子》及《马克白夫人》里大胆、闪亮而具有现代感的音乐，早已成为绝响了。此后的他除了撰写安全无虞、重复拖沓和摹仿普罗科菲耶夫的矫情之作以外，再也不敢插手其他。这种现象一直维持到他生命将尽之前，才敢再放手去写他所想写的音乐，全然抛开了苏联的文化独裁。

三四十年代，萧斯塔科维奇完全偃旗息鼓时，只见普罗科菲耶夫一枝独秀，成为独霸苏俄乐坛的主力。他的和声理念和旋律特质均反映在苏联当时每一位重要作曲家的音乐里——萧斯塔科维奇、卡巴列夫斯基、恰恰图良、赫伦尼可夫——他们都创制经过冲淡稀释的普罗科菲耶夫乐曲，连普罗科菲耶夫本人亦无例外。他们也都担任国家及宣传教条的代言人——唯独普罗科菲耶夫不肯附合流俗，因为他自恃在国际间已有相当大的声望，因而除撰曲外，对其他外务一概回绝。

他确实专心致意于创作一事，不暇及他。他为电影创作背景音乐，其中以《基杰中尉》（1934）和《亚历山大·尼夫斯基》（1939）最受激赏。他亦完成了第二号小提琴协奏曲（1935）、《彼得与狼》（1936），以及芭蕾舞音乐《罗密欧与朱丽叶》（1935），这些都让他饮誉国际。他的歌剧《塞米昂·柯特可》后来无疾而终，另一出歌剧《修道院内的婚礼》（1931）改编自谢立登的《保姆》，只演出数场即匆匆下台。

大战方酣之际，普罗科菲耶夫却屡见佳作——大型歌剧如《战争与和平》，第七号钢琴奏鸣曲、第二号弦乐四重奏、D 大调的横笛（小提琴）奏鸣曲、芭蕾舞曲《仙履奇缘》和第五交响曲。这些都是大师的手笔，较之他的法国时期及美国时期作品，有着些微的不同——节奏、旋律及和声上的表现技巧依然可辨，不过现代感收敛了不少，也减少了钢铁时代的风味。就其所表达的情绪而言，这是一种更婉美温和的音乐，与社会主义者的现实主义理想相去不远。

然而，即使是令誉崇隆，受国际倚重之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亦不能免于被批评攻讦。随成功而来的是 1948 年的临头大难；他和此间的重要苏俄作曲家，都遭到当局政权的围剿。触发此次事件的是伐诺·穆拉德利的歌剧《伟大的友情》在 1947 年 11 月 7 日的初演。报端披露的乐评说，此剧在历史上和意识形态方面都犯下了错误，“音乐尤其表达欠佳，拙劣、不和谐、混淆、荒腔走板，全然构筑在连续不断的不谐和和嘈杂的声音组合上”。三个月后，共党中央委员会举行了一次会议，炮轰穆拉德利、普罗科菲耶夫、萧斯塔科维奇、恰恰图良、麦士高夫斯基、维萨里昂·史巴林等一干人。中央委员会也发布了一项决议案，批判这几位作曲家为“形式主义者”：“他们的反民主倾向不为苏联人民大众及其艺术品味所见容。”他们所创制的音乐“搀杂着欧美现代中产阶级音乐精神的余毒”。中央委员会的批判一页页地数说个不停，评论家们也一并遭殃，受到炮轰。“音乐评论早已无能表达苏俄社会

的舆论了。”文件中还语出恫吓，大意是说当局对这些音乐已经“忍无可忍”，结果以下列四项议案告终：（1948年2月10日）

（1）批判苏联境内的形式主义运动为反国家趋向，终必导向音乐的覆亡。

（2）敦促宣传部、中央委员会和艺术委员会匡正苏俄乐坛歪风，清算为中央委员会决议案指出的种种缺失，以确保苏俄音乐朝向写实主义方向大步前进。

（3）呼吁苏俄作曲家充分了解苏俄人民大众对音乐艺术的崇高需求，扫除一切可能削弱我们的音乐、或是遏止其发展的因素，让所有能够提升苏俄音乐文化的创作欣欣向荣，以便提携各种音乐创作，使之成为足可彰显苏俄人民的上佳作品。

（4）通过相对社团的组织章程，俾使音乐活动突飞猛进，一日千里。

从2月17日到26日，临危的苏俄作曲家在莫斯科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中官方文化意识形态发言人安德烈·札达诺夫，重加解释中央委员会的各项要点。赫伦尼可夫亦延伸札达诺夫的话，指责同侪中之形式主义者。赫伦尼可夫特别指名骂萧斯塔科维奇的第八和第九交响曲、第二钢琴奏鸣曲，普罗科菲耶夫的《战争与和平》、第六钢琴奏鸣曲，以及其他钢琴作品；罪名仍是形式主义。他说，苏俄作曲家必须“将音乐艺术中的中产阶级形式主义余毒，全部视为百无一用、有害身心的垃圾，而加以深恶痛绝”。（赫伦尼可夫此言一发，瞬即成为苏俄音乐机构中一呼百应的人物。）

受到批评的作曲家一一站起来发言，向当局俯首认错了事。穆拉德利说：“怎能想像我自己竟然如此疏忽，在歌剧中未引用任何民谣音乐？……我眼前有一项非做不可的工作，那就是认清自己创作上的严重错漏，并在未来的作品中以坦诚无私的意识匡正这些错漏。”萧斯塔科维奇说：“我对中央委员会决议案中的批评怀抱着无限的感激。……我应该以更大的决心致力于描绘英勇的苏俄大众形象。”恰恰图良说：“我真不知道自己竟会鬼迷心窍，在作品中误用了形式主义。……我在此也要告诫那些像我一样的音乐家，勿再一心企盼自己现在不被世人了解的作品能为明日的世代所了解。这是最有可能置人于万劫不复的谬论。在我们的国家里，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大众，整个苏俄，都是音乐的仲裁者。”

无怪乎自从1948年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案发布后，任何些微表现出个性的思想都要因此而销声匿迹了。倘使普罗科菲耶夫表现在《战争与和平》里的不成熟技巧都会以形式主义而见责的话，那么苏俄作曲家除了根据民谣音乐谱配管弦乐曲，并以此行世的话，又有何处可以略施手脚呢？

继之而起的是一个统一单调、绝无分歧的时期。苏俄的音乐也步上当地画坛的后尘，不再对世界具有任何意义了。甚至连全苏最优秀的作曲者——普罗科菲耶夫及萧斯塔科维奇——都被形势迫得仅能推出苍白而不会引起訾议的艺术成品——无异于当时艺术家不得不髹画农产品的窘态。萧斯塔科维奇只得着手室内乐、交响曲和一些电影配乐。普罗科菲耶夫炒炒冷饭，在1948年推出芭蕾舞曲《石花》，1950年又如法炮制出第二号大提琴协奏曲（后又修改为供大提琴与管弦乐团演出的交响复协奏曲）他在生命最后一年完成了第七交响曲。巨匠在1953年3月5日殒谢于莫斯科，恰好与斯大林死于同一日。

普罗科菲耶夫身后留下一批受欢迎程度历时不减的作品。他是20世纪人

才济济的作曲家群中最常为人演奏的一位。包括五首钢琴协奏曲中的两首、两首小提琴协奏曲、第五交响曲、许多钢琴作品（尤其是第三号、第七号及第八号奏鸣曲），以及至少三首的重要芭蕾舞曲——《浪子》、《罗密欧与朱丽叶》、《仙履奇缘》——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必传之作。他在《亚历山大·尼可夫斯基》中，表现了最杰出的电影配乐。不过时日既久，或许普罗科菲耶夫的作品终究有大部分要为时间所湮没。他早期的作品总是把效果置诸音乐的实质之上；到了后期作品，又被迫撰写些温和、不痛不痒的乐曲。他的钢琴奏鸣曲第七号、D大调小提琴奏鸣曲或G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等作品，都令人有不耐久听之感。普罗科菲耶夫的情绪经常伸展不开，往往像他的《怒火天使》一样显露出故意制造听众心中震撼感的斧凿痕迹。一旦这些震撼的价值祛除，可供欣赏的优点就不多了。尽管如此，他最得意的作品仍然能让本世纪听众的心灵大受感动。

斯大林死后，某种愈趋自由的艺术政策挣扎着破茧而出：第二届“作曲家全联大会”确实声言争取更多自由，时值1957年，于1958年当权的赫鲁晓夫公然畅言“社会主义者之写实主义”的老旧教条——不过苏俄境内的许多敏感人士，都隐约感受到这位新领袖所说的话，不过是为求服众而已。1948年一度遭受清算的穆拉德利及其他人士，在1958年获得共党的平反，令爱乐者雀跃不已。

在此风雨飘摇之际，萧斯塔科维奇一直是苏俄乐坛上的泰斗，国人敬若神明。1957年，他膺选为“苏俄作曲家联盟”书记，又于1966年获颁苏联两项最高大奖：“社会主义劳工英雄奖”和“列宁勋章”。同年，在遭受过一次心脏病发后，这位害羞、畏缩、精神紧张、烟不离手的萧斯塔科维奇，几乎绝迹于公开场合。不过他仍创作不辍，撰写了一连串弦乐四重奏，其中的第八号在本质上属于自传形式，并引用了萧氏早年的几首作品。他的《马克白夫人》又再度抬头，经过了几次修改后，以《凯萨琳·伊丝马洛娃》的名目面世，甚至还被改编成电影。

1962年，他的第十三号交响曲大功告成。此曲以叶夫根尼·叶甫图申科的五首诗为本，其中的《巴比雅》叙述的是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犹太人在基辅遭到的大屠杀事件。舆论传出赫鲁晓夫不赞同这个主题，使初演陷入愁云惨雾中——即使这是苏俄最明亮的两颗文化彗星联手出击的作品，政府官员也不露面捧场。官方不同意的态度既经此非正式方法表达，这首乐曲二度演出过后，就识趣地隐退了。翌年在歌词内容假叶甫图申科之手改编之后（音乐本身原封不动），才有两次面世的机会。不过此曲的本来面目已是“社会主义者的写实主义”作品，也是顺应情势而不得不宣扬教条的音乐。其后此曲也很少再为人演出。

萧斯塔科维奇在世时，积郁难平，心知如果自己获得充分自由的话，成绩必定不可同日而语。他在回忆录中发自肺腑地解释自己的作为，以及作曲的方向，并以忧心忡忡的丹麦王子哈姆雷特自况：“哈姆雷特和罗申克伦滋及葛登斯坦的一段交谈，尤其触动我的心弦。他说他不是笛子，因此他不愿任凭旁人随意玩弄。这段对话真精彩。在他说来不让人玩弄这件事易如反掌，因为他贵为一国的王子。倘使他不是王子的话，别人不免要把他玩弄于股掌之间。”萧斯塔科维奇也以老境萧条的李尔王自喻：“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李尔王幻想的破灭。若说破灭还不算真确，因为若讲到破灭，总是猝然而至，随即事过境迁；不能成为悲剧，也不那么有趣。不过，你看他的幻念慢

慢地一个个破灭了——这又是不同的情境。这是一种痛楚逾常，病态不健全的过程。”因此这位萧斯塔科维奇—哈姆雷特—李尔王三种身份纠结夹缠的伤心人，在尝尽了幻象破灭后变得委顿不堪，只得如行尸走肉般苟存、工作，日复一日。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的感情寄托在音乐上。

似乎（如果回忆录真是出自其手笔的话）萧斯塔科维奇看待自己音乐的眼光，与一般人接受的方式很不相同。以第七交响曲为例，一般相信它是对列宁格勒一役与苏俄英勇御敌表现的赞美颂歌。不过萧斯塔科维奇所采取的又是另一种眼光。他在文中说第七交响曲的构想成形于防卫战之前，“自然也无所谓抵挡希特勒进攻一事。……我在创作此主题时，脑中想着另一批人民之敌。”所谓的“另一批人民之敌”，当然指的是当时的独裁者及其帮凶。“战争带来了新的悲怆和新的毁灭，然而我亦未曾忘怀战前恐怖的年岁。这也是我从第四号以后一连串交响曲的内涵，第七号、第八号，亦无例外。我的多数交响曲都堪称为墓碑，因为成千上万的同胞埋尸于不为人知的地方，连亲属也不及凭悼。你又如何能为梅尔霍德和图卡契夫斯基树立墓碑呢？唯有音乐能为之。我甘愿为每位战火下的牺牲者各创制一阙悼念曲，然而个人能力有未迨者，故而我决定将音乐呈献给所有亡魂。”

自从赫鲁晓夫在1964年被柯西金和勃列日涅夫取代之后，苏俄官方管制艺术的原则松弛了不少。广播电台的围堵嘎然而止，学生与作曲新秀不仅可以谛听最时兴的外国音乐广播，还可以拷贝成录音带。甚至大约有一打的作曲家未得教科书的帮助，仅凭外来音乐家所提供的世界信息，着手创制音列性音乐——尽管他们的作品难容于官方，当局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多加为难。斯特拉文斯基和巴尔托克的音乐又有机会在俄境演出了，而新一代的音乐家也摹仿《春之祭》，以及为弦乐、敲击乐器与钢片琴所作的音乐，而非在他们看来老旧板滞的普罗科菲耶夫及萧斯塔科维奇。

萧斯塔科维奇对这次乐坛春雪解冻的情形反应冷淡，因为这种美景并未维持太久。自从1968年捷克叛乱以后，苏俄国内又吹起一道寒流，艺术自由也为当局所镇压，噤若寒蝉。赫伦尼可夫曾经主宰作曲家联盟，统领自斯大林以后的乐坛风骚达数十载（直至1980年仍旧在位），却遭萧斯塔科维奇的批评。萧斯塔科维奇鄙夷赫伦尼可夫已极，因此叙述了一段赫伦尼可夫在斯大林面前举止污浊的故事。萧斯塔科维奇在回忆录中把自己描写为一位对自己与对其所生存的世界信心全丧的天才。最后几页笔触之悲悒、自怜，宛若陀斯妥耶夫斯基：“不，我再也无法形容自己郁郁寡欢的一生了。没有人愿意相信我确实活得极不快乐。我这一生里，没有特别高兴的时刻，也没有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有的只是晦暗和迂滞，想来真是肝肠寸断。”展现在萧斯塔科维奇回忆录最后数页的悲怀感，直追他的第十四交响曲。萧斯塔科维奇揣测苏俄的年轻一辈或能有机会过着高尚、体面的一生。“或许在他们的生活里，会除去我个人生活里的灰色色彩。”不过直至1980年，对苏俄的乐坛新秀来说，这种机会仍是渺远而不可及的愿望。

（摘自《现代乐派》，台湾万象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出版。题目系编者所加。）

## 政治阴影下的普罗科菲耶夫 [英] 大卫·古特曼 白裕成译

1936年5月16日，普罗科菲耶夫的妻子抵达莫斯科，整个迁居于焉完成。至少到目前为止，普罗科菲耶夫对新的安排还算满意。

他生命的最后20年“待在家里”，但是并非一帆风顺：生活里有失败、横逆和谤议，不过也有窝心的回应、真诚的赞誉，人民与景物、语言和传统让他心中的汨汨灵感更为精纯。在此，他的音乐有了一种抒情恢宏的特质、深刻的人文关怀，从而和他的听众开创出新的联系。

(鲍里斯·史瓦兹 [Boris Schwarz])

伊雅·爱伦堡 (Ilya Ehrenburg) 告诉我们，那几年政治迫害的悲惨岁月让普罗科菲耶夫多么挫馁，但是他的态度始终如一：“今天，人一定要工作。工作是惟一的事情，惟一的救赎。”

普罗科菲耶夫的归来被视为俄国音乐发展上的里程碑。俄国无产阶级音乐家协会解散之后，苏维埃作曲家联盟 (Union of Soviet Composers) 随即成立，音乐行政事务落入中央政府的控制。官方鼓励作曲家在过去的民歌传统中寻求灵感，要注意作品中的社会内涵，以及对广大群众的吸引力。被视为“西方人士”的普罗科菲耶夫显然选择和这些新政令共存亡。而他并不是惟一抓不到这些政令背后意义的人。

在艺术上的新口号是“社会主义写实论” (Socialist Realism)，这个名词是斯大林 1932 年 10 月在高尔基的寓所与作家会面时所提出的：

艺术家若要正确地描绘我们的生活，他就得要看出、并指出是什么把它导向社会主义的。所以，这将是社会主义者的艺术，也将是社会主义的写实论。

对苏维埃音乐家而言，这个文学教条又意味着什么？在普罗科菲耶夫和高尔基最后一次在莫斯科的谈话中，普罗科菲耶夫向高尔基问及现在应该创作哪一种音乐：

“你自己心里应该明白，”他微笑着回答。我说道：“每个人都说音乐应该要活泼而乐现，以与新生活的精神相应。”“没错，”他补充道，“但是它也必须温暖而柔和。”

普罗科菲耶夫便如此步履蹒跚地走入苏俄第三次革命，这是一个孤立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文化革命，它和第一次的 1917 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及第二次的 1928 年革命一样有决定性。这和马克思也 (稍) 有关连。

和许多当时的人一样，马克思与恩格斯对“写实艺术”有特殊的偏好，不过他们在文学的社会关连性上的强调还不到大力鼓吹的程度。他们看出，对生活种种矛盾的想像了悟，以及表现出可信而独特性格的能力一定会比抽象言词、高贵情操，和立意良善的倡导要来得重要。艺术家的直觉总是会超越他的政治论见。莎士比亚绝对是个比席勒还要伟大的作家。马克思不认为堕落时代的艺术也一定是堕落的，他指出，当人民讲到使社会发生革命的观念时，人民应该意识到，在他们的“旧”社会里，新社会的要素是不断创发出来的。

“社会主义写实论”之提出是要作为这种“写实”艺术的“淬炼”。有人认为，19 世纪伟大的小说家是“激进”的写实主义者，不论他们的意识形态为何，他们不得不在作品中揭露当时社会的罪恶。但是，他们身为资产阶级艺术家，却没有办法从自身的环境中逃脱出来，无可避免地走向宿命和绝望。对苏维埃艺术家而言，这个僵局已经被超克。社会主义以“社会主义写



实论”——“前进”（progressive）社会的“前进”艺术——提供了向前的正路。

在一个转变的时代里，“写实主义”及其“社会主义”修正人士之间的紧张是无法避免的：前者要求如实描绘生活，而后者却指向应然的生活。而苏维埃艺术当然不会只满足于仅止于现实的反映而已，它在意识形态的重塑过程中有所帮助。它必须显示出 *partiinost*、*klassovost* 和 *narodnost*（这几个字大致可译为“政党精神”、“阶级意识”和“人民性”）。

斯大林政权为了替这个文化策略辩护，将列宁的思想加以断章取义，以为己用。列宁劝说受过教育的上层阶级，要他们牺牲个人的艺术偏好，“人民”的原则显然是从此衍生出来的：

当工人和农民大众还需要黑面包的时候，我们难道应该为一小撮少数人奉上精致的糕点吗？

列宁预言通过大众文化意识的发展会有向上提高的作用，而非将文化水平向下看齐。我们撇开这句话不管。他曾经坚持这一点：群众不能用“浩大场面”、“马戏”，或是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来蒙骗：

要艺术越来越接近群众，而群众越来越接近艺术，我们必须从提升一般的教育和文化水平来着手……“群众”有权利得到真正而伟大的艺术。这便是我们把大规模的……国民教育当作当急要务的原因了。

斯大林对形式实验一贯的厌恶或许也可以追溯到列宁。但是列宁自称是个野蛮人，拿自己对现代潮流一窍不通来开玩笑，他说得很明白：至少在这件事情上，不要拿他的意见来当作权威的指导方针：

我们跟不上新艺术脚步；只能循迹而行。

卢那察尔斯基在 1933 年回忆道：

……因为他向来厌恶玩票性质的业余爱好，而且他不喜欢就艺术方面发表言论，这和他的本性相连……我再说一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未以他的审美好恶下过任何指导原则。

且不论“社会主义写实论”确实的起源为何，要把它转译成音乐的术语并不容易。作曲家联盟在 1933 年提出了以下的路线。一如鲍里斯·史瓦兹所述，他们“在彼此攻讦中掩饰了他们在清晰度方面的欠缺”：

苏维埃作曲家必须将注意力集中在现实原则上，朝向英勇、光明与美丽的事物上。这使得苏维埃人民的精神世界有别于其他，而且它必须表现在充满力与美的音乐意象中。现代主义的途径在现今堕落的资产阶级艺术中甚为常见，而社会主义写实论便是要求对抗这个否定人民的途径，不向现代资产阶级文化阿谀屈从。

理想上，音乐家在这个新世界里应该从一个乌托邦的未来来看当代的问题，把今日的缺点说成正面的力量，这股力量把社会推向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

欲对每一首交响作品的布局设计——加以解释是不可能的，而以具体、文字的意象来描述音乐的意义也是令人难以接受。不过苏维埃的美学家倒是努力去发掘一首音乐作品和官方认可的教条之间有多么接近，他们觉得有必要把语言和音乐形式的表达看成是紧密相连的。这个方法学上的断裂便由音乐学者阿萨费叶夫来填补，他是普罗科菲耶夫从音乐院时期起的好朋友。

阿萨费叶夫把他的观念建立在马列主义的辩证法上，从而发展出一套音乐“音调”（intonation）的理论。阿萨费叶夫在 1947 年的重要著作《音调》（Intonanzia）一书中，把音乐的表达与人类说话时的声调相比拟。语调的

起伏透露了隐微的情感,所以音乐一定透过相关的音调起伏而表达了它真正的“意义”。

音乐的音调可以在不同的层次上当作意义的载体(carrier)。在最简单的形式上,某些共同的生命经验转化成音乐的语法,而这种转化便是由音调所构成。所以有人会说某些音乐的表示(gestue)听起来像冲锋的军号。但是只有在把握到声源(sound-source)更为深刻而重要的特质时,作曲家才能够触及人心。如此一来,一用到信号曲便能唤起英勇与爱国的“音乐想像”。

现在的俄国音乐学家会认为音乐表达的语义学(semantics)远不只于有说明的作用而已,它在人类和社会意识的最底层运作着。每一个时代自有其规范和习惯,每一首新的作品都会放在这个基础上来加以评判。这些必须是从一部“音调辞典”中取出,在这样一本书里,生命经验和音乐表达及语汇相连结,密不可分。在30年代初,这些口号还未成形,这些论题对普罗科菲耶夫而言似乎也太过学院气。这一些要等到他下定决心,让自己和家人开始过真正的俄国生活,之后,当局才提出清算的要求,一点也不含糊。

1936年1月,斯大林听了一次萧斯塔科维奇的《莫臣斯克的马克白夫人》(Lady Macbeth of Mtsensk),这出歌剧在剧场上已经演了两年。当苏维埃音乐家在1月28日早晨翻开《真理报》(Pravda)时,在第三版的左上角,刊登了一篇占了三栏的文章,文中公开谴责这出歌剧,标题为“混沌而非音乐”。执笔的可能是日丹诺夫(Andrei Zhdanov),他是新上任的列宁格勒党部负责人,也是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里文化政策的代言人。据说萧斯塔科维奇也知道这位“领袖兼导师”是在背后操纵的黑手:

从乐曲一开始,听众就被刻意制造的不协调而混乱的声流所震惊。旋律的片断、还未成形的乐句出现——在喧闹嘈杂、尖叫声中又消失……这段音乐是以一出受排拒的歌剧为其张本……它把“梅耶霍德主义”最负面的特征(而且还加重了数倍)带进剧院和音乐中。我们有的是左派分子的困惑,而不是自然的、属于人的音乐……这股潮流对苏维埃音乐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左派分子对歌剧的扭曲与左派分子对绘画、诗歌、教学和科学的扭曲可说是出自同源。小资产阶级的革新结果导致和真正的艺术、真正的科学和真正的文学断裂开来……一切都是粗劣、低级而鄙俗不堪的。音乐嘎嘎作响、低声嘟哝、咆哮,乃至把自己给闷死,以求尽量自然地表达剧中的爱情。而爱情却以最低级的方式在整出歌剧中到处涂抹。商人的双人床就放在舞台的中央。所有的“问题”都是在上面解决的。

这出歌剧暴露小资产阶级在道德上的浅薄,但是这个意识形态立场的正确却救不了《马克白夫人》。文中传达的信息很清楚。俄国生活的形式或许已经是社会主义的,但是“新”文化的内涵却是开倒车、是禁欲、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写实论”——这种美学观其实相当模糊笼统,而现在正是这种笼统羞辱了艺术家,造成了艺术家先行自我审核的怪象。为了避免麻烦,最好还是保有旋律的流畅,少去冒背离基本上是19世纪和声定式的危险。最安全的就是谨守安分、老套的语汇,尤其是多写纯粹的器乐曲,少写些需通过意识形态检查的诗词伴奏曲。一股强装出来的乐观气氛自然是风行弥漫,此乃势所不能免。

萧斯塔科维奇面临的困境可想而知,普罗科菲耶夫的处境则稍微好一些。这两位作曲家多有共同之处,虽然从现在来看,他们从来不曾亲近过。苏维埃官方对这件事情的声明,我们对此一定要打个折扣,尤其是从佛可夫(Solomon Volkov)引人争议的回忆录在西方出版之后更是如此。对于在《见证》(Testimony)中的萧斯塔科维奇来说,普罗科菲耶夫并不是苏维埃传说

中“鼓舞人心的楷模”，而是“汤里的鸡”，有着“宠坏的神童(Wunderkind)的个性”。以下便是他们之间的冲突：

普罗科菲耶夫和我从来没成过朋友，可能这是因为普罗科菲耶夫不想和人保持友好关系的缘故。他是个难以相处的人，对于自己和自己的音乐以外的其他事物，似乎都不感兴趣。我不喜欢别人拍我的头，普罗科菲耶夫也不喜欢，但是他却让自己对别人故示亲切……他有两个字常挂在嘴上。一个是“挺讨喜的”，他把这个字用在他周遭所有的东西上。所有的东西——人、事、音乐。他似乎觉得包括《伍采克》(Wozzeck)在内，也是“挺讨喜的”。第二个字是“了解吗？”这个时候是他想要知道自己是不是表达得很清楚。这两个口头禅逼得我心头冒火……

普罗科菲耶夫和我是永远不可能敞开心胸交谈的，不过我自己觉得我是了解他的，我很可以想像为什么这个欧洲人比较喜欢回到俄罗斯来。普罗科菲耶夫是个积习难改的赌徒，不过到头来，他总是赢。他自以为什么都已经算计好了，这一回他也会赢。普罗科菲耶夫有15年多的时间脚踏两条船——他在西方被视为苏俄人，而在俄罗斯，他们把他当作西方来的客人来欢迎他。

不过，接下来的情况有所改变，掌理文化事务的官僚开始打量普罗科菲耶夫，思忖着：“这个巴黎来的家伙是谁？”普罗科菲耶夫认为自己搬到苏俄去会更有利。这一着棋会让他在西方的身价更高，因为苏俄的东西在那时刚开始流行，他们不会再把他视为在苏俄的外国人，所以他便会全盘皆赢。

顺便一提，最后是因为他喜欢打牌，才决定出此下策。普罗科菲耶夫在国外欠了一屁股债，他必须速谋脱身之道，这条路就在苏俄。这就是普罗科菲耶夫像汤里的鸡一样着陆的地方。他到莫斯科来教学，而他们也开始教他。他和其他人一样，必须背诵登在《真理报》上的历史文章“混浊[混沌]而非音乐”。不过，他没有把我的《马克白夫人》看完。他说：“挺讨喜的。”

萧斯塔科维奇对普罗科菲耶夫的命运并非无动于衷，他心里清楚自己也必须“吞下许多屈辱”。但是他对普罗科菲耶夫的创作漠不关心。在萧斯塔科维奇自己的作品中，马勒的影响在很久以前便把普罗科菲耶夫推到阴影里，不见踪迹。

相较之下，虽然普罗科菲耶夫未受到讨伐“音乐形式主义”的影响，这多亏了他在音乐圈里的特殊地位，但是他心里也很清楚这个进退维谷的局面：“形式主义这个名称有时是送给那些第一次听不懂的作品。”他讽刺地说。他愿意学习，但同时也愿意批评，他对某一类过时俄国传统主义者始终是冷眼相待，他在格拉祖诺夫的身上看到这种人的典型。现在，西方来的前卫音乐在音乐会曲目中逐渐销声匿迹，他继续抗拒沦于地域主义：

在音乐里……我为了明晰和旋律性而努力。但同时，我并没有试着以老掉牙的旋律与和声来达成。就是这个缘故，使得创作明晰的音乐非常困难——必须是新的明晰，而不是旧的。

现在存有一份手稿的大纲（它以普罗科菲耶夫惯用的缩写形式写成，没有子音），这是一场给作曲家联盟的活跃分子的演讲（1937年4月9日）。在叶佐夫（Yezhov）整肃达到高潮时——“疯狂地把个人和团体砍倒，一视同仁，之后是整个人民”——普罗科菲耶夫还继续勾勒出一个美学纲领。普罗科菲耶夫的傲慢和天真使他昧于时势，他谴责“没有教养的同志”对形式主义错误的解释，蔑视真正的技能和屈意迎合发展不全的品味：

我们在苏维埃经济的各个方面奋力向前。那么，为什么我们的音乐家同志还停留在以为他们只靠昨天的面包和坏掉的牛肉便能过活？

普罗科菲耶夫在 30 年代末进行他最后几次的大型巡回音乐会。1936 年 12 月，他人在西欧和美国；1938 年初，他到捷克斯洛伐克、法国、英格兰和美国。他在美国西岸的时候，把时间多消磨在好莱坞的制片厂里，仔细研究电影配乐技术，心里想着要将之运用在他为苏联电影谱写的乐作上。

普罗科菲耶夫回到俄罗斯未久，便得到实现这些想法的机会：爱森斯坦（Sergey Eisenstein）请他为影片《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谱曲度乐。这两个人在过去已会面无数，但少有人料得到他们的合作会大获成功。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以清唱剧 op.78 的形式问世，成为本世纪最脍炙人口的一部合唱作品。但萧斯塔科维奇的心中却是百味杂陈：

1941 年 1 月 14 日，列宁格勒

亲爱的瑟各·瑟各叶维契：

.....我最近听了史塔塞维契（Stasevich）演出了您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尽管妙笔迭出，但是整个说来，我并不喜欢这部作品。对我而言，似乎某种艺术规范在其中遭到破坏，吵杂而具象的音乐太多了。我尤其感到许多段落似乎还没开始就结束了。[冰上的] 战争开始的段落和写给低沉女声的整首歌留给我极深的印象。可惜我无法对其他的部分发出此语。即便如此，这部作品若是荣获斯大林奖的话，我心里会很高兴。虽然这部作品有其缺陷，但是它比许多入围的作品更配称.....

紧握着您的手！

D. 萧斯塔科维奇

这首爱国音乐极为成功，更是增加了普罗科菲耶夫以当时的苏俄为主题创写歌剧的决心。他心中的腹案已经搁了有五年之久，他在 1938 年的夏天发现了适当的题材：卡塔耶夫（Valentin Katayev）的内战故事《我是工人之子》（I am the son of the working people）由梅耶霍德担任制作，卡塔耶夫本人也同意撰写脚本。普罗科菲耶夫自己并不是不知道问题所在：

以苏俄的题材来谱写歌剧绝非易事。在这里处理的是新的人民、新的情感、新的生活，职是之故，许多在古典歌剧里用得上的形式和手法可能会发现不合用。举例来说，一个农村苏维埃主席所唱的咏叹调对作曲家而言是个小麻烦，但是对听众来说可就是满头雾水了。一个人民委员打电话的宣叙调可能也会让人觉得很奇怪。

作曲家和脚本作者之间的歧异势必会发生。卡塔耶夫把这部作品定位在乌克兰民间歌剧的陈腐看法和普罗科菲耶夫“现代”歌剧的理想格格不入。和普罗科菲耶夫在早期的歌剧尝试一样，他拒绝把剧情的流动给牺牲掉，而受时尚所左右。在《塞米欧·考特科》（Semyon Kotko）里没有振奋人心的进行曲，也没有随俗应景的歌曲和舞蹈。他告诉卡塔耶夫：“我不需要韵脚和咏叹调。”

完成的曲谱有好几个地方写得很好，但时而晦暗且不和谐的音乐却给普罗科菲耶夫惹来大祸：

若是要它甫推出便成功，显然把这出歌剧塞满耳熟能详的旋律样式（pattern），让这些样式在许多场合重复，对它会更加有利，但我比较喜欢用新的途径，以新的样式写新的旋律，而且还要尽可能地多。乍听之下，这种音乐可能会更难以理解，但是听了两三次之后，就会豁然开朗。听众每一次听都会有新的发现，总比他听了第二次就说“哦，我以前听过这首，没必要再听一次”要来得好。

新生活、新题材自然要求新的表现形式，如果听者必须花一点力气来掌握这些新形

---

：这首作品结果没有得到斯大林奖。

式，他也不应有所抱怨。

这出剧本显然不是给国外上演用的。马卡利斯特说它“和一部糟糕的西部片还差不多”。

姑不论这出歌剧的缺点何在，单单它的失败就是有政治考虑的结果。纳粹德国和俄共的关系在 1936 ~ 1937 年走到谷底，双方对此必须有所补救。

1939 年 5 月，斯大林把他手下犹太裔的外交部长李维诺夫 (Litvinov) 给换下，代之以亲德的莫洛托夫 (Molotov)。同年 8 月，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普 (Ribbentrop) 签署了恶名昭彰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军事行动随即展开，两国枪口一致向着波兰，也觊觎芬兰和波罗的海三小国。到了 1941 年中，普罗科菲耶夫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已和纳粹德国在军事、经济和文化上结盟了，其他的西方国家则是在“敌对阵营里”。普罗科菲耶夫在大众战线的政治里表现得有声有色，但是这个政治崩解于一夕之间，而现有的文化输出市场也随之成为泡影——普罗科菲耶夫从此再未踏出国门，而在自己家乡也有许多改变。在莫斯科—柏林的结盟下，《塞米欧·考特科》更是没有演出的机会。萧斯塔科维奇（《见证》中的萧斯塔科维奇）以他惯有的敏锐来解释这件事，把这首作品的命运和当时正在波修瓦上演的瓦格纳作品（这次演出是政治因素所促成）作了对照：

[ 普罗科菲耶夫的 ] 歌剧以德军在 1918 年占领乌克兰为题。德军被描写为残忍的屠夫；当普罗科菲耶夫写出这出歌剧的时候，这和当时的政治背景相合……《塞米欧·考特科》由梅耶霍德亲自搬上史塔尼斯拉夫斯基歌剧院 (Stanislavsky Opera Theatre) 的舞台。这是他在这座剧院制作的最后一部作品。事实上，他根本还没把它给完成，在排练期间就遭到逮捕；他不再是梅耶霍德了，而是“塞米欧尼奇” (Semyonich)。据称这是地下破坏分子给他的昵称。这真是荒谬。很可能是审讯者在文件中读到一些报上对《塞米欧·考特科》的报导，而想出了这个名字。

导演遭到逮捕，而这部作品却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继续下去。这是这个时代的恐怖标志之一；一个人消失了，但每个人却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个人在负责这部作品，这部作品在他的执导之下，只对他有意义。但是这个人不在了，蒸发了，却没有人出来谈一句话。梅耶霍德的名字，一瞬间就从人们的谈话里消失。就是这么回事……

普罗科菲耶夫转而求助于他的朋友爱森斯坦。“朋友”这个词在这儿只是依惯例来使用的，特别是用在像爱森斯坦和普罗科菲耶夫这样的人身上。我怀疑这两个人是否需要朋友。

他们两个都是孤高自傲，不过至少普罗科菲耶夫和爱森斯坦彼此敬重。爱森斯坦曾是梅耶霍德的学生，所以普罗科菲耶夫请这位电影导演将《塞米欧·考特科》续完。

爱森斯坦拒绝了。政治气氛到那时已有了改变，在那么那个时候攻击德国人，即便是在歌剧里，也是不允许的。看来这出歌剧前途不妙。为什么要卷入这件事，冒政治上的风险？所以爱森斯坦说：“我没时间。”但是我们知道，他有时间拍《女武神》(Valkyrie)。

这两部制作后续的演变非常非常有意思。《女武神》的首演盛大举行，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以及纳粹派驻的大使都出席。报上的评论一面倒，给予热烈的好评。一言以蔽之，这是在艺术阵线上的另一次胜利。而《塞米欧·考特科》惨淡登场。这部作品的演出是不要德国人出席的，而由一些不知名的“占领军”到场。不管如何，当权派心里头并不高兴。斯大林很怕激怒德国人。每一次排练都有外交部人民委员会的官员到场，皱着眉头，然后

---

Semyonich 意即“塞米欧之子”，以虚构的剧中人物来入人于罪，果然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是刀笔吏的功夫了。

离开，什么话也没说。这是个很糟糕的现象……这个半死不活的制作就这样重获生机，而  
没有一个人喜欢它。

几经激烈尖锐的争辩之后，这出歌剧从剧码上抽换下来。在往后的数年中，只要对现代主义稍微表示同情就被当成罪恶的年代里，这出戏的拥护者往往投以怀疑的眼光。

（摘自《普罗科菲耶夫》，台湾智库股份有限公司出版，题目系编者所  
加）

## 思想书廊

### 《保守主义》

刘军宁著

中国社科出版社 1998 年 7 月出版定价：16.00 元

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构成了当代世界上三大主流意识形态。在中国，对保守主义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由于缺乏认真的学术研究，对保守主义的曲解与误解甚多。保守主义的一个重大特色就是轻视抽象的理论，注重实践和经验，因而缺乏系统严密的理论体系。不过，为了更好地了解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对其观点和立场做某种概括又是必不可少的。此书对保守主义并不持“价值中立”的态度，而是持明确的同情性理解的态度。

此书不是保守主义的百科全书，只是试图对作者所认识的、理解的保守主义的核心思想作初步的描述和阐发。

## 萧斯塔科维奇：斯大林—日丹诺夫时代

[英] 大卫·古特曼 白裕成译

然而忧患就要降临这个以外力干预文学的国家了。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萧斯塔科维奇完成第九号交响曲的同一年，他的朋友米凯尔·米凯洛维奇·左琴科（Mikhail Mikhaylovich Zoshchenko）发表了一个短篇故事，标题是《猴子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a Mon-key），我们可以肯定，萧斯塔科维奇兴味盎然地读了这个故事。在这篇作品里，这位49岁的讽刺文学作家暗指，关在动物园里的猴子都还比苏维埃人民在“铁栏外”的生活要来得好。左琴科曾受官方斥责，不久就发现自己和作品同被挑出来公开羞辱。在1946年8月14日的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中，他和列宁格勒的女诗人安娜·阿克玛托娃（她的家人有的惨遭处决，有的遭到囚禁）受到严厉的攻击，原因是他有“中产阶级的堕落”。接着，战后新上任的文化头子安德列·日丹诺夫再加批判。日丹诺夫是斯大林的手下爱将，他发起的文化整肃绝不亚于战前叶佐夫胥契纳时期的政治整肃。日丹诺夫斥责左琴科“习于嘲讽苏联生活、现状与苏联人民，并以空洞的娱乐和无意义的戏谑做幌子”。日丹诺夫的指控并不乏证据——而且还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1922年，左琴科就已加入了一个青年文学团体“塞拉皮恩兄弟”（The Serapi-on Brothers）。发表各种宣言在当时蔚为风尚，于是他们也发表了自己的反潮流信条，其中包括这段与苏维埃传统相左的论点：“我们不为宣传目的而写作。艺术是真实的，一如生命本身。而且，一如生命本身，它既没有目标，也没有意义；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无法不存在。”这种论调在1922年的某些团体里就已经很不受欢迎，在斯大林统治下的战后俄国更是难逃受罚的命运。至于阿克玛托娃呢，她的“悲观主义”、“个人主义”以及她遁入私人的情感世界以逃避现实，也是同样“可鄙”。日丹诺夫指出，由于《星星》（Zvezda）与《列宁格勒》两个文学刊物的编辑刊登这两位作家的文章，还协助、怂恿他们，所以他们才能利用作品来腐化列宁格勒的青年。官方认定这种文学属于圣彼得堡与青铜骑士的皇权时代，而非属于崭新而神圣的列宁时代。

日丹诺夫受过高等教育，能力强而心性冷酷，他曾在纳粹围堵列宁格勒期间负责军事防卫事宜。亚历山大·渥特指出，这位日丹诺夫在围城时，还狠心决定在必要的时候不惜牺牲市民，任其饿死，以确保有足够的军粮。他是最得斯大林信任的助手（他死后的名声甚至在反斯大林风潮之后还能不坠），在入人于罪一事上口才便给，制定政策并贯彻实施。他能以政客的狡狴来运作文化官僚体系，而且，他在这么做的时候还能表现出他对时下文学与艺术似是而非的了解。

他策动的文化整肃运动等于是国内反映出斯大林战后的外交政策：在战争时期的放松之后，重申共产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势不两立，并致力扩张苏俄在东欧地区的势力范围。分隔东西德的柏林围墙是铁幕赤裸裸的象征，铁幕把苏俄及其附庸国和所谓的“自由世界”分隔开来。东西方因此展开了武力竞赛，努力透过军事优势来维持“均势”。1949年，俄国试爆第一颗原子武器：拥有并发展“核子吓阻武力”便成为双方战略上的中心课题。在那段时间里，“和平”这个字眼在铁幕两边都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的武器，而文



化被迫为之服务。

日丹诺夫先后对付了文学、戏剧与电影之后，矛头便转到音乐上。1947年是革命的30周年纪念，而作曲家在这个重要的场合里似乎不够重视他们对国家应负的责任。普罗科菲耶夫提供的作品充其量不过是把其他作曲家的旋律混起来的集锦而已；普罗科菲耶夫写了一首节庆诗篇与清唱剧《兴盛吧，伟大的国家》（Flourish, Mighty Land），花的力气比他刚谱写的第七号交响曲要少得多；而恰恰图良（Khachaturian）献上的是一首写给交响乐团的“交响诗篇”，还加上管风琴以及15支以上的小号，渥特说它是“嘈杂、浮夸的卖弄”。这“三大家”是日丹诺夫现成的箭靶——整肃音乐界的时机到了。

渥特指出，日丹诺夫对萧斯塔科维奇怀有“特别的恶意”，因为这位作曲家——

太含蓄、太精致，难见容于1948年的莫斯科。他完全是俄罗斯的、完全是苏维埃的，他自始即生活在苏维埃党之下，而且几乎没出国门；这使得他的处境更为恶劣，况且，日丹诺夫有种感觉，萧斯塔科维奇虽然是道地的俄罗斯人，却也是典型的列宁格勒产物——列宁格勒虽然是日丹诺夫从德军手中救回来的城市，但他始终怀疑它骨子里太过独立、太过反叛。那细致的童稚面孔，那淡蓝色的眼睛似乎知道太多事情，实在令日丹诺夫不悦。1946年中央委员会的文学改革由日丹诺夫对列宁格勒作家首先发难，这或许也是意料中事了。

其实是一位二流作曲家穆拉德里（Muradeli）的作品让日丹诺夫对乐界现况的攻击提供了藉口。这位倒楣的作曲家写了一出歌剧来讨好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Georgia），但是却因所选的主题有了差错，因为这出歌剧颂扬一位战前的人民委员，后来却死于斯大林的整肃行动，说不定还经过这位苏维埃领袖的默许。斯大林本人在1947年12月看了这出歌剧的演出，这出歌剧的命运和萧斯塔科维奇1936年的《马克白夫人》一样，也未能得到斯大林的认可。日丹诺夫在1948年1月主持三天的作曲家会议，他以这个事件作为开场白：

中央委员会最近参加了穆拉德里的新歌剧《伟大的友谊》（The Great Fellowship）的试演。各位可以想像，连续十年没有任何新的苏维埃歌剧推出，我们对这出新的苏维埃歌剧寄以热望。很可惜，我们的期望落空了。这出歌剧并不成功。何以如此呢？

第一点，关于它的音乐部分。它没有一段旋律能让人记得住。音乐并没有“深印”在听者脑中。现众约有500名，算是相当庞大而有水准，但是并未对这出歌剧里的任何一段有所回应……让人感到沮丧的是和声的缺乏，角色情感在音乐上的表现不够，常有乐段听来不和谐……管弦乐团运用手法拙劣。大部分的时候只用了几件乐器，而整个乐团在出人意料的地方又突然乐声大作。在抒情的乐段里，突然爆出鼓声，而英气勃发的乐段居然伴以悲恸哀伤的音乐。虽然这出歌剧讲的是北高加索地区诸民族的故事，苏维埃政权在该地建立的一段历史，但音乐却迥然不同于那些民族的音乐……

日丹诺夫在演讲中想起这次乃是针对穆拉德里的歌剧所召开的第二次会议（在第一次会议当中，斯大林与安排中央委员出席演出的波修瓦剧场的行政首长发生争执，弄得场面很难堪）之后，就提到穆拉德里曾经将他的“过失”归咎于音乐院教育以及乐评家。穆拉德里表示，是他的乐界长辈鼓励他忘掉古典作品，去“赶上时代”的。

“让我们来看看这一切究竟是真是假”，日丹诺夫接着说。“这一点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穆拉德里的歌剧所犯的 error 和以前萧斯塔科维奇同志

在歌剧《莫臣斯克的马克白夫人》犯下的非常类似……”他引用了1936年1月《真理报》上批评萧斯塔科维奇歌剧的文章《混沌而非音乐》（前面已经提到，这篇文章据信是出自日丹诺夫的手笔），他之后接着表示：“党在1936年所斥责的错误到现在还在蔓延。”他在结论中说道：

如果中央委员会不应该为现实主义与我们的古典传统辩护，那么请直说……作曲家联盟及其组织委员会里有些什么形式的政府？这个政府形态是民主的吗？它以建设性的讨论、批评与自我批评为基础吗？还是比较像一个寡头政权，一切都由一小撮作曲家及其忠实的侍从——我指的是阿谀奉承的乐迷——来统理，而与真正的建设性讨论、批评与自我批评天差地远。

三天的讨论就这么布置了起来，同道的作曲家被迫互相残杀。以萧斯塔科维奇与普罗科菲耶夫为首的一小群“精英”作曲家将成为此番整顿的待宰羔羊，等到穆拉德里在一篇事先准备好的演说中答应要悔过之后，各个音乐家便根据各自分配到的时间上台说话——有些人（例如属于轻音乐阵营的作曲家）巴不得狠咬官方贬斥的受害者，有一些采取观望态度，其他人则顾左右而言他，只有少数人的演讲还保有尊严、深思琢磨和分寸。由于音乐必须要“众人皆解”——日丹诺夫的话说得很清楚——因此有些作曲家就不得不谨慎行事。而这些作曲家其实也列在日丹诺夫的黑名单上——萧斯塔科维奇、普罗科菲耶夫、恰恰图良、波波夫（Popov）、卡巴列夫斯基（Kabalevsky）、谢巴林（Shebalin）与夏波林（Shaporin），最后这位还是台下的人提议处置的。自然，名声愈大的人，就愈该为这个事态负责。

在会议的最后，萧斯塔科维奇为自己，以及为所有严肃而负责任的作曲家发言，批评穆拉德里“过度将自己的失败怪罪别人和外在的环境”。他表示“每一位作曲家最重要的就是为自己的作品与失败负责任”，之后他称赞了苏维埃音乐正迈向宽广的路途。他最后的一番话谦虚、真挚、尽责而恭谨，并没有透露出他个人的感受，但是却流露出一丝悲伤：套一句传统俄国谚语，他现在已经学会“以亲吻来表达唾弃”：

在我的作品里，我失败过很多次，但是我在创作生涯中，始终以民族、我的听众，以及那些养育我的人为念；大众应该接受我的音乐，这是我努力不懈的事。我向来虚心接受批评，时时试着更加努力，以求百尺竿头。此刻，我聆听批评，以后也会继续听下去，更会接受批评的建议……

我认为，这三天的讨论将有极大的价值，尤其是如果我们仔细研读日丹诺夫同志的演说。我和其他人一样，都希望能够取得他这次演说的稿子。详尽研读这份杰出的文稿将会我们的工作带来无比的助益。

日丹诺夫的会议与之后的决议都收到预期的效果。作曲家联盟原为萧斯塔科维奇和一群音乐家共同领导，现由一位活力充沛的年轻作曲家兼行政官员赫连尼可夫（Khrennikov）取而代之，他新官上任就进行了一次大革新。对萧斯塔科维奇来说，这也表示他在列宁格勒与莫斯科音乐院的教授工作将大受限制，然而更显邪恶的是，他受斯大林底下的人任命，穿梭在当时流行的国际和平会议中，成为文化的表征。或许，这是个居心狡猾的惩罚：是不是这位遭到贬谪的苏维埃天才所谱写的音乐又散出可疑的味道，所以故意派他加入文化使团，访问外国，并被迫发表正式演说来赞美苏维埃政权？这位作曲家担负此类任务时的照片一点也看不出胜任愉快的样子。在这些年里，他受派出席了华沙（1950年）、维也纳（1952年）的会议，还有最受大众瞩目的1949年3月的美国之行。有人可能会问，赫连尼可夫继任萧斯塔科维奇

在作曲家联盟的职位，为什么他没有获选参加这东西方意识形态交手的场合。（萧斯塔科维奇在美国发表的演说显然有反中产阶级的政治意味。）但讽刺的是，萧斯塔科维奇在自己的国家虽被斥为“形式主义”与“堕落的中产阶级”，却是举世公认的苏维埃天才（除了病弱的普罗科菲耶夫之外，因为他的西化背景而不适合这个称呼）。在西方世界的眼中，他是谜样的人物——一位大作曲家，他的音乐以苏维埃政权下屈从的受害者身份，诉说了深陷政治中的人性。即使他回国之后，磨难也无法止息，因为苏维埃刊物当然会缠着要他发表他对“颓废西方”生活（想必只是很浮面）的印象，这项工作他倒还愿意去做。他告诉《新世界》（Novy Mir）的读者，他在机场遇到一位记者向他问候，对方管他叫“小萧”，问他喜欢金发女郎还是棕发女郎；这个报导显然在莫斯科与列宁格勒很受欢迎。不过他是个苏联作曲家，是个有家室的人，而不是记者，这趟旅程疲惫不堪，对他个人来说也很不愉快，因此可想而知，这不过是浪费时间罢了。

此时正值以“大计划”光耀斯大林政权的时期，像是莫斯科国立大学的建筑物便是典型——一幢 32 层高的“结婚蛋糕”式建筑物，顶部有个尖塔——它花了四年才完成。然而此种计划只不过掩饰了一个文化沙漠。艺术创作都受到压抑，艺术家必须使出浑身解数来应付这个局面。一些重要人物得以不为柴米酱醋烦恼。大导演爱森斯坦（他也在 1946 年受到谴责）和普罗科菲耶夫早逝——爱森斯坦以 51 之龄，于 1948 年逝世，曾经与他合作过一些经典名片的普罗科菲耶夫则于 1953 年逝世，享年 61。1949 年，大学者鲍里斯·阿萨菲耶夫去世，他是一位识见过人的作曲家兼理论家，曾经支持过萧斯塔科维奇，并影响了之后几代的苏维埃音乐家，索尔金斯基是其中之一。（阿萨菲耶夫一直很崇敬萧斯塔科维奇，他曾经说过：“我们只能为这位才子感到骄傲，他是如此独特、如此有创意，又如此重要……”）翌年，米亚斯可夫斯基（Miaskovsky）也去世，这位写了不下 27 首交响曲的作曲家也没能逃过开会指摘他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这位绝望而痛苦的老人臣服于苏维埃政权，他对艺术的忠诚却不妥协。在苏联乐界这种贫瘠状态下，却出现了新一代的音乐家——大提琴家罗斯托波维奇（Rostropovich，生于 1927 年）、钢琴家李希特（Richter，生于 1914 年），以及小提琴家大卫·奥依斯特拉赫（David Oistrakh），萧斯塔科维奇的第一首小提琴协奏曲即为他而写，此曲也是日丹诺夫会议之后遭到“延期演出”命运的第一首作品。

继续谱写严肃作品，等到时机更友善的时候再演出——萧斯塔科维奇在 1948 年二度失势之后，这便成了他保持诚实创作的方式了。毕竟，他早已习惯于这种作法。1936 年 12 月，他撤回了第四号交响曲，而这首作品还在等待演奏的机会。（他在 1946 年为此曲准备了一个双钢琴版本，由此可知他认为此曲最后终将发表，他也一直很在乎它。）既然现在没有机会发表任何作品，只能制作最简单易懂的苏联宣传，他也就孜孜投入电影配乐与应景庆典清唱剧的创作工作，在这些作品中，清新而旋律优美的《祖国之歌》（Song of the Motherland，1952）尤其吸引人。同时，他继续从事大型作品的创作，包括前面提到有交响特质的第一号小提琴协奏曲，后来又有了两首弦乐四重奏——第四号与第五号，两首都是严肃而极为个人的创作。特别是在以交响乐方式来构思的第五号四重奏中，完全看不出有“迁就听众”的地方。相反地，此一音乐源源不断，毫不避讳内心那种为了达致稳定而引起的猛烈挣扎，这种挣扎和他最好的作品中的快乐结局总免不了要格格不入。这首曲子的不

和谐音可以拿日丹诺夫所说的话来衡量：“违背了一般人的听觉法则……不好、不和谐的音乐，对人的身心活动有负面的影响。”不过，日丹诺夫（他在1948年8月身亡）与斯大林（他的死期也近了）都听不到这首曲子。

在小提琴协奏曲（第二乐章）与第五号四重奏的开头，我们第一次接触到一个动机主题，嵌入了这位作曲家的音乐签名——DSCH，这几个字母出自他名字的德文拼法，及其相应的德式音名：D、降E、C和B。在眼前的这个时候，作曲家公然发展一己的独特风格，一切后果都得自己负责，而萧斯塔科维奇却选了这个时候用了这个动机，这正表示了一个细微但颇堪玩味的征象，表示萧斯塔科维奇拒绝在他的艺术中向斯大林的政权卑躬屈膝。斯大林一死，他就写了第十号交响曲，这个动机在曲中成了整首交响曲的胜利动机。我们在这些作品里注意到萧斯塔科维奇逐渐将他所有的作品视为彼此相关连的整体，他使用的音形或动机让人很容易就附会音乐之外的意义。（他在这方面颇近于舒曼。）另一首谱写完成，但暂未演出的是1948年的联篇歌曲《犹太民间诗篇》（From Jewish Folk Poetry）。萧斯塔科维奇在这部作品里把革命之前的犹太裔同胞所受到的苦难看成是他自己在受苦，在最后三首歌里，他对于他们在苏俄中刚找到的快乐同感欢庆。

萧斯塔科维奇曾经说过：“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任何想要表现出合宜举止的人都不应该反犹太。”他回想这些歌曲是如何成形的：

在战后，我有一次经过一家书店，看到一本犹太歌曲集。我对犹太民间传说向来很感兴趣，而且我想这本书或许会有一些旋律，但是它却只有文字。在我看来，如果我选出一些文字，然后将之谱成音乐，我就能诉说犹太民族的命运了。这似乎是一件要紧的事，因为我看到反犹太主义正在我四周滋长。

他不敢让人听到这些歌曲。大家都知道斯大林的性格里有反犹太的成分。拉诺·辛利就指出：

在斯大林的战后统治下，反“四海为家者”的运动刻意蕴含了一丝反犹太意味在里头，虽然在迫害与被迫害者中都有犹太人。1952年8月12日，斯大林处决了一群有名的犹太人，其中也有作家在内，因为他怀疑这些犹太人计划将克里米亚（Crimea）变成犹太人的国土。他那时也在策划陷害一些医生（主要是犹太籍），指控他们用医术来暗杀地位重要的病人，并以此作为全国整肃运动的基础。

我们在萧斯塔科维奇后来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受反犹太主义刺激，忿而抗议。而这也是斯大林的战后政策引起他第一次的抗议。

当然，这位作曲家的抗议形式在此时尚不为帕斯捷尔纳克等同事所知，虽然帕氏本身反叛的意念已经开始滋长。帕斯捷尔纳克只能从萧斯塔科维奇表面上卑躬服从的行为来判断。奥加·伊文斯卡亚（Olga Ivinskaya）在回忆录中写道：

对狄米屈·萧斯塔科维奇的攻势展开时，BL（包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决定要写一封信来鼓励萧斯塔科维奇。他起草之后拿给我看。我记得我对他说：“等一等再寄出去。你看着好了，明天他又会忏悔，开始捶胸自责。”

但是BL背着我把信寄了出去。结果我说的话都一一应验，他羞得无地自容。我还记得BL说过的一句话很能表现他的性格：“噢，上帝，要是他们懂得保持缄默就好了。即使连闭嘴都可以表现勇气！”

在萧斯塔科维奇受到检审的时候，他只有两首严肃作品演出。一次是在“日丹诺夫统治”的初期（矛头还没有转到音乐上的时候），莫斯科在1948年12月16日第一次听到贝多芬四重奏团演奏第三号弦乐四重奏，这首乐曲

题献给这个团体。这场首演予人极佳的印象。到场聆听的拉宾诺维奇回忆起一位著名俄国钢琴家康斯坦丁·伊古诺夫 (Konstantin Igumnov) 教授当时所说的话：

你知道吗，那个人对生命的透视与感受，比我们和其他的音乐家加起来，还要深上一千倍。

亚历山大·渥特把这首作品放在日丹诺夫会议的脉络下来讨论（它在这次大会上被斥为“形式主义”），他说道：

在他这首绝佳的第三号四重奏里，无疑有一种深切的悲剧感，濒临悲观，在此，一位现代苏联人的个人苦痛先放到一段类似巴哈极缓板的样式中，而在末乐章里又放到贝多芬式的轮旋曲里。

另一首作品是一组前奏曲与赋格，灵感来自一位苏联钢琴家的演奏，1950年，为纪念巴哈逝世两百周年，在莱比锡举办第一届国际巴哈大赛，这位钢琴家以巴哈的《四十八首前奏曲与赋格》拔得头筹。萧斯塔科维奇这首作品于1952年12月23日与28日在列宁格勒首演，担任演出的塔提亚娜·尼古拉耶娃 (Tatiana Nikolayeva) 后来在1974年回忆她和这部作品的渊源：

第一届国际巴哈大赛于1950年举办。这是一件盛事，它其实等于是一个全国庆典，各方宾客云集，狄米屈·萧斯塔科维奇的地位尤其崇隆。我当时年纪很轻，刚从音乐院毕业，不过我鼓足勇气参加比赛，把巴哈的《四十八首前奏曲与赋格》从头到尾弹完，获得了首奖。如果是这个因缘让萧斯塔科维奇写了他自己的二十四首前奏曲与赋格，那么我实在是打心底感到高兴。

这一部分为两册的曲集令人想起约与萧斯塔科维奇同时的德国大作曲家亨德密特，他在1942年就已经继巴哈《四十八首前奏曲与赋格》，谱写了《调性之戏》(Ludus Tonalis)。萧斯塔科维奇这些前奏曲与赋格虽然后来在俄国有很多人演奏，并广受听众喜爱，但在1950年创作之初，却是冒着意识形态错误的危险。柯尔狄许 (Keldysh) 教授在会议的第二天就这么说：

我们在某些作曲家身上见到的新古典倾向，乃是由西方衍伸而来的，而且是逃避主义的一种形式。我们无法以巴哈的风格来表达苏维埃的现实与苏维埃人民的情感……

“为音乐而音乐”老掉牙的罪名总是可以用在盲目的迫害中。可以想见，在这样充满敌意的环境中，萧斯塔科维奇转向电影配乐来继续生存。但是在他的“秘密”作品中，他继续为未受意识形态污染的耳朵来谱曲，世人听到这些作品的时机已经不远了。

（摘自《普罗科菲耶夫》，台湾智库股份有限公司出版。题目系编者所加）

## 思想书廊

### 《本雅明思想肖像》

刘北成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4 月版 定价：17.50 元

听到本雅明自杀的消息后，他的挚友布莱希特说：“这是希特勒给德国文学界造成的第一个真正损失！”

作为犹太人，本雅明难逃二次世界大战的劫数，作为杰出的思想者，他在哲学、文学等领域给后人留下了巨大的财富。

本雅明一生实践着一种“诗意思维”，本书作者除了描述本雅明的生平记事，更着重对他的主要著述做了述评。透过本雅明坎坷痛苦，漂泊无依的一生，和他的美学体验背后怀有的一种更深刻、更悲观的历史哲学意识，我们将思考我们自身的生存处境。

## 萧斯塔科维奇：解冻年代 [英] 大卫·古特曼白裕成译

如果感觉丧失，下场便是虚荣，  
停顿你的计划，除非你的艺术  
透过原力，从灵魂中绽放出来  
紧紧抓住每一颗倾听的心灵。

歌德 (Goethe)：《浮士德》(Faust)

辛利曾经写到斯大林在 1946 至 1952 年间对艺术的严密控制——

导致知识与文化停滞不前，甚至连斯大林手下的官员都开始对自己造成的结果表示不满。

同样是在这方面，葛列伯·史楚夫 (Gleb Struve) 回忆道：

1952 年，真理报掀起一场辩论，后来把这次辩论称为“无冲突理论”。他们提醒苏维埃作家……苏维埃人民的意识里还留有相当的资本主义残毒，而苏联的现状离理想还远，苏维埃生活中还有许多邪恶之处，也有许多“负面性格”。

史楚夫引述《真理报》的话：“我们用不着怕暴露出缺点与困难。我们还是需要果戈里与谢德林 (Shchedrins) 之类的艺术家。”

如果，这样的呼吁能引起萧斯塔科维奇的注意（而且如果党对文学下的指令能有效地事前警告整个文化气氛已有所变化），或许会让他鼓起勇气面对未来，纵然急于采取行动总是不智。

1953 年开年不祥，发生了所谓的“医师阴谋”，有九位著名的医生（大部分是犹太籍）以向苏维埃领导人下毒的罪名被捕。这显然是大整肃的前兆，然而伴随这次戒严令的宣传行动到了 2 月 25 日却无疾而终。3 月 1 日夜里，莫斯科电台宣布斯大林中风，情况严重，之后每天报导斯大林的健康状况，内容互相矛盾。最后，到了 3 月 6 日，媒体正式宣布斯大林已于日前去世，党中央委员会与内阁呼吁民众团结并保持冷静。灵柩暂厝官邸之后，即由八名权位最高的政治人物（包括马林科夫 [Malenkov]、莫洛托夫 [Molotov]、贝利亚 [Beria] 和赫鲁晓夫）护柩，前往陵寝，斯大林的遗体经过防腐处理，与列宁的遗体并列在玻璃棺内。

从表面看来，虽然是万民同悲，颂声连连，但是人民心里头却很不安。他们害怕取代斯大林主义的东西会更糟，几个星期过去了，“集体领导”成了新的口号，艺术家与知识分子感觉到，在日丹诺夫的漫长酷寒之后，冰雪开始解冻。

“医师阴谋”事件撤销控诉。权力转移的第一个征兆是斯大林的警察头子贝利亚于 7 月 10 日被捕（他和几名共犯在 12 月 23 日遭到处决）。爱德华·柯兰萧 (Edward Crankshaw) 写道：“1953 年夏末，在贝利亚被捕之后，每一个人都开始歌唱，起初还是小心翼翼的，突然之间汇流在一起，于是歌声大作。”在文化阵线上，11 月 27 日的《真理报》刊了一篇批评艺术标准化的文字。

以一个模子来塑造所有的艺术就等于抹煞了个人的独特性……社会主义现实论为艺术创作者提供了无限的远景，也提供了最大的自由，让艺术家能够表达个人的特色，并发展各式各样的艺术类型、潮流与风格。因此，鼓励艺术的尝试、钻研艺术家的个人风格，以及……承认艺术家有不受干涉的权利，以便大胆辟出新的道路。

萧斯塔科维奇抓住斯大林去世所带来的大环境的改变。11月13日，贝多芬四重奏因在莫斯科演出他搁置已久的第五号弦乐四重奏——这首作品架构庞大，演来十分费力，同时也预示了第十号交响曲。然后，第四号四重奏在12月3日首演，这首作品的后半部压抑而静默，它含藏了一些黑暗，甚至是邪恶。末乐章是一首舞曲，让人想起了第二号钢琴三重奏里的犹太死亡之舞。12月17日，穆拉文斯基指挥列宁格勒爱乐管弦乐团在作曲者的家乡（这一年正巧是列宁格勒建城250周年纪念）演奏第十号交响曲，这首作品后来被公认为他最伟大、最完美的成就。这个情况和第五号交响曲一样，我们必须停下来，看看这个成就——这首作品成了一个重要辩论的主题，它触及创作自由与苏俄政府管制的问题。在这场辩论中，萧斯塔科维奇与他的第十号交响曲获得胜利；不过，根据鲍里斯·史瓦兹指出，萧斯塔科维奇以艺术创作者的身份发言，这是这场辩论中许多乐界同事勉强授予他的——特别是那些在斯大林/日丹诺夫时代窜起的人。

关于第十号交响曲的资料，最有趣的或许是作曲家和友人佛可夫之间的交谈。他告诉佛可夫，这首作品描写了斯大林，而第二部分的诙谐曲就是斯大林的音乐肖像。这首音乐——愤怒、暴戾、猛烈地敲击——绝对可以视为邪恶势力的音响化身，还有谁比斯大林更适合代表此中呈现的残酷无情？

小说家法捷耶夫（Fadeyev）曾称这位领袖兼导师为“有史以来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但是帕斯捷尔纳克称他是个“疯子与谋杀犯”时，则显然更接近真相。我们有彼得堡诗人孟德斯坦（Mandelstam，30年代整肃运动中的受害者）对斯大林所作的文字画像，由帕斯捷尔纳克的红粉知己奥嘉·伊文斯卡亚传给我们。它的内容如下：

我们活着，对我们脚下的土地充耳不闻，  
十步以外就没有人听得见我们说的话。  
然而只要有那么半句交谈  
隐居克里姆林宫里的人就会接到密报。  
他的手指肥大如蛆  
而话语决断如铅重，从他的唇坠下  
他的蟑螂触鬃邪恶地摆动  
他的长统靴隐隐闪烁。  
他的周围有一群人嘈杂争宠——  
阿谀奉承的半人供他玩耍。  
他们嘶吼、呜吟或嚎叫  
随着他喋喋不休或伸手一指，  
一个接一个铸造他的法律，以便掷出  
有如马蹄铁一般地砸在人们头上、眼睛或鼠蹊上。  
而每一次杀戮都是恩赐  
对宽胸的欧塞特（Ossete）来说。

萧斯塔科维奇的音乐正可为孟德斯坦的诗做恰切的补充，而且传达出同样的隽永与简洁。

第十号交响曲有多少标题交响曲的成分呢？在首演之时，萧斯塔科维奇对其含义闪烁其词，不过并不否认其中可能有一个秘密的主题，而且这首作品似乎的确需要加以诠释。这位作曲家写道：“作家喜欢说自己：我试着、我想要诸如此类的话。但是我想我会避免任何这类的说法。有一件事我要说：



在这首作品中，我想要描写人类的情感与热情。”他后来和朋友聊天，朋友问他是否会写一篇作品的布局说明时，据称他是这么回答：“不，让他们听了以后，自己去猜。”

这首交响曲的“含义”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想像。或许最神秘难解的是第三乐章，它似乎把一系列的主题与动机当做密码来使用。听者在这一段需要以欣赏瓦格纳音乐的方式——列出每个主导动机及其意义。在这个乐章后半部出现了12次的法国号五音呼唤，这要怎么来解释呢？它代表了疑问，还是肯定？它与萧斯塔科维奇的动机 DSCH 一直相连，而这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呢？这音乐的舞步踟蹰不前，混杂着希望、欢乐、绝望与挣扎，在在显示它受到音乐以外的刺激：或许这种情绪的混置源自于斯大林的去世——解脱、不安、对未来的希望，但也有着怀疑与恐惧。绵长的第一乐章忧郁阴沉，在乐曲高潮处的动机回溯到阴郁而悲剧意味浓厚的第八号交响曲。难道这反映了20多年来的苦难吗？更有甚者，这个乐章到处可以见到一个由大提琴与低音提琴合奏的主题，其忧思忡忡的起伏令人想起李斯特在《浮士德交响曲》里使用的主题。萧斯塔科维奇是否在暗示听众，《浮士德》传奇——人不合追问天地万物的奥秘——正是此曲的灵感来源之一？帕斯捷尔纳克翻译歌德《浮士德》的俄文版在同一年出版，这可能并非纯属巧合。终乐章的导奏似在摸索，寂寞的呐喊穿破黑暗，继之而来的快速音乐听来很是乐观自在，但各个主题又成剑拔弩张之势（回顾了诙谐曲中的斯大林统治），最后阴霾尽散，而 DSCH 四个音以法国号与隆隆鼓声宣告了它的无上威势。

萧斯塔科维奇深信音乐是一种组织力量，它有激起听者各种特殊情感的力量。早在1931年，他接受美国记者萝丝·李（RoseLee）的访问时就曾经说：“贝多芬的第三号让人发现挣扎的快乐”，贝多芬“希望能把新的理念带给大众，鼓动他们反抗统治者。”似乎他在1953年就感觉到时机已成熟，可以开始主张艺术家的性格，以新的驱力追求更真切的表达，并反抗斯大林的统治。斯大林的去世，以及之后发生的政治事件似乎正是大好良机。就某种意义而言，第十号总结了谱写于斯大林时代的七首（而非三首）“战争”交响曲——从第四号开始。此曲似乎多在回首黑暗而绝望的时刻，而未乐章则似乎透过个人的自我肯认，而为听众带来希望。这样一个信息绝不可能是“反革命”的。相反地，萧斯塔科维奇以艺术家的直觉而感受到这点——时机已然成熟，应该将列宁革命的社会理想（这是萧斯塔科维奇真心信服的理想）与斯大林（他是托洛茨基口中的革命掘墓者）采取的路线做一个划分。虽然斯大林在苏维埃声望、社会福利与经济方面有所斩获，但牺牲的人命太多。既然恐怖政治的煽动者已经去世，萧斯塔科维奇的交响曲邀请苏维埃听众在经历了20多年的恐怖政治之后，以人而非政治的观点来看看他们当前的处境。

评论家与作曲家都很重视这个作品。它成了轰动一时的事件。1954年3月与4月，作曲家联盟开了为期三天的研讨会。的确，这位创作天才与日丹诺夫徒众之间的辩论早在会议展开之前就已经开始。《苏维埃音乐》（Sovetskaya Muzika）一月号刊登了萧斯塔科维奇的一篇文章，标题为《寻求新方式的快乐》，他在文中表示：“以个人的浅见，联盟不应该‘保护’我们的作曲家，不让他们去探索新的领域，不能在未被征服的艺术路上行动……”他做此诉求时，得到了同侪恰恰图良的全心支持，因为恰恰图良在第十号交响曲的首演前不久发表了一篇文章，支持更大音乐自由度的必要。

这一切仿佛是在支持作曲家破除斯大林影响的官僚运作。（不知道萧斯塔科维奇与恰恰图良这类论点的后台为何？）另一方面，在刊载萧斯塔科维奇文章的同一期里还有一篇文章，是德泽金斯基（Dzerzhinsky）的“为写实艺术而战”。德泽金斯基（杰洛·亚伯拉罕曾经称他为“苏俄歌剧的首要供应者”）的作曲技巧远不及萧斯塔科维奇：让人不得不怀疑他的动机出于嫉妒。姑不论实情为何，这位谱写《顿河静静流去》（And Quiet Flows the Don）的作曲家在文中抨击萧斯塔科维奇的近作，包括《二十四首前奏曲与赋格》以及第五号弦乐四重奏，还有点虚伪地问到萧斯塔科维奇与其他音乐家在“和形式主义幻想所导致的后果艰苦奋斗时”，是否获得足够的协助。这样一篇带有“我比你圣洁”意味的文章，其目的显然是要将第十号交响曲的作曲者绑在日丹诺夫配给他的位置里，这正可代表之后在3月29日针对这首交响曲展开的辩论论点。在辩论开始之前，萧斯塔科维奇自己批判了这首新的交响曲，表面上谦虚了一番——就太短或太长的段落加以技术上的批评——故意避免提及特定的内容或含义。然而，作曲家与论者对于这方面倒有很多意见。恰恰图良在研讨会之前已经盛赞这首作品“肯定生命”，蕴含着“深刻的情感与哲学内容”。他写道：“身为一位作曲家，我永不厌于赞扬萧斯塔科维奇高超的戏剧安排手法，他能够构筑庞大形式，以动态充塞交响曲的每一个部分，让他的听众聚精会神而不懈。”

在研讨会上，各个作曲家对这个作品的品质似乎是意见一致，但是对于它的信息却意见分歧。至于萧斯塔科维奇违背日丹诺夫当初的路线到底有多严重，这个问题显然教人有一点紧张（在这次会议以及后来对这个作品进行的评析研究中皆然）。于是乐评家鲍里斯·亚鲁斯托夫斯基（Boris Yarustovsky）抒发他的意见，表示这首作品是——

一个严重疏离个体的悲剧。这首交响曲的主角似乎必须独自面对邪恶势力。他心怀恐惧，从纯粹个人（也因此狭隘）的世界往外看着那倾泻而出的邪恶与剧变，心感茫然无依。这样一个对世界的概念非常不同于绝大部分苏维埃人民的经验。

赫连尼可夫也觉得这位作曲家的《森林之歌》（Song of the Forests）比他的第十号交响曲更能代表“我们生活的真相”。热心拥护这首交响曲的人冠之以“乐观的悲剧”、“无冲突理论的结束”之类的言词。且不管这首交响曲得到的专业意见分歧，萧斯塔科维奇还是在1954年夏天荣获官方颁赠“苏联人民艺术家”奖章。之后获得此奖的是恰恰图良与夏波林，夏波林年高65，是一位无可非议的苏维埃老牌作曲家，他也是由萧斯塔科维奇曾经反抗过的那个科萨柯夫—史坦堡学派所训练出来的。由是，萧斯塔科维奇发现自己的确能与倍受尊敬的音乐家相提并论，而他的个人主义也有人人为他辩护。

针对萧斯塔科维奇的新交响曲所展开的“尖锐，时而猛烈”的辩论，让苏联以外对此人及其音乐大感兴趣与好奇，我们荣幸有一份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于1954年8月与这位作曲家个人访谈。以下就是哈里森·萨里斯贝里（Harrison E. Salisbury）先生对萧斯塔科维奇的描述：

狄米屈·萧斯塔科维奇今年将满48岁。他谱写重要作品已有30年了。虽然他依旧给人年轻的印象，但近年来他已经失去那种天真无邪的外貌，曾有人说那像“迷路兔子”。萧斯塔科维奇现在看起来白皙精瘦，他一说到运动是他的嗜好时，眼睛与脸孔都亮了起来，别人很容易就相信他的话……

萨里斯贝里注意到“萧斯塔科维奇的个性严肃与诚挚”，不论交谈或静

默时皆然。他说到他的精神紧张——他抽着烟，手指不停抖动，显然这位作曲家虽然在谈自己，但却急于把自己说成苏维埃作曲家的代表，而非以个人的身份。我们也窥得萧斯塔科维奇在这段时期的家居生活方式，饶富趣味。萨里斯贝里在位于缪斯卡亚广场（Miuskaya）的作曲家联盟进行访谈之后，又到位于莫宅斯基路（Mozhaisky Boulevard）的萧斯塔科维奇住处，然后这么写道：

一个家里有两位音乐家，自然会有一些问题。不过，还好……他拥有一幢五个房间的大房子，其隔间的方式使得他一旦关上工作室的房门，就不再受到外在噪音的干扰，像是他儿子在自己的钢琴上练琴的声音。萧斯塔科维奇家里头有四台钢琴——萧斯塔科维奇的工作室里有两台，都是布鲁特纳斯（Bluthners，他最喜爱的厂牌）。他的儿子有一台，第四台钢琴则放在乡间别墅里……那幢乡间别墅或称避暑地（Dacha），距离莫斯科大约30里，的确是个非常舒适的地方。有一大花园，空间足以打排球，而克里亚兹马河（Klyazma River）很方便游泳。这幢乡间别墅并不属于萧斯塔科维奇，是他向苏维埃政府租来的……他倒并不特别在意工作的地点——在城里或别墅里都行。不过，据他表示：“当电话响个不停时，我偶尔会到乡间别墅去住个两三天。”他开一辆“胜利”（Pobeda）型汽车，这辆四汽缸的车约值1.4万卢布（约合美金3500元）。

一瞥这位作曲家的物质环境便可看出他的地位，以及苏联照顾艺术创作者的方式。算算文化部的酬劳、乐曲的出售，加上演出的版税、斯大林奖等等，这位作曲家的收入相当不错。虽然他的地位所受到的官僚压力以及教学负担（由于他此时重获政府的支持与认可，这类负担将大为增加），但他还是有办法腾出创作所需的时间。

哈里森·萨里斯贝里的访谈证实了此时作曲家之间又可以自由地辩论，而萧斯塔科维奇一有机会就强调他身为苏维埃作曲家乃是胜过西方作曲家。萨里斯贝里报导萧斯塔科维奇的说法：

……苏联艺术家与社会及党之间存在着一种或可称为“固定行为准则”的关系，而在西方世界，至少萧斯塔科维奇相信，艺术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偶然而随便的。在萧斯塔科维奇看来，西方艺术家与其艺术作品在一个以原则为根基的社会中都没有“地位”。但是在俄国，这样的地位，这种与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这样一组原则的确存在，而这种关系其实也界定了艺术家的角色。

在谱写第十号交响曲的时候，萧斯塔科维奇似乎真的发现自己能够表达并将后斯大林理念的新潮流引向个人主义，也有权将悲剧与冲突融入艺术作品当中。西方世界展开双臂迎接这首作品。此曲于1954年10月15日在纽约市首演，欧林·唐斯（Olin Downes）之后写道：

萧斯塔科维奇生于忧患，历尽艰辛才写出这首交响曲。在我们看来，它似乎是他登上大师地位的保证，他的力量日增，之后应该会有更多的作品。

（摘自《普罗科菲耶夫》，台湾智库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题目系编者所加。）

## 思想书廊

### 《家庭史》

[法]安·比尔基埃等编袁树仁等译

三联书店 1998 年 5 月出版

定价：第一卷（上下）52.40 元

第二卷 39.80 元

法国年鉴派史学家的工作可能是本世纪最辉煌的学术业绩之一。本书即为法国年鉴派第四代人物主持编撰的大型著作，1986 年面世之后，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反响，受到专业人士和广大普遍读者的欢迎。

中译本系据法文最新版本译出。全书分为两卷，第一卷论述古代社会，尚未开化的欧洲和中世纪欧洲以及其他各洲文明的古典阶段，探究起源，囊括的时间很长；第二卷论述现代化对家庭的冲击——宗教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或社会方面，以及与统治地位的欧洲模式的比较。

## 书之魂

### 流亡与负重

筱敏

流亡这个词写在纸上的时候，纸和执笔的人都是飘荡在大风中的样子。风所过处荒芜一片，只有抛掷在路上的流亡者那儿一点是热的。我们通过流亡者的瞳仁看见荒原，荒原的样子就是《日瓦戈医生》所写的，《弗拉迪米尔卡》所画的，苍凉，炽热，通往终极的辽远。

在《流亡者译丛》的主编序言中，看到贡布罗维奇的一句话：“我觉得任何一个尊重自己的艺术家都应该是，而且在每一种意义上都必然是名副其实的流亡者。”几乎同时，在另一处，看到另一位东方国家的学者萨依德也作了相似的表述，他认为，知识分子的基本状态就是流亡者、边缘人、质疑和批判的角色。

在这里，流亡这个词指的是一种生存态度。她是拒绝趋附，拒绝从属；她是尊严，自由，叛逆性，个人选择的权利；她是永远在路上，永远动荡，不能安居的灵魂。相比较而言，她具有比去国远走他乡这种外部经历更深入也更广远的含义。

这种流亡的状态，似乎与俄罗斯作家的生存尤其贴近，在俄罗斯大旷野上，苦难，悲怆，永不安宁的追索和承担的热忱，都比旁的民族浓烈得多。俄罗斯是富于道德感的民族，俄罗斯知识分子尤其如是。

《流亡者译丛》仅就目前所出的4种，就让我们获得这样强烈的感受了。

帕斯捷尔纳克曾被称为“另一个俄罗斯的代言人”，他像一个在故乡的旷野上终日漂泊的幽灵，被家宅里庆祝太平盛世的合唱声驱赶出来，在没有栖处的荒原呼唤个人理想的权利。他承继了酷爱俄罗斯大地须臾不能离开的俄罗斯文学传统，但拒绝像同时代的许多作家那样，将俄罗斯与极权主义融合为一个民族的形象，并在民族的定义下放弃个人生活和思想的权利。他的声音——一个人的声音何其微弱！——每每被时代的进行曲所淹没，被强权禁锢和扼杀。但是，当那些唯唯诺诺纷纷攘攘的合唱潮水一样退去的时候，这个声音就像峭石一样凸现出来，穿过时间的屏障，让我们看到隽永的人的心灵史。

叶甫图申科不像帕斯捷尔纳克这样纯粹，他的诗学曾经与统治者大体一致，像合唱队的领唱，他用雄辩的歌喉唱钦定的路线和各种节日，很快获得了文坛上的特殊地位。但他身上有着“牲畜般的充沛活力”，渴望生活的热血，天生的叛逆性格——他自称革命是其家族的宗教信仰。我想这是本来意义的革命，而这成为一个家族的遗传，恐怕也是俄罗斯这个民族所特有的。这一切使他不能成为统治者的奴仆，终究挣脱合唱队的指挥，奔向荒野喊出自己桀骜不驯的声音。

萧斯塔科维奇本来只需用不确定的、多义的音符说话，而且那些音符已经奠定了他非同一般的地位，但对富于道德感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来说，声誉和地位并不是其良知安栖的巢。他的血液里总是奔涌着不安宁的因子，没有任何利益的驱使，一部作者规定必得在其身后才能公之于世的回忆录，能给他本人带来什么利益呢？只凭良知，他认为自己有责任为一个时代留下确定的文字的见证。“我必须这样做，必须。”他说，这像是说他必须成为一个

人。

爱伦堡的情况复杂一些，但即使沿着这些曲折的有时让人理不清的线索，我们也能听到俄罗斯大旷野上呼啸的风声，看到漂泊在风中的不羁的靈魂。

这些文字擦在一起，是沉重的，因为作家们的写作状态是负重的。负重可以说是俄罗斯文学的悠久传统。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说过：“在1775年里斯本大地震后，谁也不会厚着脸皮去写赞美夜莺美妙啾鸣的诗歌了。”这基于他内心沉重的道德感。但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不对，地震后的废墟上什么都长，同样也长闭起眼睛的啾鸣诗人，而且由于权威的催长剂，这种生物繁衍很快。但俄罗斯的文学传统有一种抗体，她保证了她最优秀的儿子成为巨人。

负重是远比重悠更好的写作状态，它更结实，致密，不易变质，以致经过整个世纪的磨砺，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几本书，依然像荒原上的第一堆篝火，鲜活而攫动人心。

（《流亡者译丛》，林贤治主编，花城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已出4种：《提前撰写的自传》，叶甫图申科著，苏杭译；《追寻——帕斯捷尔纳克回忆录》，帕斯捷尔纳克等著，安然、高韧译；《见证》，萧斯塔科维奇口述，伏尔科夫记录整理，叶琼芳译；《人·岁月·生活》，爱伦堡著，冯江南、秦顺新译）

（《南方周末》1998年5月1日）

## 意义的探索给出生活的意义

汪剑钊

世界和谐只存在于上帝之国，人作为一个谜团似的复杂生存，是两个世界的交叉点。

当很多人悲叹生活缺乏目标，生命不存在意义的时候，自由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旗帜鲜明地提出：“意义的探索本身就给出了生活的意义。”在他历经沧桑的一生中，哲学家始终不渝地坚持着这个信念，抵御着20世纪几乎弥漫全球的虚无主义思潮，直至晚年都未见有丝毫松懈。而他那具有总结意味的哲学自传《自我认知》如同天鹅的绝唱一般，再次以对意义的探索丰富了自己生存的意义。“认识你自己”这是镌刻在德尔斐阿波罗神庙门口的一句格言。别尔嘉耶夫的《自我认知》便是响应这道神谕的一次出色的尝试。正如作者的自述，这部著作“不是日记，不是回忆录，也不是忏悔录”，而是他的哲学命运史，他个人的精神发展史。作为一部自传，别尔嘉耶夫所要叙述的不是个人的外在经历，不是一系列事件的逻辑发展，而是自己内在的精神历程。这一点与作者对时间独特的理解有关。别尔嘉耶夫把时间划分为“宇宙时间”、“历史时间”和“生存时间”三种。宇宙时间是一种数学时间，它是可以分割的时间原子，过去、现在和未来在具有节律的同时，受到了宇宙的切割，被植入了致命的病菌，人在这一时间中生活，死亡便不可幸免。宇宙关注的是普遍，是共相，是自然，根本不在乎人的个性和整体性。历史时间是一条无限伸展的直线，一方面，它凝聚将来，在将来中等待意义的揭示；另一方面，它又依附于过去，历史的事物由记忆和传统建构而成。历史本身关注的是抽象性和中间性，因此，它忽略具体的生存，是个性的客体化和异化。历史在寻找过去时，会产生保守主义的幻象，认定过去是美好的、真实的、圆满的；当它投向将来时，又以为将来是意义的终端，是美好之完成，从而把现在作为工具、手段来牺牲，奉献给虚无缥缈的存在。在别尔嘉耶夫看来，历史是有意义的，但它的意义在自己的限域之外，也即是说，历史的意义只在历史终结以后才显示出来。别尔嘉耶夫最为推许的是生存时间，生存时间是一个点，它着眼于现在，是一种内在的时间，属于主体世界，它不经由数字的计算，不能组合，不能分割，它不是永恒，但又关联于永恒，是永恒的符号和象征。每个人内在地体验到瞬间，在瞬间中进行创造的同时，也就溶入了永恒。

“在我写的这本书中，不会有臆造，但会有我对我的生活的哲学认知和思考。这一哲学认知和思考不是关于过去的记忆，这是一种创造的行为，它发生于当下的一个个瞬间里。”在俄罗斯思想史上，别尔嘉耶夫称得上是一位命途多舛、经历坎坷的哲学家了，他蹲过四次监狱，遭逢过两次俄国革命，亲眼目睹过三次战争，其中两次是世界大战。此外，他还是世纪初俄罗斯文化复兴运动的风云人物之一，曾经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后来又被祖国放逐，后半生一直处于漂泊无定的流亡状态。但是，有别于其他人对这些传奇性经历的处理，别尔嘉耶夫把世界历史的整个过程，把个人生活的各个事件，当作内宇宙的一个部分，当作自己的精神道路来体验，把世界的命运当成个人的命运来看待。他在对自己的研究和阐述中，试图解决人和人类的命运问题。别尔嘉耶夫身上有浓重的浪漫气质，他在直面现实的同时，永远葆有对更美好的现实的憧憬，这使他时刻保持着一一种超越、精神的眼光来审视周遭世界，

“我感兴趣的是对环境的反应之评判，而不是对环境的评判”。

在“自我”之中，认识的行为与认识的对象是合而为一的事。它与自我的精神挣扎，与外在世界之冲突的折射有关联。别尔嘉耶夫写道：“我始终处在与自己的时代完全决裂的状态里，当时代憎恨自由的时候，我并不爱国家，反而具有宗教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当时代日益集体化，舍弃个性的尊严和价值的时候，我是一个极端的人格主义者；当时代冷淡哲学思想的时候，我却热衷于它；当时代打倒贵族文化的时候，我高度评价它；当时代仅仅认可传统——日常的基督教的时候，我却信奉末世论的基督教。”别尔嘉耶夫正是以与时代的格格不入贴近了时代的中心，他以个人与时代的对抗反映出时代本身的无序与矛盾。别尔嘉耶夫非常清楚，在宇宙和历史之中，纯粹的个性是难以趋达的。世界上的一切诱惑都试图奴役人，剥夺人的自由。因此，人在此岸世界是不可能消除矛盾的。世界和谐只存在于上帝之国，人作为一个谜团似的复杂生存，是两个世界的交叉点。于是，别尔嘉耶夫便觉得，“我永远是一个过客”，“我与植根于大地的感觉格格不入”。他祈求此岸世界在一场大火中毁灭。这样，个体人就会像凤凰涅槃似地在废墟上获得新生，抵达上帝之国。

别尔嘉耶夫在《自我认知》中再度重申了他对哲学使命的理解。他的哲学并不是“使某种学科知识专门化，撰写学位论文，当一名教授”。他讨厌过于学究气的东西，认为“假定的博学”实际是一种偏见，教条与概念使得大部分学者受到自己职业的异化，远离了精神的探索，从而远离了真理。别尔嘉耶夫有着一个真正的存在主义哲学家突出的个性特征，他关注每一个具体的生存，每一个当下的瞬间。认可宇宙的多层次性、多结构性，认可人和自我的诸多矛盾、两极性，致力于在活的环境中考察人的生存，抗击世界的异化和奴役，抗击必死的时间性，把生命的指针拨向永恒。总而言之，他的哲学遵循的是生存的原则，而不是存在的原则。别尔嘉耶夫的人世精神与隐含虚无色彩的享乐主义不同，他否认“人是为幸福而生”的观点。在他看来，幸福主义的道德是可疑的、虚伪的，“需要确立的不是每个人的幸福权利，而是每个人的尊严”。

（《中华读书报》1998年6月10日）



## 思想书廊

### 《文化与公共性》

汪晖陈燕谷主编

三联书店 1998 年 6 月出版 定价：28.00 元

此书所收各文的作者，均为国际著名学者，是近年来活跃在西方学术舞台上的重要思想家和理论家——汉娜·阿伦特、尤根·哈贝马斯、查尔斯·泰勒、约翰·罗尔斯、米歇尔·福科……他们的理论和思想的重要性正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承认。书中的论文涉及到公共领域、现代性和全球化等问题，它们不仅是从西方社会历史现实中提出的基本问题，其理论的启发性和有效性不仅囿于西方社会，对正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也有重要的借鉴和研究意义。

## 崇高的羞怯

郭小聪

前苏联作家 B.C. 格罗斯曼所著长篇小说《生活与命运》，曾被誉为《战争与和平》式的作品，在众多人物形象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一个未出场的人物。她是一位女医生，因为犹太血统被关进纳粹集中营，只给儿子留下了一封诀别信。

二战期间，犹太民族的苦难史就像一幅悲惨的长卷。“那么长的行列，我以前从不相信，死亡会使这么多人失去生命”，但丁在地狱中的惊呼，变成了地面上的可怕现实。人竟像牲畜一样成批被驱赶，有计划地被屠杀。特别是女医生笔下那些待屠的孩子们，他们虽然也像别的孩子一样打闹，大声笑，按大人要求完成作业，可看得出来他们的内心并不快活。大家都心如明镜，他们已不可能成为未来的音乐家、教师或制鞋匠了，这个由大人、小孩构成的热气腾腾的世界，行将消失于地下。

20 世纪这一邪恶之极的现实，突如其来，极其恐怖，既出乎人的生活常情，也在任何一种文化成长的理性氛围之外。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在危机面前还可以认真选择“生存还是毁灭”，体验一下自我的存在。而现在，人的遭遇似乎没有任何意义了，关起来不是作为“罪犯”，被杀掉也不能算做“命运”。死亡工厂的流水线不带感情日夜开动，老人、少女、儿童的眼泪或微笑，都没有用了；无论是学者、农夫还是艺术家，都像等死的牲畜。在这种非人而巨大的暴力面前，人类以往的精神文化既无力扼止罪恶，又不能忍受罪恶，于是，越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就越是面临深渊。你想反抗吗？你太无足轻重。你想试图“理解”眼前的现实吗？你只会发疯。那么真得像动物一样凭本能抱头哀嚎吗？那就等于杀死自己两次。

毫无疑问，人已经不能用文艺复兴时的调子来谈论人的尊严了，但人又必须维护自己的尊严到死。尤其困难的是，人毕竟是渺小易毁的，而且毁灭的结局越是明显，要求于人的就越偏重于美感本身。这时真正需要的不是热血，而是内在文化精神的默默自持。因为，只有人的思想和人的精神的美，才不因手脚被捆绑而一定丧失。女医生的这封诀别信，正是隐秘而优雅地表明了这一点。

从行动的意义上看，女医生什么都没做，她和同胞一样引颈就戮，既没有反抗，也没有诅咒。但与众不同的，是她信中那种平静到死的注视，始终不乱方寸的评判和温情如水的悲悯，这远比临死前选择哪种姿态要难。当德军到来，女医生周围许多友善的人突然翻脸，领导把她赶出诊所，邻居来霸占她的房屋，过去总是见面问好的人，如今杀气腾腾。但是看似柔弱的女医生，却没有被这“可怖的厄运”吓倒，她在信中只是惊愕地，有些像自然科学家那样好奇地注视着人性在动乱中的种种表现。她甚至苦笑，生活中的美好和残酷有时挨得多么近。邻居家六岁的蓝眼睛小姑娘，白天还在大人唆使下把她赶出家门，晚上又跑到小屋来听她讲故事，不肯走。两个女邻居当着她的面争夺家具，最后和她告别时又泣不成声。而平时一个看上去绝非善良之辈的人，现在却冒险来帮助她。女医生叹息道，“要真正了解人是很难的”。但感人的是，对人性的洞察从来没有引向轻蔑或怨毒，她始终以平静的口吻来谈论最残酷的事。当整个世界看起来都对她不公平的时候，她却还能善待别人。在苦难中，她为人性的每种缺陷而叹息，也更为流露出的每一点善心

而感动。

这种深沉如海的胸怀，在她转向因将受难而似乎无可指责的犹太同胞时，表现得更让人敬畏。女医生对本民族的“温柔的母爱之情”，不是婆婆妈妈，而是反观自己，思考人性，冷静而悲悯地评判身边形形色色的难友——有“脸上带着傲岸而平静的表情”，什么东西都不带，只拿着本打开的书的年轻人；也有像鼯鼠一样偷藏食物、心存侥幸而又惊慌失措的人。被宠坏了的小姑娘照样蛮横，有身份地位的人反而容易短视。而且人的外表和内心的反差也叫人吃惊。一个男人，魁伟清秀，连西服上那颗大卫星也引人注目，却是个奸细。女医生总结道，“人抱的希望越大，就越斤斤计较，就越看重蝇头小利。……而一个人悲戚越重，生之欲望越小，那他就越豁达、善良、清高。”她觉得在普通人中蕴藏着美好的人性。出诊时老人颤抖的问候，穷人塞过来的一点食物，都使她大为感动，她用俄罗斯知识分子特有的口吻说：“不是我去看病人，而是相反，人民这个善良的医生在医治我的灵魂。”

在这最后时刻，女医生无比温柔地回顾自己的一生，向儿子诉说自己的软弱和孤独：“维佳，每到夜晚，我就怕得要命，我的心紧缩起来。死亡在等待着我。我想呼唤你的救援。”可是，她明知道一两个星期后就要被处决，却仍旧每天出诊，叮嘱病人坚持用药，说“再过两三个星期就会痊愈”。她照样和孩子一起读喜欢的文学作品，上法语课，孩子的发音不正确，让她着急。她的冷静自持，越到后来就越变成了一种姿态，散发着美感。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软弱的呢？是呀，就连这些忏悔和软弱的表示本身也让人感到有某种坚强的东西在，因为它来自人的丰富而健全的内心世界。当法西斯暴力疯狂地压倒一切时，女医生的柔韧沉思的形象却静静地立起来。她感受，她思索，她表达爱，她照样以自己的内心评判一切，悲哀、沉默而不失尊严。在日常生活中，这是一种真正有教养的风度。而在无可挽回的毁灭面前，人的平静的注视，就有可能成为人世间最后的和最高贵的蔑视。法西斯杀害这样的人，真是罪恶，但它还是不能征服人心，扭曲美感。

在信中，女医生每每惊叹于人的“屈从于暴力，与此同时又高居于暴力之上的灵魂”，而这“灵魂”的美感性质，似乎已在俄国诗人丘特切夫的一首诗《秋暮》中预言过。诗里说当风暴到来，毁灭注定，诗人却感到疲惫的万物中有一种“柔顺的微笑笼罩着一切”，他进一步解释说：

在理性生物身上，  
这称作面对苦难时的崇高的羞怯。

## 思想书廊

### 《牛犊顶橡树》

索尔仁尼琴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8 年出版 定价：18.80 元

该书是俄罗斯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的自传，书中记述了 60 年代初至 1974 年这 15 年间作者的主要经历，包括他的荣与辱、飞升与跌落。该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前苏联文坛及至政坛的风云变幻，对于了解特定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苏联的社会、文化、精神、心理具有一定的意义，同时具有重要的文学美学价值和政治历史价值。

## 文学：在历史的隧道中

梁坤

一提到堂·吉诃德，人们马上会想到一个可敬可笑的疯癫骑士的形象。这个形象由于所包孕的丰富内涵而具有超越时空的意义。自他诞生的400年来，人们不断从各种作品中见到他的变体，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发现他的身影。近如古巴的前领导人格瓦拉，就被称为“共产主义的堂·吉诃德”。

格瓦拉读过《堂·吉诃德》吗？这个在西班牙语世界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形象，如果说因为年代久远和社会历史背景的差异而被格瓦拉漠视的话，那么，20世纪出现的另一部作品则应该足以令他引以为戒，这就是前苏联作家普拉东诺夫（1899~1951）的小说《切文古尔》。

这部写于1929年的反乌托邦小说是对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军事共产主义、征收粮食制和农业集体化进行深刻反思的艺术结晶。当作家的思考达到一种哲理高度时，他的作品也就具备了寓言的性质。颇有意味的是，格瓦拉的现实世界和普拉东诺夫的艺术世界竟如此相似。

《切文古尔》讲述的是一群无产者怀着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无比忠诚和热情，进行乌托邦式的探索故事。主人公之一萨夏·德瓦诺夫为寻找社会主义萌芽抛弃爱情，孤身漂泊周游全省，终于找到小城切文古尔进行他的伟大试验，以期早日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另一主人公布尔什维克野战部队司令员科片金，骑着号称“无产阶级力量”的牡马去革命偶像罗莎·卢森堡的墓地朝圣。为促进革命发展，他到处流浪战斗。出生于阿根廷的格瓦拉，为实现拉美“大陆革命”的崇高理想在古巴开展游击战，身先士卒出生入死做了游击队领导人。古巴之于格瓦拉正如同切文古尔之于萨夏·德瓦诺夫和科片金，都是这些真诚而狂热的革命家的试验田。而当一个社会理性让位于狂热时，就会出现很多不切实际的荒唐行为。革命家们在藐视财富、否定人的物质需求的前提下，用非经济的手段管理经济。小说中的革命家们命令区护林员砍掉成材的森林改种黑麦，强迫富裕中农把牲口交给没有饲料的贫农。他们认为生产性劳动必然会带来财富，财富则会导致剥削和战争，因此规定劳动者惟一的职能是做梦，仅有的星期六义务劳动是将全城的房屋迁到城中心，其目的也是要消灭旧社会遗留的私有财产。在古巴，令人称奇的是格瓦拉以游击队领导人的出身做到了工业部长和国家银行行长的高位，挥舞着意识形态的魔棒来管理经济，实施他的以“消灭个人主义”、取消物质欲求为目标的改造人的宏伟计划。小说中这两个主人公最后都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切文古尔，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格瓦拉在自认为完成了对古巴革命所负的责任之后，以“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召唤我去战斗”为由，毅然放弃了古巴的公民权和领导人的高位，于1965年出走去了刚果。“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一如诗人般的轻松洒脱，而全无一国领导人的职责与沉重。

这种失去理性的试验其结果又是如何呢？在切文古尔，革命家们整天高喊革命，却使人民死于饥饿；在古巴，也面临着长期的经济困难。与小说中的人物相比，格瓦拉更热衷于暴力和血腥，他为了拉美和世界革命的胜利，要把古巴人民作为急先锋来牺牲。这种以全世界人民的最后解放为目的的革命从一开始就背离了它的初衷，革命由手段变成了目的本身。雨果老人早在上个世纪就提出一句至理名言：“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

确的人道主义。”请问，在这些革命者心目中，天地间至为高贵的人究竟占据着什么位置呢？忽视了这一点，也就颠倒了革命与人的关系，革命就必然会成为失控的战车，人民必然会蒙受灾难。

对小说中人物的荒唐冒险，人们可以付之一笑，尽管在这一笑背后蕴藏着无尽的悲哀。而当这些悲剧在生活中重演的时候，还有谁会笑得出来呢？人们不禁要问：人类为什么会重犯同样的错误？人类究竟要为自己的荒唐愚昧付出多大的代价？格瓦拉肯定没读过《切文古尔》，因为这部小说所表现的“与其说是革命者，不如说是一些‘怪人’和‘疯子’”（高尔基语）而在苏联一直被禁，直到1972年才在国外出版。这意味着人类的思想被冻结了43年。43年的时间大而言之，不过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瞬，小而言之，却可能是一代人生命的长度。这不能不说是人类的悲哀，因为“这种损失是无法弥补的”，诚如老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所言，假如它“写完后马上就能和读者见面的话，那么我们所有人的思想就会比现在不知要丰富多少倍了”。试想，如果格瓦拉读过《切文古尔》这部警世之作，并从中照见自己的影子，情况会不会或多或少有所改观？这个问题的确很难回答，这种提问方式也可能会招来庸俗社会学之嫌。然而，对于一个可以撬动历史杠杆的人，他的作用力的些微变化都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命运，而决定这作用力的，正是他的思想。一部好的作品是作家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凝思，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应该对人类的思想发生或大或小的影响。因此在历史的隧道中，我们祈望文学是灯，能够穿越历史，警示现在并照亮未来。

（《博览群书》1998年第7期）

## 政治与良心

崔卫平

这里评述的是捷克现任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两篇论文《政治与良心》、《政治、道德和公民性》的观点（尚未译成中文），其主旨是政治应从良心出发。

出生于 1936 年的瓦茨拉夫·哈维尔原先是荒诞派剧作家。“在今天的世界上，恐怕没有比追求意义更为荒诞的了。”他自己把这称之为“荒诞的理想主义”。从这个立场出发，他提出的“异想天开”的观点之一便是政治和良心的关系。政治应当建立在良心、道德的基础之上。

他认为，政治不应仅仅被理解为政治的阴谋和手段，被实践为对于权力的欲望和追逐，或任何控制人们的技术、伎俩，也许，阴谋可以使得某个人登上某个宝座，但这也就是他“成功”的顶峰了，因为他不大可能以阴谋改进和推动社会。真正的政治，应当包括某种人性的尺度在内，与人们的个人经验尤其是良心的要求有关。因为说到底，政治是“为了寻找和获得有意义的生活的一种途径，是保护人们和服务于人们的一种途径”。“我们必须相信我们良心的声音甚于所有抽象推论的声音，不去捏造一种企图超越于良心的呼声之上的那种责任。”（《政治与良心》）换句话说，人们有权拒绝把自己打扮成“客观性”的或“客观需要”的政治，拒绝为配合这种政治而压抑自己内心深处感到的道德要求，拒绝把哪怕是微弱的良知的呼唤看作是可以不屑一顾的。

显然，这样一种作为道德实践的政治不可能以任何近期效果来衡量它。向依据自己的信仰良心去行动的人们提出“你们什么时候取得成功”这样的问题，是不恰当的。哈维尔指出，仅仅以“效果”、“成功”来看问题仍然没有摆脱以“上面”来看问题的习惯，而政治应该来自“下方”，来自人心中的真理，遵循这种思路的人们去争取、去行动，不是因为短期内看到成功的可能，或这么做迟早能骑在历史的背上，而是感到只有这样才能驱除长期以来笼罩在自己生活上空的屈辱感、失败感、虚无感，才能挺起腰杆做人，恢复自身的尊严和重建自己对于生活的信心。当然这样做同时也在告诉其他人，他们同样也能做到这一点，能重新找回自己生命的尊严和意义，不致像现在这样任其消沉和败坏下去，在这个意义上，从事政治（或者能够从事政治）的人就远非少数“冷酷的犬儒、虚荣、无礼和粗鄙的人”。“一个人若是心地纯正，有良好的趣味，他不仅有资格干政治，而且命中注定要干政治。如果他谦虚，不贪图权力，那他非但不是不适合于政治，而恰恰是属于政治圈中……说一个有原则的人不属于政治圈是不对的，在他的原则之上，再加上耐心，思考、有分寸和了解人的能力，这些便足够。”（《政治、道德和公民性》）

哈维尔致力于将一些人性的尺度带到政治中，使他获得了广泛的国际性的赞誉。

## 历史与考古

罗芑

法国哲学家福柯是本世纪思想界的巨擘，同时，作为一个人，他也极具特点。他那颗彻底“荒凉”、一望即知充满睿智的圆脑袋，挺直的鼻梁上的眼镜，镜片后炯炯有神的双眼，无疑符合学者的形象标准。然而，刀削似的棱角分明的脸庞，结实的体魄，大而有力的双手，又令人想到拳击家或者摔跤手。他不像法兰西学院他的众多同事例如列维—施特劳斯、巴尔特、阿隆那样透着人们普遍认为“理应如此”的儒雅气，相反却有几分“该出手时就出手”的绿林味道。在生活舞台上，福柯确实是一个敢做敢当，豪爽，无所顾忌，在某些人看来有些难缠的角色。“文如其人”这句老话，如今许多人不以为然，不过我认为，对福柯和他的著作，倒是恰如其分。

谈福柯那些震撼西方思想界的著作，感到这些文章只能出自这样一个人之手。才思敏捷，妙论迭出，让你觉得回肠荡气；可是居高临下，不由分说，又多少给你一种自说自话，强加于人的感觉。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福柯在老家法国，在那个讲究思维的精密细腻，据统计 60%以上的民众有强烈害羞感的国度，不怎么受待见；而在那个粗犷，老子天下第一，民众的害羞感肯定不强的美国却享有盛名。他和德里达、基拉尔等人一样，在美国打响之后，一部分同胞才对他们刮目相看。这弄得有时候叫人真搞不清楚他们的思想上盖的是法兰西文化的印记还是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图章。

福柯一般被认为是哲学家。他从中学时代就是个哲学狂，后来考入著名学府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攻读哲学科，然而他的博士论文即那部有名的《古典时期的精神病史》却似乎更接近心理学课题。他到克莱蒙—费朗大学去接受哲学课教职，正式任命却派给他心理学教授，可见教育部的部老爷觉得他的特长是心理学。他在万森大学是哲学教授，在法兰西学院的头衔却是思想体系史教授。从这个简单的经历就可以看出，福柯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他的研究带有边缘性质，跨越哲学、心理学、思想史诸学科。

国内最近出版了他的《知识考古学》。这个书名多少有点古怪。“知识”二字，从翻译的角度说并不很贴切，然而似乎也没有更好的译法，法文的这个词，除却“知识总体”这个含义，还有“知”，“认知”等意义。所以“知识”，在这里其实差不多就是“思想”的意思。至于“考古学”，用在这里乍一看真是不伦不类，建筑考古、服饰考古、钱币考古都好理解，知识是无形的，考古能奈之何？其实，福柯用这个词，是大有深意的。这部书谈的是思想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福柯标明“考古学”，为的是宣告他的理论和方法与传统思想史有根本区别。

传统历史学，福柯一言蔽之曰“总体历史学”，它研究文化的“总体形式”，某个历史时期纷纭现象的“共同意义”以及制约这些现象的“规律”。他认为，“总体历史学”行将就木，取而代之的应是“一般历史学”。他在《导言》里对一般历史学的任务作了详细说明，简言之，“一般历史学”认为，研究人类思想史，兴奋点应该放在历史的“断裂”上，放在“散落”的历史现象上，福柯因此想到考古学。考古学感兴趣的的就是散落的“历史遗迹”。考古学家工作无定所，向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地层中去寻找，发现与鉴定文物，其意义和乐趣，要比强行把纷繁的历史现象纳入某种历史规律大百倍。所以他认为，在当代，历史学应该向考古学靠拢。



福柯在《知识考古学》的前后，研究了诊所在西方的产生，研究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精神病史，研究某一阶段的死刑和监狱状况，研究“性的历史”，这些工作，说到底，都属于“考古学”的内容。福柯的一双大眼，向人类思想文化史中寻找长期为人们所忽视甚至有意掩盖的“历史遗迹”。这些“遗迹”，福柯说它们是这样一些层面，它们“有时很短暂，彼此相异，与某种惟一的规律相违拗，体现各自特有的历史类型，不可能归纳为正在进取并回顾自身的某种意识的一般范式”。不过，要注意，福柯的“文物”不是作为物质存在的古丘的衣冠或者沉沙的折戟，而是语言，是某个历史时期某个特殊情境中的话语。在写作《知识考古学》之前，福柯已经在《诊所的诞生》、《事物的秩序》里对话语权力做了详尽的考察，他写《知识考古学》，为的是对思想历史的研究如何进行话语分析在理论层面上进行总结和调整，并加以深化和系统化。所以，要了解福柯的思想，无妨由此书入手。

（《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1998年8月14日）

## 即便总统也是靠不住的

晓辉

在冷战时，苏联有个政治笑话广为流传，戈尔巴乔夫甚至还曾经讲给里根总统听。笑话说，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苏联人互相吹牛，夸耀自己的国家。美国人说道：“我的国家实在自由，你可以径直走进白宫，对总统说：‘总统先生，我不同意你的现行对内政策！’”苏联人便答道：“嘿，这有什么！我的国家也很自由！你可以径直走进克里姆林宫，对总书记说：‘总书记同志，我不同意美国总统的现行对内政策！’”

这笑话真是妙不可言，它语不惊人，然而却表现出无与伦比的洞见和概括能力，叫人拍案叫绝。没有对双方体制的深刻理解，没有细致的观察和深沉的切肤之痛，便无法在短短的篇幅里，容纳下如此令人啼笑皆非的丰富内容。

林达女士的“近距离看美国”，也许没有这则笑话那样精练，但其质朴的风格、深刻的洞见，却依然能和这篇笑话媲美，唯其出自中国学人之手，又没有叫人掩鼻的经院气，竟使得那一篇篇书信如此引人入胜，使人爱不释手。

现在，在饱览了林女士的“近距离看美国之一”《历史深处的忧虑》之后，我们终于如期迎来了她的第二批书信，便是“近距离看美国之二”《总统是靠不住的》。在前一批书信里，林女士为我们介绍了美国人的自由理念，告诉我们爱好自由的美国人民，怎样不惜承担各种代价，来捍卫自己的自由权益，在第二本书里，林女士介绍的则是美国宪法最杰出的设计——权力的分立和制衡原则。

美国的三权分立政治体制，早有卷帙浩繁的著作予以介绍，我们已经非常熟悉。而且，我们也惯于疑心，这样相互掣肘、缺乏效率的制度，岂不表明美国体制落后于时代。林达女士在她的著作中却雄辩地告诉我们，在经历200年而一字不易的宪法里确定的分权与制衡制度，恰正是美国革命的先哲们最富于理性、也最充满智慧的创造。作者将这种安排，比之于美国店铺里的收银机——一种凭借机器的安排防止店员贪心的发明，真是匠心独运，读来耳目一新。

之所以煞费苦心创设下这样的制度，出发点倒也非常简单：对国家的官员们来说，权力带给他们的种种特权，正像店员手头的现金一样诱人。只要权力存在，总会有人禁不住诱惑，干些以权谋私、祸国殃民的勾当。在这时，不同的文化背景，提供的解决思路是不一样的。例如，我们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靠官员们的“革命信念”来避免权力的腐化——对此，一个美国人会振振有辞地质问道，苏联30年代的大恐怖、中国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又怎么样？难道你会归咎于当时的“思想政治工作”削弱了不成？

而在美国人的思路下，解决这样的问题自有他们的办法。既然人总是靠不住的，那么，他们就用机制去删除不可靠的人，用机制去限制和规范人的不可靠的行为。于是，美国人宁可把权力切割得支离破碎、自相矛盾，也不要权力的全面统一、高度集中，他们甚至故意在宪法里作出一些规定，使得权力的一个分支受到其他分支的制约，避免任何一个分支掌握绝对的权力。这样造成的，就是一个确保《独立宣言》里规定的人民权利不受侵犯的民主

制度。

在林女士浓墨重彩地介绍的“水门事件”当中，美国政治体制的“收银机”作用，体现得极其鲜明，质而言之，水门事件实在是考验美国制度最合适的试金石。美国人并不讳言尼克松们的权力欲望和以权谋私的企图。“权力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么——是人之常情，值得注意的是，身为美国总统，他权力腐化的过程却无法进行下去；在他的面前挡路的，有桀骜不逊的独立检察官、忠于职守的法官、穷追不舍的新闻界、人人喊打的国会——其结果，是尼克松本人，也不能不屈服于这部顽强而又有效的“收银机”，乖乖辞职了事。尼克松的下台，恰是美国民主的胜利，恰是美国人民自由的胜利。

所以，我们津津乐道的美国“落后”的政治体制，看来是美利坚建国者们的匠心所在。美国人民向往的首先是自由，是保证自己的权利不受侵犯：对这样的目的，美国的政体提供了最为充分的保证。因此，平心静气地读一读林达女士这本书，我们会对美国的政治体制，有一个全新认识。

## 可否见林又见树

——读《新政革命与日本》

刘绪源

这是美国学者任达（费正清的学生）出版于1993年的英文专著，副题为《中国：1898~1912》，现由李仲贤先生译成中文，编入江苏人民版“海外中国研究丛书”面世。书中的核心论点，在我这样的读者看来，颇有一点惊世骇俗的感觉。作者认为：从1500年以来的世界史看，革命具有多种形式，而大多恰恰是非暴力的，不流血的。这正如托马斯·库恩所言，革命可能悄悄地进行，令人感觉不到，从农业、商业、经济革命，扩展到思想、科学、技术革命，以至政治、社会甚而性革命。出于这样的认识，在仔细研究了上一世纪末直到辛亥革命的中国历史以后，他得出了一个大胆的结论：

“粉碎了经历2100年中国帝制政府模式及其哲学基础的，不是以孙中山及其同伴为中心的1911年政治革命，相反地却是1901年以晚清新政为中心的理想和体制的革命。”

读这本书，有助于我们重新梳理那段难忘的历史的脉络。于是我们看到，在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后，为要反对以光绪和康梁为代表的改革势力，必然地会有一场上下呼应的复旧以至排外的动荡，后来的义和团运动以及清廷对这一运动的出人意料的支持，都不妨放入这一动荡的大范围中去考察，可是历史并不以政变得利者的愿望为转移，排外引来了外国势力更大规模的入侵，八国联军进京，清廷避走西安，被迫再次向洋人屈膝。这才有了1901年1月9日的“改革上谕”：“自播迁以来，皇太后宵旰焦劳。朕尤痛自刻责。深念数十年积弊相仍，因循粉饰，以致酿成大衅。”遂要求各方“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均可提出各种变革方案。对戊戌政变而言，这无疑于自打耳光；但新一轮的新政改革却由此拉开了序幕。

本来戊戌变法是始于甲午战败，那头号敌人应该是日本。可世事阴差阳错，为抑制日本势力的扩张，不得不借助帝俄；到后来帝俄等国趁机割取中国土地，则又转而求助日本抑制帝俄了。除此之外，当时朝野也都认识到，学习西方不如学习日本，因为那是改革成功并得以富强的最切近、最实际的榜样。于是，就有了本书作者所称之为的“黄金十年”，“在中日关系史上，1898~1907年间，确曾普遍存在着出人意外地融洽而有建设性的十年。”正是在这十年间，日本大量培植中国留学生，派大批日籍教师到中国任教，又帮助整训中国军队，建立警察和监狱系统，进而实行法律、司法和宪政的改革。当然，日本的出发点仍是在中国扩大自己的势力；但客观上，中国的整个体制因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作者认为，这一切的意义，已远远大于后来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其实是继承和沿袭了这些改革的成果，但却在宣传革命的成功时，将此前的新政改革与日本在新政期间所起的核心作用全部遗忘了。

本书提供了大量的史实，而得出的结论或许确有偏颇之处。相比之下，钱钟书先生关于文学史的那段著名的论述，我们就易于接受得多了。钱先生说：“除旧布新也促进了人类的集体健忘、一种健康的健忘，把千头万绪简化为二三大事，留存在记忆里，节省了不少心力。所以，旧文艺传统里若干复杂问题，新的批评家也许并非不屑注意，而是根本没想到它们一度存在

过。”他称此为“见林不见树”。而旧的批评家对于旧传统中的“委曲私情”，更能体贴入微，却缺乏那种眼界空旷的“高瞻远瞩”，所以又“未免见树不见林了”。（见《旧文四篇》P3）这两种情形，在观察和研究历史时，确是普遍存在的。从总体上看，中日关系长期紧张，自1874年起，几乎每十年就发生一次战争，中国人受够了他们的侵略，谁还愿意去细细查考在两次战争间隙，日本曾对中国改革作出的贡献呢？而新政十年中，真正起到推动作用的，除慈禧外，还有张之洞、袁世凯、庆亲王奕、张百熙、赵尔巽、端方、岑春煊、沈家本等，这些人中，有民国的死敌，也有镇压戊戌变法的刽子手，从总体看有些人确不可取，于是他们的改革也一并被扔进历史垃圾堆里去了。另外，简单地将政权更易视为历史前进的分水岭，认为此前一切都坏，此后一切都好的思维习惯及宣传模式，也长期束缚着我们的眼光。虽说清廷的权势者们推进改革，目的无非为维持他们的政权，但改革本身的意义却大大超越了他们的出发点，这两者是不应混淆的。历史总能作出公正的选择。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清廷早已崩溃，而清末变革的积极价值，却仍被继承延续，甚而泽被至今。只是我们自己受着思维的束缚，往往不易看清这一点罢了。

我想，我们尽可以不同意此书的结论，但作者所提供和强调的史实，却向我们提出了一个艰难的课题：在今后的历史研究中，我们能不能做到“既见林，又见树”？

（《文汇报》1998年8月18日）

## 星象馆

### 叶赛宁并非自缢身亡

[俄] 罗·波波夫 祖淑珍译

诗人是被国家政治局里的托洛茨基分子殴打致死

彼得堡学者维克多·库兹涅佐夫证实，在叶赛宁自杀的“安格列杰尔”饭店的住宿登记表中甚至连诗人的名字也没有。

5年来，圣彼得堡文化科学院的副教授维克多·库兹涅佐夫（语文学副博士，多部俄罗斯文学史著作的撰写者）一直在努力试图解开诗人谢尔盖·叶赛宁的死亡之谜。探寻这个问题的不只是他一人，近几年来，已经发表了对叶赛宁死因的调查以及种种猜测的文章。但库兹涅佐夫却发现了以前不为人知的材料，它们中确实有一些耸人听闻的新发现。

据库兹涅佐夫说，他所提供的不是某种推测，而是调查结果，每一个事实都有案可稽。

（以下为记者采访维克多·库兹涅佐夫的记录）

记：维克多·伊万诺维奇，我们知道官方向来的说法是：酒徒叶赛宁进过精神病院，后来到了列宁格勒，由于过度忧郁，四天后在“安格列杰尔”饭店上吊自杀了。

维：但不知为什么人们总爱忘记一点：这个悲剧是怎么开始的？1925年9月叶赛宁在由巴库开往莫斯科的列车上同一个叫罗加的外交信使和党的官员列维特发生了争执。这件事被移交到法庭。为逃避惩罚，叶赛宁住进了自己的同乡卡努什金教授的精神病院。

自然会问，叶赛宁为什么又逃出医院去了列宁格勒？在那儿他会被肃反人员或者执法人员逮捕的……

因为叶赛宁打算逃到国外去！这条路线是他所熟悉的。1923年叶赛宁游历欧洲之后就是经里加和列宁格勒回国的。

1925年11月27日在给朋友彼得·恰金的信中他说：要摆脱“某些丑闻……我大概会去国外。那里即使是死狮子也比我们这儿用于医学试验的活狗漂亮”。

12月24日，谢尔盖·叶赛宁去了列宁格勒。我推测，他是在路上或是在莫斯科火车站被捕的。因为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叶赛宁根本没下榻过那家该死的位于马依奥洛夫大街10/24号的“安格列杰尔”饭店。

记：您是如何确认这一点的？

维：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对公民的税务监察十分严格。一年要进行两次税收登记。所有新到一个地方的居民立刻就会被登记在册。

据官方报道，叶赛宁曾打算住在“安格列杰尔”。但实际上“安格列杰尔”根本不是饭店，而是供出租的寓所。我有幸找到了政府的财税登记表，其中记载了1925~1926年间曾在此居住过的所有人的名字。共有150多人，包括有肃反人员、文学活动家、饭店职工，而叶赛宁却不在其中。

在5号房间，也就是所谓叶赛宁自缢的地方，那时住的是一个姓克留柯夫的人。

记：您还了解到些什么？

维：一些“喜好跟踪追迹者”早就怀疑，叶赛宁的一些熟人，也就是那

些同他的死有这样和那样关系的熟人，或明或暗都是国家政治局的人员。只是他们尚未找到证据。我查阅档案多年，其中一个目的也是要弄清这些人的真实面目。

我现在敢肯定，那些在诗人临死之前的几天里同他打过交道的人，还有描述他住在“安格列杰尔”饭店的人，所有这些都撒了谎，他们都同国家政治局有关系！

咱们来挨个儿说好吗？记者乌斯金诺夫，就是那个声称住在“安格列杰尔”饭店130号房的诗人的朋友，他证明过，12月27日诗人在5号房间洗了澡。这是捏造。房间的用品登记表上所有的东西，甚至连夜壶都写得一清二楚。在5号房间，就像没有电话一样，根本就没有浴室。

“诗人的朋友”乌斯金诺夫因此成为“托洛茨基列车”的成员——这是个类似盖世太保的组织，他们随车到处跑，犯下一桩桩暴行。

瓦西里·卡尼亚耶夫——诗人的另一个“朋友”，也是这个组织的成员，他一直在奥布霍夫医院里守护着诗人的遗体。

请注意，在死亡调查表上签字的见证人是从外面请来的人——他们把弗谢沃洛特·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米哈伊尔·福罗曼和巴维尔·梅特维杰夫拉到了饭店来。为什么不请住在叶赛宁隔壁的房客呢？原来，喊来的这三个人都与刑事侦查处有密切关系。画家巴维尔·曼苏洛夫，就是据称在诗人房间同他一起喝过茶和其他某种更烈的饮料的那个人，在自己的一封信中暗示，说他永远忠诚地为苏维埃俄罗斯服务。

我还可以继续说很多，但我担心你们报纸上会登不下的。然而另外我要说的是，当时“安格列杰尔”饭店管理员的妻子安东尼娜·里沃芙娜·那扎洛娃临死前说出了12月27日星期天到饭店来的两个人的名字：彼得洛夫和茨基利亚。前者是国家政治局的侦查员，后者是与“安格列杰尔”饭店邻近的、位于马依奥洛夫大街8/24号的一幢楼房的管理员。我肯定地说，这幢楼房是国家政治局的刑侦监狱。

找到了这幢颇具规模的楼房的户口登记簿，那上面应该有所有住户的登记，但却仅仅注册了一家面包房，户口本上只有面包房的主人和他的一些助手。还有其他一些证据可以说明这一事实。

记：法医吉利亚列夫斯基在证词中十分肯定地说叶赛宁是因窒息而死，那么这一证词又该如何解释呢？

维：吉利亚列夫斯基不曾作过这样的死亡登记。莫斯科一家档案馆里有一份冒充吉利亚列夫斯基真实记录的伪造件。而我却找到了大量文件——尘封在库房里的有关法医专家吉利亚列夫斯基对尸体解剖真实记录的材料。根据签署死亡证书的样式、措词、病理解剖项目和笔迹，我得以证实，莫斯科这家档案馆的死亡证书是伪造的。

记：那么谢尔盖·叶赛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维：前面我已提到过，叶赛宁被逮捕要么是在列车上，要么是在莫斯科火车站。他们打算把他送交法庭审判，吓唬他一下，让他放弃出走的念头。但，根据情况判断，一切做得都太过火了——他们揍他，打在了额头上，就这样叶赛宁被意外地打死了。

巴维尔·卢柯尼茨基在巴黎所著的《与安娜·阿赫玛托娃的会面》一书中这样写道：他们下手太狠，以至于叶赛宁的一个眼珠都被打了出来。

5号房间的女清洁工瓦尔瓦拉·瓦西里耶娃临死前曾说过，她看见几个

喝得醉醺醺的恶棍将一具尸体拖进了5号房间。再下来……为什么是列宁格勒的“杰米扬·别得内依”——瓦西里·卡尼亚耶夫在12月29日晚上守护着叶赛宁的尸体？奥布霍夫解剖医院有8名勤杂工——究竟谁应该在那里看护呢？

结论只有一个：不允许旁人接近尸体，竭力掩盖殴打的痕迹。对于这一事实，1925~1926年间报纸均保持了缄默。

最后一点，为什么给叶赛宁拍照的是克里姆林宫的摄影师那别尔巴乌姆，而不是法院的摄影师或警察局的人？因为那别尔巴乌姆善于修改底版，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

记：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您说叶赛宁是被“意外地”打死的？为什么却要编造出这亵渎性的上吊自杀戏？

维：这个问题提得好！当然杀死叶赛宁后是可以把尸体扔到街巷中，然后散布说，在酒馆斗殴中有人用刀刺死了他。但，不要忘记，叶赛宁的悲剧并非官方正式立的案子，所以整个事件都是悄悄进行的。

当一些人想审判叶赛宁时，卢那察尔斯基出来替他说情。但有个更强硬的人对此并不买账。这是谁呢？

托洛茨基！他有一些憎恨诗人的理由。12月份曾召开了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列宁格勒派激烈地反对斯大林。季诺维耶夫和其他一些人在会上与斯大林闹对立，托洛茨基实际上就是这一帮派里的人。

试想一下，12月28日得知谢尔盖·叶赛宁死了，斯大林很容易利用这件事向托洛茨基分子进攻。他完全可以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斯大林并不在乎叶赛宁，但出于政治目的，他会这样做的。

我找出的罪魁祸首是雅可夫·勃留姆金，我怀疑正是他在与“安格列杰尔”饭店邻近的国家政治局刑侦监狱里对叶赛宁进行了审讯。当时他是“托洛茨基列车”这一组织的警卫队长，我推测，正是勃留姆金打死了诗人。如果拿出联邦安全服务局的审讯记录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在对勃留姆金的审讯中，他供出了所有的人，即把托洛茨基所有的关系，其中包括在列宁格勒的关系统统都告诉了斯大林。如果我们读到这些材料，就会揪出整个杀害叶赛宁的犯罪集团。

（《俄罗斯文艺》1998年第3期）



## 法捷耶夫：真相与谎言

陆人豪

法捷耶夫曾经是苏联的著名作家，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两部代表作品《毁灭》和《青年近卫军》都曾被选编入学校教科书。但是，近40年来，法捷耶夫声誉日下。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高校的教学大纲已把法捷耶夫放在极不显眼的位置，有些文学史著作则几乎把他除名了。极力贬低法捷耶夫的人，主要不是批评他的文学创作，而是攻击他的社会活动，即法捷耶夫在担任苏联作家协会领导人时的作为。

法捷耶夫自1934年起就进入作协领导层，在高尔基去世后成为作协主要领导成员之一，1946至1954年任作协总书记兼作协主席，1954年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前，由于给苏共中央的一封信而被解除第一把手的职务，1954年担任有名无实的作协书记处书记，直至1956年7月，即苏共二十大后自杀为止。

在法捷耶夫主持苏联作协工作的将近20年间，发生了以1937~1938年为高潮的大镇压大清洗，数以千计的作家被逮捕、流放、劳改甚至处死，这20年也是苏联文学发生质变的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堕落为粉饰生活和宣扬个人迷信的工具；这20年中，许多著名作家和诗人，如普拉东诺夫、布尔加科夫、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左琴科等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日甚一日。这一切与苏联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有关，当然也与主持作协工作的法捷耶夫有关。但是，法捷耶夫在哪些事情上有责任，责任有多大，在哪些事情上没有责任，在哪些事情上他根本负不了责任，这些是应该实事求是地分清的。

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副主编、老资格的新闻工作者伊凡·茹科夫经过长期的调查，翻阅了克格勃有关被捕作家的档案，写成了《命运之手，肖洛霍夫与法捷耶夫：真相与谎言》一书，其中证明，在被捕作家的所有文件上没有法捷耶夫的签名，在档案中也没有发现由法捷耶夫署名的任何检举材料。相反，在档案中却发现了由于法捷耶夫的努力而得到平反、释放，或由于法捷耶夫的及时干预而免遭迫害的作家的材料。下面略举几位有代表性的作家的姓名：尼古拉·扎鲍洛茨基、安塔尔、吉达什、尤里·盖尔曼、列昂尼德·索洛维约夫、奥丽迦·别尔戈丽茨、叶甫盖尼·塔拉塔图、维拉·凯特琳斯卡娅、伊凡·马卡里耶夫、约汉纳·塞姆彼尔、穆赫塔尔·阿乌埃佐夫等等。其中，哈萨克作家阿乌埃佐夫的事件最具戏剧性。他那部描写哈萨克伟大诗人、启蒙学者阿拜·库南巴耶夫的著名史诗性小说《阿拜的道路》在阿拉木图被诋毁成“有敌对情绪的作品”，阿乌埃佐夫处境危险。法捷耶夫在斯大林奖金委员会例会上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提议把阿乌埃佐夫列入斯大林奖金一等奖获奖者候选人名单。几天后名单得到斯大林的批准，阿乌埃佐夫因此得救。

法捷耶夫还冒着风险，帮助一批作家在处境极其艰难的情况下活下来，他们是：安娜·阿赫玛托娃、米哈伊尔·左琴科、弗谢沃洛德·伊凡诺夫、西蒙·契科瓦尼、伊拉克里·阿拜希泽、马克西姆·雷里斯基、弗拉基米尔·索斯尤拉、米尔扎·伊勃拉吉莫夫和几百名其他知名度较小的作家。

法捷耶夫与50年代中期以前的苏联文学进程有密切的关系，在评判他的言行时必须采取严肃的实事求是的辩证的态度。他在忠实执行苏共中央文艺政策时毫无疑问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事情还有另外一面。下面介绍

法捷耶夫与长期被批判的阿赫玛托娃、布尔加科夫、帕斯捷尔纳克和普拉东诺夫的关系。按照常理想象，法捷耶夫与这些作家应该是水火不相容的，其实，情况要复杂得多。

阿赫玛托娃在十月革命后一直处于被批判的地位，但是奇怪的是，法捷耶夫十分欣赏她的诗歌并且很尊敬她。1940年8月，法捷耶夫第一次以作协领导人的身份会见阿赫玛托娃，态度友好热情。他仔细倾听阿赫玛托娃的请求，办了他职权范围内能办的一切。使阿赫玛托娃感到震惊的是，法捷耶夫竟然和帕斯捷尔纳克联名举荐她为斯大林奖金候选人。事后证明，这次举荐是好心办了坏事。举荐引起了苏共中央的警觉，阿赫玛托娃的诗选《六诗集选萃》恰好在这时出版，苏共中央对此作出了激烈的反应，中央书记处下令追查责任。正当党中央机关逐级传达书记处的指示时，出版社已经把印好的诗集装上火车送往各地。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书店前排起了长队，诗集被抢购一空。苏共中央收集反应。给中央的一份报告指出，阿·托尔斯泰向群众大力推荐阿赫玛托娃的诗集，还在斯大林奖金委员会文学组会议上建议正式提名阿赫玛托娃为奖金候选人。报告还特别提到：“出席会议的有法捷耶夫同志。”

1946年，苏共中央发布《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点名批判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两人处境险恶，生活困难。法捷耶夫一方面写文章表态，拥护党中央决议，另一方面对两人表现出最大程度的人性和正派作风，多次给文学基金会写信，要求给予他们物质上的帮助。

法捷耶夫于1953年帮助阿赫玛托娃在苏联作家出版社出版新作，这在当时是需要极大勇气的。1956年2月，已经被撤职并且生病住院的法捷耶夫在接到阿赫玛托娃的求援信后，立即写信给总检察长，为阿赫玛托娃的儿子古米廖夫的平反出了大力。

法捷耶夫与布尔加科夫的关系又如何呢？熟悉苏联文学的人都知道，布尔加科夫由于剧本《图尔宾一家的命运》上演后受到斯大林的指责而终身受压。《图尔宾一家的命运》受批判是1926年的事情，当时法捷耶夫还未登上领导岗位。1940年6月，《图尔宾一家的命运》在列宁格勒上演，法捷耶夫有机会第一次看了这出戏。他看后盛赞剧本，说布尔加科夫拥有非凡的才能。他立即去拜访布尔加科夫，当时布尔加科夫已身患重病，不久于人世了。法捷耶夫赞赏布尔加科夫的剧本《逃亡》，在读完长篇小说《大师与玛格丽特》的手稿后，当面对布尔加科夫说，这是一部天才的杰作，对出版社不敢印行这部作品表示遗憾。布尔加科夫生性高傲，不愿见作协领导人，费定在拜访一次后就被告知以后不必再来。但法捷耶夫的诚挚、正派赢得了布尔加科夫的信任，他在临死前把身后出版作品的事委托给法捷耶夫。法捷耶夫组织了一个布尔加科夫文学遗产委员会，亲自挂帅，负责布尔加科夫作品的编辑出版工作。此事阻力很大，但法捷耶夫仍然编好了布尔加科夫的剧本集。可惜战争爆发，出版工作被无限期推延了。

帕斯捷尔纳克也是一位长期受压的诗人。在他不能发表作品的困难年月，法捷耶夫帮助出版他翻译的莎士比亚剧作，帕斯捷尔纳克写信表示万分感谢。

法捷耶夫与普拉东诺夫的关系很能说明法捷耶夫的矛盾。普拉东诺夫是一位以反乌托邦为特色的讽刺作家。他的讽刺小说《爱怀疑的马卡尔》发表在1929年《红色处女地》杂志上（该杂志是20年代最有名望最优秀的期刊，

法捷耶夫是杂志主持人之一)。在这之前，无论哪家杂志都不敢刊登这篇小说。小说立即受到批判，苏共中央给这篇小说定的性是“宣扬无政府主义”。法捷耶夫不得不在杂志下一期上发表批判文章。后来，在他去世前不久，在编辑自己的论文集《三十年间》时，法捷耶夫痛心地作了自我批评。

1931年，《红色处女地》第三期又发表了普拉东诺夫的讽刺小说《有好处》，这篇作品是针对1929年农业集体化运动的，讽刺了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小说以不敬的语调提到了斯大林的《胜利冲昏头脑》一文，又借贫农乌波耶夫之口请求列宁在身后留下一个和他一样的人。当时是1931年，斯大林已执政7年，乌波耶夫的这个请求当然是公然否定斯大林。这篇小说的责任编辑是法捷耶夫，他又是杂志主编。他把小说放在该期第一篇，以示重要。小说发表后，引起轩然大波。苏共中央认为法捷耶夫“迷失方向，思想上丧失警惕”，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责令检查。法捷耶夫再次被迫写批判文章，说这篇小说不是“贫农编年史”（小说的副标题），而是“富农编年史”。杂志另一位编辑列昂诺夫被迫表示同意法捷耶夫的意见。法捷耶夫公开认错，痛责自己鼠目寸光，但是他内心里赞赏普拉东诺夫的胆识和才华。后来，他又在《红色处女地》上发表了普拉东诺夫的短篇小说《第三个儿子》。

在普拉东诺夫处处遭人白眼的窘境中，法捷耶夫为他在莫斯科特维尔大街搞到一套住宅，这在30年代简直是奇迹，因为普拉东诺夫既没有莫斯科户口，也没有固定职业。二次大战时，普拉东诺夫任《红星报》记者。法捷耶夫一直把他的战争题材特写和短篇小说置于战争年代优秀作品之列。

1954年，法捷耶夫被撤掉作协主席和总书记的职务，直接原因是他给苏尔科夫的一封信。他本来是要给苏共中央写这封信的，但是考虑到以给作协另一主要负责人苏尔科夫写私人信件的方式，通过苏尔科夫把自己对苏联文学的看法转达给党中央委员会，这样做比较委婉些。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有三点：

1. 过去十几年，苏联文学中充斥平庸的粗制滥造的作品，艺术水平低下，获斯大林奖金的作品大多够不上获奖的条件。

2. 中央对过去十几年苏联文学的总评价是错误的，根本没有什么苏联文学的繁荣。

3.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优秀的作家（全国大概有十几个）大多担负着沉重的行政工作，他们没有时间和精力进行创作。必须尽快解放这些人。

信的附言示意苏尔科夫可以把这封信转呈党中央。苏尔科夫也不敢把这封信藏起来，立即亲自打印一份，呈给中央。

这封信最关键的一点是对30年代下半期至50年代初的苏联文学的总评价，这是与苏共中央一贯的调子截然相反的。当时谁也不敢这样提。法捷耶夫也只是在斯大林去世后才敢这样说，他希望在略为宽松一些的政治气氛中让中央头脑清醒一些。他对造成现状的原因也是认识得很肤浅的，也许当时也只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可是这一封信使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非常恼怒，法捷耶夫立即被解除作协总书记和主席的职务。作协工作改由苏尔科夫主持。

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召开前，赫鲁晓夫准备与作家会见，请法捷耶夫在会见时发言，法捷耶夫谢绝了。赫鲁晓夫希望他重返作协领导岗位，他也谢绝了。

二十大召开时，他是代表，但因病住院。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使他十分震惊。他一生的理想破灭，他所绝对信任和尊敬的斯大林的形象在他眼前发黑，破碎了。他本人在二十大上遭到肖洛霍夫等人的激烈攻击，有关他的流言蜚语随之四处传播。二十大后两个月，法捷耶夫开枪自杀。他的绝命书被克格勃封存 34 年之久，直到 1990 年 9 月 20 日才由《公开性周报》发表。这份绝命书的观点和语气都是十分尖锐的：

1. 苏联文学是“被自信而又无知的”苏共领导扼杀了。

2. 大批优秀的文学人才被迫害致死。

3. 作协工作是庸碌的官僚主义事务。法捷耶夫痛悔自己的一生浪费在这些事务之中。

4. 法捷耶夫对苏共现领导完全失去信心，认为他们在文化修养上比斯大林还不如。

向法捷耶夫遗体告别仪式在工会圆柱大厅举行。按照传统，以赫鲁晓夫为首的政治局成员和书记处成员最后守灵。守灵后，赫鲁晓夫一行退入大厅旁边的休息室，老作家李别进斯基泪流满面，对赫鲁晓夫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太可怕了！多么大的损失！萨沙出了这样的事，向自己开枪……”赫鲁晓夫立即打断他，用刺耳的声音说：

“他向党开枪，而不是向自己。”

周围的人心头一沉。

（《译林》1998 年 4 期）

## 布罗茨基的矛盾

刘文飞

布罗茨基的重要散文，大都收在他的两本散文集中，一本是《小于一》（Less Than One, 1986），一本是《悲伤与理智》（On Grief and Reason, 1995），两书都是由纽约的法勒—施特劳斯·吉罗克斯出版社出版的。出版年代相隔近十年的两本书，封面的装帧却是一模一样的。读了两本文集中的文章，便能得出一个关于布罗茨基美学观、诗歌观的整体印象。与此同时，笔者在阅读这些文字时，也感觉出了布罗茨基的一些“矛盾”。

像其他诗人一样，布罗茨基在诗歌与散文的等级划分上总是抬举前者的，他断言：诗歌是语言存在的最高形式。在《诗人与散文》、《谈读书》等文中，他精心地论述了诗歌较之于散文的种种优越性。然而，像其他诗人一样，布罗茨基也不能不写散文。与大多数诗人不同的是，布罗茨基的散文写得非常出色。流亡到美国之后，尤其是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布罗茨基的各种散文作品不断出现在报刊上和书籍中。也许，到了一个新的文化环境中，他想更直接地表达自己的声音，也想让更多的人听到自己的声音；再者，以不是母语的另一种文字进行文学创作，写散文也许比写诗更容易一些。这些散文有些是他先用俄语写作，然后与朋友一起译成英文的，有些是他直接用英文写作的。令人惊奇的是，布罗茨基这些以英文出现的散文却在西方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甚至被称为“英文范本”。《小于一》曾获全美图书评论奖，《悲伤与理智》出版后也赢得了广泛的反响。布罗茨基推崇诗歌，但在他的创作中，散文却似乎赢得了与诗歌平起平坐的地位；布罗茨基是以诗歌获得诺贝尔奖的，是以诗人的身份享誉全球的，可人们却似乎在怀着更大的热情阅读他的散文。是诗人获得了一次无心插柳式的成功，还是命运与布罗茨基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我们更愿意将布罗茨基在谈到茨维塔耶娃由诗歌“转向”散文时所说的那句话反过来用在他自己的身上：散文不过是他的诗歌以另一种方式的继续。

在《诺贝尔奖获奖演说》、《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第二自我》等文中，布罗茨基试图通过对诗歌与政治之关系的探讨，来肯定诗歌的地位和使命。首先，他强调诗歌与政治的不同以及诗歌相对于政治的独立，他认为，诗歌（poetry）与政治（politics）的相同之处仅在于字母p和字母o，再无它者；其次，他意识到了诗歌与政治的难以相容：每一种社会形态，无论是民主制度、专制制度，还是神权制度、意识形态制度或官僚制度，都怀有一种欲缩小诗歌权威的本能愿望，因为诗歌除了能与国家构成竞争以外，还会对自己的个性、对国家的成就和道德安全、对国家的意义提出疑问，因此，在人类的童年过后，诗歌和诗人便常常是失宠的了。最后，他竭力主张诗歌与政治的平等，并宣称了诗歌较之于政治的优越：诗歌应该干涉政治，直到政治停止干涉诗歌；政治提倡集体和服从，诗歌则注重个性和自由，政治讲究稳定和重复，诗歌则倡导革新和创造，拒绝复制、拒绝重复的诗歌，永远是新鲜的明天，而政治则是陈旧的昨日。无论对于单个的人还是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诗歌都是惟一的道德保险装置，惟一的自我捍卫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罗茨基引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阿诺德的两句名言：“美拯救世界。”“用诗歌代替信仰。”在这里，我们看到，就诗歌与政治的关系展开讨论，这本身就已经表明诗歌与政治间有着某种瓜葛，诗歌因而也许是

难以绝对独立的；为诗歌谋求崇高地位和使命的布罗茨基，却似乎恰恰是在使诗歌“政治化”。在他的意识和观念中，诗歌不是纯技巧的游戏，更不是什么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关系到人生、关系到文明的一种存在方式。

在布罗茨基分析阿赫马托娃、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奥登、弗罗斯特等人的文章中，我们又感觉出了一个矛盾：一方面，布罗茨基非常推崇以这些大家为代表的诗人对语言的处理，称每一位诗人都是语言的历史学家，他赞同华兹华斯关于“诗为最佳词语最佳排列”的定义，认为诗人的使命就是用语言诉诸记忆，进而战胜时间和死亡，为人类文明的积淀作出贡献；另一方面，他却又继承了诗歌创作的灵感说，夸大诗人在写作过程中的被动性，他在不同的地方一次次地提醒我们：诗人是语言的工具。他写道：“只有诗人才永远清楚，平常语言中被称之为缪斯的东西，实质上就是语言的操纵，他清楚，不是语言成为他的工具，而他反倒是语言延续其存在的手段。”（《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作家在很大程度上是语言的工具。”（《析奥登的1939年9月1日》）在布罗茨基看来，诗人写诗，是因为语言对他作出了某种暗示，真正的诗人，就是始终处在对语言的依赖状态中的人。布罗茨基将诗歌置于至上的高峰，却将其创造者诗人赶下了山岗，让他们无可奈何地蜷缩在语言之树的浓荫之下。这大约正源自他对语言的忠诚和迷信。布罗茨基认为，语言就是文明的载体，是人类创造中惟一不朽的东西，图书馆比国家更强大，帝国不是依靠军队而是依靠语言来维系的。而诗歌作为语言最紧密、最合理、最持久的结合形式，无疑就是传递文明的最佳工具。

此外，从体裁上看，布罗茨基的散文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散文，而多为一些回忆录、序跋、评论、演讲、讲稿等，但作者却能将这些“应酬文”写成美文；从语言上看，布罗茨基的文字既严谨又随意，既先锋又保守，他捍卫诗歌的价值和诗人的意义，字里行间时时处处表现出一种严肃的责任感和神圣的使命感，另一方面，他的语言民主化的主张也在他的散文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在写作（和演讲）时似乎是无所顾忌的，可以随意地谈到父母的做爱、演员的同性恋、湿床单上的公开暴露物等等；从情绪上看，他的态度既热忱又冷漠，自始至终的怀疑精神和冷漠态度，似是布罗茨基散文的一大特征，读者不难遇见他的嘲讽、甚至刻薄，但在这一切之后却又时时能体味出他的那份温情。

诗歌与散文，诗歌与政治，诗人与语言，传统与先锋，保守与民主，冷漠与热忱，悲伤与理智……但是，布罗茨基的这些矛盾绝不是浅薄而是深刻，绝不是问题而是答案，是深刻思考的结果，更是进一步深化思考的途径。也许，布罗茨基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些矛盾却允许它们继续存在。也许，布罗茨基的这些矛盾，就是古老诗歌与现代社会之矛盾的一个显现，就是诗人在当代之处境的一种象征。

## 科别列夫：俄国作家德国公民

邓理明

1997年6月对俄罗斯文化界来说是一个不幸的月份。伟大诗人奥库贾瓦于13日去世，18日另一位著名作家列夫·科别列夫又在波恩撒手人寰。俄罗斯的传媒在对奥库贾瓦进行全面深入报道的同时并没有忘记早已不是俄罗斯公民的科别列夫。独立电视台的著名主持人基谢廖夫当时就说：“科别列夫的去世是德国人的损失，更是俄国人的悲哀。”

科别列夫1912年出生于基辅的一个农学家家庭，自幼开始学习德语，30年代先后在哈尔科夫和莫斯科从事德国学研究，并与当时客居苏联的德国侨民（主要是一些共产党人）过从甚密。卫国战争爆发后，科别列夫作为一名苏共党员被派往前线做宣传工作。战争胜利前夕，即1945年5月5日，他出人意料以“宣传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诬蔑红军指挥员，诬蔑作家爱伦堡，诬蔑盟军”等罪名被捕入狱，判以十年徒刑。服刑期间他与索尔仁尼琴关押在同一个集中营，结下莫逆之交。后来根据这一段经历索尔仁尼琴写下了著名的长篇小说《第一圈》，书中那位百折不挠、坚持己见的主人公列夫·鲁宾的原形就是这位列夫·科别列夫。

50年代中期，随着苏联政治气候的改善，科别列夫得以平反。出狱后他定居莫斯科，并与拉伊萨·奥尔洛娃结合。拉伊萨·奥尔洛娃也是一位颇有主见且富文学天才的女性。两人非同寻常的经历使他们的家成了当时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聚会的地方。

科别列夫一生中最崇拜的人是一位叫哈兹（1780～1853）的德国医生。哈兹19世纪初迁居俄国，在俄国监狱里做狱医近30年。他生活的惟一目的就是为那些最不幸的囚徒减少痛苦，他的名言是“即时行善”。医生的名言深深地影响了科别列夫的人生观，使他终身奉行人道主义的思想原则。定居莫斯科之后，他便设法帮助那些身陷囹圄的人们，帮他们购买药品、衣物、书籍，为他们募捐，还为他们能提前释放奔走呼号。60年代科别列夫身边聚集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作家、诗人，如达维德·沙莫依洛夫、布拉特·奥库贾瓦、法泽尔·伊斯康德尔、弗拉基米尔·科尔尼洛夫等。作为一名人道主义者，科别列夫几乎与当时所有争取人权、反抗专制的社会活动联系在一起。1964年著名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以“不劳而获”之罪名被判五年徒刑。科别列夫夫妇即与著名的人权捍卫者李季娅·楚科夫斯卡娅一道展开斗争，直至布罗茨基出狱。1965年作家丹尼尔和西尼亚夫斯基因讽刺时政被捕，科别列夫挺身而出为两位作家辩护。后来他又参加了萨哈罗夫领导的人权捍卫活动。为此克格勃一直视科别列夫为眼中钉、肉中刺，并多次对他进行人身威胁：砸碎他卧室窗户的玻璃，将酒瓶扔到他的床头，甚至就在他所住的楼房里杀害他的朋友。然而这一切都动摇不了科别列夫捍卫人权的信念。他说：“在一切民族，一切社会团体那里只存在一个选择：或与持不同政见者达成一致或与他们同归于尽。”

1980年应德国著名作家伯尔之邀，科别列夫夫妇前往波恩访问。不意几个月之后，苏联政府便宣布取消二人的苏联公民权，将其逐出国门。

到德国后的几年里科别列夫潜心著书立说，他完成了第三部回忆录《消除我的悲伤》。可以说这本书与他的前两本回忆录《为自己创造偶像》、《永志不忘》构成了作家的自传三部曲。在三部回忆录里科别列夫讲述了他青年

时期盲目崇拜政治，其后站出来反对高压，最后在集中营里既看到人性丑恶又发现人性善良的心路历程。三部曲贯穿着这样一种思想：从本世纪初就开始的战争至今尚未结束，而在所进行的这些战争中根本无所谓胜利者。战争即意味着社会的瓦解，道德的沦丧与个性的消亡。科别列夫认为，为了根除战争，根除政治迫害，“必须确保各种不同思想在社会中存在的权利。这并不是让所有的民族去彼此相爱——完全没有此种可能，而是让各个民族彼此了解和相互容忍。必须在政治领域，科学领域，社会领域里建立起一种道德，不加任何形容词的道德”。三部曲中的《永志不忘》倍受西方读者的欢迎，它使科别列夫成为极受瞩目的俄国作家。

到德国不久，科别列夫被恩格斯的故乡武珀塔尔市的一所大学聘为教授，在那里从事三个世纪以来俄德文化关系史的研究，并写下若干部专著论述俄国文化中所渗透的德国精神以及德国文化中所表现的俄国思想，同时还出版了多部有关伯尔、布莱希特、施特里马特、弗里施的学术著作。

科别列夫在德国的影响远远超过他在俄罗斯。他是德国知识界少数几个最有声望的人物之一。在德国的书店和电视屏幕上经常能见到科别列夫的面孔。在那里他几乎是家喻户晓。据友人回忆，1988年春，当科别列夫到波恩机场迎接苏联来的朋友，工作人员立刻认出他来，并破例让他进入机场，到飞机的舷梯边迎接客人。而当波恩的出租车司机得知所载的乘客是去拜访科别列夫时，也免不了要打听一番作家的近况。

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科别列夫受到俄罗斯当权者的欢迎。他多次回到莫斯科，积极推动国家的民主进程。1991年夏天他支持叶利钦执政。可是当叶利钦推行“休克疗法”的经济政策时，他又与索尔仁尼琴一起站到了政府的对立面，并利用各种场合抨击现政府。1996年全俄进行总统选举，科别列夫既反对久加诺夫，也反对叶利钦。及至投票的前几天，出于对国家未来的深远考虑，他才放弃了反对叶利钦的立场。

值得一提的是，科别列夫还是一位造诣颇深的语言学家。他精通多种语言，还懂汉语。他曾翻译过毛泽东的一本著作，并作有注解。在告别人世前的几个小时，他用颤抖的手写下四个汉字“万事如意”，以此表达他面对死神无所畏惧的乐观主义精神。

（《书摘》1998年第8期）



## 思想书廊

### 《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

[美] 丹尼尔·戈德哈根著 贾宗谊译

新华出版社 1998年4月出版 定价：20.00元

在纳粹大屠杀时期，德国人消灭了600万犹太人，这是20世纪最令人震惊的事件。本书试图阐明种族大屠杀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来龙去脉；为什么那么多人参与此事，自觉自愿地成为大屠杀的执行者；这些大屠杀的执行者究竟是些什么人，他们有什么背景，生活的目的是什么，他们有自己的世界观，而这一切是在怎样特定的社会和历史环境中形成的；德国人民何以同意灭绝种族的纳粹纲领，并以各自的方式为此尽力……

本书作者对大量史实、幸存者的回忆和追述等资料作了崭新的分析。本书出版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

## 罗曼·罗兰的担忧与胡适的反悔

雷颐

罗曼·罗兰 1935 年对苏访问一个月中所写的《莫斯科日记》按作者的要求封存了半个世纪后才重见天日。之所以要封存如此之久，主要是作者在日记中对苏联略有微辞，但在几乎所有“微辞”之后，作者立即又反过来为他所批评的现象作一番“可以理解”的辩解，唯恐因这些“微辞”使外界对苏联产生“不良影响”。

例如，他亲眼看到群众对斯大林种种令人肉麻的个人崇拜而反感之至，但立刻又认为这是由于“所有的人都处在集体狂热的影响之下——期望、快乐和信心的狂热，狂热地确信他们在世界上为之效力的事业的正确和宏伟。在历史上，这被称为‘成功时刻’——人民最充分地经受自己命运的时刻”。“双手服从大脑——共产党及其人民委员会。这是可靠的大脑，而且，它可靠地架在肩膀之上。”对于他所景仰的、英明的斯大林为何会容忍甚至欣赏这类明显是阿谀奉承的个人崇拜他先是表示不解，认为这是一个历史之谜，随即又作出这并非斯大林怂恿，只是心想：“让他们夸吧，只要他们做我希望做的事”的解释。

对苏联当时贯彻“阶级路线”，不许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少年上学或进工厂的政策，他开始非常不满，但随后又认为是“可以理解”的了：“还有其他许多不公正的表现，包括把不信任转移到儿童身上，而这种不信任或许是他们的父辈或者他们根据出身所属的阶级所应得的：不允许他们获得任何岗位，甚至是为成人活动作准备的学校中的岗位。因此，正在不人道地形成贱民阶级。必须承认这一切，只能对此感到可惜，只能纠正和根除——但无论如何不能不理解这一切。”

作为一个敏锐的观察者，他看到苏联的领导层的权力实际是不受监督的，而且在生活和社会的方方面面享有种种特权，他非常担心由此会产生一个“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不过他立即又写道：“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不会大肆宣扬革命的失败。我从不认为，革命能够一下子、立即实现人类兄弟般的团结和无产阶级的社会。”“苏联革命可能成为人类社会在通向这个目标的道路上迈出的最大一步。对苏联革命的荣耀来说，这已足够……无论今后将发生什么，将始终需要管理人类巨大躯体的中枢。”

作为一个充满爱心的人道主义者，他对斯大林的苏联滥用权力、扩大专政当然屡表反感，但终认为“滥用权力是由情势(和事实)的逻辑所引起的”，“这是‘战时状态’。这是‘戒严状态’”。这位深具博爱精神的人道主义者得出的结论之一甚至令人毛骨悚然：“精心选择的政党对千百万非党人士的不屈不挠的专政是需要的。非党人士或许比敌人更危险，因为不能确定他们的准确人数……我不能谴责专政(只能因为它努力伪装起来而谴责它)，因为危险仍存在。”

尽管对所有的罪恶他几乎都作了一番辩白和洗刷，但最后他还是担心地说：“当我重读这些笔记时，我感到担心，它们可能显得过于持批判态度，并使把我当作兄弟的人们感到不愉快。我希望，将不会发生这样的事，那些将阅读我的日记的人们，能感觉到我对我所写到的人们的尊敬和依恋……我在作出总结时，说出了自己的有利于苏联和斯大林的政策的意见。目前这些政策包含某种消极的东西；这是不可避免的……可是，斯大林的政策所包含

的积极的东西远远超过所有消极的东西。我丝毫不怀疑，世界更美好的未来是与苏联的胜利连在一起的。”

经历了几十年的风云剧变之后，我们今天读到这段文字不能不感叹历史实在是过于无情。但这绝不仅仅是罗曼·罗兰个人的悲剧，而是那几乎一代知识者的悲剧，因为这种思想在当时所谓“知识阶级”中有绝大的影响，“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一口号曾扬起一代人的理想之帆。对苏联的态度，在当时完全成为衡量“进步”与“反动”的标准。在中国，左翼知识者的观点、态度自不待言，甚至向被认为是知识者“右翼”的代表胡适，也曾对苏联屡有赞美。

众所周知，胡适对马克思主义一向不表赞同，在1919年有关“问题与主义”的讨论中与李大钊就此曾有过一番不小的争论。不过，他在1926年所写的长文《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对社会主义却又大表赞扬：“18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19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19世纪以来，个人主义的趋势的流弊渐渐暴白于世，资本主义之下的苦痛也渐渐明了了。远识的人知道自由竞争经济制度不能达到真正‘自由，平等，博爱’的目的。向资本家手里要求公道的待遇，等于‘与虎谋皮’。救济的方法只有两条大路：一是国家利用其权力，实行裁制资本家，保障被压迫的阶级；一是被压迫的阶级团结起来，直接抵抗资产阶级的压迫与掠夺……于是，几十年之中有组织的劳动阶级遂成了社会上最有势力的分子。10年以来工党领袖可以执掌世界强国的政权，同盟总罢工可以屈服最有势力的政府，俄国的劳农阶级竟做了全国的专政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的大运动现在还正在进行的时期，但他的成绩已很可观了。”

就在这篇文章写后仅一个多月，胡适便取道俄国前往欧洲，在莫斯科停留3天，有机会亲眼看看这个“劳农专政”。这3天中他马不停蹄，参观了革命博物馆、监狱，会见了一些科学、教育界的人士，深为这场崭新的“实验”所感动，迫不及待地给友人的信中畅谈自己的新鲜感受。这些信件集为《欧游道中寄书》（收入《胡适文存》第三集卷一），与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可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抑制不住自己的心情，兴奋地写道：“此间的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专笃（Seriousness of Purpose），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在世界政治史上，从不曾有过这么大规模的‘乌托邦’计划居然有实地试验的机会。”他对“有计划”格外欣赏，认为“要干政治，必须要有计划，依计划去做。这是方法，其余皆枝叶耳”。因此，他甚至也在某种程度上违背自己所服膺的“自由”原则，而对“专政”（当时音译为“狄克推多”）欣然赞许：“苏俄虽是狄克推多，但他们却真是用力办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依此趋势认真去做，将来可以由狄克推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同时，参观革命博物馆使他产生了一种深深的自责：“我又感觉一种刺激。我们这几年在北京实在太舒服了，太懒惰了，太不认真了……我去看那‘革命博物馆’，看那1890~1917年的革命，真使我们愧死。”胡适的这些观点在国内被报纸摘登发表，在他的朋友中引起不同反响，有人赞同，有人反对。针对种种疑虑，胡适自信地回答说：“我所见已使我心悦诚服地承

认这是一个有理想、有计划、有方法的大试验。我们的朋友们，尤其是研究政治思想与制度的朋友们，至少应该承认苏俄有作这种试验的权力。”徐志摩向胡适提出几点质疑：苏俄的乌托邦理想在学理上有无充分的根据，在事实上有无实现的可能？他们的方法对不对，有无普遍性？对此，胡适10月在欧洲给徐志摩写了一封长信，针锋相对地反问道：“资本主义有什么学理上的根据？国家主义有什么学理上的根据？政党政治有什么学理上的根据？”“政治上的历史是《红楼梦》上说的‘不是东风压了西风，便是西风压了东风’。”同时，他还批驳了“私有制废除之后，人类努力进步的动机就没有了”和“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不能有伟大的生产力”这两个“成见”。认为人类进步、发展的动力与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无关，“无论在共产制或私有制之下，有天才的人总是要努力向上的”；资本主义现在生产力的发达在于其“生产组织”的发达完备，社会主义目前落后的原因不在于生产组织的暂不完备，今后赶上资本主义“并不是绝对不可能的”。对社会主义制度有无普遍性这一问题，胡适的回答是：“什么制度都有普遍性，都没有普遍性……我们如果肯‘干’，如果能‘干’，什么制度都可以行。如果换汤不换药，如果不肯认真做去，议会制度只足以养猪仔，总统制只足以拥戴冯国璋、曹锟，学校只可以造饭桶，政党只可以卖身。”很难想像，这些文字是出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之手。

此后，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胡适对苏联的看法不断有所改变，在近30年后，他终于有机会对当年的观点公开表示反悔。

1953年雷震在台湾主办的《自由中国》杂志连载了殷海光翻译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F.A.Hayek)于1944年出版的《到奴役之路》(今译《通往奴役之路》)。这部著作坚决反对计划经济，宣扬市场经济和个人主义。成为现代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作。1954年春，胡适从美国回台访问近两个月，还专门就此作了一场题为《从到奴役之路说起》的演讲。他对哈耶克“一切计划经济都是与自由不两立的，都是反自由的”观点大为称赞：“因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计划经济，所以尽管自由主义运动者多少以为：社会主义当然是将来必经之路，而哈耶克先生却以一个大学家的地位来说：一切社会主义都是反自由的。”同时，他对自己20年代的观点作了公开的忏悔。他说：“在民国十五年六月的讲词中，我说：‘18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19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当时讲了许多话申述这个主张。现在想起，应该有个公开忏悔。不过我今天对诸位忏悔的，是我在那时与许多知识分子所同犯的错误；在当时，一班知识分子总以为社会主义这个潮流当然是将来的一个趋势。我自己现在引述自己的证据来作忏悔。”紧接着他将锋芒指向台湾当局，因为国民党一直标榜“节制资本”“反对资本主义”(不管实际怎样，起码口头如此)，强调“国营”，主张政府对经济的“统制”和计划(实际以官僚资本压制民间、私人资本)，在撤台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对经济的管制更严。针对这种状况，胡适说：“现在台湾的经济，大部分都是国营的经济，从理论与事实上来说，像哈耶克这种理论，可以说是很不中听的。”希望国民党当局听了这些话，看了《自由中国》等杂志后“也不要生气，应该自己反省反省，考虑考虑，是不是这些人的话，像我胡适之当众忏悔的话，值得大家仔细一想的？大家不妨再提倡公开讨论：我们走的是到自由之路，还是到奴役之路？”他提出台湾应为资本主义正名，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垄断经济走向自由经济，同时在

政治上改变一党专制的状况。他说“资本主义不过是‘勤俭起家’而已。”“‘勤俭为起家之本’，老百姓辛苦血汗的所得，若说他们没有所有权是讲不通的。从这一个做起点，使人人自己能自食其力，‘帝力何有于我哉’这是资本主义的哲学，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哲学。这是天经地义，颠扑不破的。”“我们也应该想想，是不是一切经济都要靠政府的一般官吏替我们计划？还是靠我们老百姓人人自己勤俭起家？”“我们还是应由几个人来替全国五万万人来计划呢？还是由五万万人靠两只手、一个头脑自己建设一个自由经济呢？”

罗曼·罗兰与胡适都不是社会主义者，但他们在二三十年代对苏联大致相同的看法的确不是偶然的，反映了当时知识界的思想取向。当然，胡适的幸运在于“天假以年”，历史给他以反悔的机会，而早在1944年就辞世而去的罗曼·罗兰当然无此“机会”，所以对苏联始终充满感情。对一种社会的本质的认识确非易事，有时，是需要几代人的时间的。

（《方法》1998年第8期）

## 思想书廊

### 《顾准寻思录》

陈敏之丁东编作家出版社 1998 年 9 月出版定价：23.80 元

顾准，仍然是一个崭新而启人深思的话题。

本书收集了我国学界迄今为止评论、介绍顾准其人其学的主要论述。全书分三大部分：面对顾准——《顾准文集》评论；探求顾准——《顾准日记》争鸣；追忆顾准——顾准往事钩沉。史料珍贵、新鲜，思考深邃、现实。既为研究者提供研究的线索，也为一般的读者了解一个时代和一位思想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读本。

## 帕斯：假释的自由

[ 西班牙 ] 哈维尔·何塞 范晔译

1998年4月19日，奥克塔维奥·帕斯死于墨西哥城。这位墨西哥作家的去世，使西语世界失去了整个20世纪最重要的诗人和知识分子之一。帕斯生于1914年，自早年起就投身于这个即将过去的世纪中的所有波澜壮阔的政治、社会、文化风云之中，并成为这一切变革动荡的见证者。从30年代开始，奥·帕斯写作诗歌，创办杂志，作为教授在大学授课，作为外交官游历各国，致力于东西方之间各民族不同文化间的对话……这一切文化工作获得了应有的荣誉：1987年，他被授予“塞万提斯”文学奖；1990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在奥克塔维奥·帕斯几乎整个生涯特别是后期岁月中，与其他一些拉美重要作家在政治社会领域的论争从未止息。在最初的青年时代，正像那一代大多数作家所做的那样，他加入到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革命派之中。1937年，正值西班牙内战（1936~1939）如火如荼之时，出于对社会责任的承诺意识，他抛下家庭及大学学业来到西班牙，应聂鲁达之邀参加“第二届国际反法西斯作家代表大会”。在西班牙他遇见了其他几位重要的拉美作家，如阿雷霍·卡彭铁尔、巴勃罗·聂鲁达、维多夫、塞萨尔·巴列霍和尼古拉斯·纪廉，并与一些西班牙作家特别是“27年代”诗人中的佼佼者结下了友谊。在西班牙度过的四个月里，他积极地参与到拥护共和国派的一系列活动中。但当他重返墨西哥后，奥·帕斯这位世界风云的关注者却渐渐成为了一个左翼知识分子内部的批判声音。在拉美知识界他第一个站出来指斥斯大林统治下的前苏联政体、集中营以及大肆杀戮。在以后的岁月中历史本身验证了奥·帕斯的深刻见地。而在当时，却正是因为这些见解，许多作家对他进行了狂风暴雨般的不公正的攻击。比如巴勃罗·聂鲁达曾公开指责他“良心还没有身上穿的衬衣干净”。这是奥·帕斯与西语文化界的第一次决裂。此后又有几次引人注目的对立纷至沓来，其中有与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与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的论争。他们将奥·帕斯划归右翼作家之列，理由是他对被压迫国家的武装革命很少表示友善。我认为这样的指责有悖公正亦无道理可言，而多源于意识形态的狭隘和盲目。帕斯一向视民主为通向世界和平融洽的必由之路，并真诚地捍卫这一政治信念直至生命的终了。我们不该忘记，在1968年他担任驻印度大使期间，墨西哥总统迪亚斯在特拉特洛尔科“三文化广场”屠杀数百名游行学生，奥·帕斯主动辞去外交职务以示抗议。奥·帕斯终其一生保持着这样的行事为人态度，对此即使是反对他的人也无法否认。

然而我们不妨把这些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上的问题搁置一旁，把注意力集中到奥·帕斯的诗歌作品——他遗赠世界的巨大精神财富上面。奥·帕斯很早便开始文学创作，1933年出版第一部作品《野生的月亮》，此后又有《在你清晰的阴影下》、《石与花之间》、《世界之滨》等作品问世。从这些初出茅庐的诗作中，除早年的社会承诺诗歌之外，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贯穿奥·帕斯全部诗歌生涯的诸多题材：爱情与情欲、内心与存在、下意识与梦、艺术与诗歌、语言……

1943年，奥·帕斯开始为期九年的第一次环球之旅：将近两年的时间在美国的旧金山和纽约，在巴黎度过两个年头，以及在印度和日本的两年。客居异国的经历使他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文化氛围，为诗人的个人经历和精神

体验注入新的活力。然而却是在巴黎期间，奥·帕斯的创造力达到了巅峰。当他来到这座欧洲大都市之时，二战的硝烟刚刚散去，这位墨西哥诗人活跃于巴黎的文化生活中。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些彼此截然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一方面，是笼罩在让-保罗·萨特以及《现代》杂志阴影下的存在主义者们，他们一开始便对前两者颇有微词，认为其对于艺术毫无革新（相反地，他们对加缪却抱有敬意）；另一方面是以路易·阿拉贡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对于他们奥·帕斯已自感遥远；此外，还有一些独立的知识分子，他的朋友安德列·布勒东等超现实主义运动作家便属此列。奥·帕斯从一开始便对后一批作家怀有更多的亲近感，尽管与他们无论在年龄还是在美学观点、文化传统上都不尽相同。与超现实主义者的接触激起了他探求无意识领域的兴趣，并开始梦呓式写作的实践。在这一时期他写出了《孤独的迷宫》、《鹰还是太阳》以及《语汇下的自由》，并把后者作为此前创作道路的补遗和小结，此后又以同样的标题命名了自己的诗歌汇编。

《假释的自由》从超现实主义中受到启发，然而又与之保持了一定距离。诗人的灵感建立于自由之上，而这一自由又服从于言语的规则。帕斯对这一标题曾作过如下阐释：“自由是存在生命的基本元素，但她仍要遵从于一个条件，那便是诗歌的规律，我从不认为诗歌源于纯粹自发性或来自梦境或艺术的法则，也并非逻辑意识的产物，她乃是两者间的斗争——有些时候也会是拥抱——的结晶。”

离开巴黎，奥·帕斯作为墨西哥驻外大使，先后在印度、日本逗留二载，此后又重返印度，担任大使直至六年后的1968年自动辞去外交职务，以抗议总统迪亚斯为首的墨西哥政府杀戮学生的暴行。

在东方的岁月中，奥·帕斯受到了印度教、佛教、道教以及东方文学的强烈影响。1957年奥·帕斯诗歌的巅峰之作《太阳石》问世，成为其诗歌创作的里程碑。这首长诗由584行11音节诗构成，其高超的艺术才能于“自动写作”与理性批判意识之间游刃有余。“半自动诗歌写作”——恩里克·马里奥·桑蒂这样评价——“总结了奥·帕斯目前为止的个人轨迹，他和他那一代人在当时历史诸多灾难下的转型心路，同时融超现实主义美学与遗存的阿兹台克传说于一炉”。

正如书名中提示的那样（“太阳石”本是古墨西哥人的太阳历石碑）这首长诗自第一行起，于潜意识的微光下写作，在空白的书页上一泻千里，势不可挡，却又从未失去节奏韵律的流畅自如、和谐圆融，无处不流露出一切不朽之作不可或缺的天才情分。这些诗行借助“自动写作”的方式由灵感奔涌而出却并不肆虐汪洋，则要归功于艺术的、诗歌的、语言的法则。

奥·帕斯在生命最后的日子仍在进行诗歌创作。他为西班牙语文学界留下的精神财富，其价值难以估量。本文中并未涉及他在散文创作和文学翻译领域的成就。我们同样不该忘记帕斯又是整个西班牙语文学史上最优秀的文学批评家之一，他关于古典诗歌和现代诗歌的学术专著为更好地理解、探究拉美与欧洲的诗歌传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帕斯作品的博大精深有待于更多的著作研究来认识。作为以上简短介绍的结束语，我只想说：奥·帕斯的去世仅仅使我们失去了作家本人，而他的作品必将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永远的一席。



## 焚余草

### 关于《从苏联归来》郑超麟

《从苏联归来》出版于1936年，距今已有62年了。世界和中国在这期间，发生了多么重大的变化！书中所反对的，主要是当时苏联流行的对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现在怎样呢？现在，不仅被崇拜的个人已经灰飞烟灭了，而且连苏联这个国家也已解体。即以这个译本而论，出版时中国还是在受国民党的统治，不仅我这个译者，姓名不能写在书报上，连我的身体也监禁在国民党的中央军人监狱中。纪德此书的法文原本就是我的战友们从狱外设法送进狱中给我翻译的，我利用当时奉命翻译外国军法的机会，偷空译出，然后送出狱外。

著名作家楼适夷先生，当时也同我监禁在这个监狱中，也同我一起翻译军法。他曾回忆此事：

有一次，他翻译法国纪德的《从苏联归来》，有人说，这本书是反苏的，别看它。

可我还偷偷地作了他的译稿的第一位读者。我为此事还挨了难友们的批评。我不大服气。

我记得一节，是纪德游苏时，到电报局去打电报，电文中提到斯大林的名字。电报员要他必须在“斯大林”上面加上“伟大的”字样，他没有加，这电报就打不出去了。（见《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楼适夷文《记郑超麟》）

当时一同翻译军法的，只有我一个是托派政治犯，其余十余人都是中共方面的政治犯。我晚上住在小房间，他们集中住在大房间里，无形中成为一种组织。

由楼适夷的回忆可以知道，纪德此书具有战斗性。我刚译好，尚未付印，就引起了一次争论。我出狱后，听说销售很多，重印了好几次，发生了相当大的政治影响；也引起了争论。但我出狱后已经是全面抗战时期，人们已不去讨论拥苏反苏问题了。不过，解放后，我入狱，我译的《从苏联归来》一书还是被列为罪证，公安局的审讯员斥责道：你译的反动的《从苏联归来》的书阻止了好多青年人投奔延安！

由此我知道，平生所译的书，除了《共产主义ABC》在“大革命”时代发生过很大的政治作用之外，这本《从苏联归来》当时也曾发生了较小的政治作用。

所以，此次由于罗曼·罗兰的旅苏日记封存了50年之后公开出版，重新使人对于纪德的《从苏联归来》发生兴趣，使人急于知道这两个法国有名的作家先后相隔一年游苏感想有何异同，我的这个译本就从尘封的图书馆书架上被人找出来了。我看了倍加亲切，同意重新出版。

纪德为了回答当时的人对于他的“反苏”的攻击，曾再写了一本书，名为《我的从苏联归来再润色》，也是我翻译的，改名为《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也是由亚东图书馆出版。当时正在抗战期间，销售不多，图书馆没有收藏，想找一本却没有找到，便要放弃了。刚写到此处，忽然得到朋友来信，说他找到此书了，正在复印寄给我。我也是喜出望外。

我急于写完此序，不能再等待这第二本的纪德书寄来，便要在此序中对于罗曼·罗兰和纪德两大作家发表议论。

纪德有个朋友曾指着纪德的嘴巴说：“这张嘴巴是不会说谎的。”纪德游苏，看到好现象就表示赞美，看到坏现象，便如骨鲠在喉不得不吐。他明知写了并出版了这本《从苏联归来》，必然会招来所有亲苏的人的攻击，但他不管后果如何，写好还是发表了。罗曼·罗兰的日记，字里行间对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也是不满意的，但他只用暗示却不敢明写，又要封存 50 年。

纪德的第二本书（简称《答客难》）中说，他很少理会别人对他的攻击，惟有罗曼·罗兰对他的攻击，他是特别痛心的。我译这第二本书时，至今也已有 60 年整了，内容也不记得，只记得纪德如下的话，即“罗曼·罗兰对我的攻击使我痛心，这只老鹰已经筑好它的巢了”。这个反击，看似很轻，其实很重。

我老了，再过两年就满百岁，适逢中年时翻译的书今年又能重版问世，这也是晚年的一件喜事。

（《随笔》1998 年第 4 期）

## 思想书廊

### 《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

[日] 沟口雄三著 索介然等译

中华书局 1997 年版 定价：24.00 元

本书探讨了中国近代思想的本土渊源，以及后来的发展和变化历程，着重分析了李贽、东林派、王宗羲、戴震等一批士人思想者的思想。作者旨在使近代思想作为一种历史成果，在现代中获得再生。

中国晚近思想史中的许多问题，都在本书中得到系统的梳理和创造性的阐释。材料充实，胜义迭出，多发前人所未发。

## 翻译家郑超麟

钱伯诚

今年8月6日的上海报纸,登载了一条关于98岁老人郑超麟先生逝世的消息,头衔用的“上海市政协第五、六届委员”和“上海政协之友社社员”。就在两年前和今年前两个月,郑超麟曾有镜头在两部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和《共产党宣言》中出现,他穿一套老式西装,打着端正的领带,精神矍铄,在接受采访,发表谈话。屏幕上打出他的头衔,分别是“原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和“中国早期留法学生”。熟悉中国共运史的人知道,除了以上这些官方界定的头衔之外,郑超麟还有好多更为重要的头衔。但是有一个在郑本人来说十分看重,又不涉嫌禁忌,而在他人却每每忽略不提或竟熟视无睹的头衔,那就是:翻译家。

郑超麟是最早的一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他在法国学会了法文。纪录片《共产党宣言》中录下了他说的一句话:“我们那时读的是法文译本的《共产党宣言》。”随后他又学会了德文。不久他转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那里学会了俄文。他翻译的第一本著作,就是从俄文译的布哈林《共产主义ABC》。这本书成了中国早期共产党人几乎人手一册的启蒙读物,不断翻印。许许多多青年人受这本书影响,走上革命道路。郑超麟的翻译事业从这里开始。那时他是作为革命工作一部分来从事翻译的,不为名,更不为利。翻译的书上不署译者名字。

30~40年代,是郑超麟翻译的旺盛时期。他从德文、法文和俄文翻译了大量的文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类书籍。这些书籍分别由当时的亚东图书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金星书店、长风书店等出版。所用译者笔名,各不相同。文学类用“绮纹”名字,哲学类、政治类用“林超真”、“林伊文”名字,偶尔也用“郑超麟”名字。有个别翻译作品在报上连载,未曾单独出版,如德国斯托姆的《大学时代》只在《申报》的副刊《自由谈》连载,没有结集出版。

郑超麟的主要翻译作品如下:德国蔼沈都夫的《荒唐游记》,德国布鲁诺·弗兰克的《特棱克》,德国赫尔曼·黑塞的《青春是美好的》,俄国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英雄》、《野非卯夫》,俄国梅勒支可夫斯基的《诸神复活》,法国A·纪德的《冈果旅行》、《从苏联归来》、《为我的从苏联归来 答客难》,法国马迪野的《法国革命史》,德国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讲演录》、《未来的哲学》,德国恩格斯的《宗教、哲学、社会主义》,还有《马克思给顾格尔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托洛茨基自传》、《俄国革命史(二、三卷)》等。

此外尚有一些译著,不一一备举。抗日战争前,郑超麟被关在国民党政府南京中央军人监狱七年,被勒令翻译大批德国军事操典;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解决生活问题,又应坊间书店要求翻译了一批有关代数、三角和自然常识方面的书籍。这些他都不算在自己正式的译著之内。

50年代初,郑超麟因“托派”案件,又在监狱中度过27个春秋。他的翻译事业不得不告终结。但他在漫长的监禁期间,学会了填词,并利用各种方式写下了数百首合乎严格音韵格律和独创意境的诗词。这证明他确实具有语言文字方面的惊人天赋。

郑超麟翻译的作品,1949年后全部绝版了。直到1988年,北京三联书

店才重印了《诸神复活》，用的译者名字仍为“绮纹”。但即使用真名，绝大多数读者也不可能知道这是何许样人。郑超麟的名字之稍稍广为人知，还是近两三年的事。他在海外的名字似乎更响些，他的回忆录早被译成英文、德文，前不久日文本也出版了。最近辽宁教育出版社将重印他用“林伊文”笔名翻译的《从苏联归来》和《为我的 从苏联归来 答客难》二书（合为一册），并恢复他的译者真名。这是由于罗曼·罗兰封存了50年的《莫斯科日记》的出版，引起了人们想起早在60年前郑超麟所翻译出版的纪德的这两部著作，因而受到读书界和出版界的一致关注。郑超麟本人对纪德的书也很重视（他们二人在精神人格力量方面如此相似），他特为此次重印写了新序，这恐怕是他的绝笔了。可惜未能“忍死须臾”及见此书出版，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文汇报》1998年9月12日）

## 解读二马

黎先耀

世界人口到明年（1999）将达到60亿，全球人口第6个10亿的增长，仅仅过了12年时间。联合国'98“世界人口日”的主题就是“走近60亿人口日”，呼吁人们关注人口过快的增长。全世界谈到人口问题，必然涉及马尔萨斯；中国谈到人口问题，还必然想起马寅初。

今年（1998），是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发表200周年，马氏学说从来毁誉参半，讼说纷纭。我在上海暨南大学读经济学时，站在所谓人道主义立场，这位英国牧师的“人口论”，就是我们批判的对象；但是他的深远影响，却历久不衰。

当年达尔文在构思进化论时，就从马氏《人口原理》中悟出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恩格斯也曾指出“由于马尔萨斯的理论，我们才注意到土地和人类的生产力”。现代经济学家凯恩斯赞誉马尔萨斯为第一位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对他表示了极大的敬意；认为马尔萨斯经历了一个道德家的幼虫和一个历史学家的蛹之后，最终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张开思想的翅膀，翱翔于世界之上；他的名字与休谟、亚当斯密、李嘉图、达尔文和穆勒等并列而毫无愧色。从1985年巴黎召开的国际人口统计会议上通过再版《人口原理》的决议，也可见此书对当代的影响。

人们一般熟知的马尔萨斯理论的核心，就是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料则按算术级数增长；人口增长快过人类生存能力的提高，而给人类社会进步造成障碍。《人口原理》中经常被人们引用的一段话：“一个人降生在一个已被瓜分完毕的世界上，如果他不能从父母那里得到应得的财产，如果社会不需要他的劳动，他将无权得到哪怕一丁点儿食物，而且实际上是毫无意义地来到世上。”也就是马氏所说不经主人邀请自来的不速之客。当时英国诗人、慈善家雪莱，认为马尔萨斯是偏离人道主义的“诡辩论者”。马氏的诗人朋友柯勒律治也提出“难道在那嘴多于面包，头颅多于脑力的地方，贫困必将达到极致吗？”的疑问。这也许就是《人口原理》最初作者匿名发表的苦衷吧！这本为人类找到了苦难线索的天才著作，长期被人们误读的原因，就是把马尔萨斯提出的人口过剩和生活资料匮乏，社会将通过失业、饥饿、罪恶甚至战争来进行自发调节的规律，理解为马氏主张用上述社会苦难，作为用来减少人口的手段。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当然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后来马氏的追随者，强调通过自愿的家庭限制，即通过节制生育的办法，来限制人口的过快增长，形成了“新马尔萨斯主义”。我国以往在人口政策上的失误，不能说不是与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采取“把婴儿同脏水一起泼掉”的违反科学的态度有关，错误地认为人口过剩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现象，而社会主义社会不会发生。

1957年马寅初提出“新人口论”，主张破除宗族观念，开展避孕宣传，以达到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的目的时，受到了“人多力量大、热气高”的大跃进思潮的冲击。马老虽力图与马尔萨斯人口论划清界线，也未能避免和马尔萨斯同遭围剿的命运，最后甚至学术批判变成一场政治讨伐。这次“北大百年校庆”时，我到“燕南园”看望我的一位私淑老师，他指着相邻的一座房屋告诉我，这曾经是马校长的住宅，“文化大革命”中，大字报把他家门窗都糊住了。马老为国家、民族和科学坚持真理，任何牺牲在所不惜，做出

了令人仰止的师表。“错批一人，多增三亿”，真是一场时代的悲剧，至今中国人仍在吞食这枚苦果。马寅初比起马尔萨斯来，稍可感欣慰的，是在他百岁高龄时，国家终于给他送去了“中国人口奖”。

从这个历史教训来看，社会实践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人口原理》中有段结论性的文字，颇值得一读：“在我们的耳边经常能够听到反对理论和理论家的呼声，它们来自那些自以为在实践中精明强干的人。应该认识到，差劲的理论是非常差劲的东西，它们的作者非但无用，而且常常成为社会的害群之马。但看来这些实践的鼓吹者并不清楚，他们自己也往往会像他们所反对的那样。他们中的一大部分人属于当时最具危害性的理论家之列。”

有位西方哲人说，“人类是惟一能反省自己的动物”。看来只有将人口问题真正提到理论的高度来认识，方可能进行深刻的反思，才不会枉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

（《新民晚报》1998年8月16日）

## 朱正和《1957年的夏季》

邢小群

50年代末，中国被打成右派的有55万人以上。如今，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已经不在人世，健在者也已不再年轻，同样对待这段历史，很多当事人的想法并不一样。我接触过其中的一些人，有的是不愿意重新触痛这块伤疤；有人总愿意向人说明这是一次误会；有人拿起了笔，把自己当年的遭遇公诸于世。每一种选择，都有各自的理由。但是，我更希望有一个人，以过来人的感受，更以史家的眼光，从整体上记录这一场殃及两代知识分子的民族大悲剧，为这段历史，留下一个理性的见证——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人，做成这样一件事，同样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大悲剧。

我终于见到了这样一个人。

他就是朱正。

有一位被划为右派的作家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反右时，知识分子的最好待遇就是当右派。

还有一位作家说过一段同样意味深长的话：反右派斗争前，我是一个记者。如果我不是右派，1958年我必定要写放卫星，60年代要写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文革”要写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我不打成右派受得了吗？

他们是从地狱趟过来之后再回顾历史。在历史的天平上，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宁愿当右派，也不愿经受心灵的煎熬，付出人格的代价。

朱正是几十万右派当中的一员。但他写的那本40万字的《1957年的夏季》，涉及自己的笔墨却很少很少。他喜欢引用马克思的一句话：思考使人受难，受难使人思考。他只是把自己经历的苦难，化作冷静的沉思，化作对历史的深刻理解。

从某种意义上说，有的人被打成右派是很冤枉的，他们当时其实很“左”，只是阴错阳差，被戴上了右派帽子。朱正却说，他当右派并不冤枉。“我的开始觉醒是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对我来说，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当时，我买了不少有关这方面的书。如批判斯大林问题论文集，《关于波兰目前形势》、《铁托在普拉的演说及其评论》等。还有一篇东西对我震动很大，就是《文汇报》连载的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可以说我是从那时开始懂得国际共运是怎么回事，也由此知道中国正在发生的是怎么回事。很多疑问和动摇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应该说从观念上反“左”我是很早就开始了。我不感到委屈。我只相信时代在进步。”

朱正告诉我：“我写书，只想得到两张通行证，一张是现在能通得过；一张是将来能通得过。与其说我是为现在写，不如说我是为将来写。”

读了此书的手稿，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此话不虚。我同一位也当过20年右派的老人说起读后的感想：关于反右斗争的篇什，我也陆陆续续看过一些，没有一篇像朱正的这样详实、全面、深入地廓清了反右斗争的来龙去脉。那位老人说，他看了也不胜唏嘘。反右时，他们挨整，没日没夜地检查，心里只有自己的那点事，根本无心看报，因为晕头转向，对运动的前后发展情况，波及的范围并不清楚。一看这本书，庐山真面目就都清楚了。

也许是因为朱正是从考证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的，所以这本书以材料详实见长，全部以公开发表过的材料为依据来叙述历史，以材料推及事态的发展，以材料去证明事情发展的逻辑。当然他有自己的见解，但所有的议论都



是点到为止。

比如，有一个历史之谜，反右运动，一开始毛泽东是不是“阳谋”？朱正在书中综合当时国内外诸因素，说明“毛原来是真心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比较宽松的政策，让党外政治力量有较多的发言权和活动空间”，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开始思考苏联模式的得失。他提出“双百”方针、“十大关系”，就是要通过扩大民主生活解决党内的矛盾。毛的想法出台后，不理解的大多在党内，其逻辑就是权力不容他人染指。所以当民主党派的批评向这里逼近，出现了储安平“党天下”这样击中实质的批评时，毛才改变了主意，但他却不急于反击，而是采用了引蛇出洞的策略。朱正提出：“当时是不是存在另一种选择的可能性呢？不反右派行不行？”它实际是追问，执政党不再享有不受制约的权力行不行？这不但是当时不许提出的问题，就是今天，也是一个相当深刻的尚未解决的历史性课题。

邵燕祥先生在《反右斗争本末》这本书的序言中写到：这场反右派斗争是一次没有胜利者的斗争。据说，毛泽东晚年曾向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一次没有胜利者的反右派斗争的历史该由谁来写呢？

很多人以不同的方式写。朱正是其中之一。

朱正的这本书，给我们留下的思索，真是太多太多了。历史如此艰难地在回旋中前进，为了那一点一点的进步，究竟还要付出多少代价？

（《青年参考》1998年6月26日）

## 韦君宜的新书

谢泳

前一段牧惠先生转给我一篇韦君宜先生的文章，题目是《文化大革命拾零》，这是韦先生晚年回忆录《思痛录》中的一章，这是我已见到过的“文革”回忆录中最让人震动的一篇。这是韦先生在病床上完成的，可以想见这位文化老人对我们这个时代的责任，她有真正知识分子的良知，我仅读了这本书中的一章，但我的感受是这是一本说真话的书。韦先生对我们这个时代的认识是彻底的，反思是深刻的，这本书对我的触动超过了我当年读巴金先生《真话集》，也超过了我读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这是两种不同的阅读感受。他们都是让人敬重的文化老人，但韦先生的文章不是一般的痛定思痛，而是大彻大悟。韦先生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是那个时代中最有理想的激进青年。她离开了富有的家庭，放弃了出国深造，去了延安，但她的理想最终实现得如何呢？去年在一个朋友的推荐下，我读了她的《露莎的路》，是写延安抢救运动的，那本书虽然没有多么轰动，但在知识界却有很大的影响，许多人读了韦先生的这本书，都对她的肃然起敬，她对那场抢救运动的分析给人以很大的启发，她对那场运动的起源以及那场运动主要责任人的评价，都不同于以往我们一般的认识。她是那场运动的见证人，她的回忆是真诚的，是对历史负责的。韦先生的反思还带给我们许多新的视角，比如她对知青在“文革”中的经历就超越了人们的日常经验，特别是她对那些后来成了作家的知青是这样评价的：“这一群‘文化大革命’新一代，后来大多数都成了没有文化的人。有一些在农村里苦读，回来补十年的课，终归差得多。有些人把自己的苦写成小说，如梁晓声、阿城、张抗抗、史铁生、叶辛——现在已经成名。但是他们的小说里，都写了自己如何受苦，却没有一个老实写出当年自己十六七岁时究竟是怎样响应‘文化大革命’的号召，自己的思想究竟是怎样变成反对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光荣的？一代青年是怎样自愿变做无知的？所有这些老的、中的、少的，所受的一切委屈，都归之于‘四人帮’，这够了吗？我看是还不够。”

我们已有了那么多对知青小说的分析和评价，有了那么多对知青作家的剖析，但这个角度，对当代文学研究来说还是极富启发性的。韦先生的这本回忆录几经周折，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在做过一些删节后出版发行，这是一件虽有遗憾但也令人安慰的事。我听牧惠先生说，韦先生现在已失去了再写作的能力，也不能再思考了，她本来应该能够早日看到自己这本书的出版，但由于我们的出版状况，韦先生的回忆录被延滞了许久，韦先生已是80多岁的重病人，今天她总算看到了这本书的问世。

（《博览群书》1998年第6期）

## 自胜者强 王得后

“批评与自我批评”，似乎曾经蔚然成风。至少，在知识分子堆中，大体是这样，虽然，分工是有的。有人专事“批评”，有人只有“自我批评”的份。那种“批评”，现在幸福的青年，是不知道，也想像不出的；而曾经亲历的老人，或难得糊涂，或装聋卖傻，或拼命涂抹，或遁隐于健忘的梦乡，倘不是还有几个“为了忘却的纪念”的人在，真又是一个“食尽鸟飞独存白地”的梦，“只见白茫茫一片旷野”而已矣。

今年有虎。一过春节意外地奉到邵燕祥先生著的《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心里一惊：难道真的“风起于青萍之末”！

这是一本奇特的书，今天读来依旧令人“心有余悸”的书。这，不在把《邵燕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行材料（1966年9月20日）》、《批斗会的简要记录（1966年8月）》、《又一次批斗会的简要记录（1969年7月10日）》、《又一次批斗会的简要记录（1970年1月3日）》汇编在书里，因为依照“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逻辑和我们中国人的民族和社会的心理，这种当年“定罪”的档案，“不引而反”，“不引而覆”，自动化为个人“光荣”的记录了。所以，我之所以认为奇特者，乃在邵先生把自己当年白纸黑字写下的“意见”、“思想检查报告”、“交代”、“思想汇报”原原本本编辑而且印它出来。

对于老人是重温，对于青年，那么请听一听“文革”时期知识分子说什么、怎么说吧：

现在来交代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向党和人民请罪。

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充当过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放毒的工具，对党和人民，对毛主席是犯了罪的。但我有决心用行动来改正自己的错误，革面洗心，重新做人，在后半生我要跟定毛主席走革命的路。

我对党和人民犯下的罪行是严重的。为此，我情愿接受任何处分，决无怨言，永不翻案。

1968年前后，一个时代的铁铸一般的“思想汇报”的格式锻造出来了。这就是千篇一律的“首先，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如果说文章的格式全国一律，与个人的关系甚少，如果说知识分子的“原罪”全阶层共有，与个人的关系甚少，但是一旦落实到个人，关系之重大就非语言所能道断的了。

试想，把“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这样的“驯服工具”的心迹，也即不自觉其为奴隶的出身履历，在觉醒之后披沥在觉醒的人们或似醒未醒的人们面前，实在无异于煮自己的肉。鲁迅当年是从别国窃得火来煮自己的肉，今天邵先生却借时代之火、中国“现代化”之火来煮自己的肉了。

依鲁迅的论断，“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了，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啰，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那么，智识者的觉醒，就是“最初”之中的“最初”的了，而觉醒的根本标志是什么呢？是正确认识自己，摆正自己与别人

的关系，与大众的关系，与国家、政府、政党的关系。这就需要像鲁迅那样：“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邵先生今天公布这部“实录”，最可贵的正是拥有鲁迅的这样一种精神，付出半生“挣扎”的血泪，从几乎“灭顶”的时代的“浩劫”，国家的“浩劫”中抬起头来，站稳脚跟，挺直脊梁，蔑弃“原罪”的说教，打破做一个驯服奴隶的理想，挑战后半生的命运。

这已经不是邵先生个人的事；这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人生，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中后死者思考的结晶，觉醒或行将觉醒的声音，这不是我们的“败笔”，因为“笔”其实并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有如我们启蒙时描红，有一只大人的手捉住我们稚嫩的手一样。是的，这是“灵魂扭曲”的记录。“可耻”么？不！虽然也不能断为“光荣”。一个被扭曲的灵魂，耻辱与光荣已和他不相干。有如一个被强奸的女性，不应该再次背上骂名。一个被迫自杀的公民，只有特殊的人才指控他“自绝于人民”。这种旧的和新的传统，早该加以清理。这种一般道德评判，是着力改革的时候了，被污辱被扭曲被迫害的人们的道德与污辱人者扭曲人者迫害人者的少有同点而多有差异，而且是根本对立的。

## 鲁迅研究争鸣

### 鲁迅研究之谜

谢泳

关于鲁迅，总有说不完的话，但这说不完的话中有哪些是今天人们还想听的，有哪些是在当下的现实环境中还给人以启发的，在已有的众多鲁迅研究著作里，不是每一本都有这样的追求，林贤治的《人间鲁迅》是有自己独特见解的。

以往的许多鲁迅传记的作者不能说对鲁迅没有感情，但像林贤治这样先把鲁迅作为一个民族的精神象征，然后再进入他的内心世界的研究者却不多，这不是一本为研究而研究的书，这是一本为表达思想为张扬思想而写的书，林贤治从鲁迅身上发现了许多独特的东西，他在为人们重新认识鲁迅提供一种新的视角，他认为在现代中国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中，以鲁迅为最理想，鲁迅是最彻底的反专制反极权的勇敢战士，林贤治对鲁迅是偏爱的，甚至于有偶像的意味，林贤治看重的是鲁迅身上那种对专制和极权的不妥协以及他对黑暗中国的清醒认识。在林贤治看来，鲁迅的同时代人中再没有哪一个知识分子达到了鲁迅的高度，鲁迅留下的精神遗产我们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由于林贤治对鲁迅很偏爱，所以他在分析鲁迅和他同时代人的许多论战时，林贤治不是站在中立的立场，也不取客观的态度，而是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的，这种写作姿态时下能坚持的人已经不多了，林贤治敢于坚持，这也是他这本书的一个基本立场。

我是喜欢林贤治这本书的，但我也认为他笔下的鲁迅依然让人们有很多困惑，而这困惑林贤治没有给我们一个满意的解释，这个困惑就是为什么鲁迅以反专制为基本追求而却总是被专制利用，鲁迅的悲剧不在生前而在死后，他差不多可以说是中国近代以来惟一个没有被新时代否定的知识分子，这是为什么？鲁迅是最不愿意和官员打交道的，不像胡适那样，还想过去做政府的诤友，鲁迅是最看不惯胡适这一点的，然而奇怪的是鲁迅一直得到官方的首肯，而胡适却从来都是被骂的，为什么新时代愿意用一贯反专制的鲁迅来作为自己的旗帜，却不用一直想做政府诤友的胡适呢？就做文章这一点来说，胡适是明白的，他讲道理明白如话，相比之下，鲁迅是晦涩的，也就是说，胡适的那些话没有再阐释的可能，而鲁迅的话却可以被某种政治势力加以利用，因为鲁迅的许多话是可以另有所解的，“文革”中鲁迅语录也很盛行，政治势力是在利用鲁迅，但人们反过来想一想，他们为什么要利用鲁迅？在鲁迅的时代里，人们总认为鲁迅是拆台的，而胡适才是补台的，为什么一个以拆台为基本特点的人的思想总被利用，而一个总想补台的人的思想却不受欢迎呢？“文革”时期鲁迅的书是他同时代作家中惟一没有被禁的，也就是说我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人是读着鲁迅的书长大的，可为什么在中国最黑暗的年代里，那些读过鲁迅书的红卫兵战士连最起码的人道主义都不懂，学生打死老师的事几乎天天都在发生，这一切是从何而来的呢？在那个年代里鲁迅的书是可以完整地读到的，他有全集在，那么多读鲁迅书的人怎么就不学好呢？鲁迅是反专制的，可专制偏偏又只找着了鲁迅，这是为什么？

林贤治的这本鲁迅传没有能告诉我们，也许他就不认为真的存在这些问

题，但如果我们真正走近鲁迅，想让更多的人理解鲁迅，就非得拨开这些迷障不可，林贤治的这本书让我想到了别处，他对鲁迅的过分偏爱，使我不得不想这些鲁迅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岭南文化时报》1998年7月20日）

## 域外书讯

### 《俄罗斯思想》

M.A. 马斯林主编莫斯科共和出版社出版

1992 年俄罗斯人怀着极大的兴趣谈到了—本文集——《俄罗斯思想》。这本文集是由现今俄罗斯哲学史家 M.A. 马斯林主编的，辑录了从伊拉里昂大主教起，经恰达耶夫、斯拉夫主义者、西方主义者、索洛维约夫到洛谢夫、伊林止的 27 位著名哲学家有关“俄罗斯思想”的作品。此书对正深陷在意识形态“空白”之中而又苦于无所适从的今天的俄罗斯人来说，在相当的程度上起到了“解困”和“启示”的作用。今天的俄罗斯人通过这本书才得知：原来他们的历代先人在他们之前就曾苦苦地求解过同样的问题。“俄罗斯思想”而今已成了各界广泛关注和议论的“热点”理论问题，就此问题发表的文章和专著多得难以计数。

1996 年 7 月俄罗斯总统竞选期间，叶利钦提出“制定新民族思想”，把从 90 年代初期开始的“纯学术”课题一下子变成了迫切的现实“政治任务”。俄罗斯的当权者终于意识到了“思想”在“凝聚”全民方面的重要性。此后成立了好多相关的研究小组，其中包括由总统顾问萨塔洛夫领导下的负责“制定民族思想”的专门小组。

且不说“思想”是否可以“制定”和能否给“制定”“限定”期限，由国家首脑作为一项“任务”来提出，这种作法本身已使俄罗斯理论界感到疑虑和“警惕”，这使他们不由地联想起从前那种至今仍令他们“心有余悸”的“旨令”和“遵命”的理论工作方式。理论界因感受到俄国现实社会政治的需要而关注“俄罗斯思想”并把它当作“学术课题”来研究，是一回事；由当权者在“竞选”中当作一种“号召”和“任务”来提出，则是另一回事。1996 年夏以来，俄罗斯理论界对此事的反应，形形色色，观点各异，有的则截然相反。

在俄罗斯，通常认为，在此前的五百年的历史中，俄国曾形成过三个较为明确的“民族思想”即：（1）“莫斯科即第三罗马”；（2）“东正教、君主专制、人民性”；（3）“我们的目的是共产主义”。《俄罗斯思想》讲的是俄国历史上对此问题的思考和认识。而今天的俄罗斯人对此问题并无明确答案，也不可能明确答案。也可以这样说：人们因为自己今天所持的立场不同，所属的党派不同，对此问题的看法就不同，对“俄罗斯思想”包括哪些方面和内容的理解就不同。即便如此，我们也还是能够从中看到某些共同的东西，例如都强调俄罗斯的独特性，强调俄罗斯的“救世”历史使命，强调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强调俄罗斯在东—西方文化之间起连接和“桥梁”作用等等。总之，起码都认为有“俄罗斯思想”这种“东西”的存在。

## 鲁迅如何被利用

林贤治

谢泳在《中国文化报》和《岭南文化时报》上撰文，介绍拙著《人间鲁迅》之余，引出一个被称作“鲁迅研究之谜”的问题：“为什么鲁迅以反专制为基本追求而却总是被专制利用？”

鲁迅之被利用，首先是政治学方面的问题，而与鲁迅思想本体研究关系不大。我们要弄清楚的是，鲁迅是在何种情况下被利用？利用了他什么？他的思想实质与专制主义果然有相通之处吗？

其实，鲁迅生前就一直被人利用，不独身后为然。参加左联就是一个例子。亲近如冯雪峰，也有着把他当成“统战对象”而加以利用的一面。自然，这都是他所愿意的。对大众，对青年，对进步的社会事业，他甘于做“牛”，做“泥土”，做默默的牺牲；但当他发觉在被人恶意地利用时，则设法回避乃至拒绝了。

鲁迅逝世时，正值抗战前夕，于是他的葬礼便成了民族团结的标志；而他的精神，也就适时地成了鼓舞民族斗志的伟大的象征。应当说，这是对鲁迅的最大范围的一次集体利用。从此，鲁迅的名字，作为政治文化的一个符码，便开始被广泛使用了。毛泽东在延安，以及以后发表的有关鲁迅的评论，都是在这一意义上进行的。对鲁迅的这种肯定，是一种名义上的肯定，抽象的肯定，整体象征性的肯定。鲁迅思想中的许多重要成分，实质性的东西，却被忽略了，甚至被轻易地给否定掉了。比如，鲁迅称说自己思想的两大方面，即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当时，明显地被划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范畴；又比如，鲁迅的批评精神和批判原则，其中包括对“东方文明”的批判，对“国民性”的批判，对权力和权力者的批判，等等，在一个“革命”的故而是“光明”的环境里，也都变得不合时宜了。

毛泽东是政治家，看待一切事物唯用政治的眼光，对《红楼梦》如此，对鲁迅亦如此。他是从来不讳言“功利主义”的。

利用有两种情况：一是用其名，一是用其实。用其实者，也有两种情况，或者用全般，或者用局部，取其一点而不及其余。如果说，对鲁迅尚有一点较为具体的利用的话，那么就是他的关于斗争的思想。从50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特别强调阶级斗争；尤其在60年代以后，阶级斗争理论有着恶性的发展，直至“文化大革命”的降临。这时，鲁迅的注重战斗的思想，恰好被纳入流行的理论之中；而鲁迅本人，也就被打扮成了一个动辄“打杀”别人的姚文元式的棍子，始终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旗帜的江青式旗手。岂止如谢泳所说的“是他同时代知识分子中惟一一个得到肯定的知识分子”呢，简直是“当代英雄”！

“文革”是一个典型的造神时代，“凡是”时代。毛泽东的个人权威，通过个人崇拜运动，此时已达“顶峰”状态。个曾经被“神”高度评价过的人，获得官方的“肯定”，还不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的事吗？

事实上，不同的社会角色，具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和文化心理。作为一个平民作家，独立思想者的思想，明显地，是不可能混同于一个大权在握的政治家的思想的。鲁迅的斗争思想，首先根源于备受压抑的个人经历，根源于中国广大民众长期遭受的压迫而生的痛感和耻感。至于“拿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只能说，加强了他对中国阶级社会的认识，并不曾改变他原来的思



想基础。毛泽东晚年的阶级斗争理论，却是以权力为中心的政治理论的一部分，带着鲜明的斯大林主义色彩。的确，鲁迅是主张斗争的，复仇的，革命的。他说：“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在他看来，目下的中国有许多“二重道德”，主和奴，男和女，都是有不同道德的，还没有划一，放弃斗争而一味“费厄”，则未免太偏。也太早。正是如此，他承认他的作品有“暴戾之气”；也正是如此，他被主张“宽容”的苏雪林们变着花样痛骂到如今。

其实，鲁迅的斗争，与我们惯称的所谓“斗争”的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在他那里，永远代表着被侮辱、被损害、被压迫者的利益。所以，这斗争就不是自上而下，“为王前驱”的讨伐；也不是“同级斗争”，虽然他并不以“党同伐异”为恶，却从来没有那种为组织所规限的党派性。他的斗争是以人的解放为目的，以弱势者为本位的一种反抗性行为。这是理性的反抗，现代的反抗，并非从前的农民“造反”，更不是“文革”式的乱斗一气。说到《水浒》，他就十分反感那抡起板斧“排头砍去”的李逵式作法，斥之为“流氓”。他从来珍视人类的生命，对于那些随意以牺牲为代价，葬送群众性命的“革命者”，他是憎恶的。他明确表示说：“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可以认为，斗争，是他的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原则的最高体现。他不惮孤身一人，挑战权力者乃至整个社会，乃是为了捍卫人类生命个体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活着的全部尊严。他深知，剥夺了斗争，就剥夺了这一切。

谢泳文中把胡适和鲁迅相并论列，问：“在鲁迅的时代里，人们总认为鲁迅是拆台的，而胡适才是补台的，为什么一个以拆台为基本特点的人的思想总是被利用，而一个总想补台的人的思想却不受欢迎呢？”远在1927年国民党“清党”——鲁迅谓之“血的游戏”——之后，鲁迅就明明白白反对一个唯靠武力支持而不是经过民选的不合法的政府，野蛮的政府，“一党专政”的独裁专制的政府；而此时的胡适，倒是立志要做“政府的‘诤友’”的。当时，国民党在“台”上，共产党还在“台”下；因此鲁迅反抗国民党政府，正如寄同情和支持于被迫害、被屠杀的在野的共产党，表明了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的立场。由于有了这样一种历史渊源，台上台下，或拆或补，全都变得可理解了。

当谈及鲁迅与胡适时，谢泳还说到一个话语问题。他说，胡适的话是明白的，没有再阐释的可能；鲁迅的话是晦涩的，故而存在被曲解的可能性。比较胡适，鲁迅是一个独特的隐喻的思想者。他的文章确乎充满激情，意象丰富，但又同时具有健全的理性和缜密的逻辑，尤其是论战的文字。在恶劣的政治环境里，他已然失去发表的自由，因而不断地变换笔名，且不得不“曲曲折折”，“吞吞吐吐”；然而，即便如此，叛逆的思想指向仍然是明白的。

谢泳问：“可为什么在中国最黑暗的年代里，那些读过鲁迅书的红卫兵连最起码的人道主义都不懂？”“那么多读鲁迅书的人怎么就不学好吗？”我也不妨问：“可为什么在中国最黑暗的年代里，那些读过或不读过鲁迅书的知识者便连最起码的人道主义都不说？”“那么多不读鲁迅书的人难道就学好了吗？”鲁迅，一人而已，用他的话来说，其实亦不过惟有一支笔，能对一个“黑染缸”般的大社会负多大程度的责任？权力者的力量，知识者的力量，意识形态的力量，教育的力量，实际运动的力量，社会的综合力量，不是要比一个人的力量大得多吗？何况这个人已经被权力者连同知识者双方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弄得简直面目全非了呢！作为独立思想者的思想，要穿透

公共空间——或可看作一个既成的，传统的，或正统的“场”——是困难的；愈是独特，愈是深刻，则愈见困难。倘使承认鲁迅的思想是一笔宝贵的遗产，而且真正能为进步的社会力量所接受，所利用，那么，就必须同专制者的利用，以及“帮忙”和“帮闲”的知识者的拒斥斗争——虽则我们对斗争本身并不见得有需要，或先天的嗜爱！

说到被利用，鲁迅尝慨叹道：“回忆先前的经历，觉得现在的社会，大抵是可利用时则竭力利用，可打击时则竭力打击，只要于他有利。”对于身后的被利用，他也不是没有预感的。在一篇文章中，他写道：“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可悲哀的。”在这里，所说的仅属“无聊之徒”，尚未及于如他所说的“有力者”；可见世人世事的险恶，远比他——一个尝自谓“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中国人——预想的要厉害得多。

近百年来，环绕鲁迅所花的口舌笔墨可谓多矣，由此，亦可照见中国社会及诸般人士的面目。但我想，鲁迅既为战士，那么无论生前死后，被人攻击，歪曲，利用，都不足为怪；惟独为别的战斗者所不憚，所误解，这才是最深重的悲哀！

（《岭南文化时报》1998年8月10日）

## 鲁迅与顾准

钱理群

1936年10月19日，中国本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鲁迅停止了写作与思考。

但这并不是结束——他的思考融入了全民族的思考中，他的思想命题，在新的探索中延伸与发展，他的思路、思考方式更是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愿意并仍在想问题的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人：思考在继续。

在众多的后续者中，我要说说顾准。

但我首先要说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发展，以及后来的危机与变革，构成了本世纪全球范围的贯穿性历史事件。也就是说，在考察本世纪世界（与中国）的思想史、文化（含文学）史、知识分子心灵史时，不能回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创造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化”及其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这样一个全局性的问题。一个无可怀疑的事实是，在30年代，已被公认为中国文学的一代大师的鲁迅，与尚不知名的年轻的顾准，都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化”表示了他们的信任，以至向往。这在当时是一个世界性的潮流。因此有“红色30年代”之称。对这样一个历史现象，这些年学术界（包括鲁迅研究界）却少有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我们在这里也只能指明这一事实：鲁迅曾根据一位中国工人的亲身经历所提供的材料，这样赞扬在苏联所进行的共产主义试验：“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像粪一般抛掉，而一个崭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作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林克多 苏联见闻录 序》）这就是说，鲁迅是因为共产主义有可能彻底结束对人的奴役，使人成为“支配自己命运”的主人，而从中看到了“希望”的。而在此之前，他已经对中国的传统的封建制度与文化，以及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与文化感到了失望——它们都最后导致了对人的奴役。鲁迅（还有顾准）和30年代各国的优秀知识分子都是由于对既成文化的失望，转向正在发展中的所谓“第三种文化”，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化”的。正像我在《鲁迅与20世纪中国》一文中所说：“人们尽可以用事后才知道的事实，来说明现实并非如此，从而指责鲁迅们过于乐观与天真；但确实出现的某种可能性，不去及时地抓住，对之寄以希望，那才是真正奇怪的。”对鲁迅这样的以“彻底摆脱人的奴隶地位与命运”为自己的第一追求的知识分子，就更是如此。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出发点，当鲁迅在与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左”倾机会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斗争中，发现了新的奴役关系的产生时，他立即作出了“革命工头”、“奴隶总管”这样的新的概括，并毫不犹豫地进行了公开的揭露与斗争，对自己的前述“希望”提出质疑，不回避内心的矛盾：他一方面从中国的现实出发，仍然对“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寄以希望（《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同时又频频表示对“革命胜利以后”（关注“以后”是鲁迅思想的特点与彻底处，他不只一次地提出这样的命题，“死后”，“黄金世界到来以后”，“娜拉走了以后”，等等）的中国，包括自己在内的知识分子的命运的忧虑，作出了种种不祥的预言：“所怕的只是成仿吾们真像符拉特弥尔·伊力支一般，居然‘获得大众’；那么，他们大约更要飞跃又飞跃，连我也会升到贵族和皇帝阶级里，至少也总得充军到北极圈内去了。译著都禁止，自然不待言”（《“醉眼”中的朦

胧》），“倘当（旧时代——引者加）崩溃之时，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1934年4月30日致曹聚仁书）。——当然，这也仅是超前的预感而已。在历史的发展尚不充分，内在矛盾尚未完全显露，后果尚不清晰的情况下，鲁迅不可能对历史已经提出的命题，即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化”的反思与批判，作出更深入的回应：他把任务留给了后人。

只有到了五六十年代，特别是“文化革命”时期的顾准这里，前人（鲁迅）的预言——从“流放”、“译著禁止”到“扫马路”都成了现实，并且是自己直接承受的现实命运，而且是全民族、全体知识分子共同面临的现实灾难。或许历史发展到了这个时候，“科学地反思与批判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化”的任务，才提到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前，成为必须作出回答的历史使命。顾准是最早意识、并且自觉承担了这一使命的，王元化先生说他比其同代人“整整超前了十年”（《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王序），这是一点也不夸大的。值得注意的是，顾准几乎在承担这一历史性课题的一开始，即与鲁迅的著名命题“娜拉走后怎样”联系在一起思考；他一再这样说：“我们也可以效法鲁迅‘娜拉走后怎样’的口吻，问一下，罗伯斯比尔不死，而且彻底胜利了以后怎样？”“革命取得胜利的途径找到了，胜利了，可是，‘娜拉走后怎样’？”可以这么说，顾准是自觉地“接着鲁迅想下去”的。人们今天在评价顾准时，很容易就联想起鲁迅说过（或引述过）的话，如“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万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茫茫在前，顾忌皆去”，“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参看《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王元化序、陈敏之序），这正是说明顾准也是自觉不自觉地以鲁迅的精神包括思维方式去作他的反思与批判的。这对于顾准是并不容易的。鲁迅当年尽管同情甚至寄希望于共产主义运动，但他毕竟是旁观者（至多是有限的参加者），因此，他几乎从一开始，就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并很快就提出了自己的批判与质疑。顾准和他的同代人则不同，他（们）是革命者，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成员，“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化”已成为他（们）的信念，以至信仰，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理想主义已经渗入血液与骨髓；更为重要的、也是必须正视的是他（们）经过长期的“改造”，思想已经被奴化。很多人甚至到了不觉其为奴的地步，这样，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化的反思与批判”，对顾准和他的同代人来说，首先是一种自我的否定与批判。第一步，就是要从奴隶状态中解放出来，获得精神的自由与独立；要从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思路中解脱出来，换上一副怀疑主义的眼光——这实际上就是要从精神境界、思维方式上接近鲁迅，然后才有可能“接着鲁迅往下说”。这自然是十分艰难的，顾准自己说：“我面对它所需的勇气，说得再少，也不亚于我年轻时候走向革命道路所需要的勇气”——这也是一种痛苦，而且是丰富的痛苦。顾准正是在那最黑暗的、几乎看不到任何希望的年代，独立地、孤立无援地，开始了他的精神探索，如他自己所说，这是一种“从头思考”，也即对作为前提的、“终极目的”性的命题提出质疑。不难想像，这需要怎样的理论勇气与理论的彻底性；也可以预期这将开掘出怎样丰富的精神资源。而顾准几乎是刚刚开始就被夺走了生命。

这是顾准的，也是我们民族的悲剧，而且这悲剧还在继续上演，因为至今还有人想抹煞顾准的名字，或者装着视而不见；对无法无视的鲁迅，则希望（要求）把他的思想钝化：他们的当代命运竟也如此相似。这是因为人们正在“强迫遗忘”，掩盖一切历史的血污与痛苦，更不能容忍鲁迅、顾准式

的对历史的先验结论的重新质疑。但这一点，恰恰是不能让步的：没有记忆与疑问，这就意味着没有思考——这将是真正的精神死亡：没有痛苦，也没有智慧的丰富。

正是为了反抗精神死亡，我曾向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学生郑重推荐了《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与《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两部书。我这样写道——

这是本世纪两个“真的人”写的“真的书”。借用鲁迅的话说，“这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

鲁迅著作中有“现代中国民族魂”，是中国现代民族文化精神和20世纪人类文明的结晶，是现代中国的百科全书。

顾准著作中有“现代独立自由精神”，他作为四、五、六、七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对鲁迅之后中国社会、历史、思想、文化所提出的最尖锐、最复杂的问题，作出了清醒的反思，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因此，他们的著作活在现实中国的我们的生活中，每一个愿意并正在思考的普通人都可以和他们进行心灵的对话。

（《东方文化》1998年第5期）

## 思想随笔

### 清官难断家务事

王得后

清官，在我们中国人的心里，可不得了，了不得，“明镜高悬”呀，“铁面无私”呀，“爱民如子”呀；老百姓平日所受的一切冤屈，哭诉无门，走投无路，一遇清官，管他铜墙铁壁，管他皇亲国戚，都一一摆平了。不要说日管阳夜走阴的包龙图包爷爷，就是七品芝麻官，老百姓见了也眉开眼笑，心花怒放的。

然而，呜呼呀呜呼，“清官难断家务事”！这是见于《红楼梦》，见于《儒林外史》的。“俗语”也罢，“自古道”也罢，总之，是名言，是放之中国而皆准，而且历史悠久而又悠久啦。

早年间，听说上海有人以“害人三鸟鸦雀鸽”征联，可惜我孤陋寡闻，不知后事如何，近日读报，忽然想到倘以“清官难断家务事”征联，我神州大地，地灵人杰，大概会有妙对出世吧？何况，也是报上说的，早有对联学会，而且今年有的地方还开展了有奖征集春联的文明活动，好事之徒一定多多。不过，我这里是没奖的，文明嘛，读书人的事，“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穹”，能不文明？不过，结果如何，不可逆料，且看下回分解吧！

事情是怎样的呢？

举一个例子，这是许多报纸登了，许多文摘也摘了的。今年，不，拖拖拉拉，已经变成去年了，去年4月，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十几位党员干部不知怎么一来，要“结义”了。他们当中有的是电视台编辑，有的是县委常委，有的是县检察院副检察长，有的是县法院副院长，以及县公安局副局长，县办公室主任，财政局局长，交通局局长，县纪委书记，城关镇镇长。事情传开以后，有报纸登出《河北“结义事件”惊动中南海》的报道，不言而喻，于是乎调查，于是乎处理，沸沸扬扬，还跟踪报道，还出来一句不知是好话是调侃的“十八罗汉闹宁城”的套话。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不料没有多久，报上又登出《“家庭党小组”活跃平江》的喜报了。说是“建立‘家庭党小组’目前已在湖南平江县形成风气，该县现有1015个家庭党小组，他们在发展经济、扶贫帮困、促进农村党组织建设方面起到了先锋作用”。“为了扶植家庭党小组，平江县先后出台了《家庭党小组目标管理考核细则》，县财政曾拨专款5万元，对20个先进家庭党小组、300多名优秀共产党员进行了表彰奖励。”一看便明白，这里是正面引导，歌颂光明的消息。

“结义”本是中国历史悠久的传统美德了，名震中外，历久不衰的是“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这是家喻户晓的刘关张的故事，经典名著《三国演义》的第一回。同样名震中外，历久不衰的还有“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这故事刚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连续播出，不说也是更加家喻户晓的了，而且扩而大之，是一百单八条好汉的故事。“结义”也罢，“聚义”也罢，要之皆称兄道弟，把没有血缘的人“结”“聚”成有血缘的人。《水浒传》“有篇言语单道梁山泊的好处”，开宗明义就是“交情深似股肱，义气真同骨肉”，和桃园结义的誓词“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是完全一样的。

孔夫子治周平天下的伟大发明，或发现，第一就是抓住“亲亲”，也即血统，死不放松。官是“父母”官，老百姓是“子”民，几千年过去了，20世纪而且未了，我们依然逢人叫大爷，大娘，大婶，叔叔，阿姨。大姐老了改称奶奶；奶奶的儿辈又叫爷爷，不管乱套不乱套。其源，盖出于“亲亲”。孔夫子的伟大，可见一斑。解放了，似乎要变。“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好；“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得，又回去了。

“结义”受处分，“家庭党小组”受奖励，除了打击假冒，而是否伪劣还另说，这太肤浅了。其中深层的奥义，我说不清，有待于对上“清官难断家务事”的方家啦，抱歉抱歉。

## 思想书廊

### 《大国寡民》

卢跃刚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8 年版 定价：25.60 元

本书从一起震动中央政法委书记、最高法院院长的硫酸毁容毁身案开始，揭开烽火村——一个中国农村的典型历史；通过一个村的历史进程的考察，把握和描述整个社会历史演进的过程。作者写道：“一个村庄发生一起刑事案件甚至一起重大的刑事案件，没有什么了不起，任何一个村庄都有这种可能。烽火与其他村庄不同的是，它有一个非同小可的人物，有一段专胜不衰的历史，一个人和一段历史在这块土地上营造出了一种特殊的气氛，这种气氛酿成了武芳（按，武芳为毁容毁身案受害者）的悲剧，居然能把如此重大恶性又如此简单明了的案件的情节和细节瞒住，并决定了武芳案的现状……”这里所指的“一个人”，是曾被誉为青年农民科学家，劳动模范，官至副市长兼烽火村党总支书记的王保京；“一段历史”，则是浮夸和弄虚作假的历史，“左”倾思想路线肆虐的历史。



## “童言妇语”与“老言”

王得后

看到为老人求言路的“优遇”的文章，心底里着实“不亦说乎”。盖自己也早入于老年之列，而况咱中国也已踏上老年社会的门槛，老人一天天多起来。倘有话无处说，实在益增其暮气，加重暮年的孤寂。颐养天年云乎哉。

不过由“童年无忌”而“老言无忌”，却使我别有一种清凄。

那正是童年的时候，十岁出头，在江南的故乡农村读私塾，很赶上几次过年，自然是旧历年的热闹。半个世纪过去，幸未痴呆，记忆犹新。其中之一，就是贴春联。除了大门的主对联，每个房门都有一副小对联，堂屋还要东斜西歪地贴几张独立成句的春联。其中就有“童言妇语，百无禁忌”。

固然，儿童天真，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这可不是指他们戳穿了“皇帝的新衣”，给予优遇，而是指他们幼稚无知，说的话不算数，祈求上苍不因儿童无知说了犯忌的话而降祸。此所谓“得罪于天，无所祷也”，“童言妇语”不在其内。“男帅女，女从男”，妇言算什么东西！正因为有这一共同点，才会把“童言”与“妇语”捆绑在一起。显而易见，这并非优遇，而是歧视。年龄的歧视，性别的歧视，丝毫没有特准他们放言无忌的意思。这又因为过年需要吉利，需要“一团和气”，而禁忌动用惩戒者也。决不是家大人有什么宽容。

过去的记忆，眼前的文章，促使我想了一想，不得已也想多几句嘴，虽然，“卑之无甚高论”，常识而已矣。

一是老人，妇女，儿童，学会尊重彼此的人格，平等相待，作个朋友，在朋友的情谊上再增添该有的父母子女之亲，夫妇之亲，师生之亲。老人对儿童不要摆老子老娘的旧架子，也不要倚老卖老。男人对妇女不要摆主子的旧架子，勒令她们对自己“三从四德”。儿童嘛，未成年，尽可适情任性，天真烂漫，撒娇难免，断不可学“老莱娱亲”的“诈伪”。待到成年，也不要因为世界是我们的，未来在我们掌中，而摆那“十年的媳妇熬成婆”的旧架子。

二是老人，妇女，儿童，各各说自己的话；不要装假说别人的话。“盖惟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人生在世，各人有各人的活法，各人有各人的心性，要求，愿望与利益。从这一点来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是人生之常，而无须贬斥。彼此都可以各是其是，各非其非”。而且事实也必然是这样的。为了办事，只能求同存异，也必然求同存异，否则，天下大乱，殷鉴不远；同归于尽，史有明训。然而，为了言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为了思想随生活活法的变化发展而变化发展，却必须求异，存同而求异，“惟陈言之务去”。流水不腐，人法自然。

这样一来，异彩纷呈固然很好，奇谈怪论满天飞，怎么办呢？于是而有三。

这三，毫无办法。秦始皇帝焚书坑儒，据说是为了统一思想，历史的铁铸般的事实是，言论统一了吗？没有。思想统一了吗？也没有。希特勒也焚书，据说也是为了统一思想。结果如何，全世界都看到了结果。没有办法的办法，只好如咱们中国古人所实行的：百家争鸣；只好如他家外国古人所戏称的：大狗叫，小狗也叫。

理想的态度，自然是“同则相亲，异则相敬”；“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玉不琢，不成器，真理越辩越明。

然而，人人都要顽强表现自己，争论是难免的。“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法先王”，“按既定方针办”是做不到，也不行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我以为批评好，批判也可，大批判也是一景。在可见的将来，大批判是不会绝迹的。这固然是可悲的存在，然而，“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呀，不违背宪法，无所禁止。造谣，中伤，诬蔑，是违法。辱骂与恐吓不是战斗，对于老人也罢，妇女也罢，儿童也罢，不应要求他们对于异己言论的“兼包并容”，抱“自由主义”态度，只能要求他们除诉诸法治以外，不能求之于任何他力。比如，像林琴南先生写《荆生》那样，乞求于武人之类。

“兼包并容”是需要的，“宽容”是需要的，这要看清对象。这不能要求于言说者，无论老人，妇女或儿童，而只能要求于言说的掌控者，如一校之长，如一刊物的主编。蔡元培校长之所以名垂青史，与“北大精神”日月双辉，就在他掌北大时“兼容并包”“古今中外”，而不在蔡先生作为言说者毫无主见，不说自己要说的话。

同样的道理，“北京一份大报”能够发表青年不同意于老人的心声，哪怕态度激烈，言词尖刻，那编者和主编都令我肃然起敬，虽然，我孤陋寡闻，不知道是哪一份大报。最可怕的是压制青年的声音，当老言誉满全球的时候。

老言有老言的可贵处；不但老年同样享有发表老言的权利。然而，世界毕竟是青年的，一个社会应该充满洋溢着青春活力的青年的心声。如果一个社会多的倒是老言，未必是可喜的，未必是好事。当我也幸存入于老年之后，“指九天以为正兮”，是常常这样想的，的确，的确。

## 域外书讯

### 《托克维尔捍卫人类自由》

这是 Lawler 等人继《托克维尔的政治科学》之后选编的另一部评论集。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基本原则、当代论题与思想家、美国的制度。近 20 年来，有关托克维尔的研究日益深入，其出发点则源于当代民主制度的复杂现实，尤其是 60 年代之后，宪政民主国家的公民参与、性别与种族意识、多元文化等问题变得极为尖锐的情况下，研究者们得以重温托克维尔在 19 世纪做出的许多论断，重新讨论“道德约束与政治自由”、“封闭的个人主义”、“民主的暴政”、自由教育及宗教意识等问题；同时，托克维尔本人的思想气质也得到了再检讨，由这本文选的文章即可看出，所谓“保守的自由主义”的标签远不足以概括其思想的丰富性，已有论者以“一种陌生的自由主义”为题做了试探性的剖析。

## 底层知识者

### 摩罗

在他成为英雄之前，他与英雄的心就相通了。7岁那年，他读普卢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每读到一位英雄，就把自己变成书中的那个人物。罗马英雄西伏拉在伊特拉斯坎人包围了罗马时，担当起了行刺侵略者的国王的任务，不幸被逮捕审问时，把手放在火盆上烧，一声不响，向敌人显示罗马人抵抗侵略者的决心，卢梭在吃饭时向家人宣讲西伏拉的故事，激动得把自己的手也伸向火盆，体味英雄那激越壮烈的感情。若干年后，这个在苦难中久经磨砺的底层知识者终于也成了英雄。两百多年过去了，任何一个粗通人类历史的人都会发现，卢梭不是一般的英雄，而是在人类历史的某个关键时刻，以他无与伦比的道德力量和才学，把人类从黑暗引向光明的划时代的人物，是最可引为人类的骄傲的屈指可数的几个大英雄大导师之一。

1712年，日内瓦一个杰出的钟表匠的夫人生下卢梭之后就与世长辞了。几年以后，钟表匠本人为了逃避一件讼事，离开了日内瓦，这样卢梭在舅父的关照下受了一点教育之后，年仅12岁，就试着谋职自养，开始了漂泊无着的流浪生活。从瑞士到法兰西，从法兰西到意大利，周周折折，多次翻越阿尔卑斯山，年轻的足迹踏遍了欧洲大地，先后当过学徒、仆人、伙计、随从，还经常流落街头，衣食无着，连一位朋友借给他几双袜子，他也感激不尽，直到老年写回忆录时还念念不忘。几乎一切卑下的行当他都从事过，虽然他以杰出的才华常常得到主人的垂爱，但更多的是受到轻慢、冷眼和侮辱。虽然也曾醉心于浪漫的旅行，但由于衣食的困顿和前途的渺茫，他付出了数不清的眼泪，发出了数不清的深重悲叹。在万般无奈的时候，他违背本愿，去都灵进入志愿领洗者教养院，由新教改信天主教。教养期满，他以为会得到一个适当的位置却被赶出门；他屈尊去一家店里当伙计，不久以后，那个比他地位更高的伙计代表主人命令他立即离开并永远不准再进这个家门，命令中还夹杂许多恶言恶语；他去维尔塞里斯伯爵夫人家当仆人，夫人逝世后，每个仆人都按遗嘱得到了一年的工资作为馈赠，他却因为名字未列上她家人口簿，只得到一身仆人衣服和一些零用钱。夫人的侄子罗克伯爵答应给他谋份差事，让他去找他，他连去三次，都找不到机会与伯爵谈话，只好悄然离去。这一年，卢梭才16岁，一个最富浪漫幻想的天才少年，却挣扎在如此阴暗残酷的生存条件中，蒙受如此多的焦灼和羞辱，够让人心碎了。然而叫人不可思议的是，他在这种卑贱的地位上，虽然染上隐瞒、撒谎、偷窃等不良习气，却没有在这些恶习中堕落下去，竟然凭着他天才的良知，强大的向上向善之心，以及杰出的道德力量，将自己从最卑贱的境地中拯救出来，拔地而起，巍然耸立，成为肩起时代重任的旷世英雄和引领人类前进的千秋巨人。这样多灾多难的生活道路足够人类世代研究下去，这样汹涌澎湃、险象万千的心灵历程更是人类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

正是这样的原因，使得这个受尽冷眼的流浪者在身后博得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倾倒，正是这样的原因，250年后，他博得了一位跟他一样也是匠人的儿子而且跟他一样富于激情和浪漫幻想的少年的顶礼膜拜。那位少年就是生不逢时的我！我在中学时代几乎连接触卢梭名字的机会都没有，17岁那年，我来到一所学校学习中文专业，在懵懂未开的混沌之中，几乎是凭着心灵的感应，很快就发现了卢梭，迷上了卢梭。没有哪一位英雄比卢梭更能激起底

层人的自尊、野心、激情和强烈得无以复加的正义感，也没有哪一位导师比卢梭更能让我看到底层知识者的前途和希望。我发疯似地读着他的《忏悔录》，发疯似地读《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十几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当时作读书笔记时，恨不得把后者全本抄下来的疯狂，因为我感到这不只是一本论著，而实在是一篇充满义愤和激情的、浑然天成的抒情诗，是充满了谆谆教诲、庄严审判和美丽预言的福音。我的隐伏在天性之中的一切美好的因素都被卢梭激发出来，并得到其温暖的培养。后来，我在极其黑暗的日子里，又不断在心里默念卢梭，并继续研读他的其他著作，如《社会契约论》、《爱弥儿》、《新爱洛依斯》等等，汲取更多的精神滋养。我甚至模仿他在树林中构思他的杰作的习惯，利用星期日，独自徜徉在林中，捕捉激情的火花和思想的灵感。

1741年，29岁的卢梭带着一身贫穷，满腹才学和出人头地的信心，只身来到堪称欧洲文化首都的巴黎。这里有一批贵妇人和文人学士欣赏卢梭的才华，但巴黎并未轻易让他取得成功，连他在音乐记谱上的改革也无人理会，这个衣食无着的人一度打算靠背诵诗歌或下棋来作为谋生手段。当时的欧洲，虽然经过文艺复兴运动的长达几百年的洗礼，但封建势力仍然很强大，卢梭在巴黎所面对的，就是封建专制的政治统治，封建贵族的骄奢淫逸，腐化堕落，就是封建主义对于人民的压迫，对于人性的摧残和扭曲，对于人的尊严的漠视和对于自由的剥夺。这一切给了卢梭以强烈的印象。在十几年的流浪中，他已看够了也尝够了底层人民的苦难和屈辱，巴黎的刺激更使他怒火中烧。与此同时，尊严与平等的渴望，也正在欧洲大地上日渐滋长，在巴黎更有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等人在皓首穷经、苦思冥想，渐渐有充满新时代气息的著作问世，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已经进入了最后的酝酿阶段。卢梭到巴黎不久，就与日后启蒙骁将狄德罗·格里姆交往密切，相互影响，并成为《百科全书》的撰稿人。卢梭一天一天成熟起来，强大起来，全欧洲的神经都在他的身上跳跃伸张。他虽然贫困潦倒，却以其宽广的胸怀鼓舞着时代的潮浪。1749年盛夏，这个流浪者徒步去看望囚禁中的狄德罗，途中从一本杂志上看到第戎学院的一则征文广告，这时他异常兴奋，“登时就看到了另一个宇宙”，心中充满了对真理、对自由、对道德的热爱，充满了《名人传》灌输到他心中的英雄主义精神。在狄德罗的鼓励下，他挥笔写出了他的第一篇重要著作《论科学与艺术》，这篇次年在该征文中得奖的论文提出了科学艺术发展并不给人带来幸福，反而带来摧残和扭曲的观点，并批判了统治者对于文化的占有垄断。这个平民思想家就这样锋芒毕露地向统治阶级发出了他的第一次抗议和挑战。小时候由于不想学做“承揽诉讼人”求得发财之道，卢梭被书记官轻蔑地判为“无能”，并被赶出事务所，使他的自信受到严重创伤。后来，师傅的暴虐专横和旁人的冷漠几乎摧毁了他仅有的一点自负，直到这次得奖，而且已届盛年（38岁），他对自己的才能还有些怀疑，社会对于这位旷世天才的精神摧残何等残酷！而一个如此备受压抑凌侮和摧残的人，一旦放出他的能量，将会发生多么大的爆炸，造成多么强烈的影响，历史不是已经强烈证实了么？

1755年，《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诞生了；1761年，《新爱洛依斯》发表；次年，《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发表，卢梭的思想体系一步一步趋于完整。他以这些激情充沛的著作，探讨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消灭不平等的现实途径。他认为人人生而平等，人人享有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他

尽力呼唤一个自由、平等、博爱时代的到来，面对封建专制最后挣扎的凶恶面目，他提出被暴力夺去的自由应该用暴力重新夺回来，他用自己的生命向专制者喊出了反抗的誓言，向罪恶者挥起了消灭罪恶的长剑。

这时，巴黎向他撕下了宽容的垂爱的面纱，朋友纷纷反目，日内瓦政府焚毁他的著作，并无情地驱逐他，这个流浪了一辈子的底层人，在他已届老年，并为人类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之后，仍然不得不像一条丧家之犬那样四处飘零。

或许，正是过于悲惨的命运，成就了他的伟大学说和品格。他并不是最有学问、最具权威的人。当年，伏尔泰大树参天，几乎使其他一切学者都屈居其荫下，孟德斯鸠位尊如王侯，腰缠万贯，在安逸中读尽天下好书，可谓满腹经纶。但卢梭是最具革命性的、最彻底的思想家，也是最有个性光辉的思想家，因为，底层的经历是一条长青的河流。

还有谁比受尽耻辱的卢梭更懂尊严的重要呢？还有谁比他更好地履行了他提出来的美好原则呢？他在法国大革命将生未生的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如此坚定地站在封建主义的对立面，努力反对奴役和暴政，努力鼓吹感情对理性教条的挣脱，努力为一切被压迫者辩护，并努力为人类的永恒幸福寻找可靠的途径，难怪托尔斯泰盛赞他是 18 世纪的世界的良心。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良心。巴金多次把托尔斯泰称作 19 世纪的良心。在中国，在本世纪上半叶，也许可以把鲁迅认作是时代的良心，而下半叶呢？谁是世界的良心，谁是中国的良心？而卢梭不仅是他那个时代的良心，也是他以后一切时代的准则。他的思想不仅是法国大革命，而且是整个现代社会的政治、法律基础和文化精髓，整个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犹如反抗旧势力的坚强磐石，卢梭则是插在这个磐石上顽强飘扬的旗帜，这面旗帜上的题词就是现代社会赖以构成和发展的奥秘：人权、尊严、平等、自由！（《山东文学》1998 年第 3 期）

## 描述耻辱 摩罗

### 个性主义与人性尊严

“个性解放”是五四时代的强音之一，虽然就整个时代而言，当时对“个性主义”的理解并不深刻，但在少数代表人物（比如鲁迅）那里，无论是在理论表述上还是在人生实践上，都有了相当的发展。

但在后五四时代，个性主义的血脉渐渐消隐，也许这不难找到原因，中国传统文化内太缺乏个性主义的基因，社会的急剧动荡又不能为此提供温床。可是，在如此漫长的精神受难之后，尤其是经历了“文革”时代非人的折磨之后，文化学术界仍然对个性主义如此漠视，如此无动于衷，这叫人有点想不通。

这里说“漠视”，也许有点夸张。实际上，在所谓新时期中，有不少学人涉及到了个性主义问题。但是，除了极个别的人之外，大家都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学术名词在使用，至多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来追究，而没有把它与我们的精神状态和生存状态联系起来。如果“个性主义”只是我们用来描述异域文明、研究历史人物时所使用的一个“概念”，而不是作为我们的文化目标，如果它只是我们用来建设学术文化的一件材料，而不是作为我们的精神尺度和价值标准，那怎么能说我们拥有了个性“主义”呢？

有人说，人道主义的核心，就是个性主义。那么，个性主义的核心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尊严意识。我们缺乏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精神，根子就在于我们没有确立起人性尊严的意识。多少年来，任何别的东西都是重要的，唯有人不但不重要，而且是肮脏的，所以必须用别的东西来压倒人，讨伐人。有时也许是为了某个具体的需要而不得不采取漠视人的态度，比如为了战争的胜利，或社会的稳定，或家族的延续等。可时间一长，竟然培养起一种“瘾”，即使没有迫切的使命，对人的恐惧成了我们的基本心态，摧毁人折磨人成了我们的嗜好。我们既然对人所共有的基本属性怀有敌意，自然也会仇恨这种属性在每个个体身上的表现。于是，我们不但丧失了对于个人尊严和个人价值的尊重，还形成了一种反人道反人性的文化气质。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要谈什么个性主义和人性尊严，似乎难免有点不着边际。

可是，如果放弃了个性主义和人性尊严，人类还需要什么？还能拥有什么？我认为，个性主义和人性尊严乃是人类最基本的财富，也是最根本的财富。失去了这两者，人类的整个人文文化就失去了根基和依据，社会就处于失去人文精神的非生命状态。

实际上，我们正是处于这样的非生命状态。

本来，我以为，“文革”应该对这种非生命状态构成一个较大的刺激，“文革”的结束，应该成为我们生命觉醒和个性生成的契机。20年过去了，我们不得不承认，事实并不是这样。给我印象深刻的，只是一位龙钟老人痛定思痛的几声呻吟（指巴金《随想录》），其他老人则都在忙于控诉（而不是反思或忏悔），或忙于官复原职。年轻一点的则忙于成名成家。一些较认真的人，也只留下一些半真半假的经验材料，然后就不知去向了，他们没有兴趣去作原因的追究和意义的发掘，更没有兴趣去作精神上的担当。

“文革”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彻底地摧毁人性尊严。我认为，新时期文学本来应该在尊严问题上多做一点文章，这既可以为中国文学找到一个高的起点，又可以促进精神的觉醒。然而，“文革”以后的中国作家没有走这条路。30年前，苏联的中学教师索尔仁尼琴在无可摇撼的专制环境中写出了长篇小说《癌病房》，仅仅写到几十页时，就鲜明地凸现出了人性尊严的主题。实际上，19世纪俄国文学奇峰突起，其精神上的主要奥秘，就是他们致力于寻找和捍卫人性的尊严。可是，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发展中，著名作家成打成地涌现，文学书刊成车成车地发行，人的尊严问题却没有成为大家（或部分作家）的立足点，也没有成为文学合唱中的一个声部。大家不约而同地漠视它，遗忘它，无论是学贯中西的那一代人，还是“斗争哲学”哺育起来的那一代人，还是后来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化和后现代主义文化熏陶的那一代人。

也许某个细心的读者可以指出，某几部作品中具有一定的人性尊严的痕迹，然而我所期待的远不只是这些。一两位先知的孤独呐喊或轻吟浅唱不能代表时代的觉醒。我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张扬个性，寻找尊严，应该成为后“文革”时代的文化主题和文学主题。我们本来应该有一个声势浩大的文化思潮，将个人主义和人性尊严这艘双体船推向历史的海面，并让每个人，都成为这艘船的高贵的乘客和水手。然而，我们没有这样的思潮。

张扬个性和捍卫尊严本来不应该成为思潮，因为它不只是某个特定时代的主题，而是贯穿于一切时代的文化精神。我期待这样的思潮，只是为了借思潮的声势，来扫清一切非人性反人性的东西，为这种新的文化精神开辟出一条道路。在文艺复兴运动三四百年之后，在启蒙运动两百年以后，西方世界竟然还需要“美国人道主义协会”这样的组织，这个组织竟然还一再发布《人道主义宣言（一）（二）》（见美国人科利斯·拉蒙特《人道主义哲学》来捍卫人道原则和人性尊严，竟然还需要拉蒙特这样的斗士来向一切非人道非人性因素宣战，相比之下，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本是可想而知的。

## 耻辱与耻辱意识

当我们对人类历史作客观主义的描述时，我们只能看见苦难而看不见耻辱。耻辱是心灵的体验，是以尊严为坐标轴对生存状态的价值评价。当我们感受到耻辱时，这感受既可能源自外部的压力和凌辱，也可能源自对族类和个体生存状态的理性审思，而最后，总是要归结为内在精神的紧张和痛苦。

大约在十年之前，我痛切感到耻辱感的折磨，跌入了这种漫长的紧张和痛苦之中。我开始摆脱个人主义的冲动，转而寻找群体归依，急切地向知识分子群体寻找文化和精神的认同。我渴望通过这样的认同和归依，获得认识上的沟通和心理支持，渴望最少地拥有“自我”，而最多地拥有知识分子的集体“属性”。

然而，令我惊奇的是，在我所能延伸到的领域中，我几乎找不到有关耻辱和耻辱感的表达。那些出版物或致力于冲破思想的禁区，开拓理论的新地，或倾心于情感的宣泄，智慧和机巧的铺陈。这些著述者们都懂得自己的使命，并为这使命兢兢业业地工作着。然而他们惟独没有时间去反思一下自己的生存状态，没有时间用心灵去感受一下耻辱。

这是为什么呢？



不说别的，单从个人经验而言，这从“文革”的黑洞里爬出来的一代人，满身满心披沥着多少耻辱的灰尘啊。

何况，知识分子的精神资源，决不仅仅是个人经验，甚至也不仅仅是当代人的生活经验，而是整个一部人类的历史，是曾经或将要在这地球上生存的每个个体的痛苦、绝望与幻想。正像我们的个体发育史演绎了人类发展史一样，我们在精神上也应该拥有着人类史上所有的欢欣和苦难，所有的光荣和耻辱。开始也许只是不自觉地拥有着它们，而当我们自觉地拥有这一切并担当起这一切时，我们就成了一位知识分子。就是说，这个时刻，就是我们个性生成的时刻，就是我们作为知识分子的人格诞生的时刻。从这一刻起，我们不只是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在生物意义上成为人类生命的全息体，而且以自己的精神人格全息着人性的全部意蕴，因而，捍卫我们的个人尊严，也就是捍卫人性的尊严。从这一刻起，我们的每一次受难都不再仅仅是为族类所作的牺牲而首先是为了我们自身的需要，我们的每一次痛苦都不再仅仅是个体的挣扎而是折射出族类对于尊严与幸福的渴望。在风寒雨冷的时代，我们会因为申诉了自己的悲愤与抗议而表达出族类深心的希望与理想，在天崩地裂的时刻，我们会因为多担了一份族类的患难而成全了个人的光荣。诗人雪莱曾把自己比作宇宙的竖琴，要为宇宙奏出痛苦和忧伤。在这个特定的意义上，知识分子不正应该是自己族类的竖琴吗？

如果有这样的知识分子，他就应该最充分地张开自己的心灵，纤毫不漏地感受族类的和人性的全部耻辱，同时一定会无可遏止地将这耻辱感表达出来。

然而，我们很难找到这种表达。

当然，并不是完全找不到。比如1987年，从一位青年学人讨论鲁迅精神痛苦的文字中，我第一次看到了我所期待的耻辱感的表达。后来，在另几位优秀的学人和作家那里，我也陆续找到了一点。但就整个文化界而言，这点声音微弱得简直可以忽略不计，它们刚一产生，就被庞大深邃的麻木吞噬得无踪无影。所以我认定，就知识分子群体而言，我们远没有滋长发育起耻辱意识。正如一位学人所云：“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罪恶，却无罪感意识；有悲剧，却没有悲剧意识的时代。”

（朱学勤《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刊《书林》1988年10期）

要追究为什么，是太大太深的话题。我只能凭自己的感想，列出几条极为肤浅的回答。

第一是尊严意识的缺失。我们之所以感不到耻辱，恰因缺乏尊严意识。鲁迅说过，中国人自古以来从没争得过人的地位，永只在乱世之奴和盛世之奴间来回颠簸。到了近代，中国人的生存境况更是日趋恶化，无休无止的漫长凌辱把残存的一点人文气息扫除尽净。人们一步一步地后退，最后退到了只要能够呼吸、能够吃喝拉撒就心满意足的死角。对于长期习惯于动物式生存的群体，尊严不但过于奢侈，而且会成为负担。知识分子的精神产品中表现不出足够的尊严意识，正说明民族的生命机体中缺乏这种因子。

第二是文化理想的缺失。耻辱感首先意味着对自身生存状态的否定评价，而作出这种评价时，需要某种价值标准作为依据。一个尚未意识到自己的文化理想的群体，不但没法拥有对现实的生存状态的批判力，连最起码的感受力也没法具备。长期以来，我们在哲学上和艺术上一直深陷在可怕的混乱（表现为对西方“概念”和“文本”的泛滥成灾的抄袭）和同样可怕的失

语症（表现为无力作出原创性的理论建树和无力作出现实的批判）之中。你看卢梭在看清了早期人类纯朴自然的生活情景之后，鲁迅在听清了异邦的新声之后，他们对于自身的现实状况是如何地深感耻辱，接着而来的批判又是如何地勇猛有力。

一个新的时代，往往是在对旧时代的批判中渐渐萌生的，而对旧时代的批判，又只能在拥有了自己的文化理想时才能开始。寻找新的文化理想的最初动力来自哪里？来自耻辱意识的觉醒。在找到了新的文化理想的新因子之后，再反过来促使耻辱意识发育成熟。在具有生机的所谓新的时代，耻辱意识又转化为尊严意识。所谓尊严感，乃是按自身理想来创造自身的权利、信心和力量；所谓耻辱感，乃是受挫的尊严感。

我们连耻辱意识的最初觉醒还谈不上，我们离新的文化理想怕是还很遥远吧。

第三是自我要求的缺失。有一句这样的民谚：人无两块皮，百事都可为。把它翻译成文化人的话语就是：人一旦放弃了尊严，放弃了对自己的要求，那就什么境遇都可以忍受，什么丑行恶行都能干得出，再也没有羞耻可言。由于放弃了自我要求，我们无须拒绝什么，无须反抗什么，也无须要求什么，无须捍卫什么，更无须忏悔什么。表面上是无欲而刚，实际上是生命取消主义。

就这样，我们成了不知羞耻的人和不知羞耻的群体。

前几年——1989年下半年或稍后，一位著名女作家不满地说：我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活得这么感觉良好。

“感觉良好”的内蕴无非是：我们活得这么嬉皮笑脸，活得这么下流，这么无耻。

然而，生活是严肃而又神圣的，正如灵魂一样。我们应该为丑恶卑污的生活而害羞，而不安，而恐惧，而彻夜不眠。

由于灵魂的恐惧和颤栗，由于耻辱，我们应该彻夜不眠。

近年，一些有血性的学人从自身的生存困境出发，讨论起人文精神失落问题。有人马上从学理上对此提出质疑。质疑者完全漠视了这个问题中所包含的对于文化现实和生存状态的反思，漠视了它所表现出的精神的痛苦和呼告，从而把一场灵魂的拷问和挣扎转化为一场概念与概念的拼板游戏。他们真的一点也感觉不到生活的困惑与痛苦吗？我有点不相信。也许他们不过是故意东拉西扯，以逃避对于耻辱的正视？

不敢正视耻辱乃是我们所有耻辱中最大的耻辱。

如果我们还想改造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灵魂，我们就必须认认真真地咀嚼耻辱，通过反反复复的咀嚼，品出耻辱的真味真源和真义，然后起而反抗之。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同时还应该致力于描述耻辱，也就是以某种符号把我们内心的耻辱展示出来，这既是咀嚼耻辱的一种方式，也是反抗耻辱的一种方式。通过描述，赫然凸现出耻辱的存在，并无情地刺激起我们的耻辱意识。

或许，我们的灵魂和我们的生活还有一丝得救的希望？

## 疯狂与自虐

鲁迅的后半生，一直背着官方的通缉令，他却从容而又平安地写出了那

些咬牙切齿的文字。堪可对比的是，他的传人胡风却因了一封奏书而陷狱 25 年。难怪后人对鲁迅除了尊敬之外，还禁不住要羡慕他的好运气。试想，在秦城监狱的无可洞穿的高墙里，胡风能说什么呢？即使他的牺牲意志无限膨胀，一点自卫意识也没有，他仍然没法写出鲁迅式的文字。不是每个时代都能以立言的方式来担当世界。有时候，一切文明的方式都被野蛮所控制，真的文明者却连言说的权利也被剥夺。即使你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你也没法留下索尔仁尼琴式的坚定晓畅的文字，甚至连鲁迅式的隐晦艰涩也行不通，因为言说本身不再可能。这实在让那些“铁肩担道义”的知识分子为难，最基本的劳动方式已经无效，等于完全被剥夺了劳动权。他们要么放弃自己的人生立场，消解生命的意义和世界的意义，要么另辟蹊径，曲折地延伸生命，担当世界。

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经常陷入这样的境遇之中，积累了应付劫难的丰富经验。在魏晋那样的乱世，曾经有过一个知识分子团体，唤作“竹林七贤”。他们流连于山水，像纨绔子弟一样颓废放浪，纵酒行乐，却常常趁着人家不注意，向那人烟稠密和冠盖云集的地方，骂出他们的蔑视和愤恨。直到今天，阮籍、嵇康、刘伶等等这些自外于正统思想和正统体制的人，还负有半痴半傻半疯半狂的名声。可当我们以自身的经验感应到了他们血脉的冲撞，我们终于知道，他们才是良知未泯的人，他们的精神变态，正是那个时代所能找到的“正视人生”的方式，他们的变态人格本身，成了印证严酷时代的最真实的文本。被剥夺了劳动权利和言说权利的良知未泯者，只能这样用他们的披头散发，他们的疯言谰语，他们的玩世不恭，他们的奇形怪癖，来发泄对于血雨腥风的仇恨，对于尸骨遍野的忧患。他们唯有牺牲自己的常态和体面来言说内心深处的耻辱。

魏晋以后，直到晚清，名士风气绵延不绝。他们褴褛衣衫，污秽面目，狎妓纵酒，自诩风流。他们着意消解人生的意义，不无夸张地嘲讽人生，玩弄文字，游戏世界。那时的君主虽然对文化人特别留意，可对那些痴狂怪诞的名士，却认为无伤大体和大雅，任其潇洒又逍遥。这等于为那些不愿意或没机会卖身投靠的文化人留下了一条苟延残喘之路。那些名士们就这样躲在专制世界的夹缝里，小心翼翼地自尊自虐——我没有能力担当起我的责任和我的耻辱，我只有通过自尊自虐来曲折地表达我的意志，表达我对外界的抗议和对自身的恶心。

我曾极度蔑视过古人的这种名士风度。但在某一天，当我为自己的正常而羞愧时，我忽然对那些变态而又痛苦的人钦敬不已。在我们空前的麻木衬托之下，古人的变态显得高贵起来，因为在这变态之中，深隐着他们对于自身精神创伤的觉察，对于自身精神软弱的怜悯与羞愧。

真是不幸，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耻辱，既没有在文字之中得到相应的记录，也没有以别的符号别的形式得到生动的表现。以没有言说权利来作辩解是无力的，因为言说之外的某些形式是永远剥夺不掉的。如果我们的心灵没有完全麻木，如果我们的灵魂没有完全堕落，如果我们良知犹存，如果我们还为自己的耻辱痛心疾首，那就不可能不对自身和世界作出真实的反映。即使没有言说的权利，疯狂和自虐的权利总是有的。一切都可能失去，唯有疯狂和自虐，上帝会永远为我们留着。我们如果没有利用这种权利，责任不在外部，而完全在我们自身。

而且，在我看来，当我们在人性的荒漠里深深体味过生命的寒凉和绝望，

当我们终于从一道又一道死亡之门爬过，耻辱感和反抗欲应该膨胀得无边无际，即使解除了一切外部压力，言说也不足以表达我们的痛苦和恶心。除了疯狂和自虐，实在没有别的出路可找。

在反思和批判的理性尚未诞生时，我们是多么需要义无反顾的偏执狂。然而没有。

我们没有疯狂的学者和学说，没有疯狂的作家和作品。

如果这意味着个体人格和民族心态的健全多好。

然而不是。这只能意味着民族的麻木和知识分子的精神堕落。

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许是因为无力担当，而假装看不见苦难和耻辱，持一种逃避的态度。可是久而久之，我们就真的看不见了，这时候说逃避还抬高了我們。我们实际上完全失去了良知，失去了生命感受力，失去了生命本身，以至于完全意识不到自己的精神创伤。

实际上我们的精神创伤是如何地深重啊。

我们无可选择地生存在最严酷的历史境遇中。我们所蒙受的耻辱也许足以激起世世代代的同情和悲悯。也许我们有权向上帝要求抚慰和拯救。然而，上帝只能拯救那些勉力自救者，后人能不能同情我们，首先取决于我们传给他們什么样的精神和血性。如果我们还打算继续生存下去，就应该首先遏止自身的堕落。再不可原谅自己了。再不可为自己辩解了。我们至少必须勇敢一回，残酷一回，必须真实一回，清醒一回，或许可以藉此得到一个走向自救的契机。否则，怕是永无得救之日，而且只能说是活该。

我希望看见这样一个人，他精赤着身子，很瘦弱，走在血雨腥风的古道上。他手持一支长鞭，每走一步，就朝自己鞭笞一下。他鞭得歇斯底里，然而平静。血印子一道一道像蛇一样缠满了精赤的身子，然而那鞭子依然一下一下地、劈啪作响地劈向那残破的身子。这样的身子，下贱而又荒芜的身子，早就如废铁一样麻木，一直到鞭子穿透这稀烂的肉体，触着了深处的心，这个不幸的人也许才会有一点知觉。

然而离这一步还远，所以他唯应鞭笞下去。

（《百花洲》1997年第5期）

## 思想书廊

### 《和谐与统一——玻尔的一生》

[ 丹麦 ] 尼耳斯·布莱依耳著 戈革译

东方出版中心 1998 年 5 月出版 定价：22.00 元

尼耳斯·玻尔 ( 1885—1962 )，丹麦物理学家，20 世纪科学家的杰出代表。以他为首的“哥本哈根学派”建立并完善了量子力学理论，20 世纪的科学因而飞跃性地发展了无数分支学科。“哥本哈根精神”代表的团结协作的科研风格至今仍为世界科学界所推崇。本书叙述了玻尔的人生经历：剑桥求学、二战出逃、援助难民、玻尔—爱因斯坦论战……以对其一系列重大人生事件的描述，勾画了一个卓越的科学家的深邃思想和人生态度。

## 略论英雄主义

肖雪慧

近来时兴谈论淡化英雄主义。据说现今商业社会不同于刚逝去不久的这个时代，逝去的是英雄时代，继之的是凡人时代，英雄主义已不合时宜。此间，称逝去的是英雄时代，是因有人能以一己意志号令天下、运动全民，还是当年有红卫兵精神的勃兴，这精神在伪理想主义教唆下大打出手，使无数人无辜受难？抑或指面对不断的运动不断的的精神施暴和肉体施暴，在普遍的沉寂和普遍的委曲求全中不时出现过几个孤立无援的反抗勇士？究竟依据了什么，言者语焉不详。至于说现在是凡人时代，就算有理，可要淡化英雄主义，总得以当下人们还普遍追求它为前提。假如这时代的实际精神状况根本就没什么英雄基调，又何来英雄主义可淡化？

种种疑问即使存而不论，喊淡化英雄主义，还似乎有那么一点看不惯精神表现上与众不同甚或与己不同的意味，在不容精神追求多样性上与那种要人人当英雄的号召其实两极相通。我认为，人这个种族最有希望的特质就在于人的精神状态、行为方式无比丰富。英雄主义作为人的一种精神状态，固然有与时代特性、社会风尚相关的一面，也就是合不合时宜的一面，但更与个人气质、教养和人格追求相关。这后一面使它可超越时代需求，超越是否合时宜的计较，不论在英雄时代还是凡人时代（假如可以这样划分的话），都有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因为，它参与了构成人类精神风格的丰富性。何况，英雄主义意味着一种宏大气概和勇气，意味着对责任的一种自愿承当。这一点，不论从那些只身撞击黑暗的先驱者身上，还是日常生活某些关头出现的见义勇为者、仗义执言者和维护人的尊严与权利的人身上都可见出。虽说曾经有过今后也仍然会有以无数普通人的幸福和生命为代价去成就“伟业”的伪英雄主义扰乱视线，但人们并不傻，大家普遍认可的英雄主义不是这种视“小民”如草芥的“气魄”，而是时代先驱和那些在必要时勃发出勇气的人所展现的精神特质。

就此，且回到先前存疑的问题：英雄主义在我们社会中是否已经多得遮天蔽日，妨碍了其他精神的展现，非得淡化不可？实情恐怕正相反。即便在据说是英雄时代那段时期就早没了多少英雄主义，如果不把号令天下的霸气和有恃无恐的打砸抢误认成它的话，如果不以为少得孤立无援的几个勇者代表了时代的风格的话。其实，当年不仅少有英雄风格，相反倒是普遍的人格萎缩。要不然，怎会连声名显赫的科学家也信口雌黄，煞有介事地撒弥天大谎，用所谓科学论证为亩产万斤的全国升虚火添油助燃；又何至于在现代造神运动如火如荼时有大诗人凑热闹，写出“伟大领袖比爷亲”的喷饭之作。这可不光是雅人作俚语，实在是灵魂正作匍匐状。想到这在当时颇具时代特色的状态，居然有人加封那时为英雄时代，真是幽默得可以！说到如今，人们实际得很，没多少兴趣光顾英雄主义。这或许是某种长进，但太过了头也成尴尬。“英雄时代”的萎缩人格部分地原封不动遗传下来，部分地转换成锱铢必较的讲求实利和憋足劲地向市侩化冲刺，特别是再加上傍款、媚权的新时尚，英雄主义遭到多头夹击，已快濒临绝种。虽说还在一些人身上蠢蠢欲动，但只要想想：已很稀缺的见义勇为者常遭受援者诬陷，敢于揭露丑恶的记者屡吃官司而且十之八九准败，在更带风险性的问题上发扬英雄主义的人更令人胆寒的命运……它还有多少容身之地？这样一种实况下喊淡化英雄

主义，实属牛头马嘴之误。已快绝种还嫌多，有朝一日，当它真的绝灭了，当人（最好是鼓噪淡化者自己）置身于什么危难中时，环目四周尽是练达看客，没人有些许该出手时就出手的英雄冲动时，恐怕又得希望这精神还是不要绝灭的好。

话又说回来，就算时下真的到处涌动着英雄豪气，也不见得就妨碍了什么。只要不是去号召别人（号召别人当英雄犹如号召别人自我牺牲，多半有点占便宜的嫌疑，因为常常是倡者无需表现英雄行为却可以从别人的英雄行为中获益，这英雄主义就常常变成了拿人作祭品的祭坛）而是作为个人自身的一种精神表现或追求，那么它就像另一些人要追求平淡些的风格一样，是白菜萝卜各有所好，旁人最好免开尊口。因为，在事关个人选择的问题上，还是尊重个人、尊重多样性的自由主义态度比较明智。

## 思想史上沉重而轻浮的一页

肖雪慧

当世界正以急速的步伐走向 21 世纪时，我国社会也正处于一个转型期。对于人来说，这是巨大的机会与深刻的危机并存的时期，它使人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更使思想界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本世纪以来，由于世界工业化进程加快而迅速发展的经济为人们的物质丰裕提供了可能。实现富足生活的希冀极大地刺激了人的欲求，调动起许多人沉睡的潜力。但这一过程也潜藏着许多隐患。例如，专业化对人性的分割；过度的物质主义对人的丰富性的遮蔽；大众传媒以大量信息包围人而致使一些人精神麻痹；对科学和技术的崇拜则可能使人的生活局部和细节上获得更大方便、显得更为合理的同时，人的环境和自身状况在总体上却日益非理性化。对即将跨入 21 世纪的人来说，这些隐患早已演变成现实的危险，而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全球范围出现的人口爆炸、生态失衡、能源危机以及人类利用科技手段释放出来的核力量更把人类置于头悬达摩克利斯剑的险境。在我国现阶段，人们不仅面临这类世纪之交的普遍问题，还经历着近百年蹒跚曲折历程所积压的老问题和转型期的阵痛带来的新问题。一方面，对痛感国家在近代落伍而本世纪又经历了半个世纪战乱的中国人来说，经济繁荣、政治民主、国泰民安是梦寐以求的世纪理想。这个理想要求我国赶上发达国家，从近代全面落伍的阴影中走出来；但发达国家走过的经济发展道路带来的困境又使我国面临着在致力摆脱近代落后状态的同时又要着眼于未来而摸索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双重任务。这双重任务的艰巨性对人的素质提出了极高要求。然而人的素质，尤其是精神素质本身就是我国当前异常突出的问题。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人们曾久遭禁锢、现今在远未规范化的商品经济刺激下爆发而出的“原欲”给社会生活带来了剧烈震荡。近年出现的把市场观念套用于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倾向又致使崇拜实用性、贬低精神道德因素的实利主义弥漫于全社会，由此造成的社会氛围诱使人以全部生命力扑向外在之物，感情只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而萌动，自己把自己限制在一个使精神毫无拓展余地的纯现实中而不能去经验更丰富的生命。人在忙于实利、忙于物质追求时往往逃避面对自我、逃避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忙碌中的精神懒惰和自我疏远造成人在自己正面临的人性危机上的盲点。至于一些人借助于不规则的市场发迹，加之由体制弊端而生的权力经济特有的腐败活动无孔不入，使得许多盛名不过是成功的罪恶，这又不仅加剧了转型时期难以避免的价值震荡，而且动摇和瓦解着人性所凭借的基本价值和共同生活所倚仗的基本原则。憋足劲向鄙俗化、市侩化冲刺竟有成为时尚之势，以至像保持良知这一亘延数千年而且只要人不甘堕落就必须一直亘延下去的人性法则也在遭到冷落甚至是奚落。所有这一切都在警示，人们正面临着人格涣散的危机。

正是这种危机和搅动了中国知识界灵魂达百年之久的老问题与世纪之交的人类普遍问题交织在一起，使我国思想界面临严重挑战。应对这种挑战，要求于思想界的首先是诚实不欺直面现实的态度和超脱功利羁绊而自由探索的精神，同时，一个有利于自由思考的社会环境也必不可少。然而当我们依据这种要求回眸过往的思想史，尤其是当代学人在即将过去的这个世纪亲历的一段思想史时，却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凉和深深的忧虑。



自古以来，中国思想界都置身于一个与思想活动的本性极不相容的狭小思维空间，无数禁忌、戒律给思想活动，尤其是思想的表达设下了重重障碍，与禁忌、戒律相配合的社会赏罚机制更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力量把思想及其表达收敛在由这些禁忌和戒律编织好的罗网内，只有极少数人敢于抗衡现实而强大的社会赏罚，以非凡的勇气蔑视种种禁忌、戒律而自由思考，但结局都极为悲惨。绝大多数人或出于趋利避害的现实考虑而把自己的思想纳入社会所允许的轨道，或因禁忌、戒律的内化而自我限制。无论哪种情况，都导致思想界整体思维能力的收缩和智慧的浪费。

近几十年，思维活动空间狭小的情况并无实质性改变。50年代初期的知识界怀抱思想自由的期待和对新时代的信赖曾呈现过短暂的精神亢奋、思想活跃状态。但接踵而来的是反胡风、反右直至“文革”这些既粗暴触及灵魂又残酷触及肉体的思想压制运动。这些运动的惨烈程度，其波及面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对知识界心灵影响之深，过去很少有哪个时期能与之相比；而在有效地把独立思考消灭在未发之时方面，更难以有哪个阶段能与之匹敌。从50年代中期到“文革”结束的20年间，大伤元气的思想界夹缝求生，如履薄冰。不屈不挠地追求真实既为致祸之源，以假话、套话为自我保护的必要手段也就势所必然。于是，思想文化舞台上独占风流的只能是一些拒绝理性审视而冒充权威的东西，此外就是各种毫无思想含量、依附于权威和教条、为其作陪衬的应时之作。如果不是还有一些使作者横遭不测的批判作品所表达的独立思考或者深藏在隐晦曲折的词语中甚至包裹在无个性的套话中的独立思考（其实这种曲笔手法也很难保作者逃脱厄运），如果不是还有极少量出自监狱、牛棚的“地下作品”或“罪状”凝结着像顾准、孙冶方、遇罗克、张志新这样一些思考者的无畏思索，这一段思想史几乎是一片空白。

好在，思想史这沉重而贫乏的一页随着祸国殃民的“文革”的结束而终于翻了过去。国家百废待兴，思想界既面对着总结历史教训的艰巨任务也面临着一个历史难遇的发展时机。在这个阶段之初，社会各阶层对思想界的高度期望以及一个个思想禁忌的解除，为思想界提供了自由思考的条件。从思想界自身看，经历了若干次严酷的思想压制运动而沉寂的一代从对把国家、民族和人性推到毁灭边缘的“文革”灾难的巨大惊愕中受到震撼，劫后余生、痛定思痛；在共和国时期出生、文革中成年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则以自己独特的经历、体验、观察视角以及无穷的疑问和求索的热望加入到思想、学术领域。至少就总体说当时的思想界是勇敢面对了自己的历史责任的，无论是反思共和国走过的路还是向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禁区突进，无论是批判还是探索、创造，都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锐进之气。这是思想史上一个富有成果的阶段。尽管以现在眼光看，出现于这期间的许多思想成果或许幼稚和粗疏，但却透着不多见的坦诚和勇气，既不像过去那样畏缩、拘谨也少有后来充满功利计较的哗众取宠、油腔滑调和矫情虚饰。这个阶段思想界在使我们这个民族真正开始触摸到理性精神方面功不可没，对于推动全民族的思想解放、为改革奠定思想、舆论基础方面更是功不可没。如果沿着这个时期的路脚踏实地朝前走，完全有理由期望在本世纪余下的20年左右形成一个成熟的思想理论界；当本世纪结束之际，思想界自身也将可以无愧于心地面对任何领域都必得面对的世纪提问：“我们给这个世纪留下了些什么？”

遗憾的是，由于两方面原因，在20世纪已将结束时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形成一个可以无愧于心地面对世纪提问的成熟的思想理论界。一是经历了或

目睹了历史悲剧的知识分子在勇敢地反思过去、作社会批判和总结历史教训之时，没有以同样的勇气和充分的自觉作灵魂的拷问，忽视了历史悲剧的发生与知识分子整体人格的不健全和软弱的关系。知识分子以受害者和批判者身份控诉或评判了所发生的事件，但自身人格弱点依在，这些弱点会遗传下去并在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下以别的形式表现出来。二是在共和国时期为害了全社会和思想界 20 多年的极左势力在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后余威犹在，不断兴风作浪，极力阻遏对历史的彻底反省和对极左罪行的彻底清算，试图重新支配全社会的思考和判断。这股势力一有机会就要凭借权力与书气意气的学者进行不讲规则的较量，对思想学术领域的论争和探索进行恶性干预。阵发性的干预不仅打断了思想学术的正常发展，而且种种恶性干预调动社会赏罚力量所作的奖劣罚优、鼓励卑鄙、惩罚高尚的逆向示范与社会转轨期某些特殊因素结合在一起，对知识分子本来就未能通过自我反省而提升的精神人格发生了灾难性的破坏作用。这些因素是，转轨时期经济秩序的混乱，普遍的物欲膨胀和行为失范，由经济秩序的混乱而伴生的机遇和诱惑……在不仅清贫而且横亘着过多人为障碍的诚实探索之路与由畸变的社会状态推到自己面前的种种实利诱惑之间，许多人作了趋利避害的选择。如果这种选择只是表现为放弃思想者的艰辛生涯而转向较为实惠的职业，倒没什么可说。人要生存，并且希望生活中少一些逆境多一些顺境，知识分子也不例外。然而当趋利避害的选择表现于把学术研究理论探索置于趋利原则支配下，人格的畸变以及思想理论界功能的畸变在所难免了。因为，知识分子固然应该有包括对物质满足、事业成功等等在内的功利性追求，但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又要求有超越于种种功利计较之上的求真意志和相应的自律精神，否则很易陷入无原则性和投机性。不幸，这正是 90 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理论界的通病。

一部分人在极左势力掀起的阵发性政治痉挛和不容异见的一言堂中练就了翻云覆雨的小人作风。思想环境相对宽松时，这些人不妨表现得很前卫，满口操着新潮得很的术语和惊人之论，只要能引起轰动，管它是否站得住脚。一旦气氛有变，他们又会毫不困难地转而根据某种政治需要去操起时令语言或犹如化石般的程度化语言、大批判语言，干起打击别人的勾当。他们因善于敏捷地跟着事件走，任何情势下都游刃有余。然而这种为人们不耻的小人行径还不构成学术理论界的最大危险。真正危险的是学术理论界在利益驱动下普遍的心性浮躁。在社会急剧变化之际，学术理论界不少人既不愿认真观察、思索但又不甘寂寞，急功近利地试图要说明一切，急急忙忙为一个个常常相互冲突的现象或时潮作合理化甚至道德化论证，整个学界出现了从过去脱离生活依附于教条转而委身于表象的倾向。现象的非本质与时潮的短暂和无常使飘浮其上的种种论断不仅肤浅而且毫无独立品格，表现出极大的随意性和无原则性。在缺乏健全的学术规范和评判标准的情况下，本不应在学术领域有立足之地的随意性和无原则性论断却以假压真，充作学术成果招摇过市并藉此换来种种实惠。这种情况刺激把功利心置于求真之上的人对社会提供了大量不负责任的见解。当 90 年代初出现全民经商的非理性狂潮时，理论界就有不少人以轻率的议论推波助澜；伴随非理性的全民经商潮出现了一个同样非理性的势头，即市场交易原则越界运行，市场关系遮蔽人要发生的一切关系。对此，理论界也难辞其咎。因为正是理论界不负责任地拼命教吹所谓“一切按经济规律办”，“把一切拿到市场经济层面进行交换”，却无视一个基本常识：社会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领域，也更不是一切关系、任何东西

都可以商品化，都可以用金钱或经济眼光来衡量和处理。但是对于浮躁的理论界来说，现存的就是合理的。由是，可以把权钱交易、行贿受贿等腐败现象解释为社会发展的润滑剂，而且还有了把色钱交易吹捧成契约精神萌芽的怪论。当社会上流行把无价值无信仰和良知麻痹标榜为现代性时，理论界又会有视社会责任感和遵奉公理为过时观念的时髦之论相呼应，还会出现把知识分子承当“社会良知”解读为想维持自18世纪启蒙时代以来知识分子作为民众教育者和社会中心地位的说法，这种说法貌似谦逊实则化解知识分子社会功能。然而，当代知识分子固然不必去要求什么民众教师或真理发言人之类地位，但承担“社会良知”的角色意识却不能没有。这种意识的含义是，知识分子受过的系统思维训练及其专门从事于精神文化活动这一事实要求知识分子对时代的精神状况负有较大责任。这种责任要求在社会黑暗精神沉寂之时，应该有勇气去探寻和揭示被掩盖的真相，在人们中间撒播怀疑旧秩序的种子；在较为清明和繁荣之时，则应以深具洞悉力的眼睛搜索问题，敲打时代及时反省。而事实上，至少在我们自己亲历或目睹的20世纪后半半个世纪，从总体上看，我国知识分子很少担起过这种责任；现在，当巨大机会与深刻危机使整个国家和思想界都面临严重挑战时，思想界应该正视矛盾，正视人所面临的克服物化和人格涣散危机的新挑战，在帮助人把握发展机遇、摆脱生存陷阱方面有所作为，在这种情况下，反对知识分子本来就所剩不多的社会良知意识便极为荒唐；如果考虑到在我国承当“社会良知”总是招致祸端，这种化解知识分子社会责任的说法就不仅荒唐而且虚伪。

当上述种种议论频频出现并领了风骚之时，表明浮躁已在把思想理论界导向与那种表现为翻云覆雨的显性投机并无本质区别的隐性投机。种种投机性论证则为正在社会中蔓延的调侃一切价值、消解生存的严肃性和公理的神圣性从而使人良知麻木的道德相对主义，或者干脆蔑视一切规范、割断自己与文明联系的反道德倾向抹上了一层“观念更新”的油彩，罩上了一件“新潮”或“现代”的外套；对于道德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瓦解基本价值、模糊普遍法则给人的行为确定的界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些年，不断从一个潮流扑向另一个潮流的思想理论界新论迭出看似活跃，然而在表面的热闹和繁荣之下却是精神上的贫瘠、慵懒以及前所未有的轻浮。尽管仍有人脚踏实地研究探索，而且也有一些人对自己作为社会良知的社会承当历经九死而不悔，但他们的存在和艰辛无畏的思考并不能改变本世纪末叶我国整个思想界的轻浮事实，虽然出现这轻浮的一页也有着极其沉重的缘由。自由思考之路密布的荆棘、诚实无畏的思考者孤独而沉重的命运就是对这缘由的提示，并且也构成这一页思想史上与轻浮性相对的沉重性。但这沉重的一面不能成为推诿的理由。不管怎样，我们还得面对“我们给这个世纪留下些什么”的问题，面对自己亲历的这一页思想史所留下的教训。

## 思想书廊

### 《古典思想》

[美]特伦斯·欧文著覃方明译下的教训。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年 3 月版定价：19.20 元

对于想了解希腊和罗马世界的哲学、历史背景以及文献的人来说，从这本书由浅入深较为系统的论述中或许能得到些满足。

从荷马至圣奥古斯丁的一千余年间，在古典思想中有一些有哲学兴味的论题这里都有所涉及。包括苏格拉底哲学、斯多噶的和伊壁鸠鲁的哲学流派。当然，古典思想不仅限于哲学，书中还讲到了医学、数学、天文学、力学、物理学，以及史学、语法和文学，所有这些都都在古典思想中获得发展，也都与哲学有密切的联系。

本书为“牛津精选”丛书之一种。丛书共 10 种，余见本报 3 版邮购书目。

